第一章　共生史观

人类对于自身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如何看，经历了漫长的观察与探索，最初普遍是一种“神天史观”，认为神或天开创了一切，是耶和华、上帝、安拉创造了人，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就连不太相信一神教的民族，也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有祭祀天地鬼神的习俗。这种“神天史观”一直流传、影响到现代，是各类宗教信念的基础。在社会出现能诛戮杀伐的国家权力以后，产生了“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帝王将相、天才伟人们书写的，人们的命运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由此延伸把人类历史进程看成为人类意识活动的“唯心史观”，脱离了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出现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变革阐述了历史，这是历史科学的突破。但其后的发展，把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遗产，如宗教的导善的教义，各种社会改良的运动与思想，甚至民主革命反专制的理论成果等等，都视为变革生产关系为公有制的障碍，斥为“唯心主义”，与之决裂。因而忽视人的主体活动是物质生产、知识创造、实际生活、精神价值四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贻害至深。民国期间，有任觉五著《唯生论与民生史观》（1934年）阐释孙中山之民生主义。到了21世纪的今天，笔者在诸多史观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与考察，开宗明义地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总结为“共生史观”，试图阐明人类由原始部落群发展到全球国际社会；由动物界的很少数发展到60亿人口的大种群；由蛮荒、愚昧状态进步到今天文明昌盛，是通过漫长的、自始至终的分工合作、交流交换，为己利他和发现发明、创造、革新的结果；也是不断扩大共生圈（即不同范围、由小到大的生活共同体）直到全球的历史；而不仅仅是部族、民族、国家、宗教、阶级、集团矛盾斗争，直至你死我活，暴力、恐怖、战争的历史。尽管在共生圈扩大的过程中，有征服、有血腥，历尽了种种灾难，至今还存在着巨大的生存与生态危机，但绝对多数的和平人民还是在持续书写着劳动生产、知识创新、改革渐进的文明进步的历史。如果我们认真总结人类和平发展正面的经验以及恐怖、战争的反面教训，辨明历史总体进程的范围大小，数量多寡，主次重轻，发展趋势，将不难看出，共生是历史的主流。共生是历史、是现在、是将来。一切非共生的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终将在人类共生的洪流中被历史所淘汰，这便是本章所要阐明的共生史观。

第一节　共生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名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两种生物个体之间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包括互惠共生、偏利共生和寄生。因之，共生既包括有利的联合，也包括有害的联合，共生的个体称为共生体。……从广义说，生活在一起的两个种群的联合，不论从单一的耐性和共同享用空间以至各种形式的种间相互

作用，直到掠食作用，都是共生关系。”（第 3 卷第 441 页）共生概念首见于 1879 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的著作中，后生物学界发现，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近年生物工程学研究直至生命机理，发现“生命不是简单的原子、分子组成，而是由‘共生统一体’形式建构而成的，或者说是以酶的形式存在着”。[1]由于微观生命现象被发现，使共生概念不仅具有生命科学内涵，而且因为它与共存、共处概念如此接近，更具有社会科学、历史文化直至哲学上的意义。在二战和冷战结束以后，人们普遍地要求和平，厌恶战争，被愈来愈多的学科把共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使各学科增加了新的视角和内容，而被形形色色的世界观弄得混乱不堪的思想界，在寻找出路中也对共生现象进行本质的、理性的思考。首先，哲学把“共生”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来解释世界：“它泛指事物之间形成的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命运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多元并存，异类同生、互利共生现象。共生是事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或生存方式。”并具有本原性、自组织性、共进性、开放性和可塑性等基本特征。[2]其次，经济学界，如韩国经济学家李承律所著《共生时代——东北亚区域发展新路线图》，把共生概念作为时代的标识，并且指出“人们虽然热衷于竞争并夺取胜利，但区别于他人的挫折和绝望，并不能成为自己的希望和胜利的基础。”揭示共生思想与人们谋求幸福的本质联系。[3]我国经济学人更作出新的贡献，如吴飞驰在其所著《企业共生论》一文中，把共生具体定义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或生存结构”，提出人类共生的经济学规律——共生律。它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本质，它是冥冥之中引导着每个人走向合作，融合共生的神奇的最基本的“自然律”。遵循共生律的“经济人”在现实世界中不由自主地变为一个“共生人”，因为“共生”是成本最小，快乐最大的理性选择。[4]还有袁纯清博士的“金融共生理论”的出现（2002 年），企业管理界更是把共生思想普遍运用于建立具有很大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实践中，促进生产、营销、消费共生关系的发展。结合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生态经济学中人与自然共生理念纷纷出现。再次，有生态学者把人与动物界共生喻为“再造方舟”，扩大了共生概念对生物界及人与自然构建和谐秩序的意义。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的著述出现[5]，而社会学，更可循派克的共生体系与共识体系的思路，探讨全球化中的共生共识理论。于是，共生概念不仅在酝酿着各学科理论，而且由于它的基础性、普遍性、常识性和多层次的实用性，进而概括为“共生原理”，赋予深刻的科学与道德双重内涵。而本书的“共生”概念是在下述涵义下进行思考与写作的，即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过程中理性地选择损失最小、收益最大；痛苦最少、快乐最多的一种思维与生活方式，它反映着人类生活的本质方面和基本方向。

第二节　人类的历史——共生圈不断扩大的历史

生物共生的普遍性，主要还是表现在植物界。动物界普遍存在的却是种群内的共生与种群外的不共生。动物主要分两类：素食动物与肉食动物。前者以草食为主，如

马牛羊鹿，后者以肉食为主，如豺狼虎豹。前者天性和顺，后者天性残暴。在人类面前展现两种生存方式：一是我活你也活，这是人道；二是我活你必死——“豺狼要饱羊要命”，这是兽道。人在以果实，块根为食时，也是和顺的，但在抗拒恶禽猛兽的过程中，在追捕和顺的动物时，也过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肉食生活，特别是使用火以后，由于狩猎的需要和熟食的美味，原来素食和顺的本性逐渐被嗜血所替代，特殊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动物界不食同类的自然界限。在原始群、氏族、部族的内部，他们保持着共生关系，而对异氏族、部族一般则是不共生的。因争夺食物、牲畜、牛羊、土地而相互厮杀，对战败者一律宰杀。至今，我们还可以在非洲看到部族间仇杀几十万人的事例，如非洲乌干达。在古代也可以从《圣经·旧约》（约书亚纪）中看到“艾城人倒在刀下，直至灭尽……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的故事。[6]本书把这种群居共生、氏族、部族内的共生，利害相同、生死与共、语言信仰一致的生活共同体统称为“共生圈”。在共生圈内与圈外的人，其对待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圈内保持共生关系，圈外则根据不同情况，或友或敌，是一种异己关系。对于异己，今天可以成友，明天也可能成敌，取决于对自己的利害和两者之间的信仰关系。部落、部族，有一定的血缘或亲缘关系，内聚力是比较强的。游牧民族诸部族就明显地表现这一点。农耕民族逐步地固定在一定地域，加上一种地缘关系。由于人口的繁殖，土地有限，而且土地肥瘠程度不同，就产生争肥弃瘦的争夺。再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人可以用来当牛马驱使，以增加自己的财物。战争胜利的部族就开始不把战败的部族男人杀光而当作奴隶使用，只留女俘，为他们生儿育女。虽然这些妇女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屈辱，但与全部灭绝的相比，他们还能留下一半左右的人口溶入征服者的共生圈。这便是人类扩大其共生圈的初始状态，也是一种常态。其后，征服者普遍把男俘留下来充当作奴隶为征服部族服务，于是共生圈的规模便更加壮大起来。另一种扩大共生圈的途径，是部族间联姻或共同对付外族侵略而联合的形式。这两种一个是暴力扩大，一个是和平联合，而宗教信仰又是扩大民族共生圈的粘合剂，起到形成民族巩固共生圈的作用。这样，便在部族、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共生圈以国家形式持续至今。以征服为特征的古代大帝国就是扩大共生圈的结果。波斯、亚历山大、罗马、阿利伯等大帝国，都是以一个强势民族征服众多弱势民族统一版图、统一秩序为内容的共生圈的扩大。蒙古帝国更是达到极限：横跨欧亚大陆，占地 36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这可能是冷兵器时代的顶点。可是，这些共生圈内的民族、信仰、文化各异，被征服民族必然反抗，王朝统治也必然逐步分裂、腐败，以后又都分裂成各民族的国家共生圈。中国从秦朝灭六国建立帝国，直到满清王朝。因为地缘封闭，文化相同，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皇权统治加上维护这个统治的儒家思想体系的严密，构成全国的一致性的共生圈。虽有纵向的王朝更替，主体汉民族却没有大的横向分裂，这是中国的历史特色。到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商品、资本的力量取代了纯武力的征服方式，一个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了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的全

球。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世界，成为“日不落大帝国”，与其他列强一道，把弱小民族居住地瓜分殆尽。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国家共生圈的直接碰撞。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后起的德、意、日军国主义肆意侵略，发动战争。它们想独霸全球的妄想终于被打破。证明了一条真理，即谁想以武力征服世界必然要失败。特别是在人类已经有了民族、民主、人权意识的现代国家与人民之后，暴力道路更是走不通的。

存在于历史由小到大的共生圈并不是单一的模式，也不是同步进行扩大的，他们的共生程度也不在同一水平上。到目前，仍存在原始的部族、部落状态，有的仍是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专制国家，也有半开放的民族国家。过去的专制帝国或殖民帝国都是极不巩固的共生圈，现在都为各个独立国家与地区所代替。世界有主权的国家和地区的共生圈，即政治实体就有 200 多个。这些共生圈情况各异，经济发达的共生圈其规模一个可比拟普通共生圈的几十个；有的经济落后的共生圈还在靠吃联合国的救济度日；有的国家少数富豪、可以享受世界顶级的生活，平民却在啼饥号寒；有的国家还处于政教合一的体制之中，教义与教条仍然控制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有的国家仍然在排斥、敌视异国、异族、异教。这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理念冲突，是使整个世界不能共生的根本原因。如何由不共生变为共生的世界就是要将共生圈扩大到全球，舍此，别无他途。任何一个共生圈，如果不能赶上时代，必然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

所以，人类共生圈必然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智能时代（把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后工业时代、生态经济时代等新的特征概括于这个概念中。工业时代是人手的延长，智能时代是人脑功能的发挥，故此）的基础上，通过共生思想体系的催化逐步地建立起来。

人类只有一条路可走：放弃独霸、吞并、侵略等等除异、灭异、恶异心理和行径，走平等、互利、异己共生、和平联合的道路。二战后人类共生智慧的结晶——联合国宪章精神和联合国这个负有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的机构就明摆着在眼前。尽管冷战时期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实体结构受到了 46 年两霸争雄的影响，冷战后单边主义也影响着它作用的发挥。但它在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遏止部族屠杀、经济社会发展、救灾济困、反种族歧视与隔离、非殖民地化、人权保障等方面功不可没。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为全人类工作的人们，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国家，信仰着不同的宗教或不信教，但他们是在为各种族、国、教的共同利益在工作，在为建立人类和平共生世界作贡献。而在岗位上殉职的第二任秘书长，1961 年诺贝尔和平奖追认得主哈马舍尔德和一些维和人员（包括中国最近在黎巴嫩牺牲的杜照宇）他们是人类的烈士，也是派出国的光荣。就其意义说，这些英雄比为民族、为国家的烈士高出一个层次。他们是为人类和平共生而死。人类应该在他们的血光中反思，损害人类共生的言行都是可耻的，而促人类共生的言行才是崇高的。

作为人类共生的远大目标，要实现它还是非常遥远的。但诉诸理性的和平联合的

道路则是无庸置疑的。作为达到远程目标的过渡阶段——区域经济共同体——政治一体化的阶段是必要的。成功的例子是欧盟，两个有世仇的民族国家：德国和法国，从钢铁联营开始，化敌为友，一个个，一步步地联合，建立经济共同体，逐步扩大到欧洲各国，发展成为既能共同生存又保持各国的若干差异的欧盟，货币统一了，国界消除了，成为国际间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力量。而对于分裂国家，德国的统一与复兴尤其值得尚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地区效法。一个民族的分裂，总是一件不利民族发展痛苦的事。民族尚不能求同存异，如何面对全球的有异求同，达到人类共生？

全球大大小小的共生圈最后必然联合为人类整体共生圈，是历史的必然。扩大的方法与途径就是和平、平等，共赢的联合。这个方向与途径不是哪个教义规定的，也不是此前人们向上天、上帝祈祷所能求得的；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所具备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上具有世界规模的强大的生产力和国际资本的巨大储量，政治上已有对和平经验和战争教训的理性分辨，大国也有和平共处 50 年的经历的实践，以及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强烈要求，地球生态危机的逼近，自然灾害愈来愈烈，以及人类传染病如：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等等，种种客观因素促成全球共生的条件日益成熟的结果。地球一村、人类共生圈必将形成，所以，笔者认为：人类历史是各类共生圈不断扩大直到全球的历史。

第三节　自发共生与自觉共生

人类在共生圈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虽然饱受战争与恐怖、伤痛与死亡之苦，在某些具体的历史阶段具体的地域范围内，甚至有的产生种族灭绝、国破人亡、文化无存；有的天灾人祸，无力自救，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毕竟从总体上还是共同生存下来，人口达到 60 亿。其中发达国家人口近 10 亿，占 1/6，达到富裕水平，人民普遍享受着社会福利，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衣食住行无忧，生老病死无须为钱发愁。相反，有近 20 亿人口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其中还有在原始畜牧、农耕阶段，很少现代工业，抵御天灾能力极差，甚至靠救济为生。有 30 亿人口的发展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急起直追。世界和平发展总的趋势也是令人鼓舞的。但富国与穷国差距却愈来愈大，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隐忧。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科技、知识、资金、信息、资源的优势，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即使实行自由贸易，穷国也总是处于弱势，WTO 遭到反对和抵制就是反对貌似公平实为不公平的某些规则。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原来殖民帝国造成的后果。各民族国家共生圈只顾发展自己的经济，不顾他国、他族的经济利益，甚至仍然执行着不对等的强加于人的政策措施，而不发达国家内部也还有自己就不以民族共生为重的现象。穷国里一样有富豪阶层，过着当年外族统治者一样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不顾自己同族同胞的疾苦。那样的国家与原殖民地是无异的。关键在于他的统治阶层不为底层人民做好事，图发展。它们本身的共生圈圈内共生关系脆弱，甚至争权夺利，内乱不已。这些人是不会去想到还有个全球共生这一主题。即使是富强国家的执政者们，他们首先考虑也只是本国的利益

最大化，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国民拥护，再投他的票，得到更多的荣誉和尊敬。他们不会为别国的利益去设想，别国的遣责与抗议是无关痛痒的。他们并不需要考虑他国国民的意愿，而达到与本国同样共生。所以目前以主权国家为独立主体的世界是一个既共存又危险的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会牺牲自己的哪怕一点点利益去谋求人类共生，各站在本国立场上，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在一个国家内部，各个人之间，利益组织之间，同样是如此。这样，国际冲突与国内矛盾就在所难免。这还只是就经济层面上说，进一步涉及到政治领域，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那就更为尖锐，谁都要保证绝对安全。为此，哪个国家都要拥有强大的国防，以武力做后盾，以备在与他国交往时取得有利地位。平时就向他国派出谍报人员，千方百计地刺探其机密，唯恐发生与己不利的事态，以确保本身的安全，尤其对具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国家。哪怕他们在公开外交场合，握手言欢、称兄道弟，但都暗藏心计，无国无之。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一个非共生关系，加上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规范理念、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差异，又强化这种非共生关系。国际间冲突、暗斗明争直到刀兵相向，都源于这些复杂的因素。

以往，提出人与人之间，利益群体之间，一国范围内的共生关系的理想、主张和实践是大量的存在。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人类社会的局部，因而是不彻底的。这种局部共生关系到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就不仅不能解决国与国间的共生问题，还会加剧国际间强权政治势力的扩张；尤以军事战略、策略思想，军事技术，武器的推进最为有害。因此，必须建立全球共生理念。此前维持国际和平不是实力均衡的结果，就是言不由衷的表现，不可能得到有巩固基础的永久和平。只有把不得已的、迫于形势被动的共存关系转变为自觉的共生关系，把自然历史进程转变为理性促进历史的进程。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才有坚实的保障。

下面将着重谈一下人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如何促进自发共生到自觉共生的转变问题。

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共生、生产发展、文明进步是主流，即使历史上充满了人为的灾难，也无法阻挡人类共生的脚步，而且共生圈还在逐步扩大。尽管民族战争、国内战争、宗教战争此起彼伏，时大时小。从时间上看，即使英法百年战争，十字军东侵历时近 200 年也是有限的；空间上也总是局部的；规模上，最大的二次大战卷入人口 20 亿，也不是全人类都在厮杀。所以战争、恐怖、屠杀是历史长河中的回流和旋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必将归于共生的大海。那些定义“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的论调非常有害。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简单推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弱肉强食”奉为金科玉律，孳生“优等种族论”、“高贵血统论”，强化强权政治、垄断经济、独尊文化、霸权外交等等非共生思想观念，完全无视人间的一切善良与正义，把人降低到动物水平。似乎人间没有真理，有的只是兽性推演出来的准则：“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枭雄格言，成为支配着强权、

强势者杀戮、欺负弱者的最真实的写照。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懂得人是异于禽兽的，是灵长类之首，万物之灵。他灵在什么地方？人是有群性、有智慧、有理性、有道德，懂得同情、仁爱，从而能共生的人。人类的共生理性是从朴素的群性、情性发展起来的。群居、友好、合作、互助、相互依赖，互利互惠等等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共生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显著标志，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战争，屠杀是变异、霉烂，是一切非共生思想毒素癌变的结果。当然，各种非共生思想误导人民的严重后果， 是以“公权”为媒介，没有“公权” 这把双刃剑，和平人民是不会走向集体相互残杀的道路的。

共生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天赋以人的群性。几万年的史前史，人类便有群居、聚群、合群的本性。他们生活在原始群中，便一起采集，一群狩猎。人猿揖别，靠的就是合群的力量，才得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猛兽的袭击下生存下来。在协同劳动、相互诉说中产生了语言；在生理生存和频繁交往中产生了相互依赖的感情；在相互友好愉悦中产生了笑；在亲情手足之间产生了爱意；在相互模仿中发展了学习能力；在语言基础上形成概念，发展了思维；在集群对付猛兽产生了团结；对共同生活的同族人彼此产生了亲和倾向，对自然神的敬畏产生了虔诚等等，都来源于共同生活，也推进了共同生活。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世界，那么，准确地说，是共同劳动与共同生活创造了世界。

在研究人类共生发展史上，对人类感情与精神层面是如何发展的应给予关注。例如同情心、爱、善良，以及表露感情的笑，都是具有本源意义的。其他动物因伤痛而哀鸣，因惧怕而颤栗，因愤怒而狰狞，却很少能笑。动物感情生活是贫乏的。人类会笑，含有丰富的情感内涵。让世界充满欢笑与让世界充满爱是等价的。它们既是共同生活的产物，又是推进着共生向更高层面发展的动力。

二、后天的习性。人的天性有些是以一种潜质和可能性形式存在，真正要使之成为显质和现实，还要经过后天环境的培育与促成。人不能单独生活和生产，必须与其相关的人接触。以一个人为例，从婴孩开始，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接受母亲的乳汁与抚爱，产生依恋、亲昵的举动和满足的笑貌，母亲也得到宽慰与享受。母子互动的结果，便是人到人间来首先受到的爱的抚育。有兄弟姐妹的就由相互关心产生亲情、友爱。生活圈扩大后，便有小朋友、小伙伴们，其友爱的心理更扩大了。进了学校，接受教育，才从感性的爱转向理性的爱，知道友爱的利和快乐，不友爱的害和痛苦的后果，从而认识友爱的重要性和意义，进到理性阶段。因为小孩子都在家里生活，家的概念开始在我家、你家、他家的比较中产生，而各家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有差异的。相同的容易玩在一起，相异的就有矛盾，要用友爱克服矛盾，就有了团结。成绩不一致是学习生活的常规，在家庭的支持下争取好成绩，于是有了竞争。在体育活动中也有竞争，班级的和个人的竞争中的成功开始促成集体与个人的荣誉感，做好事的同时也是道德感萌生、发展的过程。这些心理要素和理性概念都是在学习阶段逐步形成的。

好的教育可以让人自小培养为好人，不良的教育可以让人从小变坏；不良交友可以让好人受坏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切好的习性都是有利共生的，团结、互助、友爱、宽容等等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即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但如何解释同样的教育，会教出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人呢？这就不能孤立地看先天秉性和后天习性，而要用行为形成机制理论即“双因双化——外因内化、内因外化交互作用理论”来解释，[7]即人是在从小到大的生活中不断将外部因素影响有选择性地接受它，化为自己的内质、内因，又不断地把内质表露为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外部，继而用其结果作为下一步对外部影响因素的选择，日积月累，循环往复，通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才形成自己的后天人格。

从宏观层面上看教育，它实际上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尽管它们有很大不同，接受程度也有不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大小不同的共生圈，都在圈内进行共生教育，如家庭教育，社会组织内的教育，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爱国家的教育等。培养成爱家、爱集体、爱族、爱国等各个层次不同的人。爱的圈子越大，人品越高，越受更多的人尊崇。只爱自己，连家也不爱的多半是些离刑事犯罪不远的人。可见一般人都已经接受共生——爱的教育。只是爱心爱到国就到了顶，还没有发展到爱全人类罢了。只有倡导慈悲、博爱与和平的教义才具有爱全人类的意义，而这可能是宗教净化人心的力量所在。

三、生产活动的需要。从古至今，任何形式的生产，都是靠配合、协作、互教、互学来完成的。尤其是工业生产，庞大的机器，复杂的工艺流程，快速的流水线，单个人只有在严密的生产组织中、一定的岗位上起作用，离开了集体，便什么也做不成。农业生产，虽具独立性，但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无数事实证明，相互依存、分工合作是生产活动的基础。体现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相互需要的根本要求。

随着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技术工艺层面上的交流与互学，更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与生活的改善。无论是古代与现代，农业方面新物种培育方法、耕作方法，工业方面的新产品的制作，技术的改进，总是很容易被他民族引进和吸收。因为它的效果是显现的、直接的，所以成为首先进入异民族的先导，促进生产方法、方式的改变，从而在横向上扩展人类共生的技术基础。

四、交换的发展。与其他动物迥异的是人类会以交换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们不能像采集狩猎时代那样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而是通过生产的产品去交换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提到交换，一般只想到实物、商贸的交换行为。实际上，精神层面的东西，一样存在交换。所谓感情投资，也是一种交换。人人生活在交换过程中，从交换中才得以生存，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人们相互需求是通过交换这个中介来完成的，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因交换的发展而更加紧密。从范围上来说，达到了全球；从内容来说，它遍及了全部物质与精神产品；从形式上说，它从物品交换——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到国际统一市场，满足着全世界的人民的需要；从媒介品来说，从实

物经济——货币经济——金融经济——信用经济到网络经济；这一切发展的本质是交换。在交换中互利、互补，双赢、多赢。交换强烈地表现人类生活的本质——互利共生。一个人没有交换，只能是乞讨，而给食物的人得到的是同情心的满足和乞讨人的谢意，严格地讲，这也是一种交换，是以物质为媒介情感与精神层面上的交换的互动行为。若是乞讨得到的是钱，去买食物时，他就在钱物交换。一个国家，封闭自己，不与其他国家交换，就是自己拒绝发展。当无产者一无所有时，他唯一可交换的就是劳动力，为雇主打工。当妇女无产者生活无着，又在体力上缺乏与男劳动力竞争的优势时，只得走上人间最屈辱的道路：向男权控制着生活资源的社会，出卖自己的身体。这是男权社会在普遍压制妇女性权利中黑暗的一面，是女性的无奈、男人的羞耻。当然不排除少数自甘堕落的女性，则与性别统治无关。这种娼妓制度，钱性交换，也不能不说是交换，而是一种有失人权之一的性权利的交换。凡此种种，互利也好，偏利也好，都在维持着正常与非正常的共生关系。交换是人类生活的全覆盖形式，它的实质内容则是达到共生。

五、感情生活的必然。人类在争取生存的活动中，不是仅限于物质生活，更有丰富的感情生活。基于人的群性，彼此的感情产生于远古，逐步发展到无感情生活就活不下去的地步。许多殉道者，是宗教感情，殉国者，是爱国之情，殉情者，是爱恋之情。可见情的强烈。有父母亲情、男女之情、爱情、恋情、夫妻情、宗亲情、姻亲情、友情、乡亲情、同窗情、同事情、师生情、同志情、战友情、同胞（民族）情、祖国情等等，可见感情的广度。“发乎心，出乎情”，没有情难成为人，而对弱者的同情，更是人间最值得赞美之情。这些感情构成人类的欢乐世界，是人类共生的感情面。人是一刻也离不开感情而生活，当他没有他人的爱与友情时，他会感到孤独与空虚，痛苦不堪。就是坐牢，他与牢外的人有着感情的联系，也能坚持活下去；而他即使是自由人，没有了感情，也如同在牢狱一般。而当一个人拥有着他人的爱与友情时，伤痛时有人慰藉，成功时有人分享快乐，都是幸福的。可见人们的相互依存的共生性表现在感情生活上最为充分与精彩，共同生活中产生感情，感情推进着共生。因此说它是一种必然。

六、智者的启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总会出现一些智者，他们面对当时所发生的非共生现象，使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的时候，在总结当时社会共同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其现实条件，探求怎样建立和平秩序和人们应有的行为准则这些关系人类生存普遍性的大问题。他们提出一些有利人类共生的思想观念、理念和理论学说。这就是早期哲人们所作的贡献。在西方主要是希腊，在东方主要是中国。他们对客观的世界的理性认识与主观世界的人伦道德、合理制度与法治秩序、科学求真与人际求善，从不同方面得出有益于人类共生的哲理名言，启迪教化后人，从古至今。而雅典艺术，快乐原则，使人知美知乐，真善美乐成为人世追求四大内容，是导向人类共生的指世明灯。

各个不同时代，尤其是社会大进步的时代之初，或者是为破除旧的精神枷锁，或

者是引领世界潮流，如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涌现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思想家，以他们的真知灼见，照耀人寰。他们的著作被视为经典，历久弥新，就是他们的智慧，让人类共生之路，得以明晰，得以步入康庄。

七、宗教的引导。有些哲人不是按世俗生活逻辑考虑问题而创立宗教。创始者在先民对自然神，天神的崇信的基础上，笃信心中的唯一神，如耶稣自信是上帝之子，穆罕默德宣称是安拉的使者，众人的先知。究竟是确有如《圣经》、《古兰经》所叙之事，他们是神人或受神之托，还是象东方哲人那样“托古”教人，或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在科学尚未对“宇宙第一推动力”从哪儿来作出回答之前，只好存疑。不过，宗教对人类的向善、向爱、向正义、向道德也就是向着共生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真人，他没有神托或托神，他是自己通过悟法，从心中摆脱人生的一切苦难，包括生老病死，聚集着信徒讲述着超脱的道理。是后来者大乘佛教尊之为佛祖，成为了神，法力无边。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慈悲、欢喜、圆满，普及到民间，乐善好施，戒杀放生等等，虽然是出世，对纯朴人心，祛恶共生也是功德无量的。

其它的宗教，除个别有明显政治目的视人为妖，以除异己外，都具有团结部族、民族，向往理想生活的意义。三大跨国性宗教，已经遍及全球，无论是东方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或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都成为各自的精神家园，对世俗共生均有指引的意义。

八、强者的强制。先民即使在最原始群中也会有大的教训小的，强者攻击弱者的现象。如我们所见到的猴群那样，当顽皮的小猴违反规矩时，就有猴王来咬它，当它不再顽皮时，秩序恢复了，猴群又平静下来，各找各的食物和嬉戏去了。先民们处于这种状态下产生对长者、强者的畏惧情感而顺从，顺从的行为多了，秩序也就建立起来。大概人类最初的权威就从这里开始。如果有人向现存的权威挑战，争斗便不可避免。只有强中强以力压服对方及其从众，更大的人群秩序于是建立。到了个体权威能叫从众不仅顺从而且能听话去一起攻击他群，个体权威支配集体力量时，人群的相互打杀就开始了。这在原始社会是很容易发生的。打杀的结果，胜方俘获败方，为奴为婢。人类的最初不平等秩序便这样建立起来，种姓制度、奴隶制度，把人分成等级、阶级。尽管如此，一个社会要正常生产、生活，共同秩序总是要维持的。这种维持就保障了部落、民族，国家的内部共生秩序。古代早期的法律，如《汉漠拉比法典》就是这种秩序的规范化和条文化。[7]这种法律是以国王权力为后盾，遵照他的意志而颁布的。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所有大小共生圈的秩序都是靠强权维持的。以一致对外的名义掩盖着圈内的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好像是没有利益冲突的整体一样。所以，这种共生关系不仅不是自觉的共生关系，而且是强权的统治者对其民众的强制压迫关系。它的共生是非自愿的、不得已的，有人称之为弱共生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偏利共生关系。这种情况，到民主革命确立人权、人民主权观念以后，才得以在实践中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共生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尚存的非共生现象：暴力、恐怖、

战争并不是它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共生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

历史上有许多共生因素，如上述八个方面，尽管是自发，但它已为全人类共生创造了前提和一定的思想基础。到了如今全球化时代，必然要进到自觉的共生时代。如何以全球观点，更加理性地对待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诸多方面的问题，自然会产生共生理念，共生价值观。正因为共生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才有可能破除以往非共生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维护暴力、恐怖、战争的主张，不让一些本末倒置之论继续为害地球村民，走自觉共生的道路，促进和平和谐的世界早日到来。

第四节　农牧时代中的共生

人类从采集、狩猎为生的原始状态进入农牧为主的时代，他们从游动的集群逐步在一块地方定居下来，每年都有可供温饱之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家一户，在家族、宗族的亲缘关系和守望相助的地缘关系中，过着自给自足的无求于人也无诈于人的宁静、和平、简朴而自适自得的生活。人与自然是协调和谐的关系，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的皈依。除了族权秩序而外，政权对他们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加哉。”历史上许多描写田园美的诗句和乡村生活的静谧，使今天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为之倾心与向往。但在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工具简陋，靠人力与兽力从事耕作，产品的剩余是十分有限的，生活条件简陋而艰苦，遇到自然灾害或瘟疫，则无力抵御，以家族为单位的共生就必然要求有更大范围的共生权力来集中力量解决此类问题。这时，国家就显现其作用。大禹治水，奠定了作为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基础，显现国家为谋求国民共生的积极作用。因之，具有对内号令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的存在也显现农耕民族求安定的和平共生愿望。

与此同时，处于草原的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游动性很大。各部族的冲突机会很多，且驰骋草原，强悍有力，飘忽不定，抢掠的可能性比农耕民族大得多。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和欧洲，大规模的战争总是在这两种民族之间进行，不是游牧民族入侵，便是农耕民族主动出击或严防以待，万里长城之筑就是农耕民族防御侵略的伟大遗迹。农耕文明往往被野蛮征服，但野蛮都在文明中被溶化，因为野蛮暴力的统治并不能使人心服，最终导致反抗，最后统治者内部，也兄弟相残，不可能有长期的安宁。但共生秩序最后总会在长期相残之后得以恢复。

农耕时代的手工业只限于制作农具、家具。商业除边境与游牧民族有较大宗的交换、贸易和境内盐铁布帛生意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可言。

交换，哪怕是极简单的以物换物，日中而市，也是人类互利共生的行为，蕴育着“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的朴素逻辑；以你有余补我不足，以我有余补你不足。只有交换才能互补双赢，带来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好处。社会学中用交换理论解释人对人的心理、行为，包含了物质、感情、精神方面，莫不如此。交换，本质上是平等互利的，是共生的。它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依照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完成的。

由于物品直接交换只能在较小的范围中进行，也许不能满足对产地较远物品的需

要，因而产生商人，专门从事物品的流通，从产地买进，到需地售出，从甲方买进，向乙方售出，从中获利。人们的关系从双边关系扩大为多边关系。后来 为了方便买卖，物品的等价物——货币也就出现了。由于共生圈的不断扩大，商业也就较快地发展起来，达到象汉代向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规模。所以古代简单的农牧工商的互惠关系，逐步发展到工业社会，这种互惠关系日益扩大到更复杂多元更间接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之中，使人感觉不到它的直接互惠性。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长达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商业极不发达，一方面是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提供商品有限，但主要方面还是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为了垄断经济命脉，把铸钱造币、盐铁贸易牢牢控制在官府手里，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扼杀自由贸易，把商人列入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都有如下记载："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8]不仅没收财产、还要施以肉刑。凡有利可图，官家都要管得死死的，"货物之利，莫非王财"！只要商业有点生机，就要开刀。再如手工业，如制磁业，也是集中工匠、开官窑，做精品，供官家使用。所以一方面，是工艺水平极高的宫廷建筑，一方面是普遍的茅屋泥舍。手工业者中能工巧匠，实际上成为官家的工奴，工与商的这种地位，使中国社会成为除了皇族官僚及地主而外无一富户。广大农民如遇上大天灾或极为残暴统治情况下便求生不得，被迫揭竿而起。农民推翻暴政，重新建立一个同一体制的王朝，清明一时，又重复由治到乱的过程，循环不已。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国是不可能摆脱这种状况的。而每次起义都是在"杀富济贫"、"均贫富"的旗帜下进行的，不仅造成如汉末唐末的赤地千里，人口急剧减少，破坏生产力和资财则更加严重。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是以死人腾出的空间为代价的。还原农耕，箝制工商，禁绝游民，建立最完备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深谙此道。小农经济加绝对皇权专制的统治，是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停滞的症结。

在世界处于农耕时代，却有另一些民族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和爱琴海周边。他们已在农耕基础上发展了商业，手工业。由于往来于海上，铁木制品、造船、冶金、祭品的生产发达。他们以海上贸易互换产品为生计，聚居港口，形成许多城邦社会。与大陆农耕社会完全不同，不是土地贵族的一家天下，而是工商业贵族与之平分秋色。这样在原有氏族民主，遇事大家商议的基础上产生平民大会、议事会、执政官等现代民主雏型的城邦民主。他们以法——大家订的契约为准则行事。虽然奴隶被排斥在外，但这种体制保证邦内矛盾不是靠武力来解决。他们在长期商业活动中所形成的尊重各自的财产权利、自愿交换、对等义务、公开竞争的原则自然会产生法治秩序、平等权利、自由发展等理念，成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渊源。同时海外贸易的扩大，人们的眼界大为开拓，面向国外，积累财富，不仅有利生产，更有利交换。做生意的选择性大，财富迅速向城邦集中，古希腊雅典文明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他们富有进取心，创造着开放的环境，面对自然——广阔的海洋和彼岸世界无穷的新奇与未知，激起探索精神。加之彼此间的频繁交流，思维极其活跃，出现了一批哲人与求真知的科学，

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大都肇端于此时。著名的柏拉图学园延续 500 年之久，影响深远。知识的传承与生产，开启了人类另一大生产领域，知识生产对发展人类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知识创新与积累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与消费具有同等重要性。后者维持世界，前者发展世界，而且二者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可以说，现代文明的人类生活准则与真理，都可以从希腊文明中找到相应的原生状态，宇宙、人生、国家、政治，秩序都在希腊哲人的观照之中。希腊文明中所产生的理念与理性化精神，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世文明的源头。

还值得一提的是手工业在雅典的地位。公元前 594 年，商人出身的梭伦担任第一执政官，进行有名的梭伦改革，有一条法律规定：“凡父亲未传授其子一技之长者，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之义务”。[9]技术工艺传家，使之精益求精，手工业者具有本身的荣誉与尊严。这与农耕社会以越分越少的土地传家何等不同。在公元前 461-429 年，32 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为工商辐辏的大都市，已经出现手工业作坊，而且有相当精细的分工。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写道：“到处都是专业，一个工匠只是缝，另一个工匠只是裁剪靴皮；一个工匠只是裁衣服，别一个工匠则专事缝纫……在烹饪术方面也是如此。依照行业来分，当时手工业者有铁匠、钥匠、陶工、画师、砖瓦匠、木匠、皮匠、裁缝、宝饰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10]分工愈细密，效率、质量愈提高，收益愈大，人们之间的依存关系愈明显。在手工业作坊时期，劳资合作共生关系就已见端倪。

发达的工商业造就了雅典的繁荣，城邦民主政治，反映在管理者官员的地位上，伯里克利认为，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把自己的地位当作特权，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替公众服务的机会。[11]雅典人崇尚民主和法治，认定“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法无私”，[12]在古代社会展露出人类共生的曙光。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有三种类型：农耕、游牧、工商。他们各有特色：农耕社会以其血缘、地缘的固定性形成的和平、安土、重迁、纯朴，但有封闭、守旧倾向；游牧社会以其血缘为纽带和游移性形成聚群、剽悍、豪放、尚武但有原始，粗犷的倾向；工商社会以业缘、地缘为依托形成独立、进取、平等、精新但有扩张、算计的倾向，这也许就是民族性的文化基因吧。

这三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都有大帝国出现，农耕社会以中国的汉唐明清为代表，周边民族莫不臣服，但其特点文治多于武功，外族不侵犯一般不进行远征，即使附属国也不实行军事统治。这与中西亚及环地中海大帝国颇有不同。游牧社会的帝国以蒙古帝国为代表，他们武力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虽盛极一时，但其文化根基薄弱，民族信仰各异，其存活期不长便瓦解了。以工商社会为基础的大帝国是到近代以殖民帝国形式出现，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所有以军事力量征服异民族的帝国，都毫不例外地被各觉醒民族解放力量和本民族的理性力量所推翻。赢得和平与进步。

工商业社会，在古代并未形成大帝国却以另外的形式发展，即继希腊城邦之后的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都是巨大的工商业中心。威尼斯是个典型的商人政权，它的金币杜卡特几乎成了全欧通用货币。尽管它也曾进行过与商业对手热那亚的战争，建立地中海的商业霸权，但其以金钱力量统治比起军事铁骑统治，在文明程度上显然进了一大步。而有“意大利的雅典”之称的佛罗伦萨，其政权由富商、银行家、工场主掌握，称为“肥人政治”。当时它有银号 100 多家，有的还经管教皇的银库。罗梭索·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在欧州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连教皇立奥十世都是他的儿子（教皇是从大主教中选举产生的）。正因为佛罗伦萨的富有，它成为当时意大利文化中心，艺术家、诗人云集，留下中世纪许多艺术遗产。而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即 1338 年，就有 200 家生产呢绒的工场，年产 8 万匹，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成为恢复希腊古典人文与理性精神的文艺复兴的摇篮。

再分析一下古代社会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如图 1_1 所示，商业的作用就是沟通这三者，处于中心地位，各民族、各行业产品都要经过商人这个中介环节达到互利共生。而工与商是很容易相互转化的。工场主自己可以经商，商人有钱可以开作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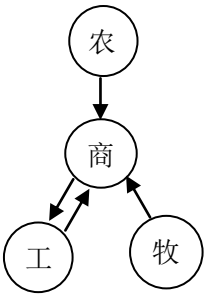

图 1-1

至前店后厂，大至联合经营，也可说工商是一体的。因此，在经济领域扩大人们的共生关系，商人是先锋与纽带。再看中国传统社会，把商人压制在最低层，关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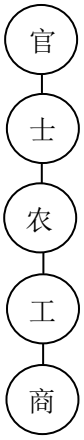

图 1-2

一方面是在身份等级上视为最下等，另一面却又垄断商业利益，还要诬之以“无商不奸”，似乎只有官与士才是“正人君子”！商人以其流动性、自主性而不象农民那样容易控制与管理，以其逐利性和获利丰厚而遭忌恨，所以他们处在官府打压和社会的妒忌之中，仇商仇富心理总是弥漫在农耕社会里，成为一种病态。

综上所述，农耕社会的共生关系是初级的、不紧密的，但它构成各族各业生活生产的主线。不能共生的暴力、恐怖与战争，则是各类首领彼此相争、称王称霸不断以武力征服的结果，每次共生圈的扩大与分裂都会是一场灾难。古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之间则维持一定的和平秩序。分与合都是以驱使奴隶、平民作战争牺牲品。而人类共生关系都不断地在和平、贸易中得以扩大交流，在学习、借鉴中颠簸着提升。

第五节　工业时代的共生

由于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积累，经过工业革命，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煤与石油取代了人畜体力能源，大工业生产象千脚千手，日夜不停地在运作。生产品已经不是用来自给，而是拿去盈利。生产组织已经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按行业分工的许多工厂。一方是拥有资本，即原有的工商业主和在土地上积累了资本的地主，他们开设工厂、农场，购置厂房、机器，进行生产、管理、经营，成为资本家。一方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受雇来工厂当雇佣工人。双方通过契约进行生产，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但依存大于矛盾，除非不生产。虽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英国土地贵族圈地养羊，驱赶农民的“羊吃人”和资本家残酷压榨生产者“血汗工厂”以及疯狂掠夺殖民地人民的事实，甚至是收捕、贩卖黑人为奴来充实劳动力行列；但这一切沉重的代价，却为人类迎来了新的巨大生产力的进步。在生产关系巨大变革过程中，用现今的语言叫“阵痛”，换来的结果是人类挣脱了近千年（在中国则是 2000 多年）总也望不到头的穷困与饥饿的小农经济。就在我们经过建国后 30 年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不堪收拾，才由邓小平挽狂澜于既倒，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归到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其实，历史自然发展进程已经明摆在那儿：不同的民族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果没有先富的一部分作为引领、榜样，共同富裕就既无物质基础，又无精神条件，只能是一句空话。300 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是人类可以共生的物质基础，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进力量。并由此逐步产生出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力量的知产阶级。它包括各种管理、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二战后在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数已经逐渐超过体力工人的人数，成为人数最多的劳动者群体。这个处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断壮大的力量，是社会和平发展的强大群众基础，也是人类和平共生的维护力量。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不仅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也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这

是工商业社会发展中自身运动的结果。工业生产的规律是质量优先，优胜劣汰，不断推陈出新，才有产品优势。商业的规律是等价交换，只有货真价实，信誉第一，顾客至上，才能占有市场。因为制度上保证了私有财产权和其后的知识产权。形成一种万舟竞发、你追我赶的形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1980 年，全球年产值达到 11，795 万亿美金的规模，到 1999 年，世界前 15 位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GNP 就达到 24 万亿美元。以全球 60 亿人口计算，人平均年可达 4000 美元。

工业时代的共生关系，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劳资共生。工业时代最基本的生产组织是工厂和农场，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除非只办个夫妻店，要扩大一点经营规模，就要雇工，雇主就得给以报酬。中国俗语：“要想富，就得雇”。表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方是有余钱，有生产资料，缺乏人手；一方是生活无着，只有劳动力。相互需要，组成两方的依存共生关系。当然，这是一种剥削关系，但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没有权力压迫、财力剥削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无权无钱者能有别的选择吗？雇主为了自身的增值利益，起码得让雇工生活得下去。尽管劳动力不值钱，是个很不对等的偏利共生关系，但绝不是猫鼠不能共生的关系。这种不对等即剥削的程度是由社会大环境所决定，尤其受所在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如果有法治和民主的保障，雇工的契约权利得到保障，他们就是一种人格平等而收益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雇主也不是一个模式、一种心态的“抽象”的雇主。有很好的也有极坏的，但一般是维持在契约义务的水平上下。而在没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雇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劳资的尖锐对立，造成冲突的恶果。在我们建国初期，实行过一个时期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合世界历史发展事实，更合乎发展生产力要求的。当时一片欣欣向荣，只惜好景不长。20 多年后，还不是这个“劳资两利”、“要想富，就要雇”在发挥作用吗？

二、权利平等共生。工商业社会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善其社会秩序和运行机制的。而是在原有工商业行之已久的等价交换、自由贸易的原则和已经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经过 300 多年从英国宪章运动、美国的独立建国、法国的大革命等一系列改革、创新，扫清了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各种超经济特权之后，逐步取得了权利平等所形成的。即经济上的个人自由发展权、法律上的平等权、政治上的参与权、人格上的独立权、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私有财产的保障权，代表各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会结社权等等。政治体制上实行民主共和，国家不可为一人一党之私。从此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保障了它的和平共生。民主制度开始时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象雅典贵族民主不属于奴隶阶级的一样，因为工人、妇女、异种族、异教徒是没有选举权的；待到发展到所有国民不分种族、性别和财产多寡，全民都有选举权、发言权、参与权以后，国家便具有全民性质。于是，社会除了财产不平等因而生活也不相同以外，其他方面权利大致是平等的。只有在暴力破坏它的法治秩序和

组织武装推翻政权时才会遭到强力禁止，即使是强烈表达民意的游行、示威、罢工也都是法律所允许的。正是因为有这种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各种争取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包括主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阶级革命思想言论也可以传播。社会上代表各社会利益群体的思想、理论、观点纷纷登场，百家争鸣，用道理争取群众，形成政党政治。哪党哪派赢得多数选票就哪党哪派来执政，这在专制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选票里面出政权”，逐步扬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日益增多的事实。尽管至今还有军事政变，毕竟不是世界的主流。1903 年由英国独立工会和职工大会合并成立的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参加了英国联合政府，到 1929 年上台政执两年，反映一种阶级共生关系。工人运动推动着工人最现实、最切身的利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强调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合同等。1945 年战后工党上台，开展国有化，实行充分的社会福利服务纲领，成为欧美实行“福利国家”的先导。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具体的劳资共生关系发展到政治上阶级共生关系，使这些发达国家处于巩固的国内和平状态，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创造出更为有利的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协调的物质基础。但这只是少数发达国家能做到，而世界多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却或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者还是处于农耕时代，或者就是被发达国家前身殖民帝国所统治的前殖民地国家，都还没有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任务。而我们建国后本可以从新民主主义政策发展下来，与世界接轨，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坚持兴无灭资的道路，拒绝走“劳资两利”合作共生的道路，错失经济发展的良机。苏联、中国、柬埔寨都热衷于阶级革命，相信只有一个阶级，在“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可以用消灭阶级的办法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建成一个美好的世界。结果是二战后不仅世界不能和平共生，开始了长达 46 年的冷战与争霸，而且在国内、甚至党内都不能共生，造成经济不振，政治专制、文化萎糜。苏联经过 74 年的共产主义模式的试验，终以解体而告终。尚幸中国放弃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所导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绝路，回到共生历史正轨上来，这才欣欣向荣，出现可以谋求和谐共生的局面。

工业时代是个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争夺达到全球范围，以欧美日列强为一方，以落后民族为一方的殖民战争及其后的列强相互争夺的战争演变为两次世界大战，构成现代战争史的主线。战争的主角是各民族国家的政府，代表了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不错，但对该国的工人有无利益呢？征服者的掠夺帮助它发展了生产力和强国的“荣耀”也都有些份吧。就是标榜“世界工人是一家”的苏联，一样的以民族利益为优先考虑，也曾发动战争（苏芬、苏阿），不过说辞不一而已。可见，统治者的野心结合民族扩张利益才是战争的源头。

下面把工业时代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分析一下它与战争的关系：

原始积累时期，对内压制农民，镇压工人的反抗；对外实施侵略，掠夺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对黑人的奴役，造成无数的流血与恐怖。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内工人情况有所改善。但生产过剩的危机，加强了对外的

争夺与控制。进行殖民战争。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殖民地瓜分完毕，开始强国与强国的战争，这阶段成为世界规模战争的温床。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内实行国家资本的调节，使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福利政策得以逐步实施。

苏联模式的国家，一样进行战争。除民族利益冲突这个根外，意识形态正统之争也成为重要原因，相互指责为修正主义，也可大动干戈。其核心还是被首领所代表了的民族之争，不过搞了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外衣罢了。就像各教教派一样，读的是同一部经，各有各的解读，甚至出现“社会帝国主义”的概念。看来，帝国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它是以武力侵略他国他族为主要特征的总称。无论是古代的帝国、还是现代的帝国，都是当权政府的不义行为。祸首就是掌权者。各种理由借口都有，实质是把暴力、恐怖、战争强加在平民的头上，死的是老百姓，为这些暴君、霸主、妄图征服控制世界的野心家火中取栗。

很明显，今天世界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民族国家之间矛盾，有无世界和平不决定于阶级的冲突，而在于民族力量的冲突。因为工业的发展，战争手段可以达到毁灭亿万人甚至全人类的程度，所以解决民族矛盾，尤其是解决相互仇恨的民族之间和渗透于其中的教派分歧、信仰分歧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是工业时代共生的头号难题。巴以冲突是这方面的最为典型的范式。

就在巴勒斯坦只有 25，176 平方公里（其中耶路撒冷占 176 平方公里）这块土地上，积集了太多的对立与仇恨，是个最难以共生的地方。用共生理性去观察，会找出问题的症结。现在誓不两立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人 5000 年前是同族、同源，都是闪族。一个分支希伯来人信犹太教，一个分支迦南人即阿剌伯人。先后在这里建立王国。耶路撒冷又是犹太教，基督教和 7 世纪后的伊斯兰教的三教圣地，获得该地便有无上荣耀。因为地处欧亚非的连接地带，历史上很多帝国及宗教势力都先后以不同形式占领过该地区：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和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则被英国控制，一次大战后成为托管地。把犹太人赶出家国的是罗马帝国，使他们成为无祖国的流浪民族，深受摧残。罗马帝国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后，犹太教被视为异教，横遭迫害，并宣布为邪教，造成欧州的排犹运动。其实这两教有先后继承关系，都是耶和华的子民。穆汗默德创伊斯兰教，笃信安拉真主，七世纪进入圣城，他也留有得道的圣迹。从此穆斯林阿拉伯人在这里生活了 1300 多年，中间各穆斯林国家与教皇号召以夺取耶路撒冷圣墓为目的的八次十字军东征打了 196 年宗教之间的战争（1095-1291 年）。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巴勒斯坦是上帝赠给他们的，顽强地要求在古犹太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国；二战后，他们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州纷纷回来。起初他们是用钱来买当地穆斯林居民的土地，本来是完全可以用金钱买土地和平相处。以色列人带来的资金与技术，可以结合周边的大量贫穷的劳动力，发展生产，

促进地区的发展，双方都受益。然而、“异族”“异教”观念妨碍着两族两教的共生，因而阿剌伯人与以色列人摩擦不断，逐步升级。英国托管殖民当局又不能主持公平与正义，双方都不要英国统治。联合国于 1947 年 11 月通过阿以分治决议，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在划分两族土地时虽有欠公允，但要求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和一个耶路撒冷国际特别管理政权以维护圣城的和平，三个实体合组一个经济联盟；否决了阿拉伯国家支持成立以耶城为首都的阿犹联邦的统一国家的方案。即使这勉强可操作的分治方案，也被邻近阿拉伯六国在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就进行围攻的中东第一次战争所打破。以色列是“哀兵必胜”，愈战愈强，结果巴勒斯坦大片土地被占，百万难民无家可归。六国联合都没打败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只得自救图存，各种反抗组织就此产生。正规战打不了就打游击战，游击战也打不了，就人弹报复战吧——同归于尽。这就是今天恐怖主义的源头。以色列由弱变强，也就得理不饶人，虽经国际无数次斡旋，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究竟进展有限。只有埃及首先放弃报复，承认以色列、和平相处，又被伊斯兰极端组织视为叛徒，萨得特因此而丧命。在以色列，主张和平的拉宾被刺，双方都从内部反对和平，何时能休兵呢？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对这一地区事态深为惋惜，但也应从中吸收教训。这就是对立双方、各不相让，必然是两败俱伤。只要有一点点共生思想，不信那些让人送死的“道理”，保留一分也让别人活的慈悲与同情心，保留一分尊重人的平等权利的思想观念也不至如此。难道上帝与安拉就永远让他们的子民在这块圣洁的地方充满血腥吗？

从巴以冲突 60 年的历史，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暴力、恐怖、战争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除了造成人为灾难而外，对哪一方面都是得不偿失的。以为占了便宜的胜者最后也不得不付出人命的代价。喜欢动武的掌权人都要认识一个规律：“仇恨爆炸规律”，就是杀人必然带来仇恨，杀一人会引起一族、一派人的仇恨；冤仇一结，冤冤相报，永无了日；而应以生命为重，苍生为念，死者已矣，来者可追；重要的是要对活人和子孙负责，而不要死死地咬住仇恨不放，斗争不已，投入更多的生命，祸及双方后代。

工业时代既产生高度的生产力，可以改善平民的生活，又产生高度的战争破坏力，可以屠杀无数的无辜居民。人们忘记在经济领域里可以共生，而让政治与思想信仰隔断这种共生关系，实属人间悲剧。

三、阶级共生。前面叙述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平等共生，已经对此作出大致的历史阐述，这里更进一步说明阶级共生的道理。要弄清阶级能够共生的道理，首先得分清剥削与剥夺。英语剥削（exploitation）与剥夺（expropriation）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德语剥削（ausntzung）与剥夺（berauben）也不是一个词，不会发生对译时的误解。剥削是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一方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方式根据契约有偿占有另一方的剩余劳动。剥夺是个政治学、法律学概念，即用强制手段无偿夺取人、财、物或依法取消人的某种权利。因之剥削和剥夺是个性质各异的概念，这几乎是常识。

主张经济平等公有制的倡导者们首先就混淆这两个概念，把雇工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必要劳动的工资是该给的，剩余劳动是被剥夺的。就凭这个道理，把剥削者混淆为剥夺者，使“剥夺者被剥夺”成为当然的“真理”。这个“真理”的形成，出于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的人道主义同情也好，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道德律令也好，出于自身遭遇倍受剥夺压迫侮辱欺凌而生的愤怒之情也好，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无情批判也好，出于对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的史观分析也好，都会支持这个剥削=剥夺的混淆，得出资本家与无产者誓不两立不能共生的结论。实际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偏利共生”关系，即一方得了大头，甚至是得了绝对大头，一方只得了小头，甚至是零头的一种关系。把偏利关系视为寄生关系。于是“消灭寄生虫”、“吸血鬼”的提法，自然就产生了。

看看剥削史实的发展：最野蛮的奴隶制度，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处死奴隶，也可以象物品一样的买卖、赠与，女奴可以被主人任意奸污，一切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当然，他们长年劳动甚至一生的成果也被主人所吞没。其中战俘奴隶劳动是剥夺，而债务奴隶就开始有剥削意义，因借债时，他从对方获得一种利益，有一定的交换关系；“卖身为奴”的卖身契或有期或无期，都是一种出卖劳动的契约。但这种契约使人沦为被剥夺的地位极不合理。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 326 年彼特留法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不让公民沦为奴隶，就是一种改进。其后，废奴、赎身在各国逐步推进。由于生产力的进步，要人监管的被动劳动究竟不如让农奴们以交租的形式，自耕自种交税金来得成本低而收益高，农业奴隶慢慢地才有了一定财产权，农奴得以能活下去并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是经济发展，奴隶制才能逐步地被封建制所替代。

奴隶劳动如同牛马、但人不是牛马，不能永远受人奴役、驱赶、杀戮。他有思想、有独立意识，有做人的权利。反抗压迫是人性的表现。“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是奴隶们悲愤的歌声。古代罗马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公元前 73-71 年）震撼整个亚平宁半岛、起义队伍达到 12 万众之多。历时三年才被罗马共和国执政官武力所扑灭。这次起义有人类对争取生存权利而战斗的意义，远比反剥削制度的意义大得多。此前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公元前 138-132 年）还在恩那建立过政权，推举优努斯为王，设有人民议会和法庭。实行过奴隶平等的政治权利，也没有推进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只是打击了奴隶主们对奴隶生命权、人身权的剥夺。

在封建社会，各国情况不同，收租数量一般维持在当地平均水平上下，而奸猾之地主，用退佃、无理解除租约，单方加大租额，用人抵债，遇灾不减租等行为则是一种剥夺行为。租佃剥削在欧洲存在于中世纪，（5 世纪-15 世纪）封建化的先后与程度不一。而在中国，租佃剥削延绵 2000 年之久，农民起义规模极大，动辄以 10—100 万人计，都是遇到天灾人祸，即自然灾害和暴政时百姓活不下去时才发生，反对的是暴君、奸臣、贪官、污吏和地主富户。旗号是“杀富济贫”、“不纳粮”、“均贫富”，目标是平均主义，推翻了眼前的统治，但只是改朝换代，一批新贵替换了旧贵，走一条帝

王统治——暴力推翻——帝王统治的老路。对租佃剥削毫发无损。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才改变这种剥削关系。

如同奴隶起义作用一样，农民起义与剥削制度存在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在人民主权、人人平等启蒙思想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农民才有摆脱束缚在土地上的可能和不依附庄园主的觉悟，争取到在私有土地上生产自主权和另谋生路——做工人的选择权。民主革命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或无偿、或低偿，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无田也可做工。“到城市去！”是二战后各农业国农民的心声与实践，这就是工业化中的城市化的路。对于人类来说，民主革命伟大意义是废除了专制和各种能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种种特权。这才是真的“剥夺者被剥夺”。因为剥夺是指凭政权或某种势力才能实现的政治性行为，属于政治范畴，用政治改革可以实现；而剥削这种行为是经济行为，用政治手段、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的。即使以革命的手段加以消灭，也终究会以经济停滞仍然回归到剥削中发展。倒是消灭了剥夺这种不义的侵害平民权利的特权，可以为正常剥削——雇工生产——劳资两利开辟道路。其实，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农民工进城，与雇主订上合同，双方同意雇工工资多少，完工或定期发给工资，这叫就业，其实就是接受剥削。但不给工资，违反约定的时间和劳动条件，直至发生人身伤亡，这就不是剥削，而是剥夺。剥夺劳动是奴隶劳动，雇佣劳动是契约劳动，是有一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劳动。二者是不能等同的。剥夺是强占恶要，剥削是有议在先；剥夺是不讲道理，剥削是有约可查。剥夺必以强权作后盾，剥削则以法律为依据。剥夺是强盗行径，剥削是占便宜。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非法的超经济剥夺侵权行为；后者是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所以“剥夺剥削者”这个命题也是错误的。错就错在混淆了二者的界限。如果今天实行这条原则，社会就得再次倒退。剥削并非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剥夺才具对抗性质，它并不因两种制度不同而改变。细究人间灾难，根本不在剥削，而在剥夺。暴力、恐怖、战争，大小莫不如此。剥夺有治，法治与民主可制；剥削无解，大概发展到机器人全部代替体力劳动方可消亡。

笔者尊重事实，说各个阶级已在共生，而且还将共生下去，共生障碍不在剥削，而在剥夺。旨在逐步由偏利共生进到高度的互利共生，由工业社会的伙计关系进到智能时代的伙伴关系。积极地解决偏多偏少的问题，亦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同时，理论才能解释历史与现实，也可能作为“和谐世界”的概念基础。

四、体脑共生。自从人类社会进步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以来，体脑分离状况出现了。农耕社会中官和士是脑力劳动——从事管理、教育，工农是体力劳动——年复一年的艰辛劳作。后者视前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前者视后者，无教养、无知识。加上儒家之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这种分工关系固化为一种统治关系，更增加了阶级对立的情势。事实上，脑力劳动占有巨大的优势，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事事占先机，好处自然很多。而且在专制社会里，掌权做官是士（知识分子）的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可得百年之利，福荫子孙。

工商社会不太一样，前述希腊父亲得教儿子一技之长，而不是读书考官做。他们从技艺而科学，生产需要知识，知识促进生产，求真知、务实学，改进技术，发明创造，形成一个能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知识阶层，这就是“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如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到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后，“知识就是力量”，显示出在生产和人文领域的巨大作用。加上能结合语言的拼音文字，使知识可以迅速普及到工人。教育的盛行更加速知识化的进程。知识产品受到尊重，产品的技术含量日增，知识始终在引领社会前进。除了中世纪神（教）权统治时期的扼杀科学发现一段黑暗而外，知识与知识分子未受到大的摧残。即使是在前苏联，技术知识分子也不是很受歧视的。但在一种极端的两分法和唯成份论思想以及农耕社会的传统三合一的“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把知识分子视为毛，嗤之为“梁上君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臭老九，对之实施无穷尽的改造，使其脱胎换骨，死去活来。使有点现代文明意识的知识分子处于全世界都少有的悲惨境地。“知识越多越反动”，仇知心理实际是仇富心理的延伸，加上知识分子常独立思考，有些异见，会动摇其政策与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或指出失策的要害。十分危险，岂能容得？非要改造得匍伏于权力的金阶之下当奴才而后已。本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言自明的共生关系是不必写的，但脑体分离在过分强调以后，余毒甚广，至今仍有心存余悸者，也得正本清源。

脑体两大类劳动分离情况不全是源于阶级，而是源于人脑具有思维能力和物质与文化生产发展的需要，它们确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各自的特点，现将其分为 15 个方面，列表说明：

表 1-1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对照表

项　　目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劳动内容	精神性、宏观性、虚拟性、软件性	物质性、微观性、实在性、硬件性
劳动对象	知识与信息（决定对信息的依赖、敏感、求速三性）	物质资料
劳动条件	专业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试验中试设备、安静的环境	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工厂、机器、土地、工具等
劳动方式	大脑加工（想）的个体性，独立自主性	工人的集体性、农民的个体性
劳动时间	连续性（难分上下班）、长期性、创造成果的不可计时性。	有明显的可计时性
劳运能力形成	学习时间长、投入成本高、知识不断积累与更新	自然形成的适龄性、简易性
劳动强度	体力消耗不明显和健康损耗的隐蔽性，易导致神经衰弱和高血压等	体力消耗大的艰苦性、工伤事故的危险性，日晒雨淋，职业病等

劳动成果	普遍适用性（科技）、价值大、甚至文化产品的永久无价性、从优性（劣者必汰）	物质产品的有限价值性、可灭性
成果效益	间接性、连锁性、潜在性（物化在一系列产品中）、多面性（经济、社会、文化效益）	直接性、直观性、一次性
价值实现	机遇性、风险性、过程长、环节多、复杂性	市场兑现的快速性，相对稳定性
劳动品格	创新性（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代表更高生产力）、竞争性（不冒尖就淘汰）、主动性	承袭性（限于现有生产条件的利用）求同性（达到同一标准）
劳动要求	做对的事情（决策、指挥、监督、设计）	把事情做对[13]
个性特征	倾向自由，只要求机会平等	要求平等（工人）、纪律性强，个体农民倾向自由
社会联系	广泛性（尤其是同行同道以获取信息）	闭锁性（指与生产过程无关）
主要特性	创造性、竞争性、复杂性、艰巨性、探索性	承袭性、重复性、简易性、艰苦性

从上表可见，维持社会生存靠体力劳动，推进社会发展靠脑力劳动，相互之间是协作共生关系。而且脑体劳动也不能绝对分割，脑力劳动者也得有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也有人创造发明，改进技术，尤其是技术工人，一样需要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当教育更进一步普及，工人知识化以后，这种差别自然在缩小。因为脑力劳动专业人才的稀缺，对社会作用较大，收益丰厚一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切社会的常规。只是在一种用劳动时间计算体力劳动价值，不去比较两类劳动的差别的经济学理论指引下，才会发生反常的“脑体倒挂”，蔑视知识、鄙视人才的事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一种文化上农村改造城市的倒退口号。

在社会分工中，两类劳动谁更有利于谁？且不说自动化、电子化以后，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大为减轻。就在商品的科技含量超过50%以后，“谁养活谁”这个命题，应该为“谁都养活谁”代替。“谁养活谁”是算剥削账以利斗争的口号；而“谁都养活谁”是相互依存共生的道理。知识分子有为全世界文盲和未开化的土著民族知识化而努力的义务。知识就是一种责任。

有个很感动人的故事；英国一位老太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志愿到非洲去办学，不幸被土著给杀了。二儿子继承兄志，结果相同。三儿子又去，还是殉职。老太太说：“为什么我没有第四个儿子？”结果全村一群年轻人都愿意到非洲去办学。[14]这是什么精神。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也是共生精神。他们的思想境界，越超了国家、民族、宗教和个人恩怨，为把文明传播给未开化的非洲土著，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人类知识化，理性、道德才能伸张，一些利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愚民去推行种族、民族、宗教、阶级屠杀的图谋才不能得逞。

社会的生产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靠知识推进；它的发展过程也是脑体劳动相互渗透交融的过程。脑力劳动者应放弃由传统带来的对底层体力劳动者傲视与偏见，平等爱心对待；体力劳动者也要放弃某些敌视与自卑，自强不息地创造条件知识化，缩小差距，才是脑体合作共生直至溶为一体的道路。

五、男女平权共生。男女共生关系本是自然秩序。树上的鸟儿双宿双栖、繁殖后代，人类比较类似如兽，也是杂交的，雄性要求与更多的雌性交配，雌性则要负起哺育后代的本能的责任。雄性为争夺雌性的争斗是人类最原始的斗争，与禽兽无异。但是，人又大异于兽，他们不能直接向自然觅食，而是在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求得生存，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活着，受社会其他人的制约；是在一定的婚姻制度中求得性满足、延续后代的。人类历经群婚制，对偶婚，母系婚（男到女家），父系婚（女到男家）发展到现代的平等婚，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其中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如血亲婚子女不旺），性发展为性爱；性的文化含量增多；宗教的“乱伦禁忌”和世俗的同姓不婚，等级不同不婚，异族、异教不婚等等规定了男女结合的范围。现代婚姻形式所组成家庭，成为社会的细胞，一个最小的共生圈——两人世界——家。

但是，家庭共生圈却并不都是完美和谐的共生关系，深受整个社会层面男女并不平等共生的影响。在历史上从母系社会为男系社会取代的过程中，在农耕社会男性凭其体力优于女性，而女性怀孕、生育、抚养儿女需付出大量体力和时间，处于劣势，逐步地牢牢地掌握着财力和权力，支配着妇女，形成男权至上的社会。无论是何种历史文化背景，妇女受压迫、奴役、歧视都是深重的，充满了血泪、折磨、屈辱、黑暗和死亡。人类历史最不光彩的一面，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侵害与剥夺。

女性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被剥夺了权利，还要套上精神枷锁；如《圣经·创世纪》伊甸园 22-24 节所述的：“耶和华 神就用那人（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子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从源头的宗教意识里就种下了女人只是男人一小部分的附属地位的根。（另方面也有夫妻二人世界不可分的自然秩序的涵义）无独有偶，东方哲学：男为乾、为天、为刚、为上、为阳，女为坤、为地、为柔、为下、为阴，也用自然秩序分了上下。孔子把女人与小人并列，并贬为“难养”，只有男人有做君子的资格。中国的纲常文化“夫为妻纲”、“三从、七出”的礼教为害至深。男子为所欲为，女人都得屈从，女奴、婢女、妓女都成为牺牲品。就是夫妻关系，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谁，由父作主。最无人性的是未同房夫死也要为之守节，终其一生。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一生命运全在男人手中。“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15]有一条都可休妻弃妻。媳妇们只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于贞操问题，要求尤为严酷：“生死事小，失节事大。”朝廷立许多贞节牌坊，褒奖一生为男人守节的烈女节妇；而在男性方面，从无贞节一说。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不足，

还要到各地选美，官僚们妻妾成群，富户三妻四妾。女人们只是生孩子，传宗接代和泄欲的工具、掌中的玩物、身上的衣服、交际场上的装饰，并进行挑肥拣瘦，束腰、缠足供男人欣赏。伤害身心，世代相传，妇女们无法反抗，并化为自觉意识，以此为荣，悲哀莫过于此。

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生产中劳动强度的相对减轻，女性比男性更廉价的劳动力符合扩大生产的需要。女人们才开始找到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从而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使男女平等共生成为可能。但数千年的压迫、歧视妇女的历史传统仍然根深蒂固，维护女权运动于上个世纪兴起。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Beauvoir,Simone de)(1908～1986)写的《第二性》，成为女权运动的“圣经”，从此在世界范围展开为争取女性权利平等的斗争。妇女解放标示着社会文明的程度，而妇女解放的实质是妇女应有与男子同等的经济自主权，政治参与权，能够使他们在同等抚育、同等教育、同等就业，同工同酬的社会条件下充分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出贡献，得到如同男性一样的尊敬与尊严。被誉为“半边天”的中国妇女在土改后与男性分得同等份额的土地，家庭中有了发言权、主事权，确是翻身了，使两千年女性依附男性的宗法制度传统得以改变。但进入市场经济后，女性弱势又开始显露。而男权中心文化影响仍然严重存在，还在重男轻女，使生育比例失调，贫困地区仍不能保证女童入学，城市女大学生就业困难。打工族女工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少，还倍受各种欺压苦楚等等，使许多妇女仍然在社会最底层，而对妇女的歧视、侵害、骚扰、侮辱、暴力也不鲜见。亟待从男女平等权利的高度，从制度与实践上多方面加以解决。

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在争取妇女平等权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宪章开宗明义就强调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60 年来，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其中 1995 年第四次大会在北京举行，197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17600 名妇女代表参加，还有了万余人参加非政府组织的妇女论坛，盛况空前。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是健康、教育与就业。统计指出，世界 13 亿贫困人口有 70%是妇女，10 亿文盲中妇女占 2/3，1.3 亿失学儿童女孩占 8100 万。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会前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了男女平等。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把世界妇女运动推向一个新的起点。联合国并把妇女作为易受损害的群体之一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争取各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订下了公约。

妇女解放事业，是男女两性的共同事业。她们的呼唤，应该得到各国政府和有知识、有理性的有识之士以及所有男性的积极支持与响应。我们最亲的人、母亲、妻子、女儿不都是女性吗？女性是爱、善、美的源泉，“让世界充满爱”首先就得同情、抚慰、援助在男权社会中受苦受难的妇女们，反思在男性中心主义历史文化传统掩盖下男性对女性的残害、剥夺、损伤、欺凌、欺骗甚至暴力的丑恶行为。还她们应有的平等做人的权利，创建新的两性平等的新人类文化。

如同经济平等一样，男女平等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离开自然与社会条件讲平等，

是不切实际的。如男女生理、心理、性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争取的只能是男女地位上、权利上、人格上的平等。而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极端办法来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男子可以袒胸赤膊，女人也不带胸罩游行，争取“女权”；男人有性淫乱，女人也可找陌生人去做“一夜夫妻”的活动。美国就举行过 5 万人这样的大游行。某大学的游行者们，1/3 参加一夜情活动。其实，用这样极端方式，也不过是一种集体性报复，向男权抗议。如果发展下去，它会使所有的家庭解体，拆除了文明社会的根基，也有违波伏娃的本意。用原始不文明手段去争取男女平权的运动并没有引起女性的广泛支持，一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被后女权主义取代。后者从女性学研究开始，才回到理性的道路，即两性和谐共生的方向。

共生论者提男女平权共生，是对平等概念的现实表述。男女权利平等不仅可以争取到，而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做到，智能时代更容易做到。最上层掌握政权清一色男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女性执政者逐步增多，英国撒切尔、德国默克尔、连发展中国家如甘地夫人（印度）、班达纳奈克夫人（斯里兰卡）、阿罗约（菲律宾）、瑟利吉（非洲利比利亚）也成为当政者。

当妇女有了就学、就业的平等权利以后，女性也同男性一样，她们的智力潜能得到发挥，决不亚于男性。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妇女力量的发挥，将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飞跃。只有象希特勒这种人，才会提出“妇女回到厨房去”，恢复男性中心的权威，开历史的倒车。

女性以其优于男性的勤勉、谨慎、宽容，耐力与爱心等秉性，在同等的条件下，一般更容易取得学习、工作上的业绩。问题是男权社会剥夺了她们的平等权利，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宗教对妇女的权利歧视，束缚了女性的全面发展。女性是天然的和平主义者，和平与安宁是女性的本性需要，因为妇女负担着抚育子女的责任，要一个和平环境中温馨有爱的家，才能让子女健康成长。而多半由男性挑起的仇恨、暴力、恐怖与战争却让她们心惊胆战，亲人要去送死。恐怖与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女性。男人的痛苦，无非是伤亡，一死百了；而妇女们却要为此承担一切灾难性后果，终其一生，是永远的痛苦与折磨。因此，妇女的解放有双重任务：一是和平，二是平权。也只有和平发展，平权才有基础；只有男女平权，运用政治平等权利参政、议政直到执政来制止恐怖与战争，妇女才更能赢得和平与解放。

以上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工业时代的共生关系。但由于民族国家还存在着非共生关系，给世界留存着巨大的潜在的威协的工业遗产，就是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每个国家都以其军事实力和军事工业为其强大的标志，不遗余力地发展它。尤其是核大国，现有的核武库足以毁灭人类 N 次，有一次也就包括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一点共生的自觉，就会感到军事工业是杀人工业，每一批军火的生产将夺去多少人的性命，而作军火贸易的则做的是夺命的生意。它的利润才是人肉人血的代价，“每一美元都淌着鲜血！”是世上最肮脏的收入。和平的人民不能等到战争已经临到头上，孩子们一批批地

去送死再来游行、示威要和平；而是就在平时，树立反战意识，反对扩充军备，要求削减军费预算。国际社会应象对待贩毒品那样对待武器出口。毒品是人类慢性自杀之品，武器是人类急性大流血之器。

要唤起全人类的反暴力、反恐怖、反战争意识，使掌握武力的当权者，枪口不仅不能对着本国人民，也不能对着别国的人民。各国武装用于维和，组织国际联合特警用于反恐，国家刑警用于刑事犯罪；不能把反恐扩大为国与国、族与族、教与教的战争，结果会是越反越恐。反侵略与反恐怖都具正义性。当战火涉及到民族与宗教感情的时候，人类便面临着又一次大灾难了。

工业时代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是巨大的，但因各种非共生的思想作怪，也潜在着很大的危险，军事科技与军事工业始终处于前沿与优先地位，不仅耗费了大量智力资源和亿万资财，而且使人类用于改善生活条件的生产始终在用于毁灭人类的军工生产的阴影之下。

第六节　智能时代的共生

由于电脑、网络、机器人的出现，人类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显著特点是人的手脚因机器而延伸获得空前的力量，智能时代则因人脑延伸会获得更伟大的力量。一个以创造为主的时代将代替以复制为主的时代，也是人类开始超越自我、超越民族、国家、宗教狭隘性、局限性的人类共生同乐的时代。

关于对新时代的命名，先后出现多种说法，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有从技术进步角度说的，如电子时代、核时代、网络时代、机器人时代；有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角度说的，如信息时代；有从经济角度说的，如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生态（或类生态）经济时代；有从人的活动空间角度说的，如地球时代，太空时代；有从人类生活的整体性角度说的，如全球时代等等。比较而言把它归结为智能时代较为全面。因其涵盖面较广、跨度更大、标明了其主要特征是智能而非体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具有人的主体性和开发人脑潜能的无限可能性。

高科技的发现、发明、创造将人类带到崭新的智能时代。原子物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的进展，使造就工业时代的传统物理、化学理论和机械工业技术退出科技舞台的中心。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带来一个信息社会。核能、太阳能技术使人类减轻了对地球不可再生性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枯竭的忧虑。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减少了人类对自然材料的依赖性。基因技术、生物工程可以让人类健康长寿，改变物种以适应人类的需要。空间和海洋技术拓展了活动空间及资源范围。尤其是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化、将使人从繁复、艰苦、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机器人还可以掌控自动化生产体系，深入管理层次，公务层次、家务层次、代替此前非人不可的领域。这就不仅惠及体力劳动者，也惠及脑力劳动者本身，惠及全人类，由此奠定人类共生的技术基础，生产力基础。

由传感、通信、激光、光纤、空间、计算机等技术所形成的高速、全息、全球信

息网络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网络世界。它的特点是信息比实物资源更为重要；而且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到 20 世纪时发生信息大爆炸。信息不是以线、面方式传递，而是以全方位、高速度、连锁性的爆炸方式在扩散，我们生活在信息与知识的海洋中。中国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榜》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风火轮全然成了现实。人在家中坐，能见到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大事现场影象，听到现场的声音，还能和该处的人直接通话，全球可以连线。这是多么奇妙的世界。如果不是国家的壁垒、财团的垄断，人为的阻隔与封锁，这个奇妙的世界该是多么美好！

与实物不同，信息是符号，数字代表着实在物的量，语言文字概念则代表着各种自然、社会现象的“质”，构成哲学上所谓的“符号”世界。符号可以用以观察、记录、比较、运算、储存、更深入的思考、模拟、仿效、创新、发明、检验、分析、综合等等，贯彻于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它不同于物质世界，它是不守恒的。而物质、能量都是守恒的。信息可以产生、扩散、消失、放大、缩小、畸变、失真。因此，那些正确、有效的信息便成为科学知识留存下来充实知识的宝库；那些失真、畸变、有害的信息也同样的有它的生存、扩展的空间。构成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人们共有的虚拟世界。人们所有能够想得出的思想观点、办法主张都可以在一个大平台上见面，交流、切磋、批评、辩论，雅典学风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家求真知吧！这是旷古以来没有过的机遇。

智能时代会在工业时代各国共存的基础上进到全人类共生的阶段，由自发状态进到自觉状态，由非共生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的现实世界迈向高度共生的理想世界。这决不是跨越历史阶段的乌托邦，也不是激进的感性冲动，而是根据世界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面对现实存在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唯一可取的道路。客观上或者是人类毁灭或者是人类共生，主观上则是全世界和平人民普遍要求与愿望，也是人类共同利益所在。这个时代可导致全人类共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智能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性。以往科学的发现与技术创新，产品的发明，工艺的改进，都是分散的，顶多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现在有了网络，可以把全世界的科学家联聚起来，对某一重大项目进行共同研究。由于迅速传播便易于启动更多的大脑思考，使人类的科学知识马上又有了新的高度。基础科学知识超越国界，各国都能得益。技术层面，尽管在高科技方面，核心技术成了国家的发展命脉而高度保密，但假以时日，也会在各国科技界努力下，同样能创造出来；就产品的发展而言，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更新换代，层出不穷。这种科学界既有高度合作，又有强力竞争的局面，使智能时代的科技发展不是几年几十年才能发展一步，而是日新月异、变幻变测。现在不仅是科学家、工程师在搞创造发明，连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这个行列，因为只要他们学会了电脑操作，就能获取大量的信息。智能时代就是人人动脑筋的时代，共同向着科学技术全面推进的时代。

二、智能时代生产、消费的全球性。以信息网络为技术手段，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物质、技术、人力的优化配置，使经济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一部汽车，可在七八个国家生产其部件，并不一定要回到资本所在国组装再卖到销售地。那些超越了国家的界限的宠大的经济体，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王国。而这些跨国资本，对母国和生产所在国的依赖愈来愈小，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工厂和商店。沃尔玛就开在家门口，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货遍及全世界，印度软件摆在世界各处电脑之中。发达国家只要保持其技术与标准及名牌等智能产品优势，就能财源滚滚；而发展中国家也会找到突破点和机遇，深山里的产品也可从网络上找到买主。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人类共生的交换基础。

三、智能时代的交流合作的国际性。由于生产消费的全球性，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人与人、家与家、行业与行业已经扩大到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世界统一市场、跨国公司、信息网络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科学研究、能源、卫生、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挽救濒危动植物方面到具体技术层面，生活层面，都在相互交流，借鉴合作。以各专业为基础的遍布世界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的、各国官方的、各国民间的日益增多。内容上从务虚的论坛性的探讨到实用的技术与文化合作日益深入。世界性的问题，全球都在关注。除了各国军事科学、国防领域而外，民生问题都是公开的，全方位的在讨论、研究、各展其长，相互学习、借鉴；从广度、深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扩大了人类共生的合作基础。

以往阻隔人们交流，合作的障碍因素：空间与时间，通过网络与快速交通已不成为问题。语言障碍因同步翻译机和应声翻译机的使用和普遍地学习国际通用语言热而逐步消除；语义障碍因频繁的文化交流相互了解而逐步打破。种族、民族的心理障碍因彼此需要、相互理解而日渐拆除，宗教也日益抛弃彼此排斥而变为互相尊重；阶级障碍也因经济社会发展，互利关系增多而步步减削，意识形态化现象也在改变；即使是非洲贫困国家的人民，也在国际组织援助之下，不让他们饿死；困难无助的群体、残疾人、艾滋病人、失养失学儿童也在国家和慈善组织以及人道主义者们的关心之中。人类共生正在这种打破各种障碍中一步步的向前，超越国家共生圈的界限。

四、智能时代中知识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与体能为主的工业时代不同，知识生产者不象工人、农民那样迫于“饥饿法则”不得不在工厂、土地上被动地劳作，对物质生产资料的依赖性很大，耗费体力很多；而是依靠信息资料在自己的大脑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者的主动积极性。他们不仅从生产中获取财富，而且能从中得到快乐。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满足人性中好奇、求知、发现、发明的精神欲求。当知识生产者具有足够的知识，达到能独立思考的时候，要他停止这种探索与追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专业兴趣和创新品格推动着他们的主动性，并不需要很大的外力的推动，而是自然的、自我的律动。

甚至在临终时都还忘不了对问题、作品的思考。

由于知识生产是在人脑中进行，它的唯一要求是自由获取正确、真实的信息资料。因为在自然科学、生产技术方面障碍比较少，所以科学技术能加速地发展，而关于人、社会的科学则被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所割裂、所垄断，因而滞后不前，以致没有一个可为人类一致认同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在各国坚持自己国家利益往往不顾及他国利益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因之，现在各派社会科学，只能是“利益科学”，只能是为某些共生圈或利益集团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人类主体活动符合客观实际、实践的知识的总结，受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之社会科学理性的建立也非常困难。只有把科学理性建立在人类共生理性的基础上，才能把科学理性与价值观结合起来。而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人动脑筋，也一定能促进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建立人类共识体系，为人类共生奠定社会科学基础。

五、智能时代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以往的社会结构多是宝塔型，包括权力与财富都呈宝塔型，越往上人数越少，甚至只有一个人（帝王），越往下人数越多，贫苦百姓居于最低层。专制社会压迫最甚，“官大一级压死人”，“苛政猛如虎”，百姓有冤都无处伸，结果是官逼民反，是专制特权使然。到工业时代，经济是自由发展，通过实质是反特权，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特权受到彻底革除，执政者才受到人民的监督，开创了人民主权的新时代，保证了市场经济的和平发展的秩序，从此在领先发达的国家内没有争夺政权的内战。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不是中间阶级的消失。而是通过“反垄断法”、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股份制的公司的迅速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知产阶级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而壮大等等因素，以致知识劳动者的人数超过了体力劳动者人数，成为菱形社会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极富与极穷的都是少数。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全部劳动力中大约有 56%是从事信息工作的”。[16]这是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重大转折，意味着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种种对抗、斗争逐步在消减，而不是加剧。其他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的对抗与斗争，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适合本国的优秀部分，改革、创新制度，使自己更好更快的发展，从知识结构提升到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壮大知产阶级，必能跟上智能时代的步伐。

以往困惑人们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在工业社会中逐步在缩小，有的已不成问题。体脑差别到智能时代则进一步缩小，甚至融为一体，只剩下一个贫富差别，而这个差别也是相对而言，世上应无赤贫现象。社会结构应是整体均衡向前推进的箭矢结构，一体地飞向未来。

就是现存的地区冲突、国家、民族、宗教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也是能够通过国际社会的进步逐渐得到解决的。只要不偏离人类共生这个大方向，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历史不平衡性终将被智能时代的历程所抚平。

六、智能时代的非暴力性。也可以说智能时代开启了人类和平共生的大门。我们比较农牧、工业、智能三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特点，来看战争与和平。农牧时代社会生产靠的是人力和土地，由统治者的侵略野心所发动的战争，无一不是去拓疆掠地，虏获劳动力，才可称王称霸，臣服万邦。战争技术是冷兵器，（刀矛剑戟、弓箭、弩之类）只有直接宰杀才能镇压。被压迫人民，拿把菜刀就可杀敌，有铁就可以造反。这是人类直接拼杀时期的特点。工业时代社会生产力主要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并有销售商品的市场才能增长财富。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向殖民地掠夺，扩大其市场。强国与强国因为再无处掠夺而展开相互争夺的世界大战。以热兵器（枪炮、战车、炮舰、炸弹之类）为手段使控制面大为扩展，没有枪炮的被侵略民族成为毫无抵抗能力的羔羊，一个英伦三岛之国，可以独霸世界成为“日不落国”，就是它的军事优势和资本力量使然。

到了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力主要是靠智力资源，信息资源，而实物资源的地位下降。经济领先的国家，只要发展知识经济，用知识产品，雄厚资本，把工厂、超市设到别的国家，还愁他国钱财不会流入自家的口袋里吗？所以，非殖民地化，除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国际道义的伸张，民族自决权的普遍认同，其深层次的技术经济原因是：“用不着直接控制你，让你们自己去管理自己吧！我还划算些。”现在发达国家害怕大批移民、偷渡、就是害怕穷哥儿们进去后分他们的福利；而对于高智能人才，则是求之不得，来者不拒。智能时代争的是人才，它不缺普通劳动力。知识经济实行的是“君子求诸己”，开发脑力才是致胜致富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也是个和平经济，这是看问题乐观的方面。

再从战争手段来说，智能时代则是核武时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力是空前的，核大战可以毁灭人类。核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包括发动核战争的人自己也得毁灭。“物极必反”，以往强国一般是操胜算才去挑起战争，至少执政者自己不会考虑要死的问题，死的只是对手和将士。现在却也要考虑自己的存亡问题。而且只要有一点反映和平人民的愿望的政府及其首脑，特别是实行政治民主的国家，都惧怕发动毁灭人类的核战。为此，他们尽量地想“核弹小型化”，把弹头威力缩小到仅止于战场，或实施重点清除。这样既避免世人的遣责，又消灭了对方军事力量或首领。核弹无论大小，都应在反对之列。共生论者反对一切暴力、恐怖与战争。人类创建美好生活的智能，决不应用于屠杀普天之下的兄弟姐妹。

智能时代的非暴力性还表现在人类主体的有产化和知识化，他们是反对暴力的，他们既不同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半无产者经常会因社会不公产生愤怒之情，也不同于财大气粗的傲视弱者的统治群体，在这对立的两极中，居于中间状态，是社会稳定平衡的力量。只有和平、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才是他们发展的良好条件。同时，长期的脑力劳动习惯于理性思维，起码也具有权衡利弊、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比较平和的心态，不使感情冲动占据上风。台湾 2006 年 8 月百万人反贪倒扁的大游行、静坐示

威达月余，和平进行，秩序井然，没有打砸暴力冲突，可为中产阶层政治品格的见证。

七、智能时代的真理权威性。知识界、科学界只相信和服从真理权威，它是经得起现实、历史、逻辑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科学理性权威。而不是靠武压、文骗、蒙蔽、吹捧建立起来的假权威。只有独立思考加自由讨论，把各种假设与思路亮出来，愈辩愈能接近真理。它可以从各个角度与侧面，观察、论证，去伪存真，相互补充，相互证伪，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百家争鸣是认识真理的必由之路。哪个地方只一家独唱，哪个学科出现学阀，实行真理垄断；那个地方、那个学科必然出现因缺乏理性思维而萎缩。但认识到真理并不与人数多寡有必然的联系。哥白尼提“日心说”时，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地心说”，但真理是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真理有它的认识过程，如果一开始就对不同见解视为异端邪说，就会堵塞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任何高深、高明之见，也只能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而即使是错见、误见，也可为证伪提供资料。学术容异、宽容气度就是从这种认识中来的。

现在同行评定，专家投票对某一问题下结论，只是在某一阶段认识不能一致的折衷方法，少数服从多数，有人称之为“学术民主”。这在反对学阀和保护歧见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作为原则是难以成立的。倒是学术自由和平等讨论则是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

智能时代的人类，因为知识的普及化，大家都能动脑筋；对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伪理，他们决不会盲从。人类共生是不是更接近真理？社会科学受各种共生圈利益意识所左右。没有共生理性作为考虑问题的思维方法，没有以人类共生这个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能有人类的社会科学吗？

因此智能时代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继续着真理权威性，而且也会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建立真理权威。

八、智能时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工业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超负荷索取和肆意将废气、污水、毒物还给自然，破坏生态环境极为严重。现在开始接受苦果了：城市见不到蓝天，农村看不见绿水，毒雾酸雨，癌症高发，森林被毁，沙漠化使生存空间日蹙，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真个是江河断流，日月无光，冰川消融，海面上涨，淡水短缺，矿藏挖竭，一些物种濒临灭绝。凡此种种全球性的大问题，除能在现有条件下急谋补救外，都是有待智能时代用科学技术和全人类合作才能得到解决的。智能时代的经济必然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人类只能利用自然的恩赐，而不能破坏其根本。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叫“天人合一”，颇合自然之道。本书改之为“天人共生”，即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同时具有人的主体性。这将会在下述方面展开：

1、接受工业社会对自然资源过分掠夺的教训，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应当发掘一切技术条件的可能性，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应该瞻前顾后，综合开发，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达到寸物寸用。用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取代污染性能源。安全使用核能，对核废弃物尤应注意放射性物质废料再利用的研究与应用。

2、开展海洋资源、太空资源的开发，注意海洋与太空的污染。解决海水淡化与沙漠绿化问题，只有集中全人类智慧与艰苦努力，才能进行这些伟大工程。人与自然的协调，首先人自身先得联合起来，不能象殖民时代那样去抢占资源，只顾自己发展，不管别人的沙漠化。地球只一个，洲际天气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解决问题也只能是全球性的。

3、发展基因工程技术，在改进品种，创新物种，克隆动物，让自然生态的智能含量不断增长，让大自然不仅是保持，还能同社会一样也发展，创造一个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好的自然环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4、针对细菌、病毒展开深入研究，保证植物病虫害、动物疾病、人体疾病的危害减至最小程度。人类不仅要做自己的医生，使人活得健康长寿，而且还要做生物界的医生，还可能把豺狼虎豹凶恶吞噬异类的本能改变，使之和平共生，人兽为朋。对家畜宰杀也要免其痛苦。人类还可发展素食食物、合成食物，依靠创造、减少凶杀，慈悲及于众生，岂非佛家境界？这在高度发达的智能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5、揭示脑科学的奥秘，让人能更聪明善思考，解密悟性，把人脑、思维机理、心理学、光电学等综合起来研究，在现在的测谎仪器基础上研制出神话般的“照心镜”，能够象探知生理疾病一样探知心理思维的疾病，用科学技术手段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九、智能时代人类利害的趋同性。与以往以物质产品为主的时代不同，物质享有者之间是零和关系，你有即我无，资源不可共享，这是抢夺、战争发生的物质基础。智能时代以知识精神产品为主导，精神知识产品，你有我可以学，是可以共享的非零和关系，这是和平共生的信息基础。以往财富是靠步步的积累，现在是靠超越性的知识创造；以往的各共生圈隔离式的生产生活，现在是全球一村在生产、生活；以往是各国家写自己的历史，现在是共同书写人类的历史；以往不同国家有它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现在是没有全球普世价值标准，就只会有战争没有和平发展；以往是各国解决各国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人类共同的危机——生存危机和生态危机亟待解决；以往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现在则不得不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彼此祸福相关，休戚与共。其所以现在还只停留在国与国的明争暗斗阶段，就是因为 80%的国家还停留前智能时代，有的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巨大的差异。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视现代化为工业化，实际上现代化就是智能化、跨国化、全球化，现代化的标准要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民族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一，可能殊途同归。但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精神文明则是缺一不可的。三者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市场促发展，民主保公平，文明增幸福。就分配关系而言，市场是各取所值，这是第一次分配。民主：民主政府必能实施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是二次分配。文明：慈善事业的救助，有人说是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是人类爱心与道德的表现，是自觉自愿的，有的是跨国的。支持他们的是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明。人类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明晰地要走共生之路。

正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利”，也有上世纪三次大的人为灾难共同的“害”，才会出现联合国宪章这样的能达到全球互利共生的文献。凡是会员国即 192 个国家都签字承认的精神和原则及其具体规范，为的是保障和平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把世界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国际组织的宗旨和各国的义务。尽管联合国现在还是个平等协商指导性的机构，但它可以授权对和平有巨大威胁的国家采取行动或派出维和部队，防止对和平人民的残杀；实际权力则非常有限，并且受到某些强势国家的干扰，甚至绕过联合国自行其是。60 年来，联合国对和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主要是维和与调解。而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工作，更是开启国际消除饥饿与贫困、扫除文盲、免费实施初级义务教育，提供健康保护，消除失业，保证工作权利和组织工会权利等国际性行动的先河。各基金组织更具体落实，惠及全人类尤其是弱国穷民，其中非洲得益颇多。

智能时代，全球一村，信息互通，更扩大了合作发展的基础。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高产出，智能产品的迅速普及，人类利害的趋同性将使全球能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不断改进与改革）实现世界事务管理的一体化，在全球共识体系逐步建立以后，亦即消除了各国家民族的对立意识之后，必会走向政治、法律的一体化。那时被各大小共生圈所分割的世界必将为一个平等联合的权力体系所取代。

十、智能时代人类智慧潜力的无限性。如果用人的体力，物质力量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发展，是有限的，反之，用人的智力结合物质工具的力量则是无限的。知识爆炸，信息辐射会把人脑迸发出原子裂变、聚变式的力量，几十亿人都开动思想机器，什么人间奇迹都能被创造出来。

但是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国家人民尚处于求生存求温饱的阶段，远远没有实现全民知识化、技能化，他们想的都是物质需求。这些国家和人民普遍地没有受到良好的有实效的教育，怎能谈到有创造性的智能人呢？但是，有远见的民族，看到“知识就是力量”，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民族赶上时代的希望。日本二战后在最困苦的时期也不减小学老师的工资，这些受教育的孩子就成为尔后世界第二个经济强国日本的中坚力量。国也好、家也好，抓教育是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教育体系应与其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就是说不能盲目追求高精尖，究竟创造、发明的顶尖人才是少数。这些人才是在学习竞争中自然涌现的，而大多数要在技能上下功夫，即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以适应市场的需要，才能在整体智能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迈向智能时代。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大机遇；一是后发优势，可以接受发达国家几百几十年的经验，以知识经济作为切入点，可以比较迅速地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而迎头赶上。二是信息技术可以实施远程教育，全民教育。摆脱应试与文凭资格教育的束缚，着力新型智能人才的培养。要讲究真才实学，才能提高创作和制作能力。

关系人类思维能力的哲学，关系每个国家，每个人的人生方向的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和现实的利益冲突的缘故，冠以“科学”之名的社会知识，五花八门。处于具体实用层次的社会科学是汗牛充栋，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真正能指导人类和平共生的著作不多。这是人类精神文明远远赶不上物质文明的教育与学术根源。

社会科学中处处找得出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偏见和局部利益神圣化的非真实、非理性的成分。历史都被掩盖与歪曲。对自己是文过饰非，对异己则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甚至相互妖魔化，延续仇恨和敌意。这不足以教育子孙后代和平共生。所以笔者赞同日本池田大作“教育联合国”的设想[17]，进行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公民教育。从孩子抓起，懂得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道理，就会少产生一些炮灰，多培育出为人类共生与幸福做出贡献的人才，把人类精神文明推向前进。现在各国教育如同每个家庭对自己孩子一样，各以其不同世界观人生目的来教育后代。使一个个可爱的孩子教成核心价值不同的人来，培养世界公民与和平共生的核心价值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做出巨大艰苦的努力，它应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同步进行，它是世界精神文明的发展基础。

1999 年 9 月底，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举行了一个 500 个经济、知识、政治顶级精英的预测未来社会前景的会议。提出了一个“20 ： 80”的概念，描述智能时代将是只要 20%的就业人口能够保持世界的繁荣，而 80%的人将被淘汰出局，“靠喂奶过日子”。[18]这个前景。不仅体能工人，而且具有一般技能白领也不需要。从高科技产业只需要很少数人和机器人所替换下来的就业人口看，这也许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实。但它显然与笔者所持的观点相悖，即悲观与乐观的不同。笔者的看法是，80%的人智力尚未被开发。80%的人当然主要部分是指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难道他们就没有志气与可能赶上去吗？而且，20%的人没有 80%人的市场需求，能维持 20%的人高消费吗？如果你的产品销不出去，能维持繁荣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未来社会不只是物质生活消费，更广阔的空间是人类对健康、娱乐、文化、艺术、科研等巨大消费领域。现在的文化尤其是娱乐消费急剧上升就是讯号，看不到人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性，停滞在现有的水平上是没有远见的预测。

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也会拉动发达国家的增长。人类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多彩性、发散性将会使生产力不断提高，让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更应有眼光与发展国家合作，用资金，技术扶贫助学，开发智力，而不仅限于慈善家们的救济。发展中国家更应自强不息，别再因穷而愚，因愚而斗，因斗而乱，因乱而失去发展的机会，以致真的要靠别人喂奶过日子。20 ： 80 社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人类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全球温饱甚至小康而有余，就不可以继续发展，向着精神文明发展的广阔空间进军，使人类不仅能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而且建设一个更美好、快乐，四海五洲一家人的地球村吗？

尽管智能时代会产生大量失业人群，也会包括发达国家的失业危机，形势严峻。但是如同过去许多危机一样，终因人类智慧能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它。因此，笔者深信，智能时代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必大于带来的灾祸。除非人们疯狂了，没有理智了，使反共生的意识占了上风，毁灭了地球。这就是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危险——高科技一旦掌握在仇恨与报复者手中，什么殃及人类的事情都能发生。其次，高科技研制过程中本身存在始料不及的失控局面所造成的生物或生态灾难。如果现在不预见这些，尽快地建立人类的共生意识，由于国家、民族、阶级的割裂与对立也有可能越往后越危险。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以上十点，一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一部分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相信智能时代的到来和进展必将促进人类共生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发展，相信人类的共生智慧终将谱写出人类共生辉煌的乐章。

第七节　民族国家共生圈——形成世界共生圈的过渡形态

在人类共生圈由小到大的历史过程中，有两个平行发展而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的共同体。一个是自然形成的，有着远古血缘关系的，在同一地域上，操同一语言和使用同一文字，过着同一种经济和文化模式的生活，信仰相同的宗教，有共同的归属感的民族，它是基于历史文化特质的心理共同体。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权力统治为特征的、有疆土、有国民、有武装力量维护一国范围的安全与秩序，防范外国外族侵犯的政权组织——国家；它是基于主权、政治的、国防的实际生活共同体。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如日本；有多民族的国家，如中国；有同一民族多个国家，如阿拉伯民族；还有民族无国家的，如吉卜赛人和未建国前的以色列民族等。民族可以产生国家，民族在先，国家在后。国家是以民族共同生活为实际内容而代表本民族或多民族利益而存在的。民族的生命力可以延续到世界民族大融合，而国家则是比较变易不居的，它是以政权掌握在谁手里为转移的，如中国在 20 世纪就经历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政府，则是经过更多的更迭。

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从 15 世纪中叶英吉利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以统一政令军令、统一法律、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等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其后逐步遍及全球。法国政治思想家，《国家论》作者博丹（Jean • Bodin 1530—1596）首创国家主权理论，他把主权作为国家与其他机构相区别的主要特征，认为主权就是制定和废除法律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17 世纪英国霍布斯（Thomas • Hobbes 1588—1679）进一步强调国家的绝对权威性，认为人们都为私利而你争我夺，因此必须由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政权来统辖一切。从此“主权国家”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理上的定位，在国际关系上就具有公认的不可侵犯的属性。这种对内最高权力性与对外的独立性的民族国家就是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国际活动的主体。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国与国战争的起点。而在倍受殖民国家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求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的浪潮中，唤起了民族国家意识。二战后只有 50 个主权国家，迄今已有 200 多个。这么多的主权国家是不是都能万古千秋地存在下去呢？从上几节人类共生发展的历史看，从智能时代的诸特点看，从人类共生的技术基础、经济前景，政治趋势、共生意愿等综合来考虑，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全人类一定会走自觉共生、平等联合的道路。主权国家只不过是人类共生世界的一个长时期的过渡形态。

“国家消亡论”不自今日始，十九世纪就有人认为消灭了阶级，共产国际实现之日，国家便消亡了。有的认为世界公政府成立之日，国家职能为世界公政府所取代。世界议会能把各国议会职能统一到全球范围。20 世纪末则有人认为逐步加强联合国对世界面临各类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力度，努力集中各国政府与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逐个解决各个具体问题，使国家职能逐步过渡到实施全球化管理的模式之中；只要各国能贯彻联合国宪章精神，也是可以达到的。有的认为区域经济联合体将逐步使众小国区域一体化，世界成为几大片，再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到相当水平，才能完成全世界的大联合，等等。以上这些设想和提法，无论是革命的、改良的、激进的，渐进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不是永恒的，它将消亡于世界事务逐步实现全球化管理的趋势之中。各种设想最后全球管理模式虽有不同。民族国家这个共生圈一定会走向全人类管理一体化则存在必然性。近代民族国家有 500 年的历史，支配国际关系才 300 年（17 世纪欧洲君主国家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在国际政治领域首次实践）。笔者不相信它的寿命会比帝王国家的寿命长。因为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加速度发展的智能时代。

然而，目前我们仍处于主权国家的现实中，与共生智慧相反的看法是各为其国的，在内部是至高无尚的国家观，在国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观。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锱铢必争，以武力作后盾，你强我比你更强，你狠我比你更狠。这种思维定势，打个比方，把当今 200 多国家看成春秋时代；各强势国家划分势力范围，进而看成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合纵连横。巧合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也是七大文明。[19] 霸权主义的西秦，“虎狼之国也”，最后难免一战。如若各国当政者都心存这种思维方式，那就会把人类拖入无底深渊，重复 20 世纪的灾难，更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民主政治文明程度远非 2000 多年前农耕时代可比。但这种帝王思想，即反共生的思想却颇有人在，信奉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则更有人在。尽管世界多极化是发展趋势，可以制衡霸权主义，但前景应该是和平发展的多极，各国不断发展壮大相互促进的多极；而不应是秣马厉兵的多极，导致战国七雄的多极。

究竟现今世界仍然还是个非共生的世界，各类首领们的共生思想还微乎其微。强权政治仍占上风，主权国家存在的客观条件仍未改变。国家存在仍然具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是获得独立不太久的弱势发展中的国家，没有独立权就没有自主发展。所以，国家还是世界各民族的生存依靠和精神家园，它对内是国民和平生活，发展经济的保证，对外是反侵略的堡垒并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则是毋容置疑的。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及其拥护者儒家灌输了数千年的忠君思想，国家被视为极神圣的。君主国被推翻后，百姓家把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祖宗牌改成天地国亲师之位，可见“国”之深入人心。民国时期，提倡“效忠党国”，国之上又加个党，大概是“以俄为师”的表现，结果是党、国、民族、人民四个不同范围不同概念，混为一团，造成一种假象：党=国=族=民。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民主权”的国家首次厘清了君主政治只是窃公权以为私有，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将公权还归全体人民。其后又出现以阶级看国家，指出国家的阶段实质，并有“工人无祖国”之说。[20]启发了人们从不同角度去审视“国家”，发现国家不等于民族和全体国民，而是在民族和全体国民的名义下让国内这部份人服从那部分人统治的机器。其实实行统治的也不是整个阶级，而是其中更小部分的群体或集团。同时国家也不等于民族，不然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民族纠纷，需要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来解决。从此，国家的神圣性便大打折扣，人们就开始看代表国家的政府究竟能给它的各民族人民实际做了些什么来确定它神圣不神圣。

比较一下三位古人对国的态度是有意思的。一个是楚国的屈原，是个典型爱国人物，为了爱国，宁可投江自杀，也不愿意出国他就。一个是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复周礼的理想，带着一帮弟子游说列国，不管自己的鲁国，为的是天下。一个是墨子，也是鲁国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用勇敢+技术手段去“止楚伐宋”，抑制强国去攻弱国，把理想付之实践，传为美谈。没有谁说他们不爱国。说明人类社会还有高于国家的神圣：这就是人类向往着的天下太平，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幸福生活。

气壮山河的爱国精神的古人是“正气歌”作者宋代文天祥，当蒙元帝国诱之以高官厚禄，施之以斧钺之时，视死如妇。突出表现了我们民族反侵略的伟大而壮烈的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为正义、为真理、为民族、为人民而献身的中国英雄烈士们。

祖国、国家，这两个在人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词，因为它的民族内涵而产生的向心力，曾经鼓舞我们前辈人为之奋斗终生，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国家观念，牢不可破。在群雄并立的国家民族之林里，只有国家才能保障人民的和平幸福的生活，保卫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制定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仲裁着我们的社会行为，维护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它的正面职能无可置疑。由于国家掌握着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当你对它作出贡献时，会受到她的奖赏，因而也就受到普通的赞扬；当你有损于她时，她会给予应有的惩处，人们会鄙弃他。有功者是英雄，为国捐躯者为烈士，背叛者是卖国贼，是罪人。荣辱祸福，国实系之。国际上，国家是现实世界的权力主体，任何事不经过它，不和它协商就什么也办不成。在联合国，国家不分大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力实体，联合的原则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其实这条原则执行得不彻底，大国、强国经常决定小国、弱国的命运。富国组成的八国集团也是经常决定穷国的命运。国际关系总还不是共生关系，是一种各国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关系。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都会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外交上，贸易上总在争利，也不惜损他国，利己国。

这样在国内才能得到拥护，执政党才不致下台。这样的现实政治与人类共生在新世纪的任务是相左的。国际间需要和平，世界人民需要发展，世界性的难题：如核扩散，生态，贫穷，疾病等等都需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国家的自利性与人类的需要的普利性构成国际间的主要矛盾。国家规范人们的行为，谁来规范国家的行为？人们往往忘记联合国的宪章精神是国际间的行为规范原则，而由各签字国所签订的公约、条约的具体条文都应得到遵守。国家已经不是肆行无忌的权力，而是一方面有国际条约的义务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道义约束；另一方面，它必须为全体国民服务，包括国家与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经济的发展，福利的增进，文化教育的普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必须在国内主持正义与公道，维护社会秩序等等双重任务，而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处在新世纪的各国当政者及有觉悟的世界公民们，需要有全人类共生理念，把世界各国的事看作本国的事，休戚与共，关心别国的人民象关心本国人民一样。尤其是已经形成敌对国家的首脑们和教派的掌门人，更要有极大的政治智慧，化干戈为玉帛。历史教训已经够多的了，巴以冲突，什叶派逊尼派之间，流血不止，难道这是上帝，先知和世界人民愿意看到的吗？国家应成为和平的乐园，而不应成为战争的堡垒，人民的日子才好过。

国际关系如同人际关系一样，过分自私的都会受到谴责。只因国家是个完备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机器，别国无可奈何。若是危及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为一旦发生，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和其他国家也不会坐视的。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的失败就是坐视日本、德国侵略不管的结果。今天联合国决不应重蹈这一覆辙。

如果我们不把国家观念绝对化，发挥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积极作用，防止它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消极作用，各自努力建设自己的和平发展的家园，那就会在走向人类共生的过程中，引领世界潮流作出贡献。所以各国政治家与宗教首领们，得多对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反思，发展有利和平发展的因素；剔除国家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障凝因素，包括各种非共生思想因素，极端情绪和过激行为。从而消解这些因素，为人类，当然也包括了本国本族本教的人民幸福做出贡献。

21 世纪的国家面临着许多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信息的全球性、快速性，以前用“家丑不可外扬”的封闭手段愈来愈不灵了。各种暴政，暴行的消息会不胫而走，好事恶事同样迅速地传千里。跨国经济迅猛发展，谁也抵挡不住高科技，价廉物美优质服务的商品的巨浪。它将冲垮一切历史形成的樊篱和堤坝，全球资源新的配置格局，在自由贸易，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将迅速发展。各国人民将会从中受益，当然也会对无力补贴农业的国家造成危害；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优缺点在新的形势下展现无余，为各国取长补短提供借鉴，同时也会对各国的不适应新潮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国家权力因需不断解决区域性或世界性的难题中采取不同形式的联合而有所让渡，固有的价值体系也难免不触及。旅游业的发展，各种文化的相互了解交流，全球化必然是由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深入到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的各个领域。国家的存在既保证

民族国家共生圈的现状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又作为向人类共生，政治一体化的起点前进。如果不是这样认识未来国家的发展，还抱着国家本位主义，国家利己主义的老观念，不以全人类利益为重，必然把国家引入与国际对立的地步。则国家承受的内外压力，足以使首领们痛苦不堪。

国家的历史使命将是创造自己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联合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使之能融入人类共生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个过程实际是各民族特色文化互相交汇、学习、共同进步逐步趋同的过程。只有那些能够自强不息、平等待人，能够从自己民族历史中珍视自己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接受沉痛教训的，善于从异文化中学习自己缺失的东西，择其善者而从之，建立合乎人类共生的理论思维，并以实际行动与成绩作出榜样的民族，才能在这个进程中发挥其伟大作用。尤其是各大文化区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更应如此。

指出民族国家共生圈是人类共生的过渡形态，不是让人们在现有条件下抛弃正当的国家观念，不爱自己的祖国，而是爱得有道理，有个限度，不把自己国家驾临于别国之上，走到有损于人类共生损害他国的地步。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高兴，同时也要为邻国他国的繁荣富强而高兴。对已经繁荣富强的国家要学，深思其致富强之道是什么，对尚未繁荣富强的国家要帮，帮到心上，这才叫胸怀天下。这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国表现，可以为祖国带来更恒久更伟大的荣光。

第八节　全球和谐共生——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从以上各节分述了人类各个阶段共生进程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共生本质，共生的范围由小到大，共生的程度由弱到强，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可以预见的趋势，而全球一体化也会变得越来越近。全球一体化完全实现的时间长短，也许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要看世界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物质条件确已具备，就看精神条件方面的进展。如果人我共生的共生思想逐步能占上风就快，异己不能共生就慢。但是人类的共生终归是会实现的。和谐共生是全世界和平人民的期盼，是个很容易明白的浅显道理，但是要使各类掌权首领明白这个道理，却不太容易，他们硬要等到自己有了正面的经验和事实的教训之后，才会明白各种非共生思想意识的羁绊，接受和谐共生的观念。个别的也许要坚持到死，还以为在为自己民族、国家、教派作出了伟大贡献呢！

人类社会毕竟会发展到国家消亡之日，即国家的防卫功能消失之时，世界没有侵略恐怖与战争的客观条件，也只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功能一体化于世界机构的事务管理之中，才有可能。对照现实，该有多么遥远，但这是人类向前迈进的目标。

人类共生状态是不断进化的，从农牧时代的维持共生底线——即仅能生存、维持温饱到工业时代的温饱有余，各有财产，再到智能时代小康富裕，并不能达到完全和谐共生状态。笔者起意写“共生论”时，但求人不杀人而已。

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及“和谐世界”，已经从物质层面进到精神

层面。启发笔者可以描述人类社会共生的高境界，也就是和谐共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作为本章最后一节。

和谐，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一种社会状态。它的通俗含义是人们心态平和，不争不斗，自组织地化解各种可能引起的冲突和矛盾，而深刻含义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它是中华哲学“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精神的具体体现，表现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一种比和平共生更进一步的互尊、平等、友好、信任的关系，也表现为矛盾经过调停、调解、调和之后归于平静，不紧张的心安理得，是双方或多方的良性互动的心理环境。达到这样境界，诚属不易。但它的操作性较强，提出这个目标，可以从各个社会层面一步步脚踏实地做去。目标尽可远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是会离目标越来越近的。

用什么思想作基础来建立“和谐世界”呢？各种非共生思想、理论观念肯定不会支持“和谐论”的。非共生思想亦即少数人活，多数人活不成；或者多数人活，少数人活不成。前者是有权有钱者的强势群体或国家的一般思想表现，后者是无权无钱者弱势群体或国家很容易接受的意识形态。现实世界这种强凌弱，富侮贫，众暴寡，恶欺善，势压人的观念遍地都是，和这种强权、强势进行反抗，暴力、斗争、恐怖也不在少数。如此，怎么能够和谐得起来呢？只有人人都有共生思想，尤其是各类掌权者都有这种思想，才有可能迈向和谐世界。

历代的思想家、理论家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远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提出自己的蓝图，描绘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理想王国。在中国春秋时代就有孔子回答弟子言偃的一番论述，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21]

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是余音绕梁，越两千年而不散。对建立和谐社会，又是何等亲切有力。我们结合现实加以解读；首先发现这个理想的大前提是天下为公，非一人、一家、一群体、一集团、一组织之私，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小前提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即贤能者领导；办法是讲诚信，莫讲假话，讲和谐，莫讲杀、关、管。才能在亲其亲、子其子的基础上扩大人们对社会的爱心，而不是六亲不认，子女不保的恐怖社会。其政策是“老有所终”——社会保障体系，“壮有所用”——充分就业，“幼有所长”——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包括免费教育。“男有分”——就业还要恰当，“女有归”——有生活依靠，不致沦为娼妓。货弃于地——朱门酒肉臭，高消费，极浪费，和弃于地差不多。“不必藏于己”——人人有公德，对那些放在地上的财物，也不拿回家中，归个人所有，这是很自然的。也许智能时代发展到物质生活已完全不成为人类的问题时，可以实现，至少慈善家们部分做到这一点。“力出于身，不必为己”——不必指不一定，眼前实际是人人为自己，只有社会能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不必”

才有可能，不然，谁养活呢。接着孔子讲更高境界：“谋闭而不兴”——不搞阴谋诡计，公正、公平、公开。“盗窃乱贼而不作”——没有犯罪现象，“外户不闭”——用不着关大门，成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君子国，叫大同世界。

与孔子差不多同时期，希腊文明中，苏格拉底的“哲学王”——由哲学家当王才行；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大同主义“也都是向往着人类平等和平共生，趋向大同的观点。

到近代，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More,Sir Thomas）1516 年出版《乌托邦》，在第二卷中描述一个“所有公民在饮食、服装、住房、教育、政治、战争甚至宗教活动中，享有完全的平等”的乌托邦岛。全部公民义务的共同标准是信仰善良公正的上帝。这是有神论者的大同世界。接着法国社会理论家傅立叶（Fourier,Charles）在 1808 年发表的《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中指出，社会演进的最高阶段就是和谐阶段。主张以“法朗吉”为名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基础重建社会。他开始在法国、美国建立“协作移民区”，实践他的社会经济生活平等的理想，影响所及，当时法国、美国成立了一批这样的“法朗吉”。更加注意实践的是英国的欧文（Owen,Robert），他从一个 10 岁的学徒做起，19 岁便当上了曼彻斯特大棉纺厂的管理人，其后成为经理。开办英国第一所幼儿学校，接着开工厂，办商店，都对员工有福利性质。1813 年出版《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详述了他的教育慈善事业的原理。1825 年他在美国买下 3 万英亩（1214 公顷）土地，定名“新和谐村”社区，（有译为合作社）试验了三年，自己损失 4 万英磅的财产。对这三位社会理论家，人们只看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空想，不现实的一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他的社会主义精神，这就是和谐、博爱、慈善、教育，而没有这些，能成为社会主义吗？今天我们讲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似乎可以从这里找到它们的出处。

在伊斯兰文明中，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于伊朗的巴布教派，巴布真名为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有个“正义王国”的理想：“当救世主马赫蒂降临时，正义王国就会跟着建立起来，在正义王国，无论男女老幼都将是平等的，没有压迫和奴役、饥饿与痛苦，人们将友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22]

举此三例，说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孔子不信教，信天）、不同阶级、不同身份（莫尔——从律师到内阁大臣，傅立叶——从职员到农场主，欧文——从学徒到资本家，巴布——从盲人儿子到教派领袖）的人都提出过人类的理想：和平、和谐、友爱的共同生活原则。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对人类生命、生活的终极关怀和伟大的博爱（泛爱）精神。

近代以全球观点来描绘人类未来有两位：一是西方的马克思，一是东方的康有为。尽管他们一个成为引领一个半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成为导师，思想所及，至今还有西方民意调查列为世界哲人之首。一个是保皇党因其实践的失败而声名狼藉，他的人类未来蓝图——《大同书》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是在民主社会里设想革命；

一个是在专制社会里设想改良。因为他们都有着理想世界，笔者就不能不抱“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认识与态度，作一比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以后，国家消亡了，进入了无阶级，无剥削，无政治统治的社会，人类过着无商品、无货币、无交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产品的最平等的生活。

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没有臣妾奴隶，也没有君主统领……，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但并不悬殊。无国、废兵，世界置一总政府，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工农商产业全部公有，不许有独（个）人的私业。政府举办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等院及各类各级学校，由政府保障从事生产，实行工资制，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人民无罪、无刑，但有奖励，尤奖发明创造，只对懒惰施行惩罚。[23]

前者是在 19 世纪中叶处于欧洲大陆革命大潮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到自由资本主义，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时期提出的革命主张所绘制的未来蓝图。后者是清末国危族衰专制王朝，中国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所设想的未来世界。实际是托古改制，演绎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有所创新。但《大同书》成书后，梁启超要康有为发表，康说“不合时宜”。这种爆炸性的观念革命，皇家岂能容得？而马克思幸运得多，能够帮共产国际起草并发表《共产党宣言》，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即使宣告资产阶级必然死亡，也可以说出来、印出来。这只能表明农牧时代的专制与工业时代的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

思想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尽管东西方文化根基存在巨大差异，但关心人类未来所提出的设想却颇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主张无国家、无阶级的天下为公。

对照现实世界，有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在一国范围内作为个人物质生活层面上，实现了从摇蓝到坟墓的国家供给，算得上大同之世。但还不能达到无刑无罚，夜不闭户的高度。而国与国的差异太大，首先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悬殊太大。国家、民族、教派斗争不已，离无国无兵还远得很。讨论未来世界蓝图意义何在呢？正是因为人类存在着面临的危机，要有足够的信心、耐心来克服这些危机，提出未来蓝图给人类以希望与光明，起码比实用主义文化圈的人们最多提到 21 世纪的设想要远大。而既然历史已经是这样共生过来，也就会更好地共生下去。智能时代从各方面展现了全球共生的可能性，就不能不进一步肯定对人类未来理想的积极意义。既然可以通过“人民福利”这个共同理念能达到一国范围逐步实现福利国家，在物质层面过上富裕康乐的生活，为什么全世界就不能？“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最大的困难是国家、民族、教派、贫富之间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也就是各种非共生的意识在国家力量强化下，或者激化下造成许多尖锐的对立得不到解决。提出和谐共生正是其时。共生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和谐是它的理想表现。和谐共生本身是一个结合体，不能共生谈不上和谐，

没有和谐的目标也不能具体促进共生。它的意义在于既有现实主义立足客观实际的态度，又有高屋建瓴的未来理想，一点也不脱离历史与现实。和谐共生世界究竟具体蓝图如何描述，本书继承古哲先贤，使用“共生”概念，设想人间没有剥夺、暴力、恐怖与战争，国与国、族与族、教与非教平等和平共生；有相对富裕没有绝对贫穷，有竞争而无巧取豪夺；国家走联合的道路，渐至于世界管理职能一体化；无国界的有管理而无统治，种族融合、信仰自由，思想解放，人人平等的一个新世界。人类和平、和谐、快乐、幸福地共生下去。具体的蓝图就由赞成和谐共生的后人去描画吧。

人类理性的追求，自古以来都是真、善、美三大目标。有对人格完善和社会期待两方面意义。

真：对个人来说，要求成为一个心怀坦荡，是非分明；对为对，错为错，决不文过饰非，口是心非；知过能改，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阿谀奉承，只服从真理权威。对社会期待，则是希望没有虚伪、谎言、阴谋、狡诈，口蜜腹剑和伪理充斥的世界。

善：做个充满和善、友爱之心，平等众生，帮人助人，谦虚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对社会期待：不能让恶人当道，善人受屈，坏人欢乐，好人悲伤；正义伸张，奸佞退避，善言善行，遍于天下；恶言恶行难以藏身。民主法治，是为政者之善，要创造趋善的环境，而不是相反。

美：人的言谈美，举止美，仪表美，源于心灵美。美是文明社会的精神风貌，其实质是能给人相互以愉悦。因为审美的方面与层次的不同，不同的民族与人民审美标准也有异。美的领域宽广而深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共同点。而什么为美，却大异其趣。然就整体来说，知识化以后，层次是可以逐步提升的。从自然美，心灵美，艺术美到最高境界的美，则是与真善结合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个美是一种精神境界。要把别族他人所欣赏的美，自己也欣赏起来。“美人之美”就是善，从美的角度阐述大同之境界，要美美与共，大有共生同美之理。不要把自己认为的美强加到别人思想里，不能把美也统一起来，才能美美与共。在智能时代，对美的认识和欣赏水平必将广泛而深入发展下去。美的需要将成为未来人类重要需求，现在人们还只停留在求富求安的层面上。

笔者根据智能时代的特点，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世界年青一代的生活取向，发现“乐”是未来生活十分重要的内容，这是精神生活将要上升的讯号。很多人觉得这是孩子们无理想无志气对社会压力无奈或玩世不恭等等的表现。笔者却从中感受到人性中的根本面，与趋利避害同等倾向是避苦求乐，真善美似乎还缺乏一种人类共性的另一目标，即“乐”。人们的一生幸福就是由一连串的快乐联结起来的。当然这种“乐”是“同乐”而不是独乐，而没有人群一起乐也乐不起来。让世界充满快乐，把悲伤与痛苦降到最低度，就是乐。乐也和美一样，也是有各方面和各个层次的。智能人的乐也许在创造中，也许在享受人生上，也许在艺术，各种善与美的实践中，也许在追求

真的探索里，乐的发展会使人进入更高的同乐境界，找到更多乐的形式。乐可以让真善美联结成一体。真实人生令人喜，虚假人生让人悲。让人快乐为善为美，使人痛苦为恶为丑。“乐”理应成为与真善美并提的目标，也是人类生活的必然要求，原始群还围在一起手舞足蹈呢。现实世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现象太多了，共生论者耻之。而不讲乐，只讲真善美又似乎是清教徒的追求高洁无暇，缺乏群众基础。因此，从我这个平凡人看来，人类未来的精神境界，应概括为真、善、美、乐“的世界。

人类历史画卷，波澜壮阔、景象万千，尽管风云诡谲，变易无常，但沧海中的巨大潜流，自古至今，以至未来，终将载着诺亚方舟，同登和谐共生，真善美乐的彼岸，这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属。

作为本章结束，看到日本池田大作的一句话：“正确而深刻的史观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他并引述他的恩师户田诚圣的话：“……只有虚心学习历史，才能引导到真正的和平主义，蔑视历史的人们必定误入歧途。”这是池田和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对话录——《只有实事求是的真诚对话才是推动历史的强大力量》一文中提到的。[24]史观既是史学家价值观、世界观的反映，又是他们在研究历史后对历史所持的总的看法。它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推进历史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笔者不是学历史的，更没有作过研究，仅凭一般的历史常识，提出我的”共生史观“，粗俗俚语之作，史料之不足，文词之不达，恐难以登大雅之堂，但馈赠之心，废寝忘餐则有之。愿天下人尤其史学家有以教我，匡其错误，补其缺失，帮助我把《共生论》写好。

注 释：

[1][3][4][5] 均见《百度网》

[2] 李思强：《共生构建说》（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35 页。

[6]《圣经》中文最新版第 210 页。

[7]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1992 年版第 386 页。

[8] 钛：音洗。足钳以代刖——砍脚肉刑。据同文书局《康熙字典》原版：钛——以锁加足，在颈曰钳，在足曰钛。

[9][10] 光明日报出版社：《世界全史》2002 年第一版，第一卷，第 136 页，第 148 页。

[11][12] 同上，第 147 页，第 148 页。

[13] [美]杜拉克：《有效的管理者》。

[14]《党政论坛》2006 年第 8 期，洪玲文——《第 4 个儿子》。

[15] 见《礼仪·丧服·子夏传》。

[16] 董崇山：《社会资本主义论》经济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62 页。
[17]《池田大作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 年 5 月版第 60 页，第 54 页。
[18]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特尔·舒曼：《全球化陷阱》“E 书时空”电子版。
[19] [美]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
[20]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9 卷，第 22、23 页。
[2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出版，1980 年彩印版，下册第 1414 页。
[22] 马通：《伊斯兰思想史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第 81 页。
[23]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 版，第 448、454、455 页。
[24] 刊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友通讯》总 42 期 2006 年 11 月，内刊第 60、64 页。

第二章　人类追求共生的思想轨迹与实践

与人类共生发展的史实相吻合并超前存在的是各民族在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思想家们有利于共生的思想，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共生”这个概念，但在不同共生圈里起到推进共生的实际作用，引导着各民族改变现实，指向未来，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精粹。因此追寻历代哲人们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人类共生具有本原性的意义。共生之说，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不仅具有时代的高度，而且有着思想史的厚度。

人们常说要吸收人类全部宝贵的精神遗产。什么为宝贵？对全人类共生同乐有利的思想最宝贵。虽然历代思想家受到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等等和当时科学知识的局限，但哲人们所表述的许多思想、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等，却是通向共生的，有迹可循的。如：“爱人如己”的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也有尊重生命、爱护世人的历史实践。因此，人类追求共生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重点所在。

世间万物最为宝贵的是人，是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生活在世上具体的人。生命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因此生命对个体的意义是同等地至关重要。所以，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就是善；而杀死人、残害人、蔑视人、禁锢人就是恶。人类共生史就是趋善祛恶的过程，提示这些道理的哲人们（包括宗教家们）的思想遗产正是我们所要追寻的。

本来，善与恶是非常明确的事，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但现实中却不然，明明是暴力侵犯他人，恐怖殃及无辜，战争集体厮杀，而他们各认为“理直气壮”，症结究竟在那里？一是各类共生圈横向利益冲突；二是各共生圈在历史上形成和奉行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纵向思想上冲突，都互不以为然。前者可说是南北之争，是发达国家对弱小贫穷国家的殖民后遗症，后者可说是东，中东（伊斯兰）西思想意识之争。各抱自己的观念不放，都自以为是，纠缠不清。只有以人为本树立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理念，才能解开这个结。如果不以人命为出发点，具体落实到每个生命的基点上，世上还能以什么价值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呢？还有什么更正确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呢？又还有什么道德、天理、良心、公平与正义呢？

且看人类先哲们是如何在复杂、曲折的历史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又是怎样实践着趋向共生的思想。

第一节　宗教中的共生因素

人类的道德、行为规范可溯源于宗教，它起到一定范围内趋善祛恶，维护人间的和平安全的生活秩序的作用，反映人类生活的共生本质的东西。

公元前 13 世纪，希伯来人首领摩西，带领一万五千族人离开统治压迫他们的古埃

及法老王朝，前往上帝（耶和华）指定的“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即今巴勒斯坦。途中在西奈山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戒”，命希伯来人遵守。有说这“十戒”是当时与相关部族立下的盟约。这是可以考证人类最初具有崇善去恶的精神信条。十戒是：

一、崇拜上帝而不拜别的神；

二、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

三、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

四、须守安息日为圣日；

五、须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1]

前四条是人对神的，后六条是人对人的，充分体现人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破坏别人家庭的基本精神，这成为犹太教及其后基督教共同的戒律。

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以释迦牟尼为创始人的佛教，也有十戒：

一、不杀生；（生指包括人在内的全部动物界）

二、不偷盗；

三、不淫；

四、不妄语；（不说谎）

五、不饮酒；

六、不涂饰香鬘；

七、不听视歌舞；

八、不坐高广大床；

九、不非时食；

十、不蓄金银财宝。[2]

“佛”意即觉悟，这十戒反映佛教是以自我修行养性，出世脱苦为主的教旨。前 4 条是对人的，后 6 条则是对自身的要求。当时的物质条件低下，大床、香发、歌舞，非时食都是奢侈足以乱性的东西，均在否定之列，进而不敛财，也就从根本上去了贪心。不贪无欲，世上必然和平共生。

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创始人，于公元 7 世纪时创建伊斯兰教，在他们奉为神圣的《古兰经》上也有十个方面的训诫内容：

一、严禁高利贷和囤积居奇；

二、奖励释放奴隶，限制纳妾；

三、戒偷盗及掠夺和贪污受贿；

四、戒搬弄是非和造谣捣乱；

五、戒分党分派，同室操戈；

六、拥护真理、服从领袖；

七、勤俭艰苦、劳动生产；

八、孝敬双亲、和睦兄弟、善待妻子、培育儿女；

九、救护孤儿、照料老弱；

十、提倡团结、重视清洁卫生。

上述十条，都是奖善惩恶。《古兰经》不仅是一本宣传教义、崇信真主（安拉）是唯一神的经书，而且是一本政治、法律典籍，具有伊斯兰国家宪法的意义。伊朗的国名现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教在国之上。

还有一个在 3 世纪出生的巴比伦人摩尼，在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础上溶合基督教与佛教精神建立的摩尼教，也有十戒，即：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伪或行邪道巫术、不二心、不惰，每日四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3]

这些产生于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宗教，它们训诫的内容，却如此相似，或相同，可见古代人在宗教的指引下，由诫律过渡到共同的道德规范。现就世界三大宗教的诫律作一些具体分析：

1、戒杀：犹太教——基督教曰“不可杀人”，佛教曰“不杀生”，伊斯兰教戒曰“同室操戈”，但在《古兰经》另一处有“不能违背真主禁令而杀人”[4]，三者有个共同点：别杀人。但三者戒杀的范围是不同的：佛教禁杀一切生命，当然，更不可以杀人；基督教就仅止于人类；可说是原始的人道主义。伊斯兰教杀人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教内不能相互残杀，不违背真主禁令的不能杀。但是，真主无言，谁拥有禁令的解释权，谁就可以以真主名义杀人，它缺乏一个刚性的客观可杀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般地说它不会对和平（不损害伊斯兰教）、顺从（伊斯兰原意）的无辜者加以杀伐。《古兰经》也不强迫人信教，“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5]伊斯兰教的宗旨是和平，《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人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6]这里，《古兰经》把伊斯兰教等同为和平教。它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各游牧部族中，原来各信各的神，互相征战不已。为一部族一老妇的一只骆驼，两部族都可相残达 40 年之久。后在伊斯兰一一神教统治下，消弭了半岛上的战火，赢得了和平。

这三教都戒杀，佛教最坚决，基督次之，伊斯兰又次之。但它们的基本点都是一致的，即要遵守“上天好生之德”。信众们心中的佛陀、上帝、安拉都是至善至恕的。佛陀庄严肃穆，神圣崇高，中国佛教的观世音大慈大悲，手持净瓶，洒甘露于人间；而基督为世人受难，表达了上帝对世人的关爱，连他的亲生子也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教导世人要沉重地反思人间的罪恶。基督的博爱、宽容精神更是人类共生

所亟需的精神条件。在金戈铁马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伊斯兰，难免给人以“一手执《古兰经》，一手执宝剑”的征服者的印象。实际上伊斯兰教义有强调宽容而不报复伤害过自己的人的精神，理应为信众与世人所知晓。

三教都戒杀，但为何教与教、派与派、信徒与信徒之间至今还存在相互攻杀呢？这与各教义中都有“魔鬼”这个概念有关，也与世俗的“权力”、“利益”有关。《圣经》里的“魔鬼”与《古兰经》里的“恶魔”都是与上帝、真主对立的，是“善”的反面，反映世俗中的恶。它是一切吃人、害人、引诱人作恶的神灵。对魔鬼，上帝、真主当然是不会饶恕它们的，必杀之而后快。在人世间，那些坏得透顶的人，人们也称为“魔鬼”，自然也是认为可杀之、可灭之的。但人世间是有权力统治的，是有利害冲突的，各站在自己的一方，互不相让，记仇结恨，就互相指责对方为魔鬼；为了消灭对方，争取胜利，相互妖魔化。妖魔化起的作用是为杀人而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在至高至善的上帝、真主面前作出合乎神意的交代。而当信教的人同时拥有教权、政权的时候，他就会巧妙地凭教义解释权去杀更多的人。这就是本不杀人的教有时降低到世俗人水平去奉行强可杀弱的道理所在。而在世俗，帮人助人为善，杀人害人为恶，反对恶人恶事、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叫做正义。行为的正义性取决于对善恶的判断，如果不以人命，尊重、爱护每一个生命为基准来判定善恶，还能有什么更善的标准吗？

佛教用语中也有魔，梵文 Mara（音译“魔罗”）意思却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含义为“扰乱”、“破坏”、“障碍”，指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是以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心理活动为魔。实际上自身的魔才是真正的魔。那些对别人进行妖魔化的人，自己也就慢慢地变成了妖魔，因为他摆脱不了自身的物欲、情欲、权力欲、控制欲、统治欲、领袖欲，做了皇帝想成仙。一天到晚想的是别人如何坏，怎么比别人更能“以坏制坏”，以暴力对暴力，以阴谋对阴谋。他们的心性就被妖魔控制，已经坏到恶魔的程度，还自认为是“救世观音”，美得很呢！所以佛教的“魔”的概念，对于人类反省自身，去恶向善，摆脱“欲”的羁绊，是有积极意义的。用现代话说，世上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具有佛教去魔的意义。

另一个在宗教里达不到不杀人的训诫就是“异教徒”这个概念，宗教的局限性表现在对异教的排斥上。本来宗教应该是对所有世人的，是个信仰问题。各信各的教，平等相待，有什么不好？但在各教发展的历史上，由于与权力的结合，教义的殊异，不能求同存异，而争斗不已。这种以神的名义进行殊死斗争也不少，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战争，死人也不在少数。最典型的十字军东征长达 196 年之久，比世俗人的战争还残酷，为的是要夺回圣墓、圣城、圣地。究其根源仍是不同教的利益冲突。就是同信一个上帝、一个真主，教派之间也是相互残杀，无止无休，何况加上不同民族、国家间利益冲突因素，达到巨大的规模。两伊战争就打了八年，寻根求源，不过是为先知的继承人，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原故。所谓“异教”、“异派”，全是一种偏见，都是人，能驱使人的集体屠杀都是基于利

益和反映这些利益的意识形态作怪，更彻底地说是自己心中的魔（错误的蔑视人命的意识形态）在引导自己走上自己和他人的不归路。甚至至死不悟，还能到上帝、真主那里享受天堂之乐，而不愿去领取人间现实的荣耀——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把和平使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拉宾刺死，令人痛惜。谨遵上帝、真主的旨意，从不杀人命训诫开始，世界才有共生的起点。不杀人是任何向善的宗教信徒最基本的思想行为准则。正是总结三大宗教所训诫的根本共同点——不杀人，尚和平，使得宗教在人类共生历史上成为照亮人们心灵的灯塔，受到世人的尊崇与信奉。

2、戒盗：三大宗教的第二个共同特点，即禁偷盗、禁掠夺他人的财物。偷盗者的心理是十分卑下的，自己不勤奋生产、积累财物，而像老鼠一样去偷他人的财物。摩西十戒指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作为“不可偷盗”的补充，从动机上遏制偷盗的滋生，伊斯兰把贪污受贿列为训诫之一，具有遏制在公共财产管理上的弊端和权力运作中的腐败的意义。对私人财物的盗窃是直接的，而贪污受贿对众人的损害却是间接的；为害甚于偷盗而众人不察。“硕鼠”、“国蠹”，都是破坏公共经济生活的。至于掠夺，《古兰经》认为更是大罪，因为它危害性更大，且容易伤人性命。佛教“不蓄金银财宝”是配合“不偷盗”这一条，看空财物，除去物欲，还去偷盗干什么？所以贪——偷——盗——劫——杀是一条犯罪升级的路径，宗教早就训示人们不能从这条路走向罪恶的深渊。

3、戒淫乱。构成人类和平秩序的威协另一源头就是性淫乱。“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个食欲，一个性欲，都是大欲，即人的两大基本需要，无食不能活，无性不能乐。从自然法则来说，性是繁衍后代的必需，从主观感受来说，感情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是乐的源头。人类脱离兽一般的杂交时期以后，受各种婚姻制度的约束，是在一定规范下满足其男女大欲的。三大宗教产生于父系男权社会，带着浓重的偏袒男性的印记。上帝、真主的旨意反映着当时的性秩序，所以三教都有维护家庭性和谐的“戒淫乱”的训条，成为性道德、性法律的基础。

世上纷争之源，也就是人的两大欲：一争食，包括以后发展的生活之资；二是争异性，包括以后发展的夺爱之争。在社会组织化以后，权可以决定这种争夺战的胜负，就集中去争能控制一切的权，于是，权、财、色成为三大目标。为了维持在性方面家庭与社会的和平秩序，宗教作出了的努力，所以三教都订出“不淫乱”的戒律。但因婚姻制度的背景不同，婚姻的范围却有不同。基督教出自平民，一夫一妻，所以规定“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那个时候就有“第三者”的问题，似乎没有看到婚姻自主后，也有贪恋别人丈夫的问题；还有同性恋的问题，都是宗教尚未解决的婚姻问题。伊斯兰产生于游牧部族社会，习俗是一夫多妻。《古兰经》关于男女婚姻，何者该娶，何者不该娶，有颇详细的规定。但只“限制纳妾”，限额七个。所以现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确信为真主进行的圣战而死去的人可到天国娶到七房妻妾享乐呢！基督教把妻子与财物并列，那是一个妇女无权的历史时代，只有男性的人格权和对异性的选择权，女性

则完全是受男人摆布的。女性淫乱，更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一发现，他的男人、族人就可以处死她们。伊斯兰也是要将她们当场用石头砸死的。女人的贞节始终要为男子的颜面而保持，女人的容颜身体决不能被男人看见，都得用布遮掩起来，处女们尤甚。否则对不住真主，也对不住未来的男人，若是泄漏一丝春光，便视为不洁，自己也就认罪、服罪了。

女人为男人活着，一切遵守男权的教规，当然以男人为依靠，而男人有疼爱和保护女人的责任。当自己女人受到他人侮辱时，尤其是性侵害时，夺妻辱妻之恨，就会火高万丈，又会发生残杀事端，甚至可以扩大到族际的一场大厮杀。《圣经》（士师记）中便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利末人带着他的妾（犹大伯利恒人）和仆人途经基比亚城借宿，被该城匪徒拉去轮奸致死。利末人把尸体拉回家切成 16 块，传送到以色列全境，示知仇恨，引起以色列 40 万众拿刀向基比亚进攻，大败住在基比亚的便雅悯人。接着以色列人便将便雅悯人居住的各城的人和牲畜以及所遇见的人，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光一切城邑。原来便雅悯人也是犹太民族的一个分支。似这等同族相残，因族中匪徒奸淫而起，酿成战争惨祸，可为东方古语“淫近杀”作出一个典型的注脚。男女淫乱会造成许多杀人惨案，即使法制健全，法制观念比较普遍的社会，为淫而死的人也不在少数，奸杀、情杀、性强暴、性虐待、性暴力都是要命的。“戒淫乱”成为宗教信条，也是有原因的。

佛教在戒淫上要求最为彻底，它是要彻底去欲所生的“苦”，摆脱轮回的出世教。佛教高僧都是修行到无欲境界，即使普通的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都是终身不嫁娶的。比丘戒 250 条，比丘尼戒 348 条，从身（行动）、口（言论）、意（思想）三方面对出家的僧尼作了详细的规定。佛教发展中当然一样有各宗各派，执行戒条有所损益，其中秘宗还传授一些房中术，健身益气，深得统治阶层的青睐，就是例外了。

4、戒谎。在摩西十戒中，规定“不作假见证陷害人”。伊斯兰戒律规定为不“搬弄是非和造谣捣乱”。前者是说谎以利已害人，接近诬陷；后者则是一连串的谎言，接近阴谋，都是欺骗行为。人们造成别人痛苦，除杀、盗、淫三者外，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欺骗”，欺骗行为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说谎。利用别人的信任、同情、不了解或老实无知，去干损害别人的事，是欺骗。行骗的人是骗子，也是为人不齿的。它的危害性大可以使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深则是使人精神上刻着伤痕，造成永远难忘的隐痛。广可遍及生活，特别是些爱情骗子，不知使多少人间血泪、青春年华付与他们甜言蜜语之中；重可涉及国家政治，影响民族兴衰。

说谎有三种：一种是进攻型的，为达到损人利已之目的，让人上圈套，落陷阱；一种是防御型的，为了不让对方知道真情，保守自己的秘密或隐私而说的假话。还有一种善意的谎言，出发点是为别人着想，如迟报凶信，减少对其家属的伤害，则更当别论。宗教戒谎言，主要是针对第一种的。

一般而言，信教的人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举头三尺有神明”，神在看着你，监

督你。信神的人说谎、欺骗要比不信神、只信自己的人要少些，建立诚信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要大些。这也是宗教对社会的贡献。

在什么情况下，说谎竟然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在说假话、骗人的人可以大获其利，大获全胜；而说真话，不骗人的人总是吃亏、倒霉、甚至付出生命。

对宗教信徒的对人的诚信和对神的虔诚，笔者始终抱着尊敬的心情。这是人类共生的相互信任的精神条件之一。可怕的是自己不相信，不断地要别人相信，他们从不敢说出自己心中的真话。

其他的戒律，佛教着重修行，基督教着重对上帝的信仰与尊重，伊斯兰着重神喻的世俗规范，家庭伦理，不多赘述。

从以上宗教戒律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反对的恶——杀、盗、淫、谎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在范围、程度上有差异。对社会的祛恶意识的建立显然起到积极的作用。

下面就宗教正面提倡的规范，即导善、扬善、劝世、济世的教义，作出分析。

1、基督教的博爱、感恩、忏悔、宽容。基督来到世间，就是代表他父亲（上帝）把爱带到人间的。他出生于低微贫苦之家，生活在底层人民之中，他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在他看来，穷人在苦难中挣扎，富人却在争权夺利中醉生梦死，这是极不道德的。他要求众人爱上帝胜过父母。而上帝是创造人和给人以生活之资，一切为上帝所赐予，所以要感恩。上帝是一切善的化身，有违上帝的言行和思想，都要向上帝忏悔。而对于有害自己的对手，抱着宽容的态度，“别人打你左脸，把你的右脸也凑上去”。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也就会赐福给我们。对于人间无奈的不平等事和痛苦，只有寄希望于万能的主来主持最后的末日审判。在这些宗教信条、宗教精神、宗教的许多仪式的深处，正是生活的逻辑，亦即人类的共同生活，有赖于这些信念和精神的发扬。基督教经过两千年的养成性教育、代代相传，发展成第一大宗教，到 2000 年信徒达 19.99 亿人，（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也是源远流长。基督教的入世态度，切合人类生活实际，弘扬博爱精神，让人们“爱人如己”，今天我们唱着“让世界充满爱”的歌，不就是源于基督吗？

一个来自下层人民朴实的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结合了权力，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罗马帝国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尤其是它的分支——天主教在西欧形成教皇体制，统治着整个中世纪，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以神的名义来讨伐异端，统治世俗，禁锢人民，其权势竟在世俗皇帝之上。只有到 16 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反对教会横征暴敛，以赎罪券盘剥人民，宗教法庭迫害人民，以及对教义解释权——当时的真理垄断；强调信徒独立、平等地与上帝直接相通，不必借助神父——教会权力体系的中介；并把教义的道德精神联系普遍的行为规范，特别强调成就事业、勤劳节俭是上帝对信士的要求。这样新教便更接近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动力。马克斯·韦伯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详述了这方面的关系。新教把宗教用人类社会生活行为准则加以世俗化，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伊斯兰教的顺从、团结、虔诚、牺牲。伊斯兰教产生于游牧和商业社会，兼有二者特点，它一开始就与权力相结合，以教立国，以国促教；以教固族，以族兴教。所以政教合一，带有浓重的政治性。在 1300 年发展的历史中，从先知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上原来分崩离析的部族、氏族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宗教三位一体的伊斯兰政权起，两百年间，即建立了横跨欧、亚、非，而以西南亚为中心，西至西班牙、摩洛哥、东达阿富汗、印度北部的庞大帝国。伊斯兰阿拔斯王朝为继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之后的疆域最广的国家。影响所及，伊斯兰文化遍布赤道以北的非洲、西亚、中亚、东南亚各国，现有十亿多居民都信仰真主。因为教义的政治性，它的顺从性实际是无条件服从掌握教义解释权的掌权者，而团结则是保卫大小共生圈内的凝聚剂，但是这种不分是非对错的团结，对圈外则不一定是好事。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分岐、民族间的分岐，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分岐之所以不容易弥合，与强调只自己人的团结缺乏容异精神的大团结心是有联系的。但无论如何，顺从与团结总比桀骜与分裂的和平性要大些。穆斯林的虔诚，从每年参加朝圣的成百万人的规模可以看到。其牺牲精神，为真主而不畏死的程度，则是其它宗教望尘莫及的。伊斯兰因其宗教仪式简单、教义的法律化，比较明白易懂，与实际生活、利害关系联系更为紧密，容易为普通民众尤其是无文化的贫苦民众所接受。

3、佛教的慈悲、无欲、解脱、布施。佛教对人类道德建立的贡献，是它的高度同情心和对一切生命的关怀——慈悲：从意念上克服自身的欲望与邪念，达到无我的境界——无欲。它要修行到完全脱去人世间一切苦因，甚至生老病死之苦——解脱，以及大乘佛教宣传有财者对众人的布施，对民间乐善好施济贫助苦，积德修福有积极意义。中国佛教（禅宗）更强调恶向善的转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在我心”，不强调客观条件。佛教有十善业是它的基本道德信条：属于身业（行动）的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属于口业（语言）有四：不妄语（撒谎）、不两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双重标准），不恶口（骂人）、不绮语（粗话，秽语）；属于意业（意念）有三：不贪欲、不嗔恚（恼怒）、不邪见（偏见）。从行为、语言直到思想，都是善的，要求严格的自律，并不设置火刑与末日审判，而以“涅槃”摆脱轮回之苦，入极乐世界。对于充满物欲的芸芸众生来说，佛的出世境界高不可攀，而它的十善标准则是能够做到的。它的身业已经属于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只是不包括人以外的“不杀生”，不可能做到。“不邪淫”各国各有其婚姻制度而标准不同，邪淫到什么程度也因社会宽容度不同而不同，但全世界对妨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色情文化均持反对态度，确是事实。它的口业四善，“不恶口”、“不绮语”属于不文明行为，也会遭到现代社会的抵制。只有“不妄语”、“不两舌”，则普遍存在，难以消弭，尤其是利害冲突的官场、商场、情场和国与国之间不仅做不到，相反还会以战略、策略、谋略、聪明、高明、伟大称之；善恶颠倒，自欺欺人，伪善天下。因为双方固守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考虑对方的权利与利益。只有佛家把它列为不善，是非才能确定，达到讲真话，不搞双

重标准、不崇尚欺骗。它的意业之善，比较容易做到的是 “不嗔”，能够以理智控制感情，稍有修养的人不大发脾气，不会吹胡子、瞪眼睛；而不恚则不易，能从心里达到原谅对方的损己行为，而不怨恨的人比较少。这是一种不仅在表现上不嗔，而且要在心底不存在芥蒂，是很要有包容之心的。佛家能做到这点，是基于一种更高的境界。你看有一幅对联形容弥勒佛：“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这是超脱于俗事，即低级趣味的争权夺利、毁人利己的一切丑行。“不贪欲”，一切恶行，源于贪，贪权、贪财、贪色。能够不贪，只有把人性修练到佛性，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偏见”达到“正见”、“正觉”，这是最难的。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对，即使自己已被事实证明不对，也都还要找出理由证明自己对。这就是某种意识控制了自己，是“魔”在作怪，所以“为善必由自讼始”，要反省、反思、要认错，要自我忏悔，要向人道歉。否则是脱不了魔力场的。

从以上正（扬善）反（祛恶）两方面来观察宗教，可以说它们在基本点上是相同的，都在向往人类的和平共生，而它们树立的道德准则和秩序也都是互不侵犯，各安其位的和平秩序。教内的平等兄弟关系发展到对他族、他国的大众，突破国族的界限，则可为全球人类共生奠定基本道德和信仰基础。但在我们吸收宗教的共生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宗教在普及与发展过程中，对于异教的排斥和教内各派的相互排斥所造成的非共生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异已不能共生是其思想根源所在。就是看空一切的佛教，在历史上，也不乏为衣钵而争夺和协助世俗争夺权力的事例。此时，同是僧人就可互诬为“妖僧”。就更不用说与世俗更为接近的，甚至与权力结合得更紧密的教与教派了。这又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一是教义的岐义性。同样一本经，出于原创与附丽者不少，即使是信徒们，理解也会有差异，着重点也有不同。后世人解读也不会一样，还要根据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时代发展阶段去理解它，所以出现许多宗，许多派。二是教义的可利用性。一方面，世俗权力发现一种信仰可以让大众信奉一个神，能起到团结族人，巩固政权的作用时，就把它作为一种统一思想的工具，达到统一指挥，统一言论，统一行动的效果。这就是权力往往尊崇某教、某教派为国教的道理。另一方面，教主们也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达到布道的目的。因为教与派的排异性，恰恰与民族、国家权力的排异性合拍，就可能产生都倡导和平而事实上并不和平的局面。当教与教、派与派相互屠杀时，全然忘记宗教的扬善祛恶和立善立德的本意。三是时代发展性。当宗教发展距离创教的时代越来越远时，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智能社会时，原来信教的客观环境变化了，必然引起宗教的变化。那些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成份，与科学理性的时代必然引起矛盾、冲突，而适应时代的教派，就会通过改革，如基督新教的崛起、伊斯兰的世俗化、民主化获得新的教义。佛教由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是佛教现代化的尝试，日本创价学会也是佛教的新发展。所以，许多宗教改革家对宗教与世俗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以上笔者只就三大宗教来分析，其实，传统宗教远远不止这些。如比佛教徒数量

还多的印度教、锡克教和日本神道教因皆为民族内的宗教，世界性就不及上述三大宗教，故不赘述。实际上各种宗教都有其扬善成份，这有赖于他们各自去挖掘与总结。宗教发展到现代，出现大量的新兴宗教，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 1979 年信徒人数达 1.484 亿，占该年世界人口 2%，新宗教、教派组织约有十几万个。[7]也就是说，宗教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性的新局面，定于一尊的教也会滋生众多的异派，其中也许有利于人类共生的亦未可知，但愿如日本奥姆真理教和美国圣殿教人杀人与自杀的神经错乱的、把人引向死亡的教派不再发生。

所有宗教都信神、拜神，把人间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的安排，因此都带有宿命论的思想。造成世俗统治权力能顺当统治的条件，并为统治权力效力而不自知。“威尊命贱”，威是假借“神”的威，“命”却是命中注定的“ 贱”。历史上宗教多是在为世俗统治服务，这是宗教可叹的一面，但它更重要的一面，是在非共生世界创自发共生的信仰的道德基础，确实功不可殁。如果不是这些宗教的努力，人类唯物是求，唯人是敌，还不知要混乱、杀伐到何种程度。

宗教把善恶的最后裁判权交给神，以此来行善止恶。那是在人类智慧尚未能由自发共生进到自觉共生阶段中的历史现象，人类还没有能够理性地建立起人间实际生活中的和平共生秩序和道德秩序。现在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条件的逐步具备，在推进全球共生进程中，将会把判断是非善恶的最后裁判权交给全世界人民自身，扫除一切行善止恶的障碍。而积极寻找宗教教义和实践中的共生因素，正是尊重宗教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尊重占世界人口 84.8%各教教徒[8]的信仰自由和他们的精神家园之所必需，更好地发展教际、族际、国际的共生关系。

正因为宗教面临着全球化，宗教间、教与非教间的关系亟待重新认识与调整，宗教正为全世界和平共生努力，世界宗教会议已有 114 年的历史。2003 年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主题是：主张和平、宽容与对话，强调宗教间的和睦相处，以此消除暴力和仇恨。其中东正教代表有一句话可为宗教最根本精神的概括：“上帝是宣扬爱的上帝，而不是宣扬仇恨的上帝”。这也是共生论者对宗教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原因，可以作为本节的结语。

第二节　哲学中的共生因素

尽管宗教神学中也存在早期的人类的哲学思想，即宗教理性的部分，但作为主体人对于宇宙、世界、社会、人生和思维的独立的认识和研究的哲学，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从希腊和中国的先哲们开始的。公元前 6 世纪到 3 世纪，300 年间，东西方思想家群星灿烂，交相辉映。中国第一位思想家李耳以其五千言的《道德经》著称于世，虽其生卒年不能确定，但依据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应稍早于孔丘。应该说，孔子是第二位思想家（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开创了中国儒家伦理哲学。孔子卒后 9 年即公元前 470 年，古希腊第一哲人苏格拉底诞生。他和弟子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斯多德开创了哲学理性时代。而中国继孔子之后的孟轲、荀卿发展了孔子学说，同时

并出的有墨翟、杨朱、韩非子诸家学说，以及希腊出现的伊壁鸠鲁与芝诺的斯多葛学派。在时间上、学术思想传承与分歧上都有相似之处。说明两个问题：①人类在物质生产、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经验知识已有相当的积累，客观上需要有理性思考来回答一系列关于政治、伦理、社会秩序、人神关系等等问题。②人类思维能力的提升。哲人们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突破对世界与人的那些原始的、神明的、巫术的朦胧不清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理性思考，并加以系统化，形成哲学。

虽然中希相距万里，信息不通，哲学产生的背景不同，文化根基不同，政治环境不同，但有三点相同：一是都处于原来秩序（包括政治、社会、道德）发生危机时期，中国封建政治秩序“礼崩乐坏”，希腊城邦民主面对着伯尔奔尼撒战争，促使着哲人们思考解决面临的问题。二是都有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三是对人生价值的确定和追求。正是这些哲人们的人文与理性精神，奠定了东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哲学之可贵就在于它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凡事总得探究一个理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它是从总体上把握最一般的、普遍适用的规律；它是关于阐述宇宙、世界、社会、人生道理的学问。它不是感性的、直觉的、局部的、片面的认识。它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带有整体的、最一般的性质。因之它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实证、实践的经验，也有赖于思辨、推理的逻辑。人们的视野在扩展，认识工具在进步，哲学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人们把它看成关于理性思维的科学和最深刻的、因而也是最普遍的原理层次的学问。

如果把共生论从理性层次上提高一点，也可以说是“共生哲学”。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包括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宇宙是一个天体运行的自然系统，日月星辰，有序共存，各行其轨道，万有引力，力的平衡，互不相撞是自然秩序的基础。但也有变异、变化，如慧星轨道就有变动，天体分裂物——流星也相撞。但亿万年来，无碍大体。因之有序平衡发展是我们的宇宙观。世界万物，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了动物后，才发生相互吞食，形成动植物食物链，有利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地球上进化到有了人以后，吃遍了所有能吃的动植物。获得了动物界霸主的地位，成了万物之灵。它能思考，能创造，不仅能利用自然，还能改造自然物，发明以前未曾有过的东西，为人所用；不仅能感性地直觉地认识世界，还能进一步理性地探知世界和自身。此时就产生许多的世界观，哲学上把它分为两类，以物质与精神何者是第一性分唯物与唯心。如果以人的生存来分类，可以分成非共生与共生（天人共生、社会共生、人我共生）这是以人类共生为目的的世界观，而非共生世界观是把动物生存弱肉强食的法则延伸、应用到人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问题，至于共生人生观，就是把人类共生作为生命与生活的最高价值。

本节旨在从古代哲人们的观点和理论中寻找共生思想的源头，分两部分叙述。

一、中国哲学

要说中国哲学中的共生因素，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主义精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帝尧时期，尧和舜有一段对话，尧说他自己“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9]意思是不轻视求告无门的人，不让穷人饿冻而活不下去，悲悯哀悼死去的人，救助、爱护孩子，同情、帮助妇女们。现在是公元21世纪，4200年中，依然是要解决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活的问题，真可算源远流长。

中国哲学中的天的观念很早就表现出人文色彩。所谓“尧天舜日”，天和人是合一的。“德配天地”，人的德行，可以与天地配，天是人文的天，自然的天。考之殷代（约公元前16—11世纪）卜巫祈祷的、宗教性的“帝”，也只是指全族的祖先神。到周代，“其命维新”，才把天、上帝改变为一般的主宰神——帝和配天的后稷（姬姓始祖）为两个层次。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周灭殷必然上面还有一个主宰命运的帝。《史记·封禅书》记载有：“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就是说王的祖宗就是神，天的儿子（天子）就是世俗的帝，神人一家亲。王祭神、祭祖的地方就是社稷、宗庙，代表国家。神、国、家三位一体的政治宗教化，宗法化，伦理化，成为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主线，历3000年而未衰，直到19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

中国知识文化来源于官学，殷周的卜辞、典章、诰令、礼乐、天文、历法，集中于史官。到公元前6—5世纪之交，才由孔子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称为六经，成为集大成的学问家。在杏坛办起了中国第一所民间学校，知识才传播开来。中国哲学形成的知识基础不象希腊知识来源于民间神话故事，荷马史诗，智者时期的历史、地理和实际应用的数学、天文、技艺等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国家制度、典章文献，如何治理，建立不乱的秩序，做人应有什么品德以及治乱的经验教训的知识积累为中心素材而进行理性思考的哲学。知识产生理性，理性思考成为哲学，中国哲学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人伦，主观精神远比希腊研究客观世界实在为重。因此，思维方式是从大到小，从抽象到具体，太具体的格物致知之学缺乏关照。这也许与语言、文字、概念形成都可能有关系。最初中国知识分子——士就产生在宫庭文化背景中。

公元前722—221年，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原来西周封建秩序“礼崩乐坏”，竟然“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原来的经济结构井田制，劳役地租逐步被实物赋税替代；政治结构，原来的公侯伯子男，贵族等级打破了。楚国子爵可称王；晋国三家大夫——没有爵位的大臣把晋公的地方分了，成了韩、赵、魏三国的王。原来的周天子——真正的王，成为无足轻重的象征意义上的王，有实力的都可称王。社会结构：世袭的贵族通过层层的家臣管理农民，演变为士商农工四民，士可以游走于各国，商可以在原体制外发财。这是个大分化时期，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纷纷出现，往深一步思考，支持各种思想的哲学观点也发展起来，以老子、孔子为代表，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开始被阐述。到战国诸子百家时期，就比较系统化成为各学派理论的著述了。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恐怕就数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有学问能思考的人，独立自主，自由思想，平等辩论，争而不战，以理服人，没有学霸，使我们后人能享受到他们的精神遗产，滋养我们的心灵。

以下将从孔孟、老庄、墨子、杨朱等四个学派中寻找共生思想的源头。

（一）孔孟儒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复周礼为己任，开创了中国古代原始儒家学说。假如我们不把后来被历代帝王利用他的学说实行思想统治的账全算在孔子身上，就会发现，他的原始学说可说是中华民族精神源头的主要部分，虽然经过从 19 世纪以来的各种现代化思潮的冲击，猛烈批判和否定，甚至权力扼杀，但并不能动摇其根本，这就是已经溶化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为人之道——道德与和平、天理与良心。

1、中和哲学。突出表现在“永执厥中”。孔子提出“过犹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他的孙子子思所著《中庸》，阐述得最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充满矛盾，对立双方各执一端的世界里，如果不持中和的态度，能有缓和、和解、协调、和谐共生的局面吗？孔子对异类不服的态度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他不语“怪力乱神”，不是崇尚暴力、实力，崇尚“和”的力量，崇尚“德”的力量。对国与国的关系，是“协和万邦”，而不是征服。对于天和天命的认识，是把天与民挂起钩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就是天也得听老百姓的呼声。“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由此产生 “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都是与当时“苛政猛如虎”和霸道横行唱反调的。“仁”与“苛”之争，“王”与“霸”之争，实际上是和平安宁与暴力战争之争。孔子的大同理想，“必也无讼乎”！连官司都不用打的社会，是多么美好的和谐社会。

2、仁孝伦理。孔子的伦理观，核心就是一个仁的概念，其前典籍中很少。这也是孔子“人的哲学”的核心。一部《论语》，在 511 条孔子和弟子的语录中，有 54 条是关乎仁的，占 1/10 强，分量超过其他概念。究竟仁的涵义是什么呢？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仁”的意思。也就是自己好，也要别人好，自己不想要的伤害与痛苦，就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和痛苦。这是古代中国版的人道主义，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境界高出不知道多少倍！正是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造成多少灾难与痛苦。也正是因为仁的核心部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标准，所以在弟子子贡谈“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的时候，子曰“赐（子贡名）也，非汝所及也。”连子贡这样的高徒，都难以做到。细想一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升级不就是因为不往这个“仁”字上想而造成的吗？“仁”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尊重人，平等待人，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等等道德之源。孔子一生坚持的原则也是这个“仁”字。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他的“礼”是为仁

服务的一种秩序、仪式、规矩的外在表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没有仁德之心，搞那些形式是没有用的，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孔子对人的尊严是十分重视的，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连作一个木头人、泥巴人去陪葬都是要断子绝孙的，一个人怎么能让别人，哪怕是俑，跟你去死呢？连象征意义的人都不行。

3、“仁”的实践。孔子的实践路线是从讲孝道开始，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要求仁爱的德行，先得从你最应该爱的人爱起，父母养育之恩， 三年才“免于父母之怀”，需得尽作人子的孝道；兄弟之间，兄爱弟敬；对子女，得慈爱；夫妻间，宜室宜家；在族人邻里中，尊老爱幼，尊重残疾；对待朋友，讲忠信；对君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非礼即不尊重人，则去，等等。这是一条很合乎人情、爱有等差的现实心理的路线，所以，能够传播得如此广泛和久远，有它内在的发展逻辑。从仁这个核心出发，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层地扩大其仁心，去实行“近者说（悦），远者来”、“胜残去杀”的，即建立一个没有暴力与杀戮的政治秩序。

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讲“仁政”，进而讲“王道”。王道是与霸道对立的，霸道在从国家到个人各个层次上都能表现出来，成为祸害的根源。中国人讲厚道，就是不尊从霸道的。对施暴政的君主，桀纣之类，就主张推翻，延伸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最初的民本思想。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多少摆正了二者的关系。但这种萌芽后来并没有得到发展。孟子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性善论”。从人具有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出发立论，认为人作恶是不学习、无教育的结果。孟子的人性，排除了人性的恶的一面、即兽性的一面，是不合实际的。但他提高了人的标准，把人与兽区别开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起到导善、向善的作用。孟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在“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不利形势下，力求把仁这个核心概念扩大到“仁政”、“王道”，游说诸侯，改变现实，并把人心之仁理性化为义理之义。讲出一番道理，力排异议，成为一位辩论家、宣传家。遗憾的是他的辩风有些不正，他斥责杨墨之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骂人的霸权话语，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即既然是“禽兽”，当然就可以厄而杀之。合乎他自己的“义”，却违反了孔子的“仁”。孟子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显然，杨墨两家有合理部分，才去执中，近乎孔子中和之道。作为宣传家的孟子，他就不能执中，“以一废百”。骂别人为禽兽。开了一个自以为真理在手就可以封别人的嘴巴的先例。

孟子可敬之处是他对战争的厌恶，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认为会打仗的胜利的“英雄”，判死刑都不为过，为诸侯战争服务的政客们也要判刑，连加重赋税逼民垦荒的人也要受到制裁。是中国早期的和平主义者。

4、君子人格。孔孟是从仁义出发，在当时实现不了他们理想的政治秩序的情况下，就企望建立一种精神秩序；而力行、推广这种秩序的承担者，就是君子，意味着一种最佳的人格完善。《论语》中谈君子仅次于谈“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思想言语行为各个方面对君子作出具体的要求，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强调自省、克己的功夫。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自己做到“温、良、恭、俭、让”，作为示范，并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来要求克己，从善如流，“过则勿惮改”。这种坦荡的胸襟，谦虚敬事的态度，就会达到慊慊君子的品德和风度。孔子在谈君子时，总是和小人作对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尽管当时“同”的意义是苟同，附和，与现在有“认同”协同的意义不同。又说：“君子周（团结）而不比（勾结），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泰（平和）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凡此都是在努力进行自我修养，达到理想人格。虽然历代帝王大多数只是做小人，但为了他们的统治还是得鼓励臣民们做君子，所以孔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都鄙夷着非君子的小人，成为判定好坏善恶的标准。

君子人格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匹夫不可夺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已经成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文天祥《正气歌》所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铸造一种君子人格，为扬天地之正气，做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仁、智、勇的伟大人格。

以上四点，无论是思想方法，人伦哲学、还是实践路线、理想人格都是塑造“共生人”的形象，而不是相反。当然，孔孟也有许多不合历史发展的复古、保守倾向甚至是错误的观念，如维护封建秩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尊尊、男尊女卑，贱视稼圃生产知识，卑视劳动；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成为中国强调人治、讲人情传统的根子，至今还解决不了。这些方面，批判文章，汗牛充栋。我在这里只是找寻共生思想的源头。毫无疑问，孔孟思想中有着大量的能导致共生的因素。共生思想的践行都是具体的。人人做个君子，君子国离和谐共生世界，不会更远吧？[11]

（二）老庄道家。老子的道是“法自然”，——“人法地”（地是生长万物的生态），地法天（天是宇宙生态）、天法道（自然秩序）、道法自然（自然规律）。但当时没有科学，不能解释自然规律，所以道只能是个“恍兮惚兮”的“万物之奥”，（道德经 41 章）不可名状的一种自然法则。反过来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为混沌的一，分为阴阳、正反的二；通过二的交互作用生三（分化为两级与中介），才生出万物来，它有着天人共生和三分法哲学的初始意义。

《道德经》第 77 章把天之道与人之道区分开来，“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

把人间的统治秩序——损不足以奉有余，看作是与天道相悖的东西，破坏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所以道家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如赤子。

庄子继承了这种思想，他创造一个物化环境中完全超脱世俗的精神世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形体归于天地，生死归于自然”。不仅从思想上鄙夷那种得到极大权势，像猫头鹰抓住一只死老鼠样而沾沾自喜，害怕别人夺去的人，还自比鲲鹏扶摇直上九千里，就是生死也都能超越的养生乐生、达生逍遥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已忧的认识与胸怀乃是内心的解放，“乘万物以游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相反“丧已于物，失情于俗，谓之倒置之民”，就是说，本末倒置。庄子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生命融于天地的永恒，而不是充斥物欲的世俗人，以心为形役的俗态。老庄哲学思想尔后形成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林语堂比较了儒家与道家，说中国人（严格地说是过去中国知识界——笔者）社会理想是儒家，自然人格理想是道家。所以有如此的自然的、平和的、并生的、随遇而安的乐天的民族性格。

古籍中“并生”概念仅见于庄子。也只有在老庄学说中才会出现这种类似“共生”的概念。

如果说儒家是在塑造不凡的人比人的现世人，佛家意在解脱人内心的痛苦，那么道家便是向往一种超脱、逍遥的人生。

（三）墨子学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旨的墨家，是最接近“共生”的一家。它反映着人类相互依存性，不仅要求人们应该爱无差等，而且他的爱不是空洞的爱的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给人们以好处，用“交相利”去实现“兼相爱”。他说“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墨子·节用中》）“众利之所自生，此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墨子·兼爱下》）就是说人们赖以生存、生活的资源是由人们相爱相利产生的，而不是仇恨和残杀能够产生出来的。这就决定墨家另一个特点：“非攻”——反对战争。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丧；……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他对战争残酷性有这样的描述：“差论蚤（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不顺从）则剄拔（杀）之，不格者（顺从）则系操（捆绑）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女奴）。”（《墨子·天志下》）对战争的不义性，辨明了义。他说：“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如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外战）一都（内战）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同上）墨子竟然把国家权力做的恶事视同盗窃。战争就是不义，而世俗君子——其实是权力的捧场者小人们鼓吹、附和战争的言论是颠倒黑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窃钩者诛，窃国者义”的不合理性和荒谬性。墨子是站在和平“民人”的

立场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

墨子的社会改革思想集中在“兼以易别”的革思上。“兼”是平等观念，即一样。“别”是不平等的观念，即差别。因为有权力的统治者和民人之间，差别太大。不同的地位就有不同的义，所以他在《尚同篇》中说：“何为人上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者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在古代，党是个不妙的词。孔子说，“君子朋而不党”，墨子这里认为有党就相残，因为义不同。墨子的义就是兼和同，来改变别和异。同到什么观念上呢，就是爱和利——兼相爱、交相利。那么，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尚同上》中说：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这个“贤可者”就是“兼君”——平等地爱所有民人的君，而不是不平等对待民人的“别君”。墨子居然能在君权“授命于天”贵族世袭的制度和环境中，讲出“选天子”的道理。确实令人敬叹！他的“革思”，就是指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弃各国之小义，实现兼爱、相利、非攻等大义。不正是二千年后今天和平、双赢共生的道理的源头吗？

墨子学出孔门，却举“非儒”的旗帜，可谓“当仁不让于师”，他对儒家“亲亲尊尊”，爱有差等，重周礼、厚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不平等的“别”，视为非义。对于儒家所尊崇的君、父、母，《法仪篇》在叙述天下的“父母君三者很多，而仁者寡”，“故父母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这种否定君父的态度，是儒家完全不能接受的。墨子认为只有“兼君”才是可以为治法的。

墨家身体力行其主张的精神尤为可贵。他说儒家“立命而怠事”，(《非礼》) 讲空话，不做事。孔子讲仁心，讲动机；墨子讲兴利除害，讲实际效果。他从事生产劳动、从事非攻的实践活动。连他的论敌孟子都说是墨子和他的从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在他的《天下篇》中叙述大禹治水亲率民人艰苦劳动的情形后说：“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该篇又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之道与孔孟不同，他不选择尧舜“垂拱而治”，选择禹这样能“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身体力行，作民表率，“自苦为极”的圣者作为榜样。可见墨家行高志洁，学说是真为民人利益的。还有感人的。如《吕氏春秋》记载，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看他年老，赦免其子，但腹䵍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 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孟春纪 • 去私）与儒家讲人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亲亲境界何等的不同。

因为墨家学说与实践代表的是平民的利益，遭到儒家的强烈反对，斥之为禽兽之道。要说继承民族优良传统。为何不往墨家中去找？共生论者在诸子百家中比较崇墨，应更多的发掘墨家的主旨而兼收其他诸家的优秀部份。

在一个难以共生的世界，何况在皇权专制，儒学统治的近两千年的中国，墨子学

说早已被扼杀得湮没无闻，但墨家对理想追求的指向无疑是共生的。

（四）杨朱学说：杨朱的著作今已无存，我们只能从《庄子》、《孟子》、《韩非子》，《列子》的关于杨朱篇章中了解它的宗旨，从他们引述杨朱的原话来了解。他的主张，虽受诸子百家所责难，却是独树一帜的，而且具有现代自由派人生的意义，即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权利意识，是“和而不同”，坚持不同中自主性原则，对人类共生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事实上存在的杨朱思想，是历来人们口里不谈或不敢谈的“为我”思想。杨朱的原意是：“贵己”“重生”。在《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篇》“重己”章中，杨朱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他是高度重视生命的。在《本土》章中说“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或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故圣人必先适欲”，客观地提出要先满足生存、生活所需，才能得生，而又不被物质欲求迷惑了自己。《吕氏春秋》记“杨生贵已”——“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杨子不追求名，“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追求的只是现实的物质享受，他说“丰屋、美服、厚味、娇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对于虚名和尊贵的权位，并不看重，反映着追求财富商人的要求，正是当今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他不管生后事，抓住生时好好活。“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与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大异其趣。杨子一派对君国毫无兴趣，他们信徒詹何，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生，不闻为国。”（《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篇·执一章》）

杨子的“为我”“利己”、“适欲”“乐生”也不是以“侵物”（损人）为前提的。他说：“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必时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就是说，靠智力而不靠武力掠夺，才是合理的。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里，他谈到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不利天下，一是以天下奉一身不对，而这恰恰是君国利用权势的特权现象，所以他们重自己而轻君国。孟子批评，杨子无君，恰恰是杨子思想的优点。比口口声声利天下实际是帮助那些“以天下奉一身”的统治者们，从而也可以以天下奉自己的伪君子们强得多。

杨子是中国哲学中，第一个说出“我”——人的自我，个人利益的人。他发现的是现实人、自由人，不与天和命扯在一起的人，独立于君主统治体系外的人，享受自己人生的人。用现代语言，是防火墙意识很强的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别混淆不清。

杨子思想与墨子思想，处于自由与平等的两端，因为受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儒家的排斥，使二者都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各派理论中的共生因素是不少的。共生思想不是一

种空洞的口号，而是由许多从古到今，东方西方具体的观念、理念，理论和实践慢慢发展而来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不过举其荦荦大端者。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形成，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了封建政制。汉代还留有刘家的封国，权力已非周之封建诸侯可比，秦皇为统一思想、巩固皇权而焚书坑儒，实行了一次文化革命。“坑灰未冷山东乱”。儒家在汉武帝支持董仲舒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皇权实行的是虚伪而残酷的外儒内法，即四书五经后面的严刑峻法，思想言论的箝制把中国历史上学术辉煌时代的成果大部分断送，中国进入近两千年的儒学统治的中世纪。其后的共生因素就只有在佛、道两教中有所表现，并在宋张戴“民胞物与”的思想和明末黄宗羲天下大公的学说中还找寻到一些踪迹。

二、西方哲学

如果说中国哲学着重是求善指向，那么，西方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则走着一条求真的道路，就是善也要找出个真善来。哲学是理性的产物，它的命题需要逻辑的论证。逻辑是语言的数学，不能错的。理论哲学是人类知识的高度概括，人生哲学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理解与追求，二者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而定其真伪是非。哲学从本质上讲是探究真理的，宇宙与人的奥秘是无穷尽的，因之，真理也是无法穷尽的，人们只能一步步把对真理的认识推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通过人们对自然、社会历史的实践检验，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只能是为进一步认识真理开辟道路。

（一）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师徒三代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与东方哲学产生的背景不同的是希腊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有数学、自然科学、医学、地理、工艺等知识的积累，如毕达哥拉斯（公元前约 580—500）的名言“一切都是数”，启迪哲人们的“理性哲学”和逻辑辩证思维的产生。而且，苏格拉底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亚里斯多德自己就是科学家、逻辑学家。

1、苏格拉底（Socrates 约公元前 470—399 年）一个使哲学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哲人，他不是用神谕去劝善，而是用理性思维，从对话与辩论中除去人们不正确的观念。他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理念论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那里和他的名言、事迹中寻找。

苏格拉底出身并不富裕，只是雅典的一介平民。但他说：“我不只是雅典的公民，我也是世界的公民。”“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他所倡导的理性思维，带给人类的智慧之光。他说：“认识你自己”，“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美德即知识”、“无知即罪恶”。他力求探索道德和人道的术语的涵义和达到的方法。他甚至说，“所有坏的行为，都不是故意的”，而是被误导人们把不是真善的东西误认为是真善的东西的观念所害，所以理性的认识是最为重要的。他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和悲哀。他讲道德、重公义、法律至上、法制为贵。他用生命证实了这些，当雅典法庭宣判他不敬神、腐蚀青年的死刑时，他并不选择逃跑，拒绝了友人的规劝，临死前还在与人讨论问题。他说：“我一

生受惠于法，我必须遵从合法法庭的判决”，然后欣然饮鸠而亡。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不为神，只为人类理性思考自觉赴死的光辉形象。

2、柏拉图 plato（约公元前 428—348 年）继承并发扬了他老师的理性主义精神，一生从事著述，作品均未散失。“柏拉图对话”以对话体裁阐述苏格拉底的思想，建立起博大的哲学体系，涉及认识论、国家、政治、伦理等诸多方面，其亮点是理性高于一切，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照护心灵的善，就是对善与恶的认识，也是“适度”学说的渊源；伦理学中的四种德性，聪明、勇敢、克已、正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勇、仁、义相对应；国家应由知识权威管理，实现权威与民众的平衡；国家领导人应彻底学好一门最重要的科学，即辩证法“在多中见到一，又在一中见到多”。他强调，“一切公民都应该自由，享有参政权。”等等。当代哲学家怀特海评价柏拉图说，欧洲的哲学传统，“它不过是对柏拉图一系列的注脚。”他的《理想国》中四种政制的比较，王者的条件、教育与优生、正义与善等许多内容，朦胧地接触到人类共生问题。

3、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 年），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幼时便接触到医学和生物学，18 岁—38 岁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了 20 年，又到小亚细亚、莱斯沃斯多建立研究中心，考察生物，还做了三年的亚历山大王子的老师，学生成为大帝后，资助办吕克昂学园，提供研究费用达 48，000 磅黄金，并为亚里斯多德在各地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各类资料，使学园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动植物园。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思辨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有着广泛的经验科学的探索和社会生活的体验，使得亚里斯多德不仅成为哲学家，而且是科学家、历史学家。他是实在论哲学最杰出的代表，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开启了经验科学的先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培根思想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工具篇》、《逻辑学》、《物理学》、《论天》、《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论灵魂》、《修辞学》、《诗学》等看到他的广博的知识体系。

他师承柏拉图，却采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理性态度，反对柏拉图“物质是心灵的监牢”的超验论唯心学说，力主实在论哲学。他提出“理性潜在地是它所能想象或思维的东西，用概念进行的思维就是实现了理性。”“人的特殊本质不单纯是肉体存在，或带有欲望的感觉，行使植物和动物的功能，而且有理性的生活。”对于人的欲求与社会条件之间，持唯理是从的态度。他认为是“居中于两个极端之间”，类似于执中之道。

这三位哲人提供给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是“理性”，带有人类共生本质的意义，并启迪共生论者们要建立共生理性才是正确的道路。

是他们教导我们怎样去思考，怎样思考才能达到正确认识的方法，而不被神话、感性认识、习惯理念、错误推理等等迷雾蒙蔽我们的双眼，糊涂自己的头脑，逐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而从根本上创建了学术。正是这种哲学理性和其后发展的科学理性，敢于向自然和社会问些“为什么”，而且一直追问下去，从而促进人类认识的不

断提升。

（二）伊壁鸠鲁学派。创始人伊壁鸠鲁 Epicurus（公元前 341—270 年），他的老师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门徒。他在雅典建立“花园学校”，与以前哲人建的学园不同，实际上是个建立在远离政治，生活清苦条件下研究学问的隐居的生活方式。他提出的快乐论和功利原则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把每种快乐都看成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善良的和合理的。人的主要目的是快乐，一种是“活跃的”快乐，感官上的满足；一种是无痛苦的“平静的”快乐。依据科学知道神远在自然界之外安静自如，并不干涉自然和人类。人死后，灵魂消失，用不着恐惧。这种思想在中世纪作为异端被批判。但到 17—18 世纪伊壁鸠鲁主义复兴之后，一大批思想家都受到他的思想影响，包括霍布斯、爱尔维斯、A·斯密斯、J·边沁、J·S·穆勒，直到弗洛伊德。但他的快乐论不是纵欲论。他说，一个人不谨慎、诚实和正直，不能快乐，德性或道德是达到快乐或精神宁静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因为它有用处，我们称颂它并加以运用。和三大哲人一样，斯多葛学派都推崇德性，即聪慧、勇敢、节制和正直。

他对天赋人权另有看法，他说因其有用而同意遵守这种行为规范。一切法和制度，只要使个人安宁，即有用处，就是合理的。人们共同生活于社会中，依赖经验发现某些规范是必要的，这些规范才成为人们所公认的。他的哲学确实是有见识的利已学说，他鼓励个人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一切努力奋斗的目标。参与政事无助于幸福，所以聪明人尽量避免。他得出没有绝对的正义的结论。

（三）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 Zeno of crtium（约公元前 355—263 年）可能是闪族人。在彩色走廊（Stoa Poikile）下开办学校，其学说由此而得名。他们用通俗语言论述三大哲人的人生观，而与唯物、快乐，唯我等主义相对立。在罗马共和时期极为流行，并分为科学派和通俗派。斯多葛学派主张世界大同主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关系，都是兄弟，都是同一父亲的儿女，有同样的起源和命运。同一宇宙理性在他们身上都发出呼声；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国家的公民，甚至敌人也应当得到我们的帮助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把公共福利、共同的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们于必要时要为它而牺牲自己，因为实现共同的善，就是完成我们真正的任务，保全了真正的自我。”“一个人要履行他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同样他有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义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变成狭隘的沙文主义者，胸怀全球的人道主义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扩大了范围。个别国家的法律必须植根于大同国家大同的法律和正义之中，天赋人权是成文法的基础。”[12]

如果说三大哲人的眼光还囿于希腊城邦范围之内，把希腊公民视为有知识，有德性的人，而奴隶和异族则是下等的人，如亚里斯多德主张对不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待遇是公正的话，那么，到了希腊和其他多族人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斯多葛派开拓了眼界，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一切有理性的人权利平等的思想就在德性的涵义上提高了一个层次。他们说，“德性不轻视任何人，无论是希腊人或野蛮人，男人或女人，富

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聪明人或无知的人，健康的人或患病的人。”[13]这就达到人类平等地位的认识和思想。斯多葛学派为人类共生提供了伦理哲学的坚实基础。这几乎与当今联合国宪章的平等精神相一致。

而且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之间，看来是对立的观点，利己与利他、利群，但却有着共同之点，都肯定德性的内容是聪明（智）、克己（仁）勇敢和正直（义）。但快乐论说应当为幸福而遵从德性，而唯理论的论点是健全美好的灵魂本身就是善。伊壁鸠鲁说要与周围的人和平友好相处，否则不会得到幸福。斯多葛学派认为爱邻本身就是善，他说“同胞本身就是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综上可见，希腊的道德哲学普遍的都有秩序、和谐与调和的思想，人应该服从理性的约束，克己，守中庸之道。与中国哲学相比，克己、中庸相同，就是多个理性，这种差异是很大的，影响尤为深远，理性是科学之源。以个人为基点去考虑问题必然得出人人可以落实的结果；中国以家国为基点去考虑问题必然将人作为家国的附属物来对待，独立思考，自由权利，平等尊严的人的本身则被忽视。

欧洲经过近千年（5 世纪—15 世纪）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经过文艺复兴，才找回了希腊时代的哲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加上日心说地位的确立，地理大发现，一起打破了神学、经院哲学的统治，解放了思想。实证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兴起，迎来一个崭新的科学时代，它的创造发明，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世界面貌一新。在社会由农业转为工业，封建转为资本的转型期，许多新的问题产生了，学问家们已经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研究，而是结合科学进展、社会实践对世界提出新的解释。所以威廉·冯特（1832—1920）定义哲学为“它是一般的科学，其职能在于结合得自专门科学的一般真理，而构成本身一致的体系。”[14]在这种学术走向中，17—18 世纪一批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涌现了。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社会学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丁·孔德，而对社会政治影响至大的就是启蒙思想家，以致形成了一种社会运动——启蒙运动，把人类文明带入新阶段。

第三节　人民主权运动对共生的贡献

共生论把民主运动称为人民主权运动是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1、突出人民权利的重要性及其对共生的意义，它是神权、君权、独裁权的对立面，只有实现了人民主权，民主才有保障，权是根，主是本，无权岂能主？即同义而又更本质。2、民主概念现在是如此宽泛，包括了共和与立宪，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同范围的民主，人民有权无权都可称之为民主。是在国家大事层面上的民主，还是社区事务层面上的民主，还有社会民主、经济民主等都非常复杂。不如每个人实实在在有平等权利的人民主权来得明确而简要。尽管是在国家层面上，但上至国际下至个人，这是重点。3、人民主权运动的实质是反对有人能剥夺他人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4、人民主权运动包括了启蒙思想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如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天赋人权等等。不相矛盾，但焦点集中。5、人民主权运动摆正了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政府是为民而设，而不是相反。人民可以决定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政府掌握人民的命运。6、政治领域的反君权的人民主权发展到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人权，即不分种族、民族、国家、宗教、阶级、阶层、男女的平等权利的人权，则是争取人民主权过程中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人民主权运动是在一国共生圈内进行，而人权则扩展到国际范围成为人类共生的核心概念之一。

一、人民主权运动的先声——启蒙思想运动

人类之所以不能共生，是因为有剥夺现象和保障它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各种专制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启蒙思想家就是人类反专制统治的旗手与号角。之所以称为启蒙，就是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是从哪里来的，还在哪里迷信着教会权力来自上帝，“朕即国家”的权来自“君权神授”的时候，理性地告知思想界和民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不可剥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共有的，因而受到广泛的认同与传播，形成一种思想运动，进而揭开民主革命的序幕。

17、18 世纪，启蒙思想家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破除神权统治的精神枷锁；二是要打破君权专制现实的牢笼，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1、约翰·洛克（John·Looke）（1632—1704 年），作为清教徒，他首次理性地提出宽容异教的问题，千百年来，宗教互不容忍始终是宗教之间、教派之间不和的原由之一。他写的《论宽容异教的通讯》，认为没有人能具备完全的智慧和知识，用以支配别人的形式，与个人意志对立的强制只能取得表面的服从。影响到后来伏尔泰的《论宽容异教》，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尽管当时的提法仅止于宽容，还没有提到共生论尊重异教的高度，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突破。教与教的斗争就是相互企图剥夺对方信仰的自由权，才会发生象十字军东征的残酷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的战争。而政教分离则是把世俗的利益关系从宗教信仰关系剥离开来，免于教权的统治，也便于不信教者理性地谋求生存与发展。对人类共生都有积极意义。

洛克的自然法即理性的思想尤有启蒙意义，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5]同时，他又说：“对于统治者的失败，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16]只有在“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的情况下，人民才“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目的的人们。”[17]这就是政府是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和司法公正而合法建立起来的初衷。他的这种既理性又宽容的思想，代表了英国民族的特色；使英国在从专制转为民主的过程中，死人最少，成本最低、社会处于比较稳定发展的状态。对于“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他也不会容忍的。但他不是用仇恨对待这些人，而是从制度设计的方法来使这种状况不致发生。把传统与现代有效地结合起来。他首次提出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

执行权、对外权，他认为最高的权力是立法权，应由民选的国会来行使，经常的执行由国王负责，实际上是二权分立，对外权也是执行权的一种。这对后来法国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产生直接影响。

2、孟德斯鸠 Montesquieu（1689—1755 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反对君主专制暴政，反对教会和贵族特权，考察过西欧各国政治制度，在英国时间较长，对英国提倡自由、实行君主立宪制比较倾慕。对照法国社会，经过 40 年的考察、研究，20 年的专门写作，1748 年完成《论法的精神》这本引导现代文明的法治政治的巨著。他的法学理论是建立在自然法，即理性的基础上的。他的自然法内容，第一条就是和平，第二条生产，第三条亲近与爱慕之情，第四条是社会生活知识的结合等等。他论证封建专制国家的不合人类理性，并直指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8]

为了彻底地从制度着眼而不是对某个国王个人的专制统治，孟德斯鸠设计了为其后发达国家、福利国家所践行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方案。他论证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个法律……如果立法权同司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19]这种权力制衡、相互制约的构想，在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方面，在法律的维护、防止产生大权独揽和不被监督的权力腐败方面，经过其后的 250 年的政治实践，证明它不仅是政治哲学理性的产物，而且是政治科学的里程碑。因为推翻一个专制政权比较容易，而推翻以后，不再产生一个专制就很困难。送一个国王上断头台容易，不再有断头国王出现也很难。因为在推翻专制过程中，即使是人民自发起义，军权也会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形成个人或极少数人专权，复辟专制。“三权分立”另一个作用是在非专制化的进程中可以用国王适应性让权，逐步拓展民权的方式进行；使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殊途同归，都可以在分权框架内做到。

洛克和孟德斯鸠都是理性和温和的，但他们的反专制的态度都是严正的、彻底的。尽管被 20 世纪某派学说认为是妥协的、维护君主的，但他们不是维护专制的，而是走逐步限制王权达到废止一切特权的目的。

3、伏尔泰 Voltaire（1694—1778 年）法国作家。他因反对天主教会和国王专制，曾被投入巴士底狱，一次被驱逐出国，一次被迫离开巴黎，毕生以文学形式，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用科学知识启发人民摆脱蒙昧主义，用民主主义思想向专制主义现实作斗争。他认为教会统治是和人们的理性及法定的权利根本对立的，“宗教狂热好像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症。”[20]坚决反对宗教统治，提倡信仰自由。

他的政治观念的核心是自由。反对奴隶制、主张人身自由，“自由就是服从法律”，没有专横行为。自由要包括言论、出版和信仰。

4、卢梭 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 年）。卢梭出身于瑞士工人家庭，从小丧母，13 岁当学徒，不堪折磨到法国当过奴仆、家庭教师和抄写员；生活在底层社会，深感人间的不平。他是个激进的思想家。核心概念是平等，所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年发表）阐述这方面的道理。他把社会不平等分为三个阶段。原始自然人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因为有人把土地和财产据为己有，私有制出现了，才产生富人的豪华、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的怜悯心和最微薄的公正声音，从此人们变得悭吝、贪婪和邪恶，社会就进入可怕的战争状态。“富人们好象狼一样，尝过一次人肉之后，便厌弃一切食物，而只想吃人了。”[21]第二阶段：国家的成立是富人反对穷人的阴谋，因为在统一政权的统治下，富人变成了强者和统治者，穷人则成了弱者和被统治者。从此，人们之间不仅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国家的出现，还导致人们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第三阶段：统治者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剥夺了人民的自然权利，使社会大多数人遭到奴役和贫困。人民本来希望君主能保障他们的自由、生命和财产，但他们却成了践踏法律，奴役人民的专制君主，变成了独裁者和暴君。这是不平等的顶点。卢梭主张暴力革命，他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的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22]在《社会契约论》（1762 年）中提出的民主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由人民自身通过契约转让自己的权利给“公共的大我”，即体现公意的集合体就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它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防御和保护每个参加者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富。当执政者滥用职权，不履行契约而损害人民利益时，人民就有权取消契约；当人民的自由被暴力夺去时，人民应当用暴力将自由再夺回来。[23]建立在自由、民主选举的基础上的人民主权，体现“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实行法治的国家，这就是卢梭的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的人民主权，才能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对于财富，他提出差距不宜太大，“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别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24]可见他不是一个平均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理论精神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成为民主革命成功后各民主国家宪法的基础。

18 世纪的法国，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到“众不得生，要以死拼”的程度。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思想迅速成为革命的旗帜，在卢梭去世后的 11 年，即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对一个国家共生圈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反对了专制政治。这种剥夺人民政治权利甚至生命财产权的反共生的政治体制是必然要被推翻的，而代之以民主政治。这个在一国内可以达到平等共生的体制，不再为争夺政权而发生内战，用选票代替枪杆子上台执政。这使共生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也为国际关系中的和平、

平等奠定一定的法理基础。尽管他们彼此有差异，但是反对剥夺人的特权、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力是相同的。

二、实践人民主权理想的艰难——法国大革命

远在法国革命 140 年前，即 1649 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经过近 40 年王室、旧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反复较量，到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它的成果是“权利法案”，把无限的君主权力，限制在宪法规定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国王必须经常召开议会会议，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废止法律、征税和募兵；臣民有权请愿，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不受任何追究。这对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具有启发意义。王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主权时代就从此开始。经过启蒙思想的普及，深入美法两国的民心。

当英国政府对北美 13 州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侵犯本来是英国人移居美洲后的同胞的生存与财产权，多次征收不合理的赋税，并造成多起惨案，使这些美洲移民奋起进行独立战争，反对殖民当局。1776 年 7 月 4 日大陆会议通过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语）。宣言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人民有变更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权利。从 1775 年开始，经过 8 年的战斗，终于赢得了独立。这是一个与传统国家不同的移民地区，这里没有国王，没有封建贵族，大多数是新教徒和其他各国在本国没有发展机会的流浪者，带着寻找自由和幸福的愿望而来的。他们成立的国家是以领导独立战争的“大陆会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是群众的联合，州与州的联合。政府的设计上接受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实行联邦制，州有自主权，联邦政府再三权分立。不使权力集中在一个机关之内，杜绝发生专权的可能。它的成果就是 1787 年制宪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规定总统、议会、法院的职权和产生办法）和 1790 年国会通过第一次 10 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明文规定公民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集会、请愿的权利以及人身、财产、住所、文件的不可侵犯权。从此，民主已不再是思想，而是活生生的政治现实。

在美国独立的鼓舞下，法国革命开始了。因为法国的专制传统力量的强大，周边王权国家的敌视，反对专制各阶级利益要求不一致，革命中形成的政治集团的主张相互矛盾，并强调以暴力为主要手段来进行，几乎是一切诉诸起义，使法国革命经历了惨烈的反复斗争达 82 年之久（1789—1871 年）。最后建立第三共和国才实现革命的初衷。

革命都是被暴君专制武力镇压逼出来的。在第一阶段当法王路易十六要解除稍有改革之意的财务大臣奈克尔的职务时，巴黎到处都是反政府的演说，群情激愤。7 月 11 日，圣安东区劳苦大众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射杀了百余群众，整个巴黎怒不可遏，连一部分军队也倒转枪口，参加起义。7 月 12 日，冲突发生，7 月 13 日人民手持斧头、短刀，冲入军火库，夺取数万支枪，巴黎人民武装起来了。到 14 日晨，人民控制了整

个市区，最后只剩巴士底狱——这个无数政治犯被监禁的地方，攻破该狱的壮烈场面，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后来把这一天定为法国国庆日，这是世界反专制主义的胜利。

8 月 26 日制宪会议通过《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内容有 17 条：主要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权利平等的。第一条：人们的言论、集会、出版……人身自由和反抗压迫的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直接或间接参加立法；第六条：没有司法机关命令，任何人不受逮捕；第七条：宗教自由；第十条：言论自由；第十一条：在“公共秩序”和“法律”范围内受到保护等。

但是，实现“人权宣言”的革命是为此艰难：权力很快由君主立宪派掌握，企图与国王妥协。山岳派率领自卫军，攻下凡尔赛王宫，立法会议宣布国王停职。八月起义（1792）结束了三年的君主立宪制。9 月 25 日由普选产生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吉伦特派）掌握政权，矛头不指向国王，相反指向把国王囚禁起来并处死 2000 名（又说 1000 名）保皇党囚犯的雅各宾派，又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两派在对路易十六的死刑问题、对秩序的问题，镇压保皇党问题、土地问题、生活物资限价等问题形成尖锐对立。比雅各宾派更激进的“忿激派”要求实行恐怖——“对暴君作战，对贵族作战，对囤积居奇者作战”。1793 年 1 月，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21 日又一个专制国王送上断头台。因为与吉伦特派的矛盾，激进的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于 6 月 20 日又起义，迫使国民公会软禁 29 名吉伦特派议员，雅各宾派专政开始。通过“雅各宾宪法”。在 1789 宪法基础上增添了公民享有劳动权、社会救济权和受教育权，成年男子普选权，人民拥有反抗政府压迫的权利等。由于“联邦党”（即赞成各省成立政府组成联邦）的鼓动，全国 83 个省有 60 个不断脱离巴黎，雅各宾派实行恐怖专政。罗伯斯庇尔指出，“宪法政府只能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战时就只能暂停……革命的本质上就是内战。因此，革命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以应付危急形势。和平时期政府的生命力在于施行仁政，战争时期政府的生命力既在于施行仁政，也在于实行恐怖。没有仁政的恐怖会祸国殃民，没有恐怖的仁政会软弱无力”。[25]旋即通过法令建立中央集权制，全国权力集中于巴黎。各级行政权力集中于救国委员会——责任内阁，对国民公会负责。治安警务权集中在治安委员会，被称为“恐怖部”。审判权归革命法庭，审理一切反革命罪行。它的判决不得上诉或推翻，简化审判程序，加速审判速度。救国委员会颁布“嫌疑犯令”：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未能按规定证明其生活方法及已履行公民义务者、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吏、前贵族及其亲属或亡命者的代理人未经常表现热爱革命者、革命期间出走的流亡者、经济上违反最高限价买卖双方、储存货物限期不报或申报不实者、宗教政策的反对者等均列入嫌疑犯名单，将他们收押、监管到和平时为止。9 个月内全国遭逮捕者达 30 万人之多。政治上对反对派，更是无情处决，包括王后，斐扬派

（保王右派）吉伦特派（民主派）。其中熟知卢梭的思想并参加革命的作家罗兰夫人在狱中 5 个月写下一部回忆录：《请子孙后代公断》，在上断头台时，讲出“自由啊，多少罪恶是以你的名字干出来的”。[26]自由到底与恐怖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自由理性为什么会走到它的反面，值得沉思、深思、痛思！因为杀人太多，反对者也就更多，以温和与争取少杀人的吉伦特派处境很快就落在执政的雅各宾派头上。左派集团中又有更左“忿激派”（埃贝尔为首，他说“一切罪恶是因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断头机。”他撰文说：“正如不能宽恕大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小商人，他们一样坏。”）和“右倾”的丹东派（几乎是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走过来的亲密战友丹东要求“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罗伯斯庇尔对这样的“同路人”不是稍记前情，而是大开杀戒，在一个月之内将左右两派代表人物悉数杀绝。

如果说 1793 年 10 月—11 月是恐怖的第一波，还是在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包括联邦派的成员，派赴各地的特派员权力失控进行过激的屠杀的话，代价是造成直接判处死刑近 1 万 7 千人，加上未经审判处死的则达到 3.5 万—4 万人。所有业经查明的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 8.5%，教士占 6.5%，而原来第三等级则占 85%，就是说革命者和群众付出的生命是第一二等级的 5.6 倍。

1794 年 6 月颁布的“牧月法令”，开始第二波恐怖，规定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宣布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法律决不允许阴谋分子有辨护人，连国民公会议员也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可直接送交法庭审讯，毋须经过议会决定。人称大恐怖阶段。死刑数量激增，普通民众死刑犯明显上升。3 月—6 月，巴黎共处决 1251 人，6 月到 7 月 45 天中，处决 1376 人。7 月处决的人中，贵族、僧侣仅占 5%，中下阶层约占 74.5，其他为军政官员。

这样，雅各宾专政虽然实行全民武装击退了外国的干涉，保卫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民主、博爱的三色国旗，而他自己和追随者在执政 14 个月后，被国民公会议决也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开始由这次政变上台的热月党人统治，实行议会选出三名执政官掌权的制度。1799 年以保卫共和国有功、掌握兵权的拿破仑被选为第一执政，然后又成为终身执政，实行军事独裁，1804 年称帝。他四出征战，统治了大半个欧州，1811 年他说“再过三年，我就要成为世界的主人，现在只剩下俄国，但我一定要击败它。”历史却与他愿望相反，三年后，由于侵俄失败，第一帝国垮台。他被流放，1815 年溜回巴黎，二次上台，仅 100 天，滑铁卢一役，欧州反法联军攻入巴黎，二次退位，再次流放圣赫勒拿岛至死。拿破仑有过有功，功在制定推广了“拿破仑法典”，具有反封建专制特权的平等共生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把民主精神条文化，摆脱传统偏见，纯粹从理性出发，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贵族和等级特权，至今为欧洲和拉丁美洲诸国所采用。

1814 年，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上王位，到 1830 年 7 月为革命所推翻。议会授予奥尔良公爵以“摄政王”的地位，后成为“七月王朝”。1848 年又被“二月革命”

推翻，组成 11 人的临时政府，工人代表有 2 人，争得了“社会共和国”的名义。接着因支援波兰人民斗争，15 万工人举行示威，冲进议会大厅，要求组织远征军去波兰，向富人征军费，遭政府拒绝。这次是工人领袖布期基等人领导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因 6 月政府颁布解散国家工厂，让工人除参加军队外就得去垦荒的法令，当即爆发起义。在与政府军街垒战中，80 名工人献出了生命，最后被镇压下去了，史称“六月起义”。这年底，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颁布实行总统制。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以 744 万张中 553 万张选票压倒多数当选总统。1851 年 12 月，他调 7 万多军队占据巴黎，解散议会，逮捕反对派议员 60 多名。过了一年路易宣布法国为帝国，即第二帝国时期。直到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9 月 1 日，色当战役，法军惨败，拿破仑三世率 8.6 万官兵投降，皇帝当了俘虏。巴黎震怒，工人冲进议会，甚至坐上主席台。共和派宣布废黜国王，恢复共和，即第三共和国。议会成立以巴黎军事总督为首的“国防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又激起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两次起义，均遭失败。梯也尔与德国签订和约，丧权辱国，却成为新的当政者，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1871 年 3 月 18 日，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了。3 月 28 日，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成立，到 5 月 28 日，最后被镇压。成立仅 60 天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体现公社三原则：1、公社委员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受选民监督；2、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3、公社人员薪金不得超过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还实行审判员选举制，陪审和法院中的辩论自由；规定教育与教会分离；宣布义务的、世俗的免费义务教育；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告农村劳动者书》中提出“土地归农民，工具归工人，工作给所有的人。”经济上没收逃亡厂主的工厂企业，转交工人协作社管理和经营，没收逃亡富人的住宅，供无家可归的工人居住；一切债务延期 3 年无息归还。明显是无产阶级性质。军事方面，组成了以布朗基为首的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这个政府雏型，影响到以后的无产阶级政府形式，就是议行合一制，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同时兼立法与行政工作。这是当时只在一个市，选民可以直接选举监督，为了集中权力迅速执行的原故。当范围扩大为一国，层次多了，就形成了无法监督的集权制。

巴黎公社作了一次无产阶级掌权的尝试，当时是一个力量悬殊的搏斗，是 1：10 的武装斗争。公社保卫战牺牲战士 1 万人，在“5 月流血周”先后有 2 万多人被杀害，不管男女老少，身上有血迹、两手粗糙的，都惨遭杀害或活埋，5 万多人被监禁，巴黎至少损失 10 万工人和子弟，是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

法国民主革命就是这样与社会革命衔接起来的一次比一次更为激进的，由君主立宪——吉伦特派——雅各宾专政到巴黎公社不断的起义和武装冲突的革命；是反反复复三次共和，两次民选执政变皇帝，一次旧王朝复辟的革命；又是在内外勾结、外敌不断干涉入侵的有胜有败的状况下的革命，其混乱、复杂、杀戮程度，超乎启蒙思想家和攻打巴士底狱起义者们的想象。它以法国人民近 200 万生命为代价，（包括拿破仑

征服欧洲损失的 100 万）较之英国美国的民主革命，代价是高昂的。但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形成殖民帝国，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世界大战正在等着他们。

尽管英美法情况不同，代价各异，其造成的民主潮流，却是势不可挡的。这就是法治宪政、平等人权、自由发展、民选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等。但是，所有民主革命争得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理念上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它的平等只限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权利，而不触及财产的平等。

以上比较详尽述说了法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衔接着社会革命的萌芽，影响至今。其中有个革命专政与人类共生关系的大问题在里面。在共生论者看来，民主革命的实质是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直至生命的人民觉醒团结起来去反对可以任意剥夺他人权利的专制统治，帝王也好，独裁也好。它是如同反侵略，反个人伤害一样地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人类共生的基础。而在反剥夺人民中间，则没有必要发展非理性成分，相互妖魔化导致互相敌视与残杀。只有把革命界线划在剥夺与否的行为上，包括自己也不应剥夺他人，这笔糊涂账才有可能弄清楚。

中国的民主主义者，首推孙中山，他针对中国受到列强侵略的现实，提出民族主义；针对两千年专制统治，君权至尊，提出民权主义；针对农民无地少地，提出耕者有其田；针对资本趋向为垄断，弊端百出，提倡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合称三民主义。根据中国官制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监察机构和科举取士的特点，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发展为“五权宪法”；并根据革命秩序的必要，分军政维持秩序，训政提高官民素质和宪政还政于民的三个阶段实施，这些是东方政治家的智慧。辛亥革命后 1912 年孙中山当选为总统，当国家需要以总统职位换取和平民主的时候，毫无恋权之心，立即让位，践行了“天下为公”之志。只是中国两千年专制文化积习太深，掌军权想当皇帝颇有人在。造成袁世凯称帝，专制复辟。其后军阀混战，民国有名无实。直到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中国才有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这已经是欧洲启蒙运动 300 多年，法国民主革命 130 年以后的事情了。

三、民主革命对共生论者的启示

共生论者为追寻人类共生发展的中的思想轨迹，还要在历史实践中探究社会大变革时期不共生的教训。所以，先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程，作为经验材料向读者表明，由正确、进步的启蒙思想到实现是何等曲折与艰难！在它的进程中，原来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的一部人又反过来无情地剥夺他人的权利。它象一面镜子，照出各阶级、阶层、群体的代言人思想与行动，让后人借鉴。

我们可以把皇权专制作为一端，把阶级专政作为另一端，排列一个政治立场从右到左(表上却是从左到右)的比对表，从政治体制、权力归属、权力结构、阶级属性，党派名称、价值取向六个方面看它们的对应关系。

表 2-1 人民主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制度内容比对表

<table>
<tr><td>序号</td><td colspan="2">①</td><td colspan="3">②</td><td>③</td></tr>
<tr><td>政治制度</td><td>君主，独裁</td><td>寡头政治</td><td>君主立宪</td><td>民主共和</td><td>社会民主</td><td>阶级专政</td></tr>
<tr><td>权力归属</td><td>一人专政</td><td>数人专政</td><td>议会　上院　贵族
下院　平民（民选）</td><td>议会
（全民民选）</td><td>议会（全民民选）
加入社会主义因素</td><td>公社——国家</td></tr>
<tr><td>权力结构</td><td>立法、行政决于一人
言出法随、生死予夺</td><td>有权力分工</td><td>议会实权、行政分立
君主虚位象征</td><td>议会（立法、监督）
行政、司法
三权分立</td><td>同左
（有虚君、无虚君）</td><td>议行合一　一党领导
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制　民主集中制</td></tr>
<tr><td rowspan="2">党派名称</td><td>王党　保皇党</td><td rowspan="2">名称不一
保权为务</td><td>君主立宪派</td><td>共和派、民主派</td><td rowspan="2">社会党
工人党
民主社会党</td><td>布朗基派</td></tr>
<tr><td>（20 世纪纳粹党）</td><td>保守党　自由党　工党</td><td>自由党、民主党
共和党</td><td>共产党</td></tr>
<tr><td>阶级属性</td><td>皇族、贵族</td><td>权力垄断集团</td><td>上、中、下等级共和</td><td>第三等级
（资产阶级十市民）</td><td>全民</td><td>权力阶层</td></tr>
<tr><td>价值取向</td><td>君权神授、特权有理
定于一尊、等级统治</td><td>寡头民主
对平民专政</td><td>民权大于王权、自由</td><td>自由平等权利
民主共和</td><td>自由、平等、福利</td><td>经济平等　公有观念
追求权力与财富</td></tr>
</table>

注：为使两大运动衔接起来观察，将社会民主栏提前纳入本表，社会主义运动不另列表。表中之派系法国大革命中的派，党则为各类型政制主要党派。

上表的序号为社会类型，①为专制社会，专制社会中的君主、独裁、寡头是同质的而异形，只不过寡头比君主独裁多几个人。它的趋向不是向帝制、独裁倒退，就是通过革命推至民主。②为民主社会，君主立宪由限制君权发展到民权，与民主共和的民权是一致的，它们加上社会主义因素，即平等的人民福利保障即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此三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权利是平等的。③为专政社会是另一类型，因为它重点不在反剥夺，而且把反剥削作为头号任务，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直到农民的自发势力都划为敌人。放弃了工人阶级首要任务是争得民权，去争那事实上做不到的消灭剥削。本末倒置，敌人过多所以要专政，不然就压不下去，反而发展了剥夺。

这三种类型有互不相容性。因为剥夺是明显的凭暴力反共生的，所以，暴力反抗是必然的，民主革命考之大多数国家都免不了暴力革命，即使比较理性的英格兰人民，也有送国王上断头台的暴力。但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却是王权与民权妥协的产物，说明也有和平过渡的可能，全在对立双方有无理性的选择。第二、第三类型不是客观上的不相容性，而是主观上的主义之不相容。社会民主社会是劳资相容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因为专制剥夺、人身奴役残余未肃清还不容易看到，但为后来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所证实。

为什么法国同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市民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革命者，竟然在夺权过程中相互杀戮起来呢？其原因，一是各阶级、利益群体甚至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不一，各有其图谋，特别是其首领的品质、水平差异性很大。这些首领都只顾其派别利益，你争我夺，不择手段。二是由于社会是宝塔型，革命愈深入，动员的民众越多；越向下层发展，人数就越多；越是底层，受苦越多，愤怒的情绪越激烈。三是原来王权统治一推翻，“权”对每个派别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原来处于被统治状态所举的自由、平等、民权的旗帜，一旦掌权了，就忘记自己本来应该干什么，为维护权力也不惜杀人以逞。四是掌权集团内部分歧意见往往被一派（多是实力派）有意拔高为敌对势力在集团内的奸细，是企图里应外合最危险的敌人，屠刀于是杀向自己的同志。五是在法治秩序完全被革命狂潮冲垮后，任何事情可能发生，趁火打劫者，循私报复者都可找到一种革命的理由，胡作非为。六是欧洲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恐惧和仇恨，多次要扼杀革命，也是造成革命的复杂性的重要外部原因，使法国复辟势力始终抱着幻想，也有内外勾结的行动。一些起义者坚持爱国主义原则，几次从侵略者进攻中挽救了共和国，也增加革命的紧迫性，使激进派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攘外必先平内”的猛烈措施。凡此种种都是法国当时夺走 200 万人命的具体原因，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深刻教训。

由法国大革命具体实践，引申一步，根据上表政治体制思想进程，用人们常用的“左中右”的分析方法，来看从 18 世纪—20 世纪君主专制到阶级专政这个链条。表上左边为右，右边为左。右的头一个是专制、独裁政体，左的末一个是阶级专政，就是

人们认为最革命的。在这个链条任一点上，相邻的三栏都可视为左中右，都可以互相反对，用带帽子的方法，相互攻击，最后都可以大打出手，相互镇压造成恐怖。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同样残忍，是恐怖就没有道理。如果站在阶级专政的立场，所有非本阶级的全是右，所有其它主义都是敌人或同情敌人的，其结果就是一个主义。可是阶级也不是一个人，铁板一块，它是人的集，内部还会有不同利益群体和集团。它又有左中右，符合“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一说法。于是，阶级内部也就斗起来，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阶级外的斗争。

从右到左的链条中，还有个有启迪意义的是由专制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变中，君主立宪制国家代价最小，平稳地进行着社会的进步，再吸收民主共和政体的优点，完善自己。今天北欧几个先进国家，也都是有国王的，其民主程度并不亚于总统制国家，说明对立双方还是有中介联系的，这就是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互利道理和人间究竟有道德和良心。愚蠢的专制王朝是非把人民逼上梁山不可。另外也可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民主社会主义必将以其中道、中介为二者的粘合剂，让世界免于意识形态灾难，这是后话。

世间持中道、求和解在拥有强力的两极之间是如此的不容易，革命时期尤其如此，温和派往往是善良的，他们是希望共生的，有着道德底线，也不善于聚集武力，阴谋诡计。就是这些好人，经常是遭到左的右的辱骂，两边的攻击，甚至丧了性命。当人们恢复理性的时候，才会明白，温和不是软弱，而是正直，他们的死，照亮着人类走向共生之路。

作为本节小结，人民主权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国家的公权力不再是个人、集团、党派私有，政府不再成为压迫人民的机关。它首先在英美法三国实现，普及于相继发展起来的国家，通过民主与法治，废除了人剥夺人的制度。由启蒙思想家所建立起观念，理性地向全世界扩展开去，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也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解决一国和平发展的问题，却还有贫富差距、被压迫民族与宗教纠纷与对立问题，未能解决。即使如此，它也为阶级间、国际间、教际间的和平共生创造了一些基本理念：这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而这些观念是克服暴力、恐怖之所必需。

第四节　实现平等理想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早在古代宗教信念、古代哲学思想中就有人人平等的理想，启蒙思想家把它理念化，提出“人人生而自由”，“人人生而平等”其意是相通的。但这个平等并不指财产上的平等，旨在人的自由权利和平等的政治地位。所以二者是不矛盾的。就个人来说是自由的，就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专制等级社会，没有个人的自由，也就没有平等的地位。历史上每项自由权利的获得，即将平等推进一步。自由是现实的，平等是理念的。自由是有界限的，即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平等概念是可以延伸的，即不以政治权利平等为限，财产上、甚至生活上都可去要求平等，这就产生社会民主、经济民主等理念，指向实现全面的平等。前面第一章说到强势群体倾

向自由，忽视人人平等的原则，弱势群体倾向平等，甚至宁可牺牲自由，因为他们的条件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或者本来就是没有自由的奴隶。资本的扩张本性实际是人人想发财的利益驱动，需要的是自由，有产者莫不倾向自由，它讲的平等是机会平等。当资本主义秩序建立后，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个性自由、自由竞争、自由经济，富者越富，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弱势群体（主要是工人无产者）只有用同样出自启蒙学者的平等观念来抵抗。在思想领域发生的重自由与重平等的斗争成为 19 世纪各类思潮的内在主线。

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贝夫（1760-1797 年）在热月党人执行白色恐怖后建立大资产阶级，投机商的统治的 1795 年 4—5 月间，发动了一个比“忿激派”更激进的“平等派运动”，并组织“平等会”的秘密革命团体，准备暴动，后因内部有人告密而被杀害。他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思想。他主张建立国民公社，共和国中央机构统一安排公社的劳动、分配其物质，对外贸易统一管理。他革命的彻底性表现在他号召法国人民应继续战斗，进行一场“贵族和平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战争。”[27]“肃清暴政的最好方法，就是铲除暴政的根源，因为不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总有一天有人会设法使它复活。”[28]他认为这个根源就是剥削：“不应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29]废除私有制和财产继承权，“除了年龄和性别以外，其他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主张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等[30]。马克思赞扬他是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52 页），他的著作是“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第四卷第 499 页）

更进一步的是布朗基，（1805-1881 年）他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19 世纪 30 年代领导“四季社”，该社纲领宣布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一个消灭剥削的平等社会。1848 年他领导“中央共和社”，要求建立一个“平均主义共和国”，使劳动者彻底解放。他强调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实行专政。”他相信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他说“一切进步都是共产主义的成就”。[31]他是密谋派革命家，是巴黎公社军事领导人，起义前被捕，出狱时已 74 岁了。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不管生产力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即可消灭剥削与压迫。这可能是落后的农业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源头，它的结果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也是农民革命的目的。

与法国这些革命运动尤其是里昂工人两次起义相呼应的还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成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革命主张与理论体系出现的前奏。

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以一国为限，具有全球性。它是首次全球性运动，所以它的国际组织具有全球政治一体化特征，是向往人类共生的一个思路。

一、马克思（1818-1883 年）与共产国际（又称第一国际）。马克思是位划时代的革命家，影响及于世界。作为学问家，他的哲学理论，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结合起来，创造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作为经济学家，在亚当·斯密，李嘉图

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并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还没有得到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持而迅速改变生产面貌时的资本生产运行状况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用毕生精力写出《资本论》三大卷巨著，以至二三卷是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把手稿和笔记整理编辑出版的，从理论上说明工人的苦难源于剥削。共产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而实现的条件是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物质产品大量涌流。作为社会学家，他对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分析也是有创见的。而这些理论又是他为工人阶级革命作出的贡献，以至可以概括为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也就是他的理论的物质武器。

作为革命家，他承接着法国革命激进传统，在为受共产主义者联盟委托与恩格斯合作起草的党纲——《共产党宣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其要点是：

1、“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2、“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理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指当时一无所有的工人占城市成员比例）“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

3、“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4、“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能证明了什么呢？”在知识领域里“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在 阶级对立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5、“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6、通过这种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

马克思看到当时工人象奴隶般的生活，出于义愤，并受到 1848 年前欧洲革命激情所鼓舞，他所创立的一整套革命理论和理想社会，自认为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实现。”[33]他的初始意愿和最终目的都是向往共生的，但实现目的手段却是非共生的，只是 90%人的生，而 10%的人连同传统中的一切观念，恐怕连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也包括在内都在被消灭、剥夺和改造之列。

马克思以其理论完整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很快就被正义者同盟和其后的国际工人协会，推崇为精神领袖和领导人，这就是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4—1876）。由于组织内集权制原则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相冲突，导致分裂和外部被控参与巴黎公社

才迁往美国，1876 年解散。共产国际的世界眼光，对推进各国工人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二、恩格斯（1820-1895 年）与第二国际。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和马克思志同道合，著有《共产主义原理》、《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典籍。马克思后半生似乎是着重写《资本论》，构建他的宏大的完整的革命理论殿堂，而恩格斯则是革命的策略家，从事实际的指导工作。作为成功的商人、开办股份公司，资助马克思生活费；作为革命理论的创始人，又进行了对工人实际调查与研究。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成为里程碑式的调查报告，使理论建立在直接感性经验资料分析基础之上。他致力于宣传、推进马克思的思想，并把荣誉归于马克思，以使马克思的形象永垂不朽。他广结人缘，通讯联系、沟通、协调于各派工人领袖之间，视野开拓，紧握时代的脉搏，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实际指导着 1889 年成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它不象第一国际，不是集中性，而是联合性。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割断了它的进程，但它以社会党国际形式延续至今；它联合了 30 多个国家的党，共有 4000 万党员，3 年开一次会，具有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从它的发展成果——今天的欧盟可以见到这种平等联合的国际精神。不仅工人在联合，而是阶级也在协调，企业家与工人各得其利，国家再加以二次分配，共享社会财富，两种制度和平共处。这完全不能用剥削、剥削阶级是万恶之源必推翻而后已的理论来解释。

恩格斯晚年已经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必须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他在去世前 5 个月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里写道：“历史表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的迷误，而且还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4]“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表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在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35]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重复和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使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实行社会主义；既运用现实的条件，民主革命的积极成果——宪政与民主，一步步实现工人的现实利益；又不忘实现摆脱贫困、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天北欧的现实，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供给，就足以证明是一条正路。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是推翻与消灭的关系”。[36]而由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资本主义”，[37]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广泛影响。

笔者写到这里，对恩格斯的人格和事迹深为感动。首先是他作为世界的理论大师，

在历史面前，光如日月地承认“我们已经错了”。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及其改也，人皆仰之。”其二是与马克思的友谊，改其错而不居其功，堪称典范。其三是他的经商赢利活动从不妨碍他对工人解放事业的探求与实践。兼有革命理论家与资本家双重身份。阶级共生不仅在一个社会能实现，就是在伟人身上也能统一起来。和平、理性、进化、发展的进程才是人类共生的进程。

三、列宁（1870-1924）与第三国际。列宁 18 岁时便研究《资本论》，其兄密谋刺杀沙皇被处死。他学生时代即被开除和流放过，怀着对专制社会的仇恨，一开始便接受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加以实践，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指出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在第一次大战前夕，提出要变国与国的战争为各国内的战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俄国历史给列宁机遇，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沙皇政府和一个软弱无力的 2 月革命后成立的克伦斯基政府，在一个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中领导、铁的纪律、行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的武装工人面前，犹如朽木碰到铁锤，十月革命一举成功，“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巴黎公社的理想实现了。由革命领袖掌权实现消灭资产阶级和“两个决裂”，建立公有制社会的宏图在一个大国内的开始，全世界工人为之一振，各国也都先后成立共产党。列宁继承第一国际精神，对不同倾向进行斗争，于 1919 年成立第三国际，反对中派恢复第二国际的努力。第二年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温和派和和平主义者清除出去；规定国际按苏共模式组成，各国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得听从国际的指示，这种上下级关系束缚了各国党的自主积极性。[38]其后，斯大林掌握国际，为苏联民族国家利益服务倾向更为明显，让国际成为一呼百应的机构；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与英美建立同盟，于 1943 年宣布解散。

四、托洛茨基 Trotsky. Leon（1879-1940）与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台前的主要指挥者。1917 年 11 月 7 日，他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介绍列宁与公众见面，当晚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政府），任外交、陆海军人民委员，组建红军，指挥并取得抗击外国干涉与内战的胜利，是苏联第二号人物，1927 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1929 年驱逐出国，1940 年被西班牙一名共产党员刺杀死于墨西哥；著有《俄国革命史》。他的追随者成立的第四国际，至今已开过十几届世界大会，在国际大会上正式提出“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这派主张，对旧世界实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工人国家，强调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系统与政府相制衡，防止苏联国家官僚化的堕落；反对行政委任制度，反对代替主义的、家长式的、精英主义的官僚的异端；申言在马克思理论中，从来没有认为一党制是工人国家的必需先决条件。阶级不是均一的，一个党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政治史上找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内容即无产阶级民主，有计划限制政党就会导致有计划地限制革命先锋党内部的自由。党和国家是分开的完全不同的实体。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导致一党专政的形成是不对的；工人阶级不能阻止特权阶层的成长。这些观点是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书中一段话的发展。他说：“禁制反对党导致禁制党的派别，禁制党内派别导致禁制思想。除了永

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外，党的警察式的一元化之后，就是官僚的腐败行为。这是成为所有挫伤士气，贪污腐化的源泉。”第四国际还有六条原则，第一条是：党内充分民主，党员有组织派别的权利，派别之间在党代会之前可以公开争论。末一条是，参加革命国际，接受其它革命组织的批评，当（执）政党不可控制国际。[39]第四国际所奉行的托洛茨基主义被视为各种极端革命的笼统名词。它既不停地反对资产阶级，又反对工人国家里的专制与官僚阶层，似乎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一派。工人立场是鲜明的，它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的，为此，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的民主，尤其是先锋党内的民主，才能保证专政的阶级性质，则是其它国际不曾有的特点。

四个国际的历史真相与经验，是有待于所有马克思信奉者去研究的，笔者只是在这个人类追求平等共生的运动过程中，得出个粗浅的印象。即由各国党通过各抒己见，平等协商达到的联合的国际，比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中心领导的国际有生命力得多。

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做的还要多。”除了工人有国际外，世界资本家们居然也开起世界大会来了。就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相互指责，争谁是马克思正统的 1965 年，地球的那一边美国费城召开的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40]他们竟然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全借鉴去了，变成他们的财富。到上世纪末，只 35 年，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的宣言。这里也有了平等共生的意义，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所在呢？

两种制度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仅反映在“资本家宣言”上，而且反映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一国两制上。而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生发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即“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而他的崇信者布莱尔则是这条道路的旗手；1997 年上台时即宣布要把英国变为“第三条道路”的实验室，让英国成为世界的灯塔。第二年，美国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首次在 7 国会议上提出，号召建立“世界中左联盟”，而以首脑会议形式继续其活动。其社会经济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一条在自由放任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中间路线。布莱尔说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立起“粉红色的欧洲”。就这一年，欧元区由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 11 国领导人认同它，签署了“欧洲新道路”文献。有论者认为它是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反映和政治多级化、不同党派利益互相磨合，其政治主张相互吸引、趋同的客观趋势的必然结果。[41]欧盟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逐步走向一体化的。

以实现平等理想为目的。以反对剥削和剥削制度为其理论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终因智能时代的到来，原来 90%的体力工人无产者成为 5—10%的少数，知产阶级占了

多数，有产者工农逐步增加，生产关系的智能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福利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讲发财，市场经济。终于在理念上找到一个词——公平。公平含义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贡献与所得对等，没有人剥夺人，更深一层讲是自由与平等的中介，是个平衡点，维护公平谓之正义。似乎公平与正义作为普世价值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与认同。

实现公平有一个制度前提，就是人不能剥夺人的权利的制度。而这恰恰是人民主权运动和民主革命的目的。凡是民主思想不普及的地方，那里必有剥夺权利现象存在。而反对现存的剥夺权利的专制权力，正是 300 年人民主权运动的核心。

现在新的危机是对民主的认识与理解。东西方意识形态因冷战结束而逐渐淡化，为剥削而争论实无现实性。而在政治观念上民主却有较大分歧：这就是民主国家所讲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者讲的民主是人人都有同等权利的民主，后者是马克思列宁倡导的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民主。是先由党内到国家，到毛泽东时代一直贯彻到每个企业、农村、学校、商店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就是建立在阶级、纪律和同一理想基础上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统一安排下的民主。

还有个伊斯兰的民主概念，再怎么讲民主也是在信奉伊斯兰教义条件下的民主。这里面涉及到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根基的问题，不是短时期所能用强力推进的，那会适得其反。只有民众有起码的权利意识的社会才能有望实现普世价值的民主；也只有能认识民主真谛并有很大决心的领导人才能去推动民主，而不是从形式上，口头上去讲民主。民主的实质是尊重每一个人，以异己能够共生的精神，以求同存异的形式，在决策与行动上服从多数，制度上、思想上保护少数；公共权力公有、公治，权力只能为选民服务，而不能有谋私的任何特权，其形式是为这个内容而设置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总结、自我调节，两种对立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逐步接近，开始相互借鉴，从敌人变成朋友，出现和平发展的时代，是个非常大的转折。总结这 200 年的经验，对共生发展极具启迪意义。但本节只是在国际层面上作初步考察，更细致的研究，得掌握真实的材料，则非作者所能为。

第五节　政治家们的共生思想与实践

思想家再好的思想，没有掌握着权力的政治家们的实践，只是停留在著作中和人们的头脑里，要成为实际生活，还得由政治家们努力转化为现实。而政治家没有共生思想，也就更没有践行的可能。这里介绍的政治家，是人类走向共生的政治家，即不是以某国的伟大人物作标准，而是以对人类共生历史影响作标准。

人类最不共生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牲口”，如牛似马，没有做人的任何权利可言；最罪恶的制度是奴隶制度，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全部剥夺是它的实质，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杀害、奸污、买卖、赠与；主人死了，还要奴隶去陪葬。奴隶制残余是人类的耻辱，它的意识形态是把人不当人，任意剥夺、践踏，而在高压，

生命不保环境中产生的奴隶意识——奴隶主义，却是甘愿做牛马，受人驱使、奴役的一种思想，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人类要解放第一步是改变野蛮的奴隶制度。——人奴役人，人剥夺人的制度，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文明。

一、梭伦 Solon（公元前 630—前 560）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公元前 594 年，他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20 年后，获得改革和立法者的权力，制定新宪法和法典，颁布“解负令”：因债务而抵押的土地，归还原主，因债务而卖身为奴的，恢复自由；永远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债务抵押，以后成为希腊各邦和罗马废除债务奴隶的先声。立法划了一条界线，奴隶仅限于来自市场，海外掠夺的。而祖籍居民，也就是阿提加的同胞，都是世代相传的雅典公民，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甚至把卖到国外去的奴隶赎回来，还其自由民之身。他组织每年收入的普查，按收入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政治权利与义务根据等级赋予，不看出身。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都有通过法律和选举官员的权利。一二等级公民担任政府领导职位，义务是担任骑兵，冲杀在前；三四等级当重轻铠兵，重在防守。第三等级有能选出可立法的 400 人会议成员的权利；第四等级贫民仍有担任公民陪审法庭陪审员的权利，还规定所有雅典人都有向法院提出上诉之权，以便对执政官判决有所监督；创立陪审法庭制度，规定司法案件须由一定数目陪审员陪审，期能杜绝徇私舞弊，使法治清平。这为后来民主政治、司法公正开先河。同时，把原来严酷的刑法改为只有杀人者判死刑，使雅典法具有人道的色彩，史称“梭伦改革”。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写道：“梭伦禁止以人身奴役作为贷款的抵押，他不但在当时，而且也在未来，都是解放了人民。”梭伦关心自由、正义和人道，梭伦执政理念像他的诗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的占居优势，”保持着贫富两极的利益平衡。当人民因他的功绩请他作永久的独裁者时，他说：“独裁者是个很好的位置，但上去后没有路下来。”拒绝接受，出国旅游去了。[42]多么伟大的有功不居、不恋权位的民主精神！希腊人把他列为七哲之一，共生论者认为他是走向共生的第一位政治家，也是希腊开创的理性精神的光辉见证。

二、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中国漫长的王朝政治的历史中，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可算是它的顶峰。他是世界唐人（中国人）可以引以自豪的君主。除了在皇室内部权力争夺（这是专制权力必然规律）颇难共生而外，是君民、君臣、民族、宗教共生的典范。虽然在他主观只是尊崇儒家思想，敬天爱民，协和万邦而其客观效果却达到这样的高度：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43]他遵守农业社会“不违农时”的规律，与民生息；遇干旱时歉收，免赋税，自己减膳食，亲耕，皇后亲蚕；慎刑罚，达到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刑日，“尚食毋进酒肉”；就是说死刑犯要再三审讯，亲自批复，最后还给死刑犯一次面君的机会，行刑那天，自己不饮酒吃肉，以示悲戚。贞观四年，全国死囚犯只 29 人，应算中国历史上最低。最为感人的是贞观六年，太宗亲录死囚 290 人，把他们放回家，“令明年秋就刑，其后，应期毕至（都回来了），诏悉原之（赦免）。”[44]多么

好的贤君！多么好的“死囚”！太宗惜民命至此！这就叫德化，这就叫文明！太宗对前朝及战争敌方死者，一律令安葬，使魂有所归。他关心老者，80 岁以上“赐粟帛”，百岁“加版授”；关心婚嫁，实行婚嫁官办，以减民负。“民男二十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关心妇女疾苦，释放宫女达 3000 人。[45]

唐太宗克己纳谏，仁怀异己更显突出。对臣下多方征求意见，他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勅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实事求是。即使是自己诏令，不合时宜，也可上报，不能执行害民。[46]他能任用政敌重臣，如魏征，卢承庆父等多人，魏征曾建议太子李建成采取主动先杀李世民，后被俘不降，是被太宗用贤不记仇精神所感动。太宗任命他为御史，（即专门为皇帝进谏的大臣）一生提意见 200 条，有一次犯颜直谏，气得太宗恨不得杀了他。但太宗理智克服了冲动，这样成就千古君臣佳话。对待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皆视为子民。吐蕃求亲，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给西藏带去生产技术、知识文化、汉藏和好。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把突厥降唐十万人安置在河套肥草沃野之地。酋长拜官，五品以上 100 多人，占朝臣一半。他的“异族共生”之心，感动各民族尊他为“天可汗”。宗教方面，对犯禁出关的玄奘西天（印度）取经归来亲自接见，提供优惠条件，翻译佛经。中国儒释道三教共生，成为宗教纠纷较少的国家之一，唐太宗也作出了贡献。最后，他还著《帝范》一书，教做皇帝的道理，所以被称为“千古一帝”。

三、英格兰伊丽沙白一世女皇 Elizabeth，（1533—1603）与大有为的唐太宗相反，一个大无为的女皇就是伊丽莎白。她做了 45 年的女皇，只做一件事：谨守法律、尊重国会。她对她的政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态度更显不凡，玛丽嫁给法国国王，丧夫之后苏格兰人民不许她回国，避难英格兰，多次图谋篡夺伊丽莎白王位，并阴谋暗杀她。全国群情激愤，国人对此皆曰可杀，根据国会通过“女王安全法”，法庭判处玛丽死刑，3 个月后，女皇才签署执行。作为一国之君，对政敌明杀、暗刺，易如反掌，女皇避易就难，不搞阴谋诡计，不作非法之举，足堪垂范于天下掌权者。女皇 1558 年即位，次年即实行宗教和解，解决了教派冲突问题，为英国教派共生作出了贡献。在英国通货膨胀，国家困难之时，卖掉王室土地和自己的珠宝，弥补宫中开支，公私分明。在她要结婚（与其他国王联姻）就会引起战争的情况下，终身不嫁。她在位期间，尤其是后 15 年，英格兰一片繁荣，资本主义得到很大的发展。哲学文学群星辈出，莎士比亚、培根、马洛、斯宾塞都是女皇时代的著名作家。尤有趣者，女皇对莎翁讽刺、嘲笑王室、贵族、富人的戏剧，照看不恼，还多嘉勉，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也就难出莎翁。只是她死后，王位传给堂弟詹姆士一世，再传其子查理一世，不遵乃姑母风范，与国会作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成为英国民主革命对象，被送上断头台。

四、林肯 Lincoln, Abraham（1809—1865）美国第 16 届总统，是解放美国黑人奴隶的政治家。原来美国在独立后有着两种不同发展经济的道路。北方是工商业雇佣经济，南方却是种植园主的奴隶劳动经济，由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承担农业生产，他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南方奴隶主联合起来要脱离联邦，1861 年成立美利坚同盟政府，另选总统，于 1861 年 4 月 12 日武装进攻联邦要塞，内战开始。林肯领导了这次战争，1863 年颁布《解放宣言》，20 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整四年艰苦战争，1865 年 4 月以奴隶主失败告终。奴隶制的最后的堡垒——美国南方奴隶主政权被摧毁。虽然林肯在胜利后被复仇分子所刺杀，但林肯的信念——人类无分肤色，权利平等的光芒是不朽的。林肯关于民主的简要概括：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普及于全世界。他对废奴的态度，开始时也是温和的，曾在议员任上提出逐步地和有偿地解放哥伦比亚特区奴隶的议案。在内战前夕，就任总统演说中，他宣布政府不会首先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实则到忍无可忍之时，才举正义之师。内战双方死伤达 100 万，对当时只 2200 万人口的美国来说，损失是巨大的。白人与黑人并肩为黑人解放而战，不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所在么？说明林肯“和”是为种族共生，“战”也是为种族共生。

在林肯精神感召与影响之下，1866 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规定给一切在美国出生的人以完全的公民权，不论其民族与肤色；一个月后，通过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承认黑人具有公民权与投票权，黑人与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同时，林肯在任州议员时，就竭力建议用州政府资金建设铁路、公路和运河的综合体系的宏伟计划。这不就是在私有制社会里开始了民众公有解决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设想么？而且非常现实。这是他的民权思想在经济上的表现，成为以后政府从事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先声。

五、罗斯福 Roosevelt, Franklin（1882—1945）美国第 32 届总统，因受到广大人民拥护，连任 3 次，突破了宪法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他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上台的。1933 年美国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到只 1929 年的 56%，失业人数达 1300 万。这是自由经济发展到垄断经济的必然结果。罗斯福吸纳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加强政府干预，并以政府力量，主导了经济的走向，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开创了一个发展的时代，反垄断法的不断完善及施行保证经济的自由竞争，维护资本的均衡得利，不致发生不公平竞争。同时对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和就业机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向企业贷款，达到社会各阶层，都得到利益，均衡发展。罗斯福施政特点，是保持平衡：从民主党内的城乡团结开始，在任上工商间，工农间，劳资间，地区间，联邦与各州之间，都能做到各得其利，各得其所，促进了美国迅速发展。

他在二战中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坚决支持盟国抗战，与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同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打到头上时，才对轴心国宣战，并成为东西

两个战场的大后方。罗斯福心怀世界全局，极力主张战后的永久和平，并实际发起组织联合国。可惜的是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前两个月逝世，世界没有听到他在开幕式讲的永久和平的声音。

与别的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是，罗斯福不是只看到本国利益，而是与世界各国政府共创和平。他认为和平的维护有赖于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超越意识形态，甚至与斯大林相处都颇为融洽。对中国抗日功绩十分肯定，开罗会议承认完全恢复中国主权，包括 1895 年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中国由积弱积贫的弱国地位提升到四大盟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构成中国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外部条件。

罗斯福对内要承受国内七嘴八舌不同政见的压力，对外要绕过某些民族国家利己主义敌意的阻力，经历世界性经济与战争的灾难，取得如此成功，堪称民主政治家的典范。全世界除法西斯及其门徒们反对他，恐怕找不出他的敌人。他不仅是美国的罗斯福，也是全球的罗斯福。

六、甘地 Gandhi, Mahatma（1869—1948）。印度民族是个伟大的和平民族，历史上总是入侵者的对象，它没有产生过侵略性的大帝国。这和佛教与印度教主张苦行与戒杀有关，但作为民族精神的典型人物，就是甘地。印度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 300 年的痛苦与磨难，因为分散，软弱的小邦无法形成抗英力量。1888 年，甘地在英国学法律 3 年，到南非工作，深感南非白人统治者对印度劳工的迫害，25 岁在南非成立印度国大党。也许是宗教精神与英国法治理性的结合，使他产生“对敌人斗争而不使用暴力”的信念，成为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风靡印度。他宁愿坐牢、被鞭笞，也不去夺英国人的性命。他提出“不合作运动”，坚决要脱离英国统治，他多次遭受监禁，并以绝食进行抗争。他只要一绝食，印度人民无不震动，群起反英。1947 年，英国工党执政期间，印度终于取得自治领地位。他虽然没有执掌政权，却是印度人民，包括在印的欧洲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尊敬与爱戴的精神领袖。尊之为圣雄。

甘地伟大之处在于他把痛苦、折磨，甚至死亡留给自己，却要把生命留给利益冲突的敌人，可以说他是活在人间的佛和基督，尽管他信的是印度教。比之世人，为了一点利益冲突，就要杀人，或者拼个你死我活，不啻天壤之别。甘地思想是共生的，甘地精神是永生的。

简要地列举以上的政治家，旨在说明共生思想没有掌权者的实践，也是不能实现的。各类社会，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有这样的人物。梭伦是奴隶主，唐太宗、伊丽莎白是帝王，林肯是贫苦出身的总统，罗斯福是富贵出身的总统，甘地出身于宗教家庭的国民精神领袖，只要他们为的是人民的和平共生，他们都会在人类共生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第六节　国际和平共处的历程

人类共生首要的就是和平，它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而在拥有武装力量的国家

并存的世界，只要有现实利益的矛盾，民族的宿仇旧恨、宗教的纠纷、阶级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都可能发生战争，破坏和平。以往国家间的和平，不是真心的和平，而是在武力相对平衡下的暂时的、虚假的和平，甚至把百姓期盼的和平作为一种掩护自己、攻击敌国的手段、策略和宣传工具。国家权力的扩张性，暴力性只有在武力的阻遏下才会有边界。

但是，还是有主张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有实际的和平共处的实践，今天的和平共生正是历史和平共处的发展，而且给人类带来一年比一年更为和平的局面。

一、中西方都有建立多国和平共处盟约的先例。如果说原始部落联盟是维护部族间的和平的初始形态，那么在中国春秋时代的“会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一定和平形式。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以“会盟”的形式达到诸侯国不发生战争的目的。齐桓公以其国富兵强并不以吞并他国，一统天下为目的，而是匡正非和平的秩序，当然，这只是在上面还有一个周天子的封建诸侯国的条件下进行的。

真正有独立主权的国与国的和平，现在称“集体安全机制”的和平思想是在公元305年，由法国思想家庇埃尔·杜布瓦提出的。他在所著《恢复圣地》一书中，建议所有基督教的国家组成大同盟以维持和平。1263年，法国埃默里克提出废弃战争，建议不限基督教的国家联盟，以解决各国争端，又前进了一步。1625年国际法奠基人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法学巨著《战争与和平法》。这部著作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他呼吁卷入30年战争（1618—1648年）的国家——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罗马帝国）、西班牙、波兰、捷克、俄国、普鲁士和德国一些诸侯国——签订和平条约，用诸国约法来制止战争。结束这场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大会开创了国际会议解决战争问题的先例。它解决了当时欧洲极为复杂的冲突局面，包括三大教派——天主教、路德宗、加尔文宗的矛盾，国家间的矛盾，民族矛盾，皇权与诸侯的矛盾等等。战必以和而解，和平共处思想得以实现，对其后，特别是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14年—1815年，由欧洲英、俄、普、奥四大国和众小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制度，虽是反法的“神圣同盟”性质，但这种多国间的集体规约下的妥协、协商精神与方式，因后来法国也加入而具有一定和平共处的意义。

对非政治性事务的国际联合，以“万国联盟”为组织形式在19世纪纷纷出现。从1865年“万国电报联盟”，1874年的“万国邮政联盟”为其先导，其后，卫生、农业、关税、铁路、度量衡、商标、专利权、麻醉品等国际行政组织相继建立，到1914年发展到30多个。这说明商业、服务业已经把各国经济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摩擦、冲突需要国际仲裁，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会议在发展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减少战争伤害等方面所形成的“海牙体系”也是和平共处的重要部分。

1900年常设仲裁法院在海牙成立，各国开始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与私法。

这些都是人类迈向共生的重要成果，民族国家开始有了平等互利共生关系，谋求共同利益的发展，使各国人民都能从中获益。但此时还只是初始阶段，真正明确这种关系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成立的国际联盟。

二、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这是人类为防止战争、保障和平的第一个一般性、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由于欧美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祈望，成立了许多呼吁国际和平的团体。反映这种呼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南非史末资将军是倡导成立国联的主要人物。威尔逊在 1918 年年初就在向国会演说中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世界和平纲领。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他提出建立国联应该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当时欧洲人民苦于战祸惨烈，渴望持久和平，群起响应，和约各方也大体都能接受。南非出席和会代表史末资将军在该年末发表的《国际文件》，其思想更进一步，建议更切实而具体。他提出国联应该成为“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际体系的基础”，必须赋予国联总揽一切国际事务的权力，必须赋予它以管理至今一直由国际行政机构承担的一切事务的权力；还提出，国联将面对各种复杂的任务，要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担当。国联应该有一个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经常性会议，讨论所有的一般问题，并规定主要的政策方针；成立一个包括大国在内的 9 个国家组成的行政院，直接管理整个组织的一切活动；设立仲裁法院和调解法院；设立为国联处理各种问题的专家委员会；设立常设秘书处同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提出各类咨询意见。这个新机构拥有三种功能：1、保障和平，2、管理国际日益复杂的事务，3、成为咨询与求助的国际中心。他的 21 条建议大都吸收到国联盟约中。

史末资的国联构想，当时威尔逊非常欣赏，不断重复着他的语言。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位的关于国际和平的设想中看出今天联合国的雏型，在人类和平共生的道路上，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1919 年 1 月 8 日，巴黎和会一开始，针对战胜方协约国英、法、意、日先要分脏的图谋，威尔逊首先提出应讨论国联的问题，认为行将拟定的国联盟约与和约应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在威尔逊的坚持下，1 月 25 日在全体会议上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决议。决议说，为了世界安定，必须建立国联以“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公认的国际义务的实施和提供防止战争的保证”；并提出应把建立国联“作为总的和平条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后，它的修正案先后成为对战败国（德、奥、匈、保）和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战后各国对和平的义务与和平机构的设立成为和约的首要部分，在肯定原则，保证原则实施的前提下再谈具体的条款。这是有远见的。1920 年 1 月 10 日国联盟约随凡尔赛和约生效而生效，国联正式成立。同年 11 月，国联第一届大会在日内瓦召开。

遗憾的是美国国内坚持他们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不要介入欧洲事务的训诫和门罗主义只管美洲的观点的势力占了多数，盟约遭到参议院的两次否决，连威尔逊竞选连

任总统也失败。美国的孤立主义放弃了国联，使国联得不到强有力和和平道义的支持，失去了对其后德意日发动战争的遏制力量，并被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所控制，实行绥靖政策，对日德意侵略，步步退让。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又起，还直接打到美国头上。威尔逊的悲剧，历史判明，也是美国的悲剧。然而这个国际和平任务还是历史地落在了罗斯福执政的美国和他所倡导的联合国头上。

国际联盟成立时，创始国为 42 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39 年，国联全部停止工作 19 年间，累计有会员国 63 个。既然美国都不加入，其它会员国退出的多达 17 个，国联的威望丧失殆尽，日德侵略势力日益猖狂。还有，它的决议要一致通过，使国联盟约等于一纸空文，这个国际组织不起作用是人类未能走向和平共生的沉重的历史教训。

1946 年 4 月 18 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最后一次大会，决定把国联的权力、财产、档案移交联合国，宣告正式解散，结束了它 26 年的历史。世界人民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

三、联合国：人类选择联合国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 1/4 个世纪之内发生了两次遍及全球惨绝人寰的大战之后普遍要求持久和平的愿望和接受国联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反法西斯大同盟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近 1 亿人的牺牲换来的，是经过美英苏中四大国领袖们的智慧凝成的。它经过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事实证明，联合国 60 年来的道路是人类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

1941 年 8 月 14 日，正是二战方酣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美国军舰上签署一项两国政策联合声明，即《大西洋宪章》，希望在战后重建世界和平，放弃侵略和使用武力，让世界能建立起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并提出“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能落实到人的四大自由是联合国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基础，也是战后重建新秩序达到各国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个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一致赞同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二战胜利前夕，1945 年 6 月 26 日，由 51 个反法西斯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世界人民和平与发展的愿望，至今为各国所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实际是人类第一部成文立法。尽管成立后的联合国经历意识形态对立，整体冷战、局部热战，美苏争霸，两大阵营武装对峙，军备竞赛达 46 年之久，究竟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使全球经济迅猛发展，人类的理性终于走过各种艰难曲折的道路，进入 21 世纪。

在冷战期间，苏联在安理会上投了 200 张否决票，仅从 1946—1955 十年间，统计安理会共投 82 张否决票，苏联即占 79 张，甚至一次投 15 张。[47]联合国难以进行工作；但局部战争、冲突不断，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发生，集体的强力制止措施无法执行，乃采取折中方案——“维和行动”，对冲突地区起到一定的缓冲与警察作用。但比起联合国宪章中设立军事参谋团（第 47 条）由常任理事国参谋总长组成的初衷相距甚远。如

果能实现这一条，大国的军事领导人在一起工作，相互信任，世界形势能有后来那么多的流血和麻烦吗？

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分裂了世界，也分裂了联合国，所有发生在冷战期间亚非拉国家的悲剧，都能在这种对立中找到其原因。而放弃这种对立，以世界和平为重的政治人物，同样在和平共生的道路上留下印记，尽管有人对赫鲁晓夫很不以为然，但他提出的“三和路线”即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两种制度经济上和平兢赛的路线不也是通向国际和平么？他提出的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装，没有战争，不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么？只有象勃列日涅夫这样对其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48]的人们，才是断送苏联的人。苏联自行解体，二十世纪 90 年代后，意识对立减弱，联合国也就比较一致了。但另一个危机又出现，这就是美国以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实力，实行单边主义。他们本应继承威尔逊、罗斯福的和平思想，通过联合国，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相反，做了许多不得会员国人心的事。例如伊拉克在侵略科威特并为其一省之时，联合国有决议组成联合部队进行海湾战争，在击溃伊军之后，完全可以把萨达姆送上国际法庭，追究其战争罪行，更换其政权，易如反掌，却因国家利己主义，要让他牵制伊朗，放萨一马。这与二战前张伯伦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攻占捷克时何异？到 2003 年还要绕过联合国，靠假情报再来一次攻伊战争，送掉 3000 多名美国青年，几十万伊拉克人民的生命，反恐怖成了制造恐怖。再如，美国可以宣布另一些国家为“邪恶国家”，不引起整个国家的敌意才怪。美国当政者，不论新自由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都应该回到联合国宪章上来，联合国才不致蹈国联的复辙，操纵或绕过联合国都是有违宪章道义的。

尽管 60 年来联合国有过来自过去苏联和后来美国的干扰，但取得成就是巨大的。举其要者：

1、维护了冲突地区的和平，保全了该地区无数平民的生命。如柬埔寨、阿富汗、黎巴嫩、南部非洲、中美洲、西撒哈拉、索马里、卢旺达、波黑等等。

2、铲除种族主义最后堡垒——南非白人统治，成立了种族平等的新南非，清除了制度化的种族歧视。

3、结束了 500 年殖民地的历史，使原殖民地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原国联时期的托管领土或自治或独立，实现了民族或地方居民的自决。

4、制定、通过有关国际人权文书：《世界人权宣言》、《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公约》（三项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反对灭绝种族、纳粹主义和战争罪行的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儿童权利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发展权利宣言》等。还有裁军、禁毒、难民、残疾人，防治艾滋病，防灾、救灾、保护环

境等方面具体的决议。

5、不断完善国际法规。各个国家只有在联合国的宪章精神和以上各种签了字的信誓旦旦的文件要求下，心口如一、内外一致地尽自己的义务，才是和平共生之道；实现国家间的真正的平等联合，共谋发展和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并不断根据新的形势，改革联合国，发展联合国；世界永远和平和人民长期福祉的增进才是有希望的。

除了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对和平共处，地区合作及对全球一体化进程也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不结盟运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冷战期间，处在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条约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国家，为保持独立，不受侵犯，提出不结盟的概念，以争取和平。1954 年，尼赫鲁在斯里兰卡的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此论，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中印两国总理共同提出的，而在 1955 年有 29 个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确立的，后来成为不结盟国家的宗旨之一。

尼赫鲁（印度），纳赛尔（埃及），铁托（南斯拉夫）同声相应，积极推行不结盟运动。从 1961 年第一次有 25 国在南斯拉夫签署“不结盟国家与首脑宣言”起，到 2003 年吉隆坡第六次会议，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他们反对分裂世界的军事结盟，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求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军备竞赛，要求改变贸易不平衡状况，调解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反对入侵伊拉克等等。但组织上是一个拥有 115 个成员国的松散联盟，占联合国成员国的 2/3，全球人口的 55%。他们反映着世界弱势国家的声音，但因其中的石油生产国变成富国，有的亲美，有的亲苏，冷战结束后作用渐小。但对促进和平，团结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参与国际事务等方面是有其历史的功绩的。

五、地区性合作组织与联盟。最早提出这种思想是玻利瓦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口号是“泛美团结”。1889 年，由美国发起的 18 个国家参加的美洲国家会议，提出“美洲人民利益一致”的口号，“以巩固南北美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1890 年成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和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二战后实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共处是条件，发展才是目的，而发展又不能是孤立的，它促进了各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的合作到政治上的联合，已经成为趋势。欧盟是成功的范例，已经从 16 国发展到 25 国，是个去国界的联合体。地区性合作组织对各国都有利，以国为单位发展经济已是落后于智能时代的观念，尤其是一些小国，聚小成大，更具竞争力。由自由贸易区开始，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关系日益紧密，走向集体安全，统一市场、统一货币，政治步调一致，进而发展到有议会，有行政机构，直到有宪法。这是人类扩大共生圈的稳妥、有效的途径。

现在，除欧盟是高级形态外，非盟、亚太经合、上海合作、东盟、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等组织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还有同民族国家的联盟如阿拉

伯国家联盟。所有这些都是和平发展的联合，而不是军事的联合。在平等联合过程中，要防止大国控制、操纵，成为大国利己扩张的工具。

以上我们从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不断扩大，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历程看，这是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因素仍然存在，民族国家间、教派间、制度间、非共生意识形态之间冲突还存在，明的暗的要把别国从地图上抹去，要征服不要和平的仇敌现象还存在，也许这就是 21 世纪共处世界的诸多障碍。

21 世纪国家间的关系是否能沿着消极的共处到积极的共生，平等互惠共生，逐步推进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直至全球的联合。还要看各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各国人民能否制约其政权，只许和平，不许战争的有效程度。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知识界，都可以为反对战争争取永久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七节　建立共生理性，走向自觉共生

通过本章上述各节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先哲们赐给我们宝贵精神遗产许多是谋求共生的道理，尽管他们没有使用共生这个概念，可是他们的思想内容，有利于共生的因素不少，没有一个贤哲会把人杀人，人剥夺人，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视为合理。

我们要感谢宗教赐予的训诫，树立了人间的伦理观和心中的道德底线；要感谢哲学家们留给我们的理性精神；要感谢启蒙思想家教给我们人的权利观念，人人是自由平等社会中的一员，人不能是工具、奴隶，不能是迷信盲从的牺牲品，而是有人格尊严的人。要感谢民主革命的先驱和万千英烈们，是他们反对了专制统治、贵族特权，使任何人不能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得感谢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大师们怎样为一切受压迫的劳动者等弱势群体争取生存权利和社会公平而奋斗以及为此而牺牲的人们。而杰出的政治家对共生的努力也给掌握公权力的人以鲜活的榜样，那些致力于国际和平使人类走向联合国、平等联合道路的先驱者们都将得到意欲人类共生的人们广泛的尊敬。

笔者提出共生思想只是人类先哲们思想共同趋向的概括。读者从本章所述可以看到许多共生因素的历史表现。虽然历代哲人们提出了许多共生世界的理念和内容，其主要思想是趋向共生的，但未能提出共生的完整概念与体系。这是因为哲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共生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远古社会，智者们只能把平等共生寄托给神的安排。希腊工商业社会产生了理性哲学。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产生启蒙思想；有无产阶级贫困才产生社会主义；全球各国有联合起来，维护和平的需要，才产生联合国。同时，以往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自发共生阶段，各大小共生圈主要是以国为单位的，即使是一国的共生观念，也还没有扩大到全人类。只有某些理念可以超越国界、超越时代，才具有普世价值。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大都可构成共生世界的理念，只有世界到了智能时代，信息社会，寰球一体，才会有共生概念与体系的出现。

20 世纪是人类共生思想与非共生思想较量得最激烈的世纪。由于战争的惨烈性所进行的反思，人们才痛切地感到有全球共生的需要。思想先驱是美国社会学家派克，在 20 年代就提出共生的概念和建立共生与共识体系的主张。他是共生思想的首倡者。要说渊源：西方是基督，中国是帝尧。可谓源远流长，德泽永驻。现实政治则是 1946 年联合国宪章的通过和组织机构的成立。它的宗旨就是人类的平等共生。前者标志着人类理论上自觉共生时代的开始，后者标志着人类自觉共生历史事实，联合国宪章哪条哪款不是为了人类共生的？

理性是人类智慧最大的成果，是哲学的精华，是学术的精髓，是人类共生的催生剂。为走向自觉共生，本节将阐述共生理性的涵义和建立共生理性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以及对促进人类自觉共生的作用。

一、什么是共生理性

以人类共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不带任何民族、国家、宗教、主义的偏见、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不因感性因素造成有失分寸的思维方式称为共生理性。它是经得起逻辑、实证、实践检验的认知方式。它把最简朴的共生命题“我活你也要活，人人都要活”作为起点，以国与国、族与族，教与教，阶级与阶级共生作为归宿；考虑人类各类问题秉承对立双方或多方都能和平、和解达到异己共生目的而充分说理，以理服人。共生理性不同于以往的单向、同向的思维方式，以我为中心的研究逻辑；是双向、多向的思维方式。首先承认异我体的存在，研究异我体系统生存、发展的条件，看到相互作用的全貌，从而着重研究共同领域、中介领域，得出双方或多方良性互动的原则与方法，促进矛盾体的共生。对自然、对人类自身，都是如此。这对建立和谐共生社会和美好生存环境都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哲学基础不是简单的对立的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狭义辩证法，而是全面系统的一分为三的广义辩证法。[49]看到事物的第三领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中间状态的存在。只有中间状态和二元和多元的中介域、结合点的存在，事物矛盾转化才有可能，协调、和谐、共生才有可能。

共生理性不把主观信仰等同于客观真理，而是留有思考的空间，始终注意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求真知，不泥古，务创新，通过理性态度和科学精神逐步加深认识，接近真理。信仰的创造者被神化为真理的化身，谁都不对，只有他对，结果多以不实而告终。信仰者则是源于利益支配，或不辨真伪，或不作思考。理性的态度是信而不仰，信而不迷。信其可信者，怀疑探究其未可全信者；一仰视就会发生创信者无比高大，自己则日益渺小，直到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程度。至于迷信足以自戕而不自知，害人误己，莫此为甚，但与封建无关。共生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思考才是通向认识真理之路。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严格遵从科学理性，不渗入非理性成分去探求真相和真相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判断时以共生为尺度，为依归。这二者的结合才是共生理性。

二、建立共生理性的必要性

自从人类认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以后，由理性认识所产生的观点、观念

甚多。许多人系统阐述这些观念，形成理论、学说，都会运用理性。如经济学中假定的“经济人”，就须客观、科学地探究市场、成本与利润的关系，称为“经济理性”。又如用理性阐明宗教教义、称为“宗教理性”。宗教理性最新成果表现为世界宗教大会倡导的“全球伦理”，接近“共生理性”。理性精神是指说理的思维逻辑要正确，就是不仅思维的大前提要真、就是逻辑推论选择的凭证也要真、没有主观臆断的东西掺杂其间，才能得出真的结论。工具理性遵从的是科学，加以实验的检验，真伪、效用立现；而观念理性则不然，它受到不同共生圈利益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歧义很多，即使论证过程正确，由于目的性的不同，相反的结论普遍存在。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理”的根源。现今世界，主义、理论之多，莫可胜数，相互批判，无止无休。这一方面反映各共生圈的利益冲突，又反映意识形态中的混乱局面。共生理性以人类共生，各国、各族、各教、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文化总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去思考问题，不致陷入“如果触犯人的利益，几何公理都会走样”的泥坑，摆脱各类历史文化的局限，使人类得到一种最高层次的理性前提。它既是全人类理性认识的起点，又是每个人的具体的生活逻辑。除了共生，还能有更好的选择么？共生理性不是为某一国、某一族、某一教、某一阶级服务的，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大概只有暴力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宣扬、赞美战争的好战者们不需要这种服务。即使如此，共生理性也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病症，探究其病源、病理，清除其病毒，即那些让他们走上死路的思想、信条的毒素，达成治病救人，少一点疯狂，多一点理智。

人类理性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非共生状态，思想观念上，还严重存在各种非共生意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建立共生理性，来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人民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扫除有碍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与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将以往的理性，提高到共生理性的高度，就很难处理日益增多而急迫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问题。

三、建立共生理性的迫切性

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劣，气候变暖，冰山消融，海水上涨，水体、空气污染，沙漠化、灾害频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集全人类之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人类自身的关系还没有调整好，还在那里准备战争，施行恐怖、无端地耗费大量智力、人力、财力和时间。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共同去应付危机，而是把科学技术力量用于制作尖端武器，使世界各族人民处于血腥恐怖和恐惧之中。扩充军备、跃武扬威，利用民族间历史的隔阂，各共生圈原有的宿仇旧恨，煽动各种对立意识，唯恐天下不乱。这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非共生思想在作怪，只顾本国、本族、本教、本阶级、本群体、本组织利益，不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无视他国、他族、他教，他阶级、他群体、他组织都需要生存发展的机会，看不到如今世界已经是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生活已经在联结成一体，全球多元一体的利益格局日益显露，而我们还停留在各行其是的阶段，抱着各种不利共生的观念不放，造成一方面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一方面精神文

明严重滞后，思想意识更是混乱不堪。如果在新世纪不能急迫地解决这些问题，那 80%的人靠喂奶生活的日子，可能真的会到来，生态危机更无法有效解决，富国将会遭到更多的恐怖袭击。单纯的进行所谓的“反恐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恐怖问题不是孤立的一部分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不要命的问题，而是世界未能建立共生新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新秩序和道德秩序。只有共生理性才能帮助建立这种秩序。

共生理性清醒地认识到，除非人类消除了剥夺他国、他族、他教、他阶级的生存、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人间的暴力、恐怖，战争是不会绝迹的。用暴力去剥夺异己，正是人间悲剧之源。那些在本国范围内实现了人民主权的国家，也就是消除了剥夺人的权利的现象的先进国家，为什么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对待他国的人民呢？而那些民主革命不彻底因而还存在剥夺人民权利现象的国家，又为什么不能放弃剥夺自己的人民的那点并不先进的权力呢？这都是人类共生的障碍。只要有点理性思考，就非常容易想到是理亏的。就是摆不脱国家与集团那点利益的羁绊。共生理性会把这些症结，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建立共生理性都有它的迫切性。

四、建立共生理性的条件已逐步显现

人类社会发展到智能时代，首先是科学技术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且还在信息爆炸的态势下发展、创造，既不是数学级数，甚至不是几何级数，而是跳跃式，全方位的，发散式的增长。由科学技术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更是发展迅速，解决人类绝对贫困已不成问题。实现人类共生的物质基础，交通、信息条件日见具备。其次，近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因知产阶级的壮大和崛起已经使贫富两端变少，只有未工业化的农业国家还保有农民占多数的状况；教育普及化使人们更有知识，能够接受理性思维。世界有识之士，包括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环保主义者都纷纷提出人类共存之道，而且其中提出研究共生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莫不在探究共生，还有占人口 2/3 的各宗教信徒们，他们信奉的教义和宗教生活大都是在践行着自发共生。群众基础是雄厚的。就是商人、企业界也都在贸易与生产实践中尝到遵守信用和建立企业利益共同体的甜头。各国执政者也在和平共处中得益，各独立国家经济发展决不是某一国之祸，而是福。二战后 60 年的发展历史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两个制度的互相借鉴，化敌为友不是能让世界更繁荣吗？这些是自发共生所已经做到的。如果建立共生理性不是更能推进到自觉共生的阶段吗？所以共生理性不是不能建立，而是已经逐步在建立，但某些群体中还只是个别的有这种理性，现在的任务是需要自觉地全面的建立才能推进自觉共生。

如果说知识是理性的基础，那么，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大师们、精英们，就有可能成为共生理性的倡导者和阐发者，完成他们对人类的历史使命，最好地成功“自我实现”。这也是建立共生理性的有利条件。让人类少点非共生思想的干扰，使世界太平。

共生理性是联合国精神的理性维护者，联合国这个国际共生体，得有个理性思维

的支撑，事实上、实践上共生形式的存在，更多精神内容难道不要在更高层次上的理性作其后盾么？这就是说，建立共生理性的条件已见端倪，只待人们的认同与奋斗。

五、共生理性与自觉共生的关系

以往的历史，人类没有共生这样一个总概念，自发地建立了一些为人类共生必不可少的次级概念，如自由、平等、人权、和平、民主、发展、公平、真、善、美、乐等等。宗教提出的爱、道德，直到一些格言："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们虽具普世共生的意义，但都是自发共生时代的精神遗产，是自觉共生的源泉和基础。那个历史阶段，人类都还是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为这些概念，理念适合人类共生，才逐步理性地扩大为全人类性的普世观念和价值。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族文化的特殊性，许多共生观念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坚持专制观念的掌权者，为维护既得利益（奴役人的权力）。非常厌恶这些观念，用一切非共生的观念，理论和一切反共生的暴力、恐怖、战争行为来维持他们的非共生秩序，造成人间的苦难。共生理性是要剔除非共生的观念、理念，开创一个人人都能在是否共生问题的鉴别上的理性时代。这样才能从思想到行动上达成共生。这种共生阶段，才可称之为自觉共生阶段，它摆脱了此前大小共生圈（包括大至国家）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是全人类共生的理性精神的体现。

因此，共生理性是自觉共生的精神条件，自觉共生是共生理性必然结果和期待。只有建立共生理性，才能走向自觉共生。例如爱，是一种感性层面的，没有理性的支持，碰到实际矛盾，就爱不起来，甚至反而成了仇。这便是缺乏一种理性的支撑，而有了共生理性，就会把爱建立在对爱本质的认识，双方或多方都能得到彼此的幸福的共生，是牢固的理性基础上的爱，是自觉的赋予的爱，而不会受到条件变化影响的真挚的爱。又如和平，尽管人类都有和平的愿望，也为和平作贡献，但一旦与本国本族利益或传统相矛盾时，就难免赞成用非和平手段去战胜对方，这就是缺乏共生理性。若一方是侵略与剥夺，共生理性则决不放弃反抗和斗争的立场，因为那样会使侵略者和剥夺者得逞，更不能达到共生。人类决不能与希特勒共生，共生理性成为人类主流意识，希特勒一类的人也不可能生长。

自觉共生可以在人类各个层次展开，各个实践领域都可验证它的真伪和效果，但需要有共生意识，而共生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共生理性的建立。

六、怎样建立共生理性

正如没有启蒙思想就没有人民主权的运动一样；没有共生思想，也就没有自觉共生世界的到来。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理应走在前列，政治家们还可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有眼光、有志气承担建立共生世界的历史责任。当代宗教家们已经用他们的"全球伦理"作出了表率。佛家星云法师倡立了"人间佛教"。我国共生论者哲学家李志强、社会学家胡守钧也都先后发表其共生理性的著作。[50]还有一批青年学者们也正为此而

努力。实际上各个学科都可以为共生理性有所作为。现今世界、各种主义、理论车载斗量，主义中又生主义，旧理论中又生新理论，创论者、信奉者、传信者是否能用理性的筛子把信奉的主义，理论筛一遍，把那些精华，有利人类共生因素筛出来，以完善和发展自己信奉的理论呢？那样必然会出现一个共同建立共生理性的大好局面。

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在建立共生理性的事业中，一样地甚至更多地能作出贡献。天人共生与人类共生的道理很多是相通的，而且他们多数是走在前面。系统哲学是他们的贡献，共生概念就是生物学家提出的。他们发现真理就较少有社会研究中利益的羁绊，经常给社会科学以启示。尤其是直接研究人的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对于象爱心与恨心、平和与激愤情绪的差别和感性、理性、悟性的生理机制的自然基础的研究，将会揭示人性的秘密。因此，哲学科学分析研究应该有个对于人的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借用文学就是人学的提法，展开一个将焦点对准“人”的“新人学”的研究，把所有学科的力量集中研究人自身。为未来新人类——共生人的世界奠定坚实的生命科学基础，使人的科学与物的科学，并驾齐驱，紧密结合，改变现今跛脚文明状态，为人类共生服务。

本章所述，旨在接受人类古今中外利于共生的宝贵精神遗产，阐述近现代史的两大思想（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渊源、实践与发展，以便读者作为理性思考、辨明是非真伪的素材，但范围太广，在选择思想精华方面，不免挂一漏万，详略不当，甚至讹误。这是特别期望读者有以教我的地方。

注 释：

[1][2][3]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8 页、第 17 页。

[4][5][6]《古兰经》，马永真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5 页、第 169 页、第 23 页。

[7] 转引自曾春宁：《浅析新兴宗教及其趋向》，《宗教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01 页。

[8]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2000 年，全世界宗教徒约 51.37 亿。当时总人口为 60.55 亿，基督教徒约 19.99 亿，穆斯林约 11.88 亿，印度教徒约 8.11 亿，佛教徒约 3.59 亿。见《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第 4、5 页。

[9]《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10]《书经・泰誓中》。

[11] 本段引语：孔子言论见《论语》，孟子言论见《孟子》，(《四书集注》)。

[12][13][14] [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苏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12-113 页，第 115 页，第 509 页。

[15][16][17]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1964 年中译本，第 6 页，第 136

页。

[18][1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1961 年中译本，上海，第 8 页，第 156 页。

[20] 伏尔泰：《哲学通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中译本，第 10 页。

[21][23]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组：《西方政治思哲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56-157 页，第 159 页。

[22]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1958 年，中译本，第 146 页。

[2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1 年中译本，第 60 页。

[25] 白乐天、李凤飞：《世界全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 卷 327 页。

[26]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 卷，第 483 页。

[27][28]《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 28 页，第 82 页。

[29]《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84 页。

[30][31] 布朗基：《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未来》

[3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51 页，第 270-273 页，第 285 页。

[33][34][36]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 年第 2 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 年版，第 22 卷，第 273 页。

[37] 董崇山：《社会资本主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版。

[38][39] [41] 百度网有关条目。

[40] 卡洪登：《资本经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7 页。

[42]《世界全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一卷，第 135、136 页。

[43]《贞观政要》。

[44][46]《旧唐书》，《太宗纪》，《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5 卷。

[45]《新唐书》《太宗纪》，同上，第 6 卷。

[47] 李铁成：《联合国五十年》，中国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2 版，第 210 页。

[48] 同注[33]。

[49] 聂暾：《两级论与中介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50]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第三章　人类的灾难与危机

——对百年来非共生历史与现实的描述

与人类各种趋向共生的理论、学说、教义相反，现实世界却是一个难以共生的世界。从国家、宗教、教派、民族、部族、家族，各社会利益群体（包括阶级、阶层、集团）、社会组织（政党、公司、文化组织）等直到个人，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存在着追求着物质与精神的利益最大化而相互争夺的倾向，加上多种非共生的主义、思想观点的理论支持，把原本可以更好地共生的世界折腾得面目全非。杀死人、残害人、蔑视人、禁锢人的现象长期普遍的存在，使世界仍然处于暴力、恐怖、战争的威胁之中。部分地区战火未熄，自杀爆炸此起彼伏，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富国慑于恐怖，穷国苦于饥饿，转型国家困于犯罪，宗教国家沉于圣战，很少有一个国家能成为世外桃源，各有各的揪心事。而在国与国之间，假和平，真备战，准备更大规模的厮杀，让更多的人去赴死的局面并未改观。一些国家首脑不懂得“敌人多半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的道理，依然迷信武力，醉心于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竭力钻研置敌于死地的兵家之术。世界能有真正的和平吗？

共生论并不满足于人类历史是共生的历史、主流和趋势是共生的，还要彻底的看到不共生的一面，然后才能促进自觉共生时代的到来。因此，它不仅要接受人类正面的精神遗产，还要接受负面的沉痛教训。也可以说，人类的共生之路，是在不断试错中走过来的，不把试错所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教训忘之脑后，才能不重复过去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好了伤疤忘了痛”本是人的弱点，但对共生论而言，是不能这样的，不仅不能忘记，还要更深刻的分析这种错误。否则，前对不住那成亿的亡灵，后对不住万代子孙。遗憾的是有人对这些人间惨剧，不但当时惟恐暴露一点真相，就是后来也准备让它消失，好象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过一样。

本章将阐述过去的人为的灾难和由于过去的人们不能共生加上缺乏天人共生的观念而导致面临的生存与生态危机，作为历史教训来接受负面遗产，以提高和平人民的警觉。不然“大难临头日，人犹在梦中”，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节　百年来的战争灾难

人类最大的负面遗产应该是战争，它从非共生思想开始，实施集体互相厮杀，成千上万的毁灭对方生命，以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其残酷性、悲惨性、破坏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上溯一百年达到有史以来的高峰。从 1904 年的日俄战争开始到 2003 年伊拉克战争，100 年来可说是战争从未断过。大的战争有 25 次，平均四年一次，其中 25 年间世界大战就有两次。大战中又有不同国与国的战争，只统计为一次。由于杀人武

器的升级，从日俄战争双方死亡 22 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 5120 万人，增加 233 倍。立体战争使后方居民大量丧生，侵略国家对和平人民更是如猪羊般宰杀，就是反侵略反法西斯正义之战，在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瞬间夺去 24 万人的生命，遽增了死亡人数。战争已经不只是前线作战军队的伤亡，而是整个城市的毁灭，大量与战争毫不相干的老弱妇幼婴儿的死亡，更增加战争的罪恶性、野蛮性、非人性。

共生论认为，发动战争是人类首恶，暴力剥夺人的一切是它的本质特征，不论什么理由和理论，一个国一个人都不能去剥夺另一个国另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因之，反抗侵略，反抗剥夺是人的权利。人不是牛羊，任人宰割，他有人的尊严，因此，对侵略者、剥夺者强加给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暴行而奋起抵抗的战争是正义的、必需的；否则，更无永久和平可言。

从来的战争论者都是站在他自己国家、民族、教派、阶级的特定立场去评判战争的是非的，因为那是在缺乏人类共生理性的历史时代。共生论的战争观与此前不同，不是各为各的共生圈（国家、民族、宗教）说话，而是为全人类和在战争死去的亿万冤魂在说话。它的战争分类法非常简单：以剥夺他国主权为目的，过程中践踏国际公约，充满非人道行为，结果是进行更大的掠夺战争，直到意欲征服世界者为非、为非义。以反抗非义的剥夺、掠夺的、为保卫自身生存、独立、自由而战的、结果是赢得和平、互不侵犯的为是、为正义。是非分明，毫不含混。另一种类型的战争是国内战争，有阶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原因，均应作具体分析。但同样适用上述原则加以区分，是导致和平发展，还是导致更为混乱，更多剥夺，可以为是非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内战争，不是孤立进行，总是有它的国际关系的背景。有些国内战争实际是国际斗争的前台表现。本国死伤狼藉，外国弹冠相庆。

要叙述战争灾难，必然要涉及到屠杀程度，战争次数，时间长短，规模大小，死亡人数，财产损失等方面，但迄今并无权威数据，很难列表说明。可参考的是美国乔治·托马斯·库里安编著的《The New Book of World Rankings》，译名为《世界知识参考手册》（1986 年由中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印行）。这本书是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他本人搜集到的资料编写的，重点是对世界 190 个国家和地区在 300 多个领域内所作的发展实绩进行比较的定序统计。其中国际间战争、内战两项战争死亡数与本节有关。但它时间跨度是 165 年（1816—1980），就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算起，世界共出现 51 次帝国及殖民战争，67 次洲际战争，造成 3100 万参战人员的死亡。按国别分，战争死亡人数前六名是：1、苏联（1917 年前俄国）：973.12 万；2、德国（分裂前）：536.34 万；3、中国：312.85 万；4、法国：196.51 万；5、日本：137.14 万。6、英国：129.52 万，而美国仅死 66.48 万人。这便是七个大国的死亡帐，是现代史战争死亡的最有文件依据的数字。但还没有包括未在统计内平民的死亡，何等惊人。该书作者还发现，发动战争的一方比起反抗的一方死亡人数要少些，赢得战争却为战争总数的 70%。这种现象存在就是那些总是要诉诸武力的人们

的“理由”之一。国际社会若是要扭转这个局面，让发动战争的黑手一伸出来就被斩断，不让战争发生，应该有强力的集体安全机制来执行这一任务。共生论更是要让战车在装配第一个零部件时便得到和平共生的力量的反对和制止。

国内战争从来就是民族的悲剧，同胞相残，同室操戈，是最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往往又引狼入室，外来的干涉，扩大为国际纷争。据《世界知识参考手册》统计，1816 年以来，有 54 个国家发生死亡 1000 人以上的内战 106 次，导致 900 多万人死亡，平均每 10 年要经历 7 次战争。中国最多，11 次，炎黄子孙死去 349.6 万人。其次是尼日利亚，一次，死亡 100 万人；苏联 2 次，死亡 50.1 万人；法国 3 次，死亡 2.47 万人；美国一次，不同人种，民族死亡 65 万人；日本一次，死亡 1.4 万人。这些亡灵，不是死于异族或他国人之手，而是死于同一国或同一族人之手。而内战居前位的国家正是社会危机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际，国内战争都死亡钜大，也就是我们的父祖辈，他们承受着多大的历史与战争的灾难啊！库里安的统计是完全依据文件，对于重视客观统计的国家和学者来说，数字可能是精确的，而对于不重视统计，或宣传统计的国家和学者来说，数字可能带不真实性，但他的统计可以作战争灾难，首先是死亡人数的最低底线看待。只会多，不会少。因为内战中平民的死亡人数，是交战双方所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兵死了多少，并且是军事秘密。人命在战争中就是这样连个数也算不上！

现在让我们来看百年来（1904—2003）影响较大的 25 次战争吧。叙述的次序不按时间，而是按新的分类法，把这些战争有机的联系起来观察，可能对认识战争与和平有点帮助，不至于记死亡流水帐，仅止于让人感伤和悲愤，而不能接受沉痛的教训。

一、导致战争的战争

笔者在第一章中曾经说过，人类由部族——民族——民族国家——世界联合的共生圈扩大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征服，一种是联合。那么，战争就是循着前一条道路进行的。战争多是由征服者挑起的，而在反抗征服者的斗争中，发展了联合，平等联合就会带来和平。军事家们是从某次战争去评论得失，战略家们是估价一次战争带来军事格局的变化，政治家们是评判一次战争对其国的利害的影响，共生论者是用谋求人类永久和平的观点去观察战争。一要说明战争带来深重的灾难，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或多方面的，二要让成亿的死者的血不能白流，又去重复战争的灾难。

过去的 100 年，导致战争的战争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战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苏联侵略芬兰的战争、以及二战后的中东战争、苏阿战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战争等，占了一半。这种战争有的是后来一次大的战争的前奏，有的是另一场战争的条件，总之是不到侵略者被打败，战争不会停止。只有苏阿战争是戈尔巴乔夫主动停止了侵阿战争，其他的全要打到分胜败为止。

还有美阿战争、美伊战争因为力量悬殊，则是导致恐怖的战争，塔利班又重新活动，并没有带来和平。恐怖是比战争规模小的一种游击战争，对人民的伤害也并不亚

于战争。

现分述如下：

1、日俄战争（1904—1905）。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势渐强，“脱亚入欧”（即西方化），但军国主义者倾覆了它的和平政权，开始其称霸世界的帝国图谋。证明是“田中奏折”说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日本发动战争就是要踢开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军事经济势力这块绊脚石。于 1904 年 2 月 8 日以伪装俄舰偷袭旅顺港，开始这次战争，和 1941 年偷袭珍珠港一样，都是不宣而战，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小偷心理。同时，为堵塞旅顺港口，征集 77 名敢死队，自行炸沉装载巨石 5 艘旧船，和二战中日本神风队自杀式飞机袭击，都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现。给当今恐怖袭击作出了“共死”的恶劣榜样，而老大沙俄帝国太平洋分舰队官兵在日本开战时的炮火及鱼雷爆炸声中，还当作是向司令夫人祝贺命名的礼炮声呢！这又与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太平洋舰队官兵还当是自己的空军的演习一样。这种偷袭式不宣而战的手段是发动战争者惯用的伎俩。2 月 9 日，沙皇对日宣战，到 10 日，日本天皇才发布宣战大诏。两个皇帝以民族国家的名义，高扬帝国精神，驱使官兵们相互厮杀的争斗，历时 1 年零 3 个月，日本全歼了俄太平洋舰队，陆战也获得全胜，却让双方官兵死亡 22 万人。这些冤魂向谁去索命？最激烈的战斗是在旅顺口 203 高地，9 天激战中，日军付出 17000 多人的代价。日俄战争的胜利统帅东乡平八郎，显赫一时，是军事史上的“英雄”，却是共生史上的败类。他的成功是建立在 22 万人的枯骨上面。他的灵魂只不过是小偷式的强盗而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正是日俄战争的胜利，田中奏折的吞并满蒙野心得以步步实现，导致尔后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的开始。

日俄战争中，日俄双方死的是双方军事人员，而中国老百姓死于无辜的却很多。两个强盗国家在中国土地上打仗，杀我人，烧我房，征我伕，吃我粮。窝囊的满清政府还讲保持中立，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哪个强盗举着刀把子，我就让哪个强盗宰割。爱国文豪鲁迅就是在受到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刺激下而放弃学拿手术刀改做唤醒民族觉醒工作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中、日、俄三方都不会加以统计的，中国人命如蝼蚁！

2、巴尔干战争（1912—1913）。土耳其帝国对巴尔干地区各民族残酷统治长达 500 年，到 19 世纪，希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保加利亚先后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但阿尔巴尼亚、新托帕尔、马其顿、色雷斯等地仍为土耳其统治。1912 年希、塞、门、保四国结成“巴尔干同盟”，要求给予阿、新、马、色四地民族自决权，向土耳其发起攻击。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削弱土耳其，德奥支持土耳其，英法支持巴尔干同盟国家。四国联军打败了土耳其，签订《伦敦和约》。但墨迹未干，因巴尔干各国发生领土争夺，塞、希、门、土、罗一起攻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溃散，又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但奥塞冲突并未解决，一年后因塞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到第一次大灾难。巴尔干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因。

3、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为争夺巴尔干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是英德、法德、俄奥德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就是崛起的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推行其“世界政策”，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与老牌英、法、俄三个帝国占据几乎全部殖民地矛盾尖锐化的必然。当时英国殖民地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约为其本土面积130多倍。沙皇俄国领土扩张达1700万平方公里，占其本土面积3.2倍。法国殖民地面积达1060万平方公里，占其本土面积21倍。德国在中近东地区与英国争夺得最激烈，这是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又有波斯湾的大片油田，德国与土耳其结盟，取得巴格达铁路建筑权，直接威胁英国中近东及非洲殖民利益。同时，俄国一直把土耳其和中近东视为势力范围，找寻黑海和印度洋的出海口，也与德国发生矛盾。英俄于是协约抗德。德法之间则因普法战争法国打败，失地赔款，久怀复仇之心，也捐弃与英国前嫌，形成英俄法协约。具体的争夺殖民地则为：德法争夺摩洛哥，俄奥争夺巴尔干。一战前冲突、小战不断，而同盟国德奥又拉拢意大利，于是英法俄塞与德奥意土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因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而爆发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

1914年7月，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8月德、俄、法、英参战，日本为夺取德国在中国的胶州湾，也对德奥宣战。1915年，双方都争取保加利亚，保参加同盟；意反戈又参加协约国。1917年，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多次击沉美国商船，美国对德宣战。许多中立国也跟着对德宣战，古巴、巴拿马、中国、希腊、巴西、利比里亚、泰国等全加入协约国，使这次战争战场遍及欧亚非及三大洋。参战国33个，卷入人口15亿以上，占当时世界总人口2/3，动员兵力6400多万，阵亡853万，负伤失踪3897万人，因战争和死于饥饿、灾害的平民也有1261.8万人左右，直接战费863亿美元。各交战国的经济损失约为2700亿美元，[①]即卷入人口人平均损失180美元。多么浩大的财产损失！

战争最激烈的战役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德军为夺取法国东北交通枢纽、巴黎门户凡尔登要塞，在30公里正面上，投入46个师的兵力，实施进攻。法国投入66个师实施防御和反击，从2月到8月，在7—10公里纵深反复拉锯，大量消耗，双方伤亡100多万人，双方发射了4000多万发炮弹。战场上竟有炸成10层楼深的大坑。这场恶战，以成千上万的人命投入，被历史称为“凡尔登绞肉机”。[2]人类啊！为什么要把血肉之躯成批的往绞肉机里送呢？到现在还没有醒悟过来，已经快100年了！

在一战中，德军首次使用毒气，造成更大的伤亡；用齐伯林飞艇轰炸后方，使无辜平民开始受难。英军使用坦克，使战争更具破坏力。屋宇田园，尽能摧毁。人类啊！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园用坦克加以碾碎呢？而战争对于人类精神上的摧残，法国文豪罗曼·罗兰更有痛心的描述：“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折磨；忧愁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

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失望于友谊、爱情和信仰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斫伤的可怜人。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残忍”。

经过 4 年零 3 个月的残酷厮杀，发动战争的同盟国终于在 1918 年 9 月，土、保、奥先后投降，11 月 11 日，以德国签订《康边停战协定》被迫投降为标志结束了这场 20 世纪第一次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而最后的和约则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签署。英法两国对德国实行了惩罚性的苛刻条件，割地赔款，种下德国复仇主义的祸根；把德国海外殖民地全部划归相关协约国，而不是通过民族自决使之独立，充分表现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一心以剥夺别人的权利为务的国家与政府，是不会有和平可言的。强权政治，秘密外交，讨价还价，牺牲弱小，在一战中和和会期间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付出了近千万生命的代价，却没有接受沉重的教训，表现为国际联盟并不能保障和平。20 年后，即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 20 年间，又发生一些准备性的战争。

1917 年十月革命，给国际战争史增添了新的因素，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及其对战争的影响。本来，列宁颁布的和平法令，让人类从此展现和平的曙光，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类民族国家，一样受战争规律所支配。它不仅有国与国的战争，而且因为它的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迥异，更容易发生战争。或者是在它初生时，邻国入侵它；或者是它强大时，它也入侵邻国。前者如苏波战争，后者如苏芬战争、苏阿战争，都是 20 世纪有相当规模的战争，后果也是严重的。

4、苏波战争（1919—1920）。一战后独立的波兰利用苏俄内战之机，入侵苏俄想得到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立陶宛等地。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伤亡惨重，战线长达 1000 公里，祸害平民。这是协约国支持一个国家首次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锋，打个筋疲力尽，无力再战而妥协，取得 20 年的和平。20 年后，斯大林与希特勒又再一次瓜分了波兰，为苏德战争作扩大纵深的准备。

5、苏芬战争（1939—1940）。苏联以维护西北边界安全为由，向芬兰提出交换领土和租借军事基地的要求，芬兰以保持中立为重，予以拒绝。苏单方废除互不侵犯条约，11 月 30 日，以 20 个师 45 万兵力、2000 辆坦克、1000 架飞机向芬兰发起全面进攻。芬兰人民奋起反抗，使苏军以死 48745 人、伤 158863 人的代价，才赢得这次战争的胜利。究竟小不敌大，赔款 3 亿，满足苏方要求，丧失领土 4 万平方公里和第三大城市维堡。芬兰军民死 2 万 3 千人，伤 4 万 7 千人。苏联在占领区成立 O.V.库西宁政府，说是应芬政府的要求而越过边界的。不过一年，二战开始，芬兰对苏联宣战，收复失地。再打 4 年，二战胜利，苏联边界推进 150 公里。以工人祖国之名，去行帝国之实，居然冠冕堂皇！

6、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就开始了侵华战争，中间蚕食鲸吞，到 1937 年已兵临北平城下。而中国抗日战争则由七·七事变开始，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后，才成为二战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总体战的一部分。这次战争中国作出了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民族牺牲，以 3500 万伤亡的代价，赢得自 1840 年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民族独立了，主权恢复了，战争伤亡数字，按 2001 年军事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战争评说》刘庭华研究员披露数字（仍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平民伤亡 3120 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 380 余万人（其中国民党伤亡 321 余万人，共产党伤亡 58 万余人），总计 3500 余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 2/5 强。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亿美元以上，而民间损失则无可计数。

日本侵华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凶残、最野蛮的战争，时间也延续比较长，前后达 14 年之久。范围很广，战场面积达 420 万平方公里。一般战争是军事力量的争斗，而日本侵略者，对广大农村平民却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完全是一群丧失人性的野兽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日军非人性的表现最为典型的是对妇女奸污后还要用刺刀捅死，把婴儿挑在刀尖上玩耍。其中在南京所犯的滔天罪行，最为令人发指。直把南京造成一座人间地狱，超过历史上最为残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死中国军民达 30 万人之多（日方统计为 15 万多人）。侵略军还进行杀人比赛，以单人连杀 107 条生命而获取优胜者。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灾难，在历史上更是日本军人的耻辱。这是人类非共生思想意识的极端表现。如果我们不从人类共生的高度去认识，既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又友好对待日本和平人民，而让民族仇恨永远延续下去，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冤冤相报，不利子孙。也只有让池田大作的共生思想成为日本人的普遍思想意识，才能免于重复历史的悲剧。

古语：“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日本侵华的部队遭到中国军民的痛击，也有一本死亡帐。国民党死伤俘其 85 万余人，共产党死伤俘其 52.7 万余人，东北抗日武装死伤俘其 17 万余人，总计是 155 余万人。他们为什么要把命丢在中国，谁实为之？战争灾难不会是受害者一方，施害者也一样是灾难，军国主义者给亚洲受侵略各国带来的灾难，最后不是落个损人不利己的灭亡结局么？

日本侵华战争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相反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则是导致和平的战争。因为世上只要有侵略、占领、强权剥夺，就无和平可言。

7、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1941）。东非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在 19 世纪末仍保持独立的国家，1895—1896 年曾挫败过意大利的入侵。1922 年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上台后，积极准备殖民战争，1935 年终以 30 万大军不宣而战，大举进攻埃国。到 1936 年，全部占领埃国，埃国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到 1941 年。二战中由英法部队协助了埃国人民复国，原率民众抗战的皇帝海尔·塞拉西恢复政权。战争中，意大利大量施放毒气，埃国战争中死 76 万余人，有 28 万余人死于毒气。法西斯匪徒丧心病狂，违背国际公约，一至如此！而他们也付出了 14 万人的代价。人以群分，国以类聚。德意成立轴心，随后日本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三大侵略国家发起的。

以上这些战争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和准备。它们有相互关联性，我们不能孤立的去观察每一次战争。同样，和平也不能是孤立的。只要有一处战争，它就能破坏全世界的和平。它会给一些反和平的掌权者鼓舞，用侵略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剥夺他国以肥己国，以国族的名义去实现掌权集团的最大利益。同时，这也是人类由国与国、族与族不能共生转向共生的时代特点，即侵略者不到彻底被击败时，战争不会止息。以下分析至今还在继续其危机的战争。

8、印巴战争（1947—1972）。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是典型的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战争，世俗政府的领土和利益之争及教派政党的民族代表性加重其复杂性和对抗性。这种国、族、教三合一的冲突，是世上最难解难分的纠葛，如果再加上阶级、贫富矛盾，就成为异己不能共生的集大成的地区，是国际间最为复杂的政治现象。

1947 年 8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成为两个国家，因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于该年 10 月和 1965 年先后发生两次克什米尔战争。该地区在分治方案中归属须待公民投票决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两个地方，统称克什米尔，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78%为穆斯林，20%为印度教徒。因英国殖民者把统治权以 750 万卢比卖给了印度教查谟大君，使该地区上层是印度教，下层多为穆斯林。印度说是它拥有主权，而多数穆斯林则愿归属巴基斯坦。加上两教千年积怨，于是冲突在这一地区就激烈的爆发出来，并引发 1971 年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更大战争。

原来，巴基斯坦在立国之时，就分为东巴和西巴两个部分，中间隔着印度，政治经济中心在西巴，东巴则处于被管辖的无权地位，引发东巴要求自治的呼声。1966 年代表人物穆吉布·拉赫曼提出 6 点自治纲领，到 1977 年初，领导大规模与西巴“不合作运动”，进一步提出成立“孟加拉国”受到东巴人民的响应。西巴当局对同族同教不同政见的态度是逮捕拉赫曼，取缔其政党，激起兵变，又派部队前往镇压。两个月平息了这场风波，但给了印度以肢解巴基斯坦的极好机会。印度制定了“解放孟加拉”的计划，并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1971 年 11 月，印军突然发起进攻，战争在东西巴两个战场上展开，东巴力量薄弱，很快被击败，印度单方提出西线停火，巴接受停火建议。双方军民死伤达十数万。战争结束，东巴独立，成立孟加拉国。印巴旧恨新仇，双方积极搞军备竞赛，在美苏支持下，都有了核与导弹技术，摩擦不断，恐怖频发，克什米尔争端暗藏着核战危机。印巴三次战争结果还是一个火药桶，尚幸近年双方有些接近、互访，开始解冻。但只要掌权集团不以和平为重，人命为重，危机始终存在。

9、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五次战争。就在《圣经》上称为“流蜜之地”的 25176 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因为有着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成为名副其实的“流血之地”，人类千年积怨之地，是民族、宗教、仇恨、灾难最为集中的地方。1948 年由联合国决议巴（巴勒斯坦）以分治，在世界各国流浪了 1900 年（2—20 世纪）倍受古代罗马和现代德国法西斯屠杀和各地排斥之苦的犹太民族成立以色

列国。5 月 14 日，即以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动圣战，实行四面围攻。以色列人奋起反抗，在美英等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的帮助下，愈战愈强。而阿拉伯国家则各有所图，并不团结，胜则各分土地，败则畏葸不前。第一次战争结果是以色列全胜，占领了巴勒斯坦 80%的土地（包括联合国决议中划归阿拉伯人 4850 平方公里），使 96 万巴居民沦为难民，于 1949 年 2 月停战。埃及占有加沙，外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虽然到 7 月以色列分别与其他交战各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都是不服气的协定。只等时机一到，立即变为一张废纸。仇恨之火在协定底下燃烧，纸是压不住火的。

1956 年，以色列参加了英法发动的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对埃及的战争，是为中东第二次战争。因为苏美对英法的殖民战争政策持反对态度，由联合国监督停火，1957 年以色列和英法军队全都撤离埃及才结束。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1967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11 日，以色列通过六天的闪电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米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区共 6.57 万平方公里土地，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撤军，以色列不执行。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斋月战争（1973 年 10 月—1974 年 5 月）。埃及、叙利亚联合巴勒斯坦武装向以色列进攻，又被以色列打败。打到次年 5 月，联合国派驻了维和部队，监督双方执行停火协议，以色列占领了西岸 1900 平方公里土地，叙利亚又丧失 770 平方公里的土地。进攻方得不偿失。

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 年 6 月—9 月）。以色列以驻英大使被刺为由，以军入侵黎巴嫩，目标直指黎首都贝鲁特西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对该地区巴勒斯坦难民营阿拉伯人进行血腥屠杀，在世界舆论压力下，撤出西区，结束了这次战争。

这五次中东战争，实际上是一次战争的继续，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杀戮、报复、暗杀、绑架、恐怖的战争。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各处难民营中，在加沙、西岸的阿拉伯人中，生长的反抗组织——哈马斯，和大大小小的、各个派别的反以地下军，坚持着毫不妥协的态度，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而主张对以妥协坚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法塔赫一派却被他们视为美英的走卒，巴人自己又打起来。哈马斯 2005 年在选举中获胜，说明巴主战派得到多数巴人的赞成。组阁的总理在加沙地区武装赶走了法塔赫总统阿巴斯。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作了不少的努力，什么“以土地换和平”，“中东和平路线图”等等在民族仇、宗教恨的情势下，一次次的被破坏，至今是个解不了的结。

仇恨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阿以一天不和解，阿拉伯人一天不放弃内斗，巴勒斯坦总不得安宁。

10、苏阿战争（1979—1989）。苏联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行民族帝国之实，以 10 万大军入侵阿富汗，击毙阿总统阿明，进行长达 10 年的战争。这是勃列日涅夫扩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杰作，阿富汗人民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大的战役厮杀，却种下了“塔里班”执掌政权，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祸根。基地组织以反

苏之名聚集阿富汗，美国支持阿反苏，结果培养了尔后反自己的恐怖主义。苏联从侵阿开始，拖垮自己国内的经济，导致自己的危机。应了古话，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为霸权而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只是害苦了中间地带国家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见不到和平。

11、两伊战争（1980—1988）。民族纠纷、教派对立、领土争端而起的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是怀着要当伊斯兰霸主的野心的萨达姆发动“威慑性打击”伊朗开始的。战线长达 480 余公里，纵深数十公里。打了八年，死伤达百万人。同信一个“安拉”，也打的难解难分。其残酷程度，动辄以 10 万军力组织进攻，死伤狼藉；又开展“袭船战”，遇袭船只达 106 艘。1988 年双方使用了数百枚导弹，进行“袭城战”，使和平居民死于导弹不计其数。到 1988 年 10 月才接受安理会决议，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在伊拉克后面支持它去反对霍梅尼反美的伊朗政权，结果又培养了一个劲敌；而萨达姆因战争损耗太大，又去吞并科威特，强夺石油，因而导致海湾战争。战争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的打下去。

以上十一次导致战争的战争，让和平人民看到，战争往往是侵略者，破坏和平秩序的野心家所挑起的。所以勿因战火小而放松警惕，哪里有战火，就应该在哪里扑灭，勿使后面更大的战争来临。战必以和而解，与其打得两败俱伤而和，远不如战未发而以政治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共生的解决方式，尤其强势国家的人民，不要被煽动，为战胜的利益所惑。因为战争一起，你们的子弟，甚至你们自己将死在其内，哭就来不及了。

二、导致和平的战争

一般的说，战胜侵略和野心的战争，也就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会导致和平。20 世纪曾是战争惨祸频仍的世纪，但也是人类开始出现和平曙光的世纪。因为与 18、19 世纪不同，不是殖民帝国扩张时期的战争为主的世纪，而是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居多的世纪。奋起反侵略、反殖民的国家不以侵略和剥夺他国权利为目的，必然带来和平。其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最重要的一次，它几乎决定着人类和平前景的到来。

1、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正确的名字应该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命运的大决战，是剥夺与反剥夺，侵略与反侵略的生死较量，是人类非共生到共生的转戾点。

如果按其性质来划分战争起止时间则应是从中国全面抗战 1937 年 7 月 7 日开始，于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签约为止，欧洲战场打得晚，结束得早。此前，8 月 5 日，德国签订投降书；5 月 9 日，成为欧洲战争胜利日。

这场战争是以法西斯国家德日意轴心国及其附庸国傀儡政权为一方，世界反法西斯 50 多个同盟国为一方的六年殊死搏斗。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横扫了北欧，丹麦，挪威，西欧诸国，法国投降，狂轰滥炸英国。1941 年德国又进攻苏联，直逼莫斯科。日本突击珍珠港，侵占东南亚诸国，太平洋诸岛，染指澳洲，从缅甸威逼印度，

准备与希特勒会师中东，把世界给吞了。气焰之嚣张，无以复加。

这场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重的战争。六年中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4/5 人口卷入战争旋涡，战火燃遍欧、亚、非、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 2200 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 1.1 亿人，死亡军民达 5120 万余人，军队死亡 1690 万余人。平民 3430 余万人，合计 5120 万余人。但另有统计数据为 5500 万人。直接军费开支为 1.3 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收入 60-70%，参战国物质总损失价值达 4 万亿美元。

苏联是打败轴心国元凶德国的主力，其军民付出极大的牺牲，伤亡达 6000 万人以上，其中死亡 2700 万人，红军牺牲 866.84 万人，物质损失达 6790 亿卢布，是二战参战国全部损失的 41%。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死亡 200 万人，其中平民 50 万，超过“凡尔登绞肉机”的一倍。惨烈程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在 8 年抗战中牺牲 2100 多万人。（不包括 1931—1937 的 6 年间）财产损失与物质消耗 1000 亿美元以上。

美英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对战争作出巨大的贡献，美国牺牲官兵 40.5 万人，英国牺牲 37.5 万人，美国向 38 个国家提供了 500 多亿美元的武器与物质租借援助，其中主要是对英、苏、中。

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自己国家也带来巨大灾难。德军在战争中死亡和被俘达 1360 万人，其中 1000 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有 400 万平民死于战火。1400 万人无家可归。意大利死亡 16 万多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死亡 150 万人，在太平洋战场死亡 124.7 万人。日本平民在两颗原子弹爆炸声中瞬间即结束了 24 万人的生命。尽管当时对迅速结束战争有利，但开创了以平民生命赢得战争的先例，给和平人民投下极大的核无情的阴影。它告诉世界人民，如果发生核战争，死得最多的也许不是军人，而是平民百姓，不可不从这个角度来反对核战争。

轴心三国侵略元凶、发动战争的责任人是什么下场呢？希特勒（德）自杀；墨索里尼（意）被本国人民枪毙，在米兰闹市暴尸三日；东条英机（日）被国际法庭处以绞刑，可为一切战争罪犯一面无情的镜子。

这次战争的结果，不再是战胜国惩罚战败国，而是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如对德）；不索要战争赔款，帮助战败国进步（如对日，通过和平宪法，实行土地改革，实现民主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大同盟的基础上组建联合国，共保世界和平，承认殖民地有民族独立自决权，而决无任何领土占领的要求。这是一种不仅在军事政治上战胜法西斯，而且是贯彻一种反法西斯理念和制度的伟大民主精神的实现，“四大自由”的价值观的拓展，使人类获得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这对和平共生，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虽然二战已经过去了 60 年，但我们决不能忘记那 5120 万鲜活的生命是怎么死去的，决不能让我们的父祖辈白死。如果我们不能用共生理性去看待战争与和平及其根

源，创自觉共生的世界和平，让一切非共生思想继续危害人类，则我们将贻祸子孙，也对不住那半亿多亡灵！

二战是世界范围导致和平的战争，而接下来许多民族独立战争则是在各殖民地国家导致和平的战争。

2、印度支那抗法战争（1946—1954）。二战甫停，原法属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法国殖民主义进行了持续九年的战争。法国在二战中，投降德国，倍受亡国之痛。但自由法国复国以后，还要继续其殖民统治，否认于 1945 年 8 月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 9 月成立的老挝政府，从本土派兵入侵河内，接着侵占柬、老二国。战争初期，三国以游击战形式，对抗法军，但人民力量愈战愈强，最后奠边府一役，全歼侵略军 1.6 万人，俘获法军司令。1954 年 7 月在日内瓦会议上承认三国主权。但是，法国在南越（北纬 17 度以南）扶持的保大王室政权继续与北越对抗，引发越南战争。但对柬、老两国来说，是导致了和平。

3、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被法国殖民帝国统治了 130 年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觉悟、成长起来。1954 年组织了全国性起义，以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军，发展到 13 万人（包括民兵），不断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击殖民当局。有时三个月出兵 400 次以上，平均每天 4 次之多。实行以山区为根据地，军民结合，城乡结合，四处出击，1954—1957 三年中打死法军 4.7 万人，老百姓打死的占 7 千多。法国增兵镇压，从 5 万人增至 80—100 万人，包括法国大部分陆军，60%的空军，80%的海军。但到 1959 年法军死伤 11.2 万人，耗尽 300 多亿法郎军费，陷入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六届内阁相继垮台，1962 年不得不和谈签署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7 月 3 日阿正式宣布独立，以伤亡 14.5—20 万军人和 60 万居民的代价赢得了和平。

4、朝鲜战争（1950—1953）。以中朝为一方，与以美韩及联合国为一方的由内战扩大为国际性局部战争是一场以民族统一为由的阶级战争；是两个制度、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战前北纬 38 度线为分界的朝鲜政府与韩国政府，本是一个民族，一家人。北朝鲜出于统一国家，解放南方同胞的强烈愿望，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发动大规模向南朝鲜的进攻，在两个多月内，即将美韩军驱赶到不足 1/20 国土面积的釜山地区，只差一口气便可把美李（承晚）赶下海。可是，美韩海军于 9 月 15 日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仁川登陆，切断南下大军与北方基地的通道，战局逆转，战火迅速燃及北方。10 月平壤失守，美韩军打过清川江，逼近中朝边界，美机已不断侵犯我国领空，并轰炸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援助朝鲜亡国之危，也为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组成志愿军赴朝作战。10 月 19 日晚，首批部队 32 万人进入朝鲜，经过两次战役，即粉碎美李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歼其 5.1 万余人。到 1951 年 6 月又进行了三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38 线”附近。7 月 10 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到 1953 年 7 月，两年间，谈不拢就打，打不赢再谈，交替进行。终于在 7 月 27 日签署停战协定。

和平的得来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伤亡 554669 人，非战斗伤亡 41 万余人，朝鲜人民军伤亡 26.1 万余人，共计约 120 万人为代价的。志愿军牺牲 171669 人，医院接受伤员为 383000 人，其中伤病死亡 33600 人[③]。美国伤亡数在其朝鲜战争纪念碑上镌刻的是 17.2847 万人，其中死亡为 5.4246 万人，联合国军伤亡为 62.8833 万人。南北朝鲜平民死伤有统计为 200 万人。战争双方损失人员超过 260 万。中国优秀儿女有 14 万多人长眠在那块当年鏖战至今仍然贫瘠的土地上。

从战争费用及作战物资消耗看这场战争：美国战费 400 亿美元，武器弹药装备补给 7300 余万吨，中国战费 62.5 亿元（折合 25 亿美元），物质 560 余万吨。美方打的是成吨的钢铁和汽油弹，我方打的是士气加血肉之躯，士气是三大精神：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笔者当时是志愿军的一名参谋，体尝了战争与和平的况味，1953 年 7 月 27 日，我在朝鲜黄海北道还头山前线阵地。昨天我们和对面的英军还是相互瞄准，一冒头就要彼此的性命。今天他们就跑到阵地山头上跳舞，下小界河来洗澡。我们不能上山头，因为石头都炸酥成粉末一样。我曾在坑道睡了平生最甘甜最长时间 36 小时没醒的觉。我也可以告知读者，什么叫战争，几分钟以前，我的战友还和我有说有笑，一阵炮击，我就抱着他血淋淋的遗体进了坑道。他就是和我同床睡的通讯员 18 岁的小刘。至今想起都热泪盈眶。战争是恶魔，是罪恶，是叫人刻骨铭心的痛！若问那时朝鲜是什么样：平壤全部夷为平地，除了看见金日成大学几根残柱外，一片瓦砾场！老百姓全部住进地下掩体洞里，只有山间才有些村落，村落中全是老弱妇女，很少见到男丁，也很少小孩。到夜晚，一片死寂，偶尔听到妇女的啜泣声。没有电，没有灯，真正的原始的黑暗！“沙拉米”（朝鲜人）们吃的只是咸腌菜就着杂粮。战争带给朝鲜人民的灾难，实在不是悲惨二字能形容得了的。真激起了我仇恨满腔，义无返顾投入战争。大概人们和我一样，就在这战争激起仇恨，仇恨推动战争进入这个轮回的。

这场战争，取得了东北亚半个世纪的和平。但，美朝双方仍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朝鲜的先军政治加上核武试验，是不是还要重复一次灾难呢？和平人民的心还在悬着呢。好在最近六方会议，朝鲜放弃核武，韩朝首脑会晤，燃起了和平的希望。

5、越南战争（1960—1976）。如果说朝鲜战争，美国还能在联合国获得支持，组成联合国军，那么，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就近乎单干了。它要替代法国的角色，策动吴庭艳集团废了亲法的皇帝保大，在南越进行一场越陷越深，长达 16 年之久的干涉越南人民统一的不义战争，企图保住北纬 17 度线以南的资本主义前哨阵地。美国先是发动出钱出枪，直接指挥南越军的“特种战争”。1965 年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发动由美军参加的“局部战争”。1968 年越南发动春季攻势，歼敌 15 万，打败了美国和它换的新马——阮文绍政权。由于美国人民反对越战运动高涨，1969 年又改为“战争越南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巴黎协定，美军全部撤出南越。美军一走，5 个月后，南方全部解放，越南南北统一，实现了和平。美国付出了 5.6

万多人生命和 30.4 万的伤兵，南越政府死 13 万伤 50 万人，耗费 2500 亿美元，得到了什么呢？耻辱的离开。如果说在朝鲜和中朝打的是平手，这次才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战争。而造成越南的损失是正规军、游击队 110 万人死亡、60 万人受伤、33 万人失踪，500 万平民死亡。越南土地上满目疮痍，有 88 万孤儿，100 万寡妇，20 万残疾，20 万妓女痛苦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仅从承受炸弹量看越南人民的苦难，从 1965 年 2 月起到 1968 年 11 月止，三年间遭空袭 10.77 万次，承受炸弹 258 万吨，平均每平方公里达 16.2 吨！

越南战争不是孤立的，美南越得到韩国、澳、新、泰等国的支持，韩国参战先后达 30 万人，射杀越军民 4 万，自损 4687 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派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兵种及技术人员、筑路工先后九批计 32 万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人，承担了部分的防空系统任务，还有 200 万 cc 的血浆，总计援越价值 200 亿人民币。但抗美援越并没有像抗美援朝那样公开宣传其正确性，光荣性，作出了对越无名无私的援助。有 4000 多中国人血染北越土地，1000 多名长眠越南山冈。苏联更是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其导弹部队击落美机 1707 架的大部分。所以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一样，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6、海湾战争（1991.1.17—2.26）。这是以美国为首的 13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战争。8 年两伊战争，使伊拉克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萨达姆政权将矛头指向又小又富庶的邻国科威特，于 1990 年 8 月 2 日，悍然侵占科威特，无视联合国要求撤军的决议；8 月 8 日宣布兼并科威特，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联合国再次要求其在 1 月 15 日前撤军，否则进行军事行动。伊政府仍拒不理睬。1 月 17 日多国部队采取大规模连续空袭，伊防空能力丧失殆尽，坦克也大部分被毁，2 月 24 日多国部队采取地面行动，26 日科威特全境解放，伊境内伊军全线崩溃，接受联合国全部决议，战争结束。

参战人员联合国多国部队为 69 万人，伊拉克聚集兵力在 100 万人以上。

海湾战争是一次准备时间长（5 个月），作战时间短（43 天），空袭时间长（38 天），地面作战时间短（仅 100 小时），武器、装备、物质损耗大（美方 600 亿美元、科威特 600 亿美元、伊拉克 2000 亿美元），人员相对伤亡要少，（美军亡 390 人，伤 3336 人，伊军伤亡 8—10 万人，被俘 8.6 万人（几乎与伤亡相等）。胜负双方悬殊极大的高科技信息战，开创人类战争史上的新阶段。人类的战争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从农业时代——冷兵器战争，面对面的厮杀到工业时代——热兵器远距离射杀、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战争，进到智能时代——卫星侦察定位系统，进攻中的激光制导系统，信息传递与破坏干扰系统，加上威力强大的导弹，高性能的爆炸物系统，及自动化机械武器系统、航空系统综合运用的电子信息战。原来战争模式大为改变：以往战争是从前线小兵们打起，现在反过来，实行斩首行动，先打指挥系统，从战争指挥部打起；让最高指挥，也就是权力中心眼瞎耳聋，脑子无法思考（没有信息），切断它与被指挥

的广大官兵的联系，让它成为一个什么权力都实现不了的自然人状态，而这也恰恰是他们平时能够统治的要害。这的确是物极必反，由太不共生展现共生的希望，世上也就只有那么几个发动战争的狂人和它的鼓动者们。如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让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也得考虑自己的生死一样，信息战的出现也会让把国家民族作赌注的人清醒清醒。

海湾战争给科威特带来和平，却未能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不无遗憾。

7、科索沃战争（1999 年 3 月 24 日—6 月 10 日）。这场历时 78 天完全以空袭决定胜负的战争是北约与南联盟之间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要求从南分离出去而遭到镇压所引起的战争。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族人古老的家园，是塞族宗教（东正教）圣地所在。二战后，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期间，塞尔维亚共和国给予科索沃地区一定自治权，阿族人向该地有较多的移民，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阿族人宣传该地应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东欧巨变后，各民族独立瓦解了原南斯拉夫统一联邦形式。阿族组建解放军，向南联盟挑战。米洛舍维奇总统不是以民族和解为务，而是派兵镇压，并殃及平民，引起民族间大规模仇杀。仅一次屠杀就有 3248 人，其中战俘就 1000 人。北约以地区安全和人道主义为由，要求塞尔维亚部队撤军，南不答应，爆发战争。战争并未出地面部队，完全以空中打击南联盟为手段。78 天中共投入 1100 多架各种飞机，起飞轰炸 3.6 万架次，投射导弹、炸弹 2.3 万多枚，摧毁南地面重型武器 30%，飞机和导弹 50%、军工生产设施的大部分和炼油设施全部，指挥系统、运输线路严重受损，迫使南最后不得不接受北约撤军停战条件，战争结束。

虽然这次战争并没有地面作战，但给南平民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可忽视的。尽管在这次战争中制导系统比海湾战争的精确投弹总量大了 10 倍，即由 8.4%提升到 98%，但炸弹、导弹不长眼睛的现象仍然存在，造成炸毁国际列车、公共汽车等灾难，北约也是难辞其咎的。这次还炸了中国大使馆，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北约本来就是个军事联盟，竟未通过联合国发动战争，开了毫不尊重联合国的先例，为后来美伊战争提供了恶劣的榜样。

以上是导致和平的战争。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世贸大厦，造成瞬间死亡 3113 人，无辜人民受难。美国把恐怖主义列为头号敌人，宣布要进行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美国即选定阿富汗作为第一攻击目标。这就在战争类型上产生新的一种，即导致恐怖主义的战争。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在民族政权无力对抗战争而由恐怖组织来用极端手段把战争扩大到无辜平民生命的残酷仇杀而已。

三、导致恐怖主义的战争

1、阿富汗战争（2001.10.7—12.9）。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苏联退出阿富汗后上台，对内实行宗教统治，要建立一个纯伊斯兰共和国，使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报复主义

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发展壮大，本·拉登就是在这里策动组织 9·11 袭击的。美国要求阿富汗交出本·拉登，绳之以法，但遭到塔利班断然拒绝。美国在多国支持、联合国授权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于 10 月 7 日向阿富汗实施空中打击，联合阿北方联盟力量，地面部队南北夹击，到 12 月 9 日即推翻塔利班政权，组成以卡尔扎伊为首的联合政府。本来可为阿富汗创建和平，但基地组织仍在阿巴（巴基斯坦）边界部族地区活动，奥玛尔的残部仍潜入地下，二者都继续其反美反政府的恐怖活动，不时袭击美军和政府军，用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四处制造惨案，杀害绑架外国援伊人员，至今也看不出何时能结束这场看不见战线的战争。

2、伊拉克战争（2003 年迄今）。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旋即向它的第二个目标——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发起进攻。萨自海湾战争失败后，不仅不遵守联合国许多决议，特别是对武器核查人员拒不合作。美国愈益怀疑其制造、藏匿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生物武器和核设施，并对萨达姆多次镇压反对派联合中情局推翻其统治的行动极为恼怒。3 月 19 日美国宣布已有 45 个国家表示支持对伊动武，于是不经联合国决议，美英两国于次日发动对伊拉克的全面战争。经过“斩首行动”投掷精确制导炸弹 2000 多枚，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500 枚，就把伊军指挥、通讯、电力等系统打瘫痪了。地面部队采取南北夹击巴格达，伊军几无有效抵抗。4 月 15 日，美军宣布主要军事行动结束，12 月 3 日萨达姆被捕，以消灭反对派残酷手段闻名、屡次发动战争、屠杀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一代枭雄独裁者终于被伊人民法庭于2006年12月30日送上绞刑架。人类在反独裁的斗争中又一次取得胜利。

虽然美国的占领，推翻了萨达姆，却捅开了伊拉克的“马蜂窝”。伊拉克内部矛盾三方——原掌权的逊尼派、在野的什叶派、北方的库尔德人，矛盾加剧，旋即发生教派冲突不断升级，焚烧清真寺，杀戮报复，整个伊拉克像是个仇恨与敌对的海洋。加上复兴党徒、国民卫队，基地组织成员与美英的敌对情绪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使伊拉克各种自杀式袭击，几乎是无日无之。美国费九牛二虎之力，保护全民选举，成立议会、政府，使议会内派别斗争结合会外的枪炮炸弹，斗争又添一层乱。这条通向伊拉克和平民主的道路，美国走得是如此艰难。迄今五年的占领、剿灭、调解、劝和、筑隔离墙、外交折冲，加紧培训伊武装警察，伊人治伊，好撤军以平息国内反对伊战的浪潮，甚至央求伊朗来稳定局势，等等努力，被每日每晚的爆炸声所打破。联军死亡人数已过 4 千，比推翻萨达姆的代价搞出百倍。美军损失人数与 9·11 相等。至于给伊拉克平民带来的灾难，则是 65 万人的死亡和 300 亿美元的损失。从反恐开始，以制恐告终，恐怕是美国当政者始料不及的吧。现在是进退维谷，以为精确制导导弹能够解决民族、宗教、恐怖等问题，无异缘木求鱼，不可得也。伊拉克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国内战争

这不是主权国家之间，而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部族、宗教、教派、阶级、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采取武装战斗的方式进行的战争，其规模和灾难性有时比国与国

战争还要巨大而严重。一般是民族、教派、阶级之间没有和平、公正、平等秩序，一方被奴役、压迫、剥夺、残杀、歧视、欺侮等引起的。也有同族、同教、同阶级的利益集团争斗引起的，利益关系与意识形态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国内战争也不是孤立的，它受着诸多国际背景和因素的影响，但其灾难性则限于本国之内。

1、苏俄国内战争（1918—192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势力、沙俄军队、包括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东线，德国支持的旧俄将军克拉斯诺夫、邓尼金所部在南线向苏俄展开了进攻，先后占领了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相当于 3/4 苏俄土地。外国干涉军和白军先胜后败，战线长达 2000 公里。由工人士兵组成的红军，为保卫已取得的政权，不怕牺牲，英勇无比。东线以 8 万兵力反击 15 万察尔尼克和捷克军团，转守为攻。南战红军以弱小力量顶住了敌军的进攻。1919 年，经过 5 个月的奋战，红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终于在 1920 年初，赢得这场战争和境内的和平。

这场内战双方投入兵力 180 万，伤亡几十万人，当时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余粮收集制，以保证城市工人、士兵的生活，即向农民无偿征集粮食和供给的定量配给，给苏俄人民带来经济生活的极大困难。

2、西班牙内战（1936—1939）。1931 年，西班牙爆发了民主革命，波旁王朝国王逃往国外，4 月成立共和国，实行自由民主，共产党合法存在。1936 年，左翼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组成左派政府。国家主义者驻摩洛哥司令佛朗哥组织反左翼政府军，防止赤化，全国 14.5 万军队有 10 万人倒向反政府一方。对民选合法政府来说，是一种叛乱。8 月内战开启，德意法西斯国家极力支持，直接派兵参战。三年中，干涉军多达 31 万人（德 5 万，意 15 万，葡 2 万，摩洛哥 9 万）。为保卫共和，欧美各国人民志愿参加作战，对抗法西斯加上共产国际各国派去人员组成国际纵队 3.5 万人支援政府军，有 7000 名国际主义战士长眠在西班牙，苏联人民募捐了 6160 万卢布，苏联政府提供了 8500 万美元的武器、粮食、医药贷款。这次内战，终因法西斯国家的穷凶极恶，英、法等国的中立政策实则绥靖政策，听任法西斯对共和国的摧残，众寡悬殊政府军失败，佛郎哥上台实行独裁政治。

内战给西班牙带来的 100 多万人的死亡，财产损失数百亿美元。虽然这次战争带有很大的国际性，即法西斯与民主的较量。二战期间，西班牙虽然支持但未参加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保住了西班牙的和平。

二战后，1975 年，佛朗哥指定旧王朝卡洛斯接受政权，恢复帝制，走立宪道路。1982 年，社会党执政后，才融入欧洲社会。

3、中国国内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国从 1911 年到 1949 年 37 年间，完全为战争所笼罩，就是在八年全民族抗战期间，内战也没有真正的停止过。1911 年辛亥革命战争，建立了中华民国后，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法战争，北洋军阀的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分裂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最后以 1946 年—1950 年的解放战争为中国大陆上内战的结

束，但对台湾仍未结束对峙状态。

究竟百年来中国内战所造成的苦难，到底死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只有等待未来以人命为重的历史学家去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它可以教育所有后代子孙，兄弟不应再成仇了！

只是三年解放战争，史料比较充分，意义甚为重大。在世界内战史上，堪称动员兵力最多、民众发动最广、战区最辽阔的三“最”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全面的赢得了这场战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战争胜利的理论力量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它可以回答当时的实际问题，无可辩驳的是救中国的良方。物质力量主要是农民。战胜强敌的三犬法宝是武装斗争——一支统一指挥、相互协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自觉战斗、久经磨练的人民解放军，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党的建设——一个高度集中、坚决服从、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作无情斗争的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而在另一方却是背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实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专制独裁的腐朽政权，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利益。贪污腐败的官场，离心离德的将帅，拉壮丁组成的军队，虽有美式装备精兵百万，也抵不过民心向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什么是民心向背？解放战争有极好的注释。不仅解放区农民大批参军，就是战场上俘获的俘虏兵，讲几场“我为谁人来打仗”的政治课，开个诉苦会，看场“白毛女”或“血泪仇”，马上掉转枪口，与蒋军作战。群众空前热忱，在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中，表现最为壮观，参战部队 60 万，动员了五省民工 543 万人，为部队的 9 倍，动用担架 20.6 万副，独轮车、大车、畜力车 88 万辆，扁担 35.5 万副、民船 8500 只、运送弹药 700 余万公斤、粮食 4.8 亿公斤、转运伤员 11 万余人。陈毅元帅有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用几近原始的运输方式，完成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战勤保障任务，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绝无仅有的。

有着救国图存、极强的爱国心的经过 5·4 运动启蒙，12·9 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在抗战中就把希望寄托在延安，成批的从各地奔向那里，走上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的老师和学生们目睹蒋家政权，腐败透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不顾人民死活，还要“戡乱”到底，掀起“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的浪潮。笔者当时就是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的歌走进人民子弟兵队伍的。

中国这场内战，从实质上看，就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斗，是一场阶级斗争。本来巴贝夫就讲过，“革命就是内战”，毛泽东也指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革命，内战就不可避免。但就具体的三年内战来说，战争责任应属国民党一方。当时抗战甫停，百废待兴，和平民主是人民最大的

愿望，蒋却撕毁“双十和平协定”，发动内战，涂炭生灵。这是他们从“中山舰事件”开始，1927 年 4 月 12 日背叛革命，走着一条不是联共而是清共、剿共、灭共自取其咎的不归路。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炎黄子孙至少死去 300 万（仅歼灭蒋军即有 802 万人，包括死、伤、俘，应是死少，伤多，俘更多），[③]我方死亡迄未见确切数字，财产损失数更无从说起。

内战灾难还表现在分裂了民族，海峡两岸同胞 30 年骨肉不能团聚、音信隔绝、生死未卜，倚门而望，魂牵梦绕者应有几百万人之多。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台属不再以另类看待。两岸形势因马英九上台执政而大有改观，积极谋求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国共第三次合作是民族之幸。政治家们，该是为民族大义和人民福祉为重的时候了。欧盟异族都可联合，同族人还不可早日取消战争状态，永保和平、和谐共生、振兴民族么？消除内战遗迹应是对内战死难者最好的追悼！

4、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部族最多的国家。主要的是豪萨族在北方，掌握着中央政权和军队，西部的鲁巴族、东部的伊博族，各有其大区政权，长期以来三大族为夺取中央政权，展开争夺。后因东区发现石油，而成为富区，中央就要控制。1960 年 1 月伊博族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杀死联邦及北区、西区政府首脑，7 月豪萨族军官又发动反政变，最后由北方戈翁接管政权，划东区为 3 个州，伊博族最多的州，没有石油，也没出海口。显然，这是在剥夺部族权利。内战于 1967 年爆发，东区军事长官奥朱古为首成立比拉夫共和国，联邦政府向东区进攻，并切断出海通道。1969 年比拉夫军队夺得重镇奥韦里，作为临时首都，并渡过尼日尔河，但被政府军击退。1970 年 1 月，政府军攻陷奥韦里，奥朱古流亡，军队投降，内战结束。

这个以部族利益为基础的争中央统治之权，夺石油之利的内战，比较典型的说明了部分的统治者要夺整体统治者的权往往是内战的起因，而造成伊博人死亡近 200 万的大灾难（大部分是战争中产生的饥荒致死），是首先发动政变者和宣布独立者所很少考虑的。本来一国发现石油，是福，反而因争夺而成祸，福祸无常，唯人自招，可为为政者之鉴。

非洲的屠杀，还有 1994 年卢旺达几个月之内，750 万人口的国家竟有 100 万人被屠杀，200 多万人逃亡；1994—1999 年的布隆迪，人口只有 500 万，内战造成 20 万人死亡，和近百万的难民。因其杀多战少，对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的屠杀，成为它的主要特点，未列入内战。

5、波黑内战（1992—1995）一般称波黑战争。这次战争有它特殊之处：开始时是联邦国家里的一个国，全名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处于南斯拉夫联邦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与克罗地亚共和国之间，民族、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历史上相互冲突纠纷不断，面积 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436 万，其中穆斯林族 190 多万人，占总人口近 43%，信奉伊斯兰教；塞尔维亚族 130 万，占 31.4%，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族近 70

万，占 17.3%，信奉天主教；余则为其他民族与混血儿，信仰不一。而且在城市有杂居现象，界线并不分明，摩擦时有发生。三族也都拥有一定的武装，极易酿成惨剧。

1992 年，波黑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塞族反对。此时发生杀害塞族事件，穆族与克族纵火烧毁 70 多户塞族居民住宅，并枪杀尚未逃出的 15 人。南人民军介入，与穆、克武装直接交火，冲突升级。穆、克两族在反抗南统治的基础上公决独立，得到美欧各国的承认。波黑塞族也成立共和国，并抢占重要城镇，发动攻势，得到南人民军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支持。克、穆两族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支持并结成军事同盟。于是这两方战争全面展开。经过一年多激烈争夺战，塞、克、穆三族基本控制本族占多数的地区，形成三足鼎立的三族政权，战争仍然持续不断。1993 年国际社会介入调停，联合国派出荷兰等国维和部队。1995 年在普多卡利镇，塞族对穆族进行报复，荷兰维和部队成了人质，维和基地交出 5000 名难民，有 2984 人被杀，几百男人被赶进仓库，然后投掷手榴弹，悉数炸死。2 万妇女被拉走。7 月 14 日，开始杀战俘。1000 多人被射杀，其野蛮不人道表现民族仇杀的现代规模与手段，令人发指。凤凰电视台，曹景行先生曾以死亡的国度——南斯拉夫“哭泣的坟墓”为节目，以镜头详述了这次屠杀和科索沃斯雷布雷尼察屠杀阿族的惨状，使人颤栗。甚至杀到士兵们早上起来，“今天又该杀谁？”也许就是晚上睡在一起的人，达到疯狂、荒谬到顶的的程度。而在穆克联盟中，又发生争夺地盘反目成仇的激战，在其国内演出一场活“三国”。

直到 1994 年 8 月，南联盟迫于国际制裁压力与波黑塞族脱离关系，不再干预其国内部事务。1995 年 11 月，才在美国主持下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方签署和平协议，达成波黑四年的和平。接着科索沃，塞族与阿族又起战争，前已述及。

波黑内战给波黑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约 28 万人的死亡，200 余万人沦为难民（几占人口的一半），直接经济损失 800 亿美元以上。

民族、宗教纷争，从来就是个战争之源，不说同在一个国家，就是同在一个村，也不得安宁。21 世纪将面临着这个难题。从波黑战争人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是继续分裂下去，直分到每一个村呢？还是捐弃前仇，勿添新恨，使宗教、民族都平等共生呢？当政者，有影响的人物们，是送爱与和平呢，还是送恨与死亡呢？在这经济、文化如此紧密联系的时代里，应该有个理性的选择吧！

综上四种类型，百年来的 25 次战争，死亡军人是 3285 万 2558 人，伤俘是 4116 万 3464 人，平民死亡是 5871 万 8 千人，总计死亡数为 9157 万零 258 人，战争难民为 850 万人，损失财产总数仅 10 次（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即达 5.1632 万亿美元，即世界人平（以 40 亿人口计）1291 美元。即使如此庞大死亡数与财产损失数，也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有五次战争无数据（包括 2003 年开始的尚未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有些死亡数包括在伤亡数内，很难予以分开。如果把这类死亡数分出和受伤后又死亡等因素包括在内，应该说，接近 1 亿，不会夸张。[4]

影响战争损失统计的不确是原始数据的夸大与缩小问题，阅读战争史发现，对敌

方损失夸大，对己方损失缩小，对平民死亡漠视；注意军人多，注意百姓少；对胜利战功谈得多，对失败教训谈的少；讲过五关斩六将，神采飞扬，对走麦城则讳莫如深。尤其是侵略军或纪律不严明的己军对百姓的奸淫、抢掠、暴力行为，他们都想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实际是战争灾难被遗忘的部分。

本章用比较大的篇幅叙述战争，一是让和平人民认透战争的灾难性、残酷性、剥夺性、反共生性；二是从战争中认识战争的根源，从而树立和平反战观，让世界和平能保持至永远；三是揭露各种为极少数战争发动者和指挥者以各种国家利益冲突、民族不和、教派宿怨、阶级仇恨排异、灭异的非共生思想为理由欺骗、驱使和平人民走上相互屠杀的道路，为他们的权力欲、英雄欲、统治欲、霸权欲的满足去火中取栗。要让 1 亿亡灵一个个从统计表的数字中站起来，向他们控诉战争的罪恶。每一个死去的人，起码造成一家三代人的痛。作为他们的子孙，应该痛定思痛，寻找非战共生的道路。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战争根源是什么？是世间存在权利上的剥夺而非经济上的剥削的结果。殖民帝国主义是 18—20 世纪的战争主要根源，而非全部。民族利益矛盾，教派意识矛盾，各种意识形态强化这些矛盾，有野心的统治者利用这些矛盾，都会发生战争。思想根源是各种非共生思想，而不是某一单纯原因所致。同信一个上帝或者安拉自己打自己，同信一个马克思也是自己打自己，岂止异己乎？容异、存异、和异，则四海相亲；而仇异、排异、灭异，则兄弟相残，致无噍类矣！

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战争观。什么是战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定义为“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那是 170 多年前他的遗著《战争论》的一句名言，军事学界一直奉为圭臬。直到现在还有人阐释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他们只说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说明是什么政治，以及它和人类的关系。且不说这个定义与中国古代兵家：“兵者，凶器也，不可不慎”，“止戈为武”以和平为重的战争观来比较，相去甚远，更要考虑 170 多年前的西欧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强权政治，帝国政治。克氏定义等于是说，“我要不到东西就打。”再加上阶级论者把政治定义为阶级统治，化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先把自己人打清楚再说。似乎民族、部族、宗教、教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不是战争的根源，是说不过去的，从本节列举的战争实例，可以证明。

共生论者有自己的战争观，从古以来，有剥夺异己共生圈权利的现象存在就有战争，战争的表现是集体厮杀，战争的本质就是剥夺与反剥夺的争斗，只有和平人民有平等权利并可左右能发动战争的公权力执掌者的意志时，战争才能真正避免。每个国家的平等主权是国际和平的保障，每个国民的平等权利是国内和平的保障。联合国宪章一开始就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是免于战祸的基础条件。

今天，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政治的定义是否应有所创新？政治实际是“协

调、整合、平衡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维护和平秩序，管理好公众事务，促进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和平政治。国际政治则是本着联合国精神的政治，而战争恰恰是这种政治的对立物，不能用抽象的“政治”混淆是非；从而定义为：“战争是人类最野蛮的，不共生的反和平政治的集体杀戮行为”。它与强权政治——强权即公理时代的政治观是不一样的，与纯工具理性的军事理论传统定义战争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它是共生理性的产物。

作为本节战争灾难的结语，引用唐代散文家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几句话，向战争死难者致哀和让人感受战争的残酷性对生命和人性摧残的呼号：“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让人类同声相应地来反对战争吧！

第二节　意识形态灾难

人们很容易看到战争的灾难，如上节所述，却很难看到意识形态的灾难，因为人们都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生活，并视之为为正确与正义，把异于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妨碍自己愿望实现的斗争对象。其实，各种意识形态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非共生因素，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才“不识庐山真面目。”如果用共生理性对各种意识形态作一比较研究，就能滤出那些非共生因素来，并证之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就会有如梦初醒的感觉，从而自觉地理性地走出灾难，走向人类共生。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广义上，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实践理论，或者根据一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的企图。从狭义上说，意识形态有五个特点：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2、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3、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4、它不仅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担义务；5、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的领导任务。据此五个特点，就可知意识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各种国家主义，所有这些主义都是 19 和 20 世纪的产物。在这个时期，现世的信念日益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同宗教有严格的区别；宗教理论是非现世的，它诉诸灵性，强调信仰和崇拜，目的在于拯救和净化人的灵魂，而意识形态则是现世的，它诉诸团体、国家和阶级；宗教讲启示，而意识形态则讲理性。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完全抛弃了意识形态所有的贬义含义，而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5]

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开始，共产主义就以最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世界。1、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总结性的综合理论；2、它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作为共产党组织的纲领；3、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最后的

斗争；4、它吸收服务于其宗旨的信徒达到可以献出生命的忠实程度，它要求人们承担义务，甚至应为它付出一切；5、它的基本群众是工人，知识分子领袖们则是领导他们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去改造世界，符合前述意识形态的全部特点。因为信徒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抛弃任何贬义。意识形态就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代名词了。实际上如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意识形态。世界不共生就是从思想体系之间的不同开始，各自代表着不同共生圈和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的历史实践。

以剥削为“原罪”，即资产阶级成员生来就有罪为起点，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目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暴力为手段、排斥任何中间状态存在的、消灭一切异己的意识形态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下面将作叙述。这些是创信者本意呢？还是领导信徒的领袖们加了一些新的思想呢？还是东方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农民国家的历史必然呢？恐怕是都有一定的份量。

在西欧、北美没有发生意识形态灾难，起码归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物质基础；主观上则是代表工人阶级现实的、眼前的利益的工人政党、工会和团体一步步的争取选举权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以及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及其继承者社会民主党的放弃武装斗争的和平路线。

以苏、中、柬这三国为主，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程度不同所发生的灾难，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里还如同叙述战争灾难一样，用人命即死亡人数作为观察灾难的规模与程度。只叙及苏联、中国和柬埔寨。她们代表了一条主线。

二、肇始的苏联

作为马克思的后继者列宁在成功夺取了俄国政权以后，立即开始消灭阶级和公有制生产方式的推行。

1、消灭城乡资产阶级。十月革命是从首都和几个大城市首先取得胜利的，城市资产阶级悉数消灭，包括在二月革命已宣布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克伦斯基政府成员，处决人数确切数字已难找到，仅从有 200 余万文化人外逃可测知其彻底程度。政权建立后，面临的大问题是工人、士兵没有粮食吃。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对城市实行配给制；对农村实行沙皇时代的“余粮征集制”，派武装征粮队下乡征粮，见粮食就要。农民中有余粮的当然是富农这一阶级，于是消灭旧式富农的革命开始，只要属于这个阶级，生命财产悉被剥夺，并波及少粮但有粮吃的中农，结果不但富农有反抗，而且谁愿意从口中夺食呢，引起普遍不满，影响到士兵，酿成 1921 年 3 月的克琅斯塔得水兵事件。1 万多名原来十月革命的骨干力量起事，全部死于列宁、托洛茨基的镇压。究意枪杆子出不了粮食。列宁改变政策，实行农业税制：让农民自主种值、税后粮食可以买卖，鼓励勤劳致富，扭转粮食匮乏危机，并为后来工业化提供农产品，人称是苏联农业的黄金时代。但后来农业税收远远满足不了加速工业化，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和庞大国家机器的需要。斯大林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向“新经济政策”培育出来的

新式富农开刀，重新采取“余粮征集制”，尤其是对苏联粮仓乌克兰民族地区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最为严酷。除杀戮外，实施富农全阶级大迁徙，并没收富农财产作为实行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的家底。实行集体化，加强管理控制，比向个体农户征粮容易得多。1929-1933 年保卫总局公布数是逮捕富农分子 51.9 万名，还有大批有点余粮的农民带上“富农的帮凶”帽子加以镇压，把整个富农阶级的家庭 30 万户 150 万人全部赶出家园，武装押送到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部分的偏远地区，建立“富农村”，实际也是劳改营，其中饿死冻死不计其数。1942 年 8 月 14 日斯大林向英国首相丘吉尔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 1000 万人[6]，应该说，是说了点老实话。

斯大林批评文学家肖霍洛夫为农民请求放宽政策时说，粮食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和农民进行的一场无形的、殊死的斗争”，理论是“小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打击消灭的对象”。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只有工人是最先进的阶级，其它阶级不是反动，就是落后；小生产是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都应该随资本主义一起埋葬。何况是已经冒出头来的新式富农呢。

2、大饥荒，苏联建国后，发生过三次饥荒，1919-1920 年伏尔加河流域饥荒，受害面积达 17 个省，2000 万人挨饿。直饿到吃饿死人的肉的地步。在大古希那，煮十磅人肉送到消费委员会，给十个家庭充饥。萨马拉省普拉普夫两名妇女吃掉另一个妈妈和两个孩子。希祖卢克县，有母亲自己杀 8 岁的女儿，丢内脏吃肉的事。连《真理报》（俄共机关报）都披露过拘捕两名吃人肉的消息。当时各国犹太人都伸出援助的手，直接送出数百车皮的食物，美国各种基金会也提供人道主义捐助。当时苏联政府也还调剂些粮食到灾区，但饿死人迄今无完整数字。

1933-1934 年，以南方乌克兰为重灾区的全苏大饥荒是最严重的一次，正是消灭新富农、建农庄之后，农民怕成为富农，失去积极性——反正自己粮食自己不能吃。加上 1932 年歉收，苏联粮食减产 3070 万吨，乌克兰人民遭到空前的灾难。克格勒解密档案，饿死约 1000 万，最严重时段，每天死 25000 人。乌克兰独立后，建立大饥荒纪念馆，定 11 月 12 日为饥荒纪念日。据统计，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饿死 2000 万，最保守总计是 3000 万。1933 年最为严重，当时顿河农村景况是“全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老人和小孩，后来是中年人。一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此时苏联还出口了 1000 万公担粮食，当时欧州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粮食等于贱卖，只要其一半就可把南方从饥饿中拯救出来。[7]

似这等举措、政策和理论，一边从本国饥民口中夺食，一边贱卖给资本主义国家，且不说它跟共生思想多么遥远，也不说它没点人本、人道主义，就连民族、民生——“民以食为天”的影子也没有，就是用阶级分析法也找不出个道理。难道农民阶级的落后就该饿死吗？这个国家究竟在干什么？大概只能是这样的解释：为了苏联的工业化、工人国家的体面和斯大林个人的威望。可悲又可怜的是这种体面和威望是建立在

谁敢说“南方饥饿”四个字立刻要遭到警察国家的逮捕与追究的隐瞒真相的沙滩基础之上。

1946-1947 的饥荒，是二战灾难的后果加上歉收，虽不记入，但暴露集体农庄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成为始终困扰苏联的大问题，几届政府都没解决好，直至垮台。

3、大清洗：以暴力消灭敌对阶级为务的斯大林，必然地要用无产队级名义在党内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实际是非斯大林）思想倾向的政敌，以致领导十月革命一批老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幸免，甚至达到消灭 17 届选他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 3/4 的地步，下面一组数字说明这个问题：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 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被敌人杀害的 3 人，自然死亡 5 人。因斯大林自杀的 2 人，失宠的 3 人，被斯大林枪毙的 15 人，第 29 名即唯一活着的一人便是斯大林。在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 16 名成员中 4 人死在斯大林独裁之前，12 人被斯大林杀害。国内战争的 16 位前线司令员中 10 人是被斯大林杀死的。1934 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 70%（98 人）被斯大林杀害。[8]

是不是仅止于杀大人物呢？也不然，据苏联解密档案，镇压政治犯，从 1917 年-1990 年，共 82 万 7995 人，投入古拉格（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96 万 2100 人。[9]这是苏维埃国家从建立到解体前 1 年，73 年间的共产党杀共产党，苏联人关苏联人的记录。而“俄国 19 世纪 100 年沙皇统治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人，死在监狱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百名（最多几千名），[10]，岂不是小巫见大巫么？

在苏联（1921-1954.2.1），正式由法院系统判决人数，死刑 64 万 2980 人，判刑 377 万 7380 人，其中监禁劳改 236 万 9220 人，流放 76 万 5100 人，死于劳改及流放地人数不详，至于“克格勃”系统，暗杀，刑讯逼供、被逼自杀，等等死人数尚未见解密数字难以确定。以上死人数可视为在册的精确到个位数的低值。

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人民公敌”的恐怖规模是空前的。“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 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 50 万人很快就被枪决了（而被枪杀的首先是负责干部），其余犯人被判处长期监禁。1937-1938 年镇压和枪杀活动是如此猖獗，仅仅在莫斯科有时根据法院判决枪杀的，一天就有上千人。1937-1938 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内部监狱路比杨卡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数字就有 200 起之多。莫斯科火葬场整夜火化被处决犯人的尸体。”[11]

真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百年来“以俄为师”，我们半辈了向往的“工人祖国”首都所发生的事实吗？是我们“一边倒”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下公民的生活吗？是所谓伟大革命领袖所干的事吗？回想起1953年3月5日笔者正在朝鲜前线的坑道中，听到斯大林死讯，还流过热泪呢！斯大林要了无数苏联人民的命，还要了象我这样一代向往共产主义的年青人的心。这，我想，这便是意识形态的魔力所造成的梦幻吧。

而斯大林说什么呢？“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杀死 100 万人是个统计数字。”人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关于大清洗，斯大林有一套理论：（1）国家机器不是逐步消亡，而是要不断加强；（2）阶级斗争要求不断清洗；（3）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尖锐。

斯大林是通过三大步骤完成其清除异己从而巩固其极权独裁统治的：（1）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把排名在他前面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用各种不同的反对派之名一个个地从核心层整下去，取得在中央的绝对领导权。时间是列宁死后（1924-1927）四年。十三大，斯、季、加联合搞掉托洛茨基；十四大，联合布哈林搞掉季、加；十五大，联合米高扬搞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工人反对派）。十六大，搞掉右倾反对派，最后击败了布哈林。

（2）自导自演一系列政治事件，上升为刑事案件，几乎是年年有：

1928 年，针对旧专家的“沙赫特事件”，53 名被告，11 人判死刑。

1929 年，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乌克兰解放联盟”案，整肃了乌克兰学术界的高级人士。

1930 年，“劳动农民党案”，说有 10-20 万人地下组织。64 人被秘密处死。

同年 11 月，“工业党”案，有 2000 人受审，都是高级科技知识分子。

1931 年，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针对工、商、文高层，马恩学院领导人、理论家梁赞诺夫也牵涉其中。

同年，针对工程技术人员 33 人案，60-80 人被捕。

1932-33 年，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几百人被捕。

1933 年十七大，反对基洛夫的票仅 3 票，而反对斯大林的票有 270 票。使这位苏共比较宽容的政治新星在 1934 年 12 月被暗杀，实际上是追杀的。因为克格勃凶手两次被抓，又都放了。这是苏共高层最为黑暗、凶险、卑劣的一幕。为第三步大清洗创造了一个“为基洛夫复仇”——仇恨所有敌人的气氛。

（3）对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切任何异己的大清洗运动。大抓季、加、布分子，把他们三人都枪毙，又制造出季诺维也夫“总部”和“平行总部案”，扩大镇压范围及于全国各行各业，尤其是军队，所有集团军长、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都被逮捕，与季、加有牵连的将领 64 人悉数枪决。1936-1937 年，几万红军指挥员、政治委员被处决后，对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凯捷利的供词，希特勒告诉他们，“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灭了。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必需的智慧。”[12]事实上，1940 年、步兵总监进行秋季检查，集训 225 名团长没一人是军事学院毕业的，毕业于军事学校 25 名，其他 200 多名只上过少尉训练班。该年初统计，70%以上师长、团长和 60%政治委员都是任职一年左右的新人。[13]用这样一批新指挥官去抵档德国法西斯战争机器，无怪乎半年就打到莫斯科城下。

大清洗的后果是苏联 17 大到 18 大损失了 90 万共产党员和 450 万苏联人民。要不是 1953 年斯大林死去，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又不知要送多少人性命！

把一切光荣与成就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罪恶归于别人——人民公敌、暗探、间谍。制造罪恶又掩盖罪恶，“胜利者是不受遣责的”。（斯语）这大概就是斯大林的辩证法。

总计以上苏联建国 74 年，被杀的、饿死的、非正常死亡的总数，包括各加盟共和国在内应为 4179.0095 万之数，1000 万算是阶级敌人，其他的全是自己的人，这算是意识形态灾难的肇始。

三、继承的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组成了列宁式的党，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进行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积四十年革命的经验，也把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看作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提出“以俄为师”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使革命局面大为改观，促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4 年孙中山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未能实现，走上一条“武装革命救中国”的道路。蒋介石 1927 年 4 月 12 日背叛革命，迫使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成立红军，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仅江西一省，国民政府统计，人口锐减 1000 万。红军被迫长征，8.6 万人也损失 90%的本可抗日的英勇战士。八年抗日，总算国共二次合作，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共不搞苏维埃，国民党不再剿共。中国没有民主协商的传统，西安事变算是一次成功的妥协。面临着民族危亡，双方作出了让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一致抗日。但能一致到什么程度，双方是心知肚明的。国民党限共、围共政策不变。毛泽东棋高一着，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如鱼得水，在抗击敌寇战斗中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蒋介石的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守土有责，但依靠是一套官僚军事机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单纯军事力量抗日，结果损失大而收效少。不是盟国撑腰，几乎支撑不住。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全国人民翘首盼望和平民主建设祖国，台面上和平协商，实则一个“剿匪手册”早已发往部队；一个“向南防御，向北进攻”方针已定。一场世界内战史上空前规模的三年内战不可避免地降临中国大地。毛泽东以其《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力量和共产党领导农民的物质力量赢得了这场战争，成立了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祖国如旭日东升。我们的五星红旗，四个革命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象征让人民的绝大多数爱着这个祖国。但是，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把新阶段的斗争矛头重点指向资产阶级，而放松了对 2000 年专制主义对新社会的根基性影响的警惕，为尔后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的夹击与清剿提供思想前提，以为土地改革成功挖掉地主经济基础就消除了皇权专制主义，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施政大纲出来了：提出了（1）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这在夺取政权阶段的正确性已为事实所证明，但掌权后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条意识形态灾难，镇压、饥饿、恐怖一样都没有逃过。（2）“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那时除了拿枪的敌人和暗藏的特务外，谁

也不怀疑自己是人民。无奈后来“人民”范围越来越小，那些当时算是革命知识分子，也在不同阶段成为敌人，这是当时万万想不到的。（3）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这也像做梦一样。（4）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在整个毛执政时期，这根阶级斗争弦绷得是这样紧：可以说，在毛眼中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反走资派，都是在镇压资产阶级造反。历史可给毛开了个大玩笑：今天不仅欢迎世界顶级富豪来华投资，中国大款们还要到国外投资呢！（5）“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这个精神，后来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把原本不是反动阶级的人们也搞得活不下去，则为无数事实所证明，更不用说反动阶级的人了。

一个党在野的时候，它可以说到人民心坎里，什么民主呀，自由呀！反对一党专政呀，反对独裁政治呀！等等，一旦打下了江山，处于执政地位时，腔调就变了。后来人们才明白，台下、台上，不同时期，连字典都是不同的，一个民族有两部含义不同的字典。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所在。若是翻错了字典，可别怪无妄之灾降临到头上来。

走共产主义道路有两大方面，“不破不立”。破——消灭阶级；立——建立公有制。与苏联的灾难不同的是：苏共是肉体消灭为主，对内则以中上层为主，杀人是一个个案件牵连扩大，还进行所谓公开或秘密审讯。中共则是灵魂消灭为主，肉体消灭是为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就是死了还要带着“原罪”的愧疚，使子孙后代不再敢想当财产私有者。实行“统上不统下”的统战政策，留几个阶级代表人物装门面或做反面教员。对敌对阶级按人口比例实施镇压，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对政治敌人不经审判，直接交革命群众实施斗争和专政，这样省事多了。其他方面则基本相同。

（1）镇反、肃反；前者是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后者乃对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前者因与剿匪反霸是结合的，受戮人数最多说是 500 万，最少一说是 240 万。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会上报告的是，从 1948 年到 1955 年镇压了 400 万人。后者肃反因有案可查，镇压 21300 人，4300 人自杀、失踪。劳改 81000 人，715000 人打成反革命。其后甄别平反，错斗 94%，应斗为 6%。就是说肃清一个反革命，16 个人陪斗。肃反的序幕是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死 72 人，逮捕 500 人。这是从文艺争论上纲为政治问题的开始。毛一锤定音，说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全部平反。

镇反特点是先定人口中该杀的比例，大张旗鼓、配合抗美援朝，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杀人权限下放、定性由干部掌握等等。事实上，当时，暗藏反革命也确实猖狂，时有杀人事件发生（河北死 288 人，冀鲁豫死 55 人）。川西、湘西土匪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甚至县长被砍死。广东有兵变 3500 人。镇反对这些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已经建立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大城市，只按其破坏的可能性，根据已交待的历史罪过而杀戮，不按当时的法——“惩治反革命条例”逐一审讯，而成批抓捕枪决，造

成错杀、滥杀，几十年后还得平反，得不一定偿失。

据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中央曾专门讨论杀人比例，应按人口 1‰比例，先杀一半。当时上海已捕 2 万，只杀 200，毛认为应增加 100，半年应杀 1500。“南京是敌首都，50 万应杀似不止 200 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北京市创造市区两级扩大会议决议杀数的把法院的职责交给代表会的经验。罗瑞卿提出除已杀 257 人，在杀 150 人外，再杀 1500 人。毛大加赞赏，说道“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场透雨还痛快。”到 1951 年 5 月，华东局杀 108400 人，占人口 0.78‰；中南杀 20 万，距 1.5‰人口只差 5 万人；广西一位组织部长一个人批杀 226 人，甚至杀到家属不敢戴孝，村民不敢收尸下葬，不许反革命亲属啼哭的程度。

镇反死亡总数是 71.2 万，占当时 5 亿人口的 1.424‰。关 120 万，管 120 万，教育释放 38 万。

如果按历史学观点看 1950-1954 期间，被反革命杀害的人民数亦应详加统计，否则有失公允。死的都是中国人，也是人类的生命，而且更加无辜。这个灾难只当是内战的延续，下面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它们是在有立法根据下发生的。

（2）土地改革：解放前，我国是个承袭两千年小农经济（生产力）、租佃经济（生产关系）的国家。当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生产力）雇佣经济（生产关系）出现以后，小农经济便会瓦解。一方面失地农民向工业转移，成为工人；一方面土地集中于资本，向大农业发展。这是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仍停留在租佃经济阶段，不合世界发展趋势，是 80%以上农民只有 20%的耕地，10%的地主占有 70%的耕地，使农民终岁劳作而不得温饱。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合乎情理的。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真正实现是 50 年代两岸的土地改革。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总结其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没有农民的拥护。由陈诚主持的土改，是以政府为中介，执行“农民得地，地主得利”政策，设立土地银行，以债券形式征收土地，使地主向工商业转移；对农民则发放贷款，10 年分 20 期从得地后收益中逐步偿还。政府做了地主与农民的中间商，用经济方法不使冲突发生。结果农民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地主们则投资工商业得更大的利。这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农业基础，也使台湾当局得到农民的认同。

大陆的土改，尤其是新区的土改，本可依“土地改革法”平稳地不破坏生产力和死人去进行。这种精神毛泽东也曾讲过，例如他在 1948 年 5 月 25 日，对党内的指示，“……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到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到生活有出路、有保障。”[14] 又说过，“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除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15]

建国后的土改，于 1950 年在新区展开，先是按 1950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6 月 30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有领导、有组织、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土改开始时的 1950 年还是依法土改，当时口号是“土地回老家、合理

又合法”。但在1950年12月，毛在内部作出“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后，使原来依法土改变为暴力土改，原来土改工作队的工作推倒重来。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70年》阐明其要义:“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该书第284页）也就是说，在自己有了政权，有了法，不依法办事，反而回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发动群众的道路；以此树立专政权威，在斗争中形成农村革命骨干队伍。当时，提出反霸即反地主当权派斗争，县、区、乡、村都有霸，发动群众的口号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挖浮财，分果实”，极有效地鼓动起人们的仇恨与贪婪的心理。无论是开明，守法，大、中、小地主一起抓来斗。本村斗不起来，找外乡、外村的来斗，骨干多是些“勇敢分子”，于是挖地三尺，扫地出门，逼浮财，采取各种酷刑：如吊磨盘、踩扛子、割耳朵等，除地主外，还出现“中农恶霸”、“贫农恶霸”等罪名，以致打死人，自杀、夫妻双双自杀事情时有所闻。这些是当时土改工作队成员之一，除土改复查外全程参与土改的何之光在56年之后于2006年《炎黄春秋》第8期以《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为题，揭露出来的历史真相。而这只是湖南一个县的情况，因为这是毛的指示，就必然带全局性。

究竟土地改革死了多少人，从各种资料看，最多的说是1010万，大概是包括了土地革命，老区土改，新区土改三个阶段的总数。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数字是1-200万人，中间说法是450万，其中新区反和平土改为300万。正确统计方法应该是除去地主中伪官吏、军警宪特等反革命，纯以土改过左而死去的人，死人数才不致相互重叠、混淆。这些人多半是在改革后平反的。

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到的土地，那张土地证，到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就被部分剥夺了公平买卖的收益权，到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又交给了集体，实则交了公。用农民的话说，“锄头把还没有攥热。”那个曾以老区子弟兵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土地证，还是没有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从此掌握在实行公有制的中共及其基层干部的手上。中国经济与社会形成非常规的二元结构。国家自1953到1976年，从农民那里取得7000亿元的剩余甚至必要劳动价值。1978年中国固定资产才9000亿元，是得而复失土地的农民，失的多，得的少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自己，哪有那么多的圈地、买地大发其财的中外大款呢？土改时，农民组织就等于政权，后来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又在哪里呢？这是后话。

（3）三反五反运动：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打击不法资本家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目的五反运动。合称三反五反，是1951年到1953年10月进行的。枪毙党地委级干部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和上海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汪康年开始了这次运动。三反主要是打老虎（贪污犯），五反则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采取抓批斗逼的办法。逮捕323100人，自杀2300人。上海主要领导人早起要问:“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跳楼自杀者）当时上海工商企业为16万户，列为“五毒户”比例高达85%，资本家

在打虎队员面前经常是全身发抖。这次运动为1956年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作了铺垫，老板们胆战心惊，后就主动敲锣打鼓，实行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政策，成为社会主义足以自夸一段佳话。岂知一些工商业者，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甚至发生上海陆立中学女学生资产阶级小姐用剪刀割断喉管自杀身亡之事。1956年1月2日，上海106000多工商业户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定股定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交了公，那顶帽子则不是能随着自食其力进入社会主义而去的。现在解密档案发现当时国家副主席李济琛致毛主席的信，有言："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4）反右派斗争。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历史事实，并归之为"个人迷信"，让这位享有崇高荣誉的工人领袖、导师一下落到尘埃，象刑事犯一样地受到遣责和批判。它对意识形态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判断一个学说的对错，是以其历史实践后果去观察的；而对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人也不是看他宣扬的是什么，而是直观地看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而理论上解释为"个人迷信"也是不彻底的，没有从能造成个人迷信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源上找原因，把灾难说成是制造崇拜和你们要崇拜两方面原因，似乎人民还要负更多的责任的政治历史现象。虽然只是归咎为个人崇拜，也为另外的领袖所不容。中共八大召开，也响应了这种反对个人崇拜国际声浪。强调执政阶段，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八大宣布结束急风暴雨式的阶段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这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现在看是反对民族压迫和专政政治的民族民主运动。而当赫鲁晓夫问计于中国时，中国的主张是——武装镇压。当然，毛对国内动态，保持着高度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上便是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背景。

再从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看，旧社会500万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受过儒学或资产阶级教育，但他们从事的职业生活是不依靠剥削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而存在的，其中已投向共产党，拥护解放后政策占了大多数，有的还入了党，成为掌了权的干部。这些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五四"精神，即"科学与民主"和"鲁迅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人。他们参加革命是从通过理性和新旧社会不同的比较中选择走革命道路的。他们不仅有抗日反蒋的爱国热情，而且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当1957年党号召整风，要他们给党提出意见改进工作的时候，自然会毫无顾忌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还有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金口玉言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清白与忠诚，却万想不到口出天宪的巨人，搞了一个"阳谋"。正以看"斐多菲俱乐部"分子，要在中国搞匈牙利事件的眼光看着自己，已经布下个天罗地网等着你呢。对于你们这些躲在洞里的"蛇"，和能吃人的"鲨鱼"，不用"言者无罪"——民主的锈饵又如何

让你们“出洞”和“浮出水面”呢。更有趣的是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和蒋介石打交道的、以后反蒋和共产党风雨同舟的、牺牲过李公朴、闻一多这样的民主党派并参加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者们，竟也讲出了他们的逆耳之言。那个服膺民主的储安平敢于跟“老和尚”提锥心的“党天下”的意见，他们还以为此时是罗隆基可以骂蒋介石资产阶级专政蒋独裁的世界。于是，毛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说话了!”“这是为什么”。一批文章出来，本是一场和风细雨的大大小小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骤变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战场，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对于左派积极分子，要求先“硬着头皮顶住”，象战场上任敌人炮火打，不到敌人阵前出现不开火一样，一场政治战线的阶级斗争猛烈地开始了。反右中，“保护积极分子”，使一些原属整风对象，不仅得不到整改，而且变本加厉狠整提意见的人，也造成反对党员、支部、党委个别成员就是反党，把党与党员的概念给混淆了。这里错划了很多人。

看过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国务会议讲话原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竟然完全换了口气，多了个宪法之外六条言论标准，即（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16]这就是后来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初蓝本，只不过少了民主集中制和国际团结两条。这六条标准就成了中国人民言论的香花毒草的界限，同时内定为反右具体的划分标准。反右后来“改正”，反错了，证明这些人也并没有违反这些标准，而是开创以言论定罪的恶劣先例。其牵涉人数之多，领域之广，是世界言论文字狱史之最。尚幸比苏联大清洗不同，留了项上的人头，但要求改造脑筋，即绝对服从毛泽东，否则就不是人民。

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呢？原来一直是按中央口径——55 万，即毛惯常用的 5%（每次运动都说只整 5%）。刘（少奇）增到单位 3%-5%，邓（小平）再扩大——“有些文教单位可超过 7%，知识分子闹事，有多少抓多少。”这就是划右派分配指标的来由。现在解密档案：1958 年 5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数字为：右派集团 22071 个，右派分子 317.8932 万人，右倾集团 17433 个，中右分子 143.7562 万人。计右派党员 27.8932 万人，高校右派学生 20745 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 4117 人。[17]在漫长的 22 年改造过程中文弱书生，死于劳教、监管、农场、林场、石场、矿区、工地是多少，无法统计。有一本重庆南开中学 46 级同学会资助自印，郭维敬、梁惠全编著的、李锐先生以“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为题作序的《叶落萧萧，江流滚滚——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书，记录着 48 位右派分子亲身经历，可能对当时真相有所了解。右派改造期间、种种苦难，莫可名状。体罚酷刑、挨冻受饿、超体力劳动，不如牛马；人格受辱，一似

奴隶，叫人死去活来，求生不得，而折磨至死者，惨不卒读。信阳事件，尤为集中展现。其中一个县（河南省平舆县）死亡数与划右人数比例是 17.7%。全县划右人数为729 人，占全县公职人数的 18%；教师划右数占教师总数 18%；教师划右数占县右派总数 55%；全县右派改正前死亡 129 人。[18]全国又死多少呢？

从中央到县三级，天高皇帝并不远，划右从 7%到 18%，可不是个零头，而是成倍。

这是从数量上看，从划右的质量上看，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联盟。”章伯钧应是右派领军人物，但现在他女儿章诒和出了一本《往事并不如烟》的书，揭露“联盟”纯属莫须有。连头号右派都是个冤案，有人到死还坚持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不愿承认错误。至于各地为完成划右分配指标而随意找右派，拉右派，改正时档案并无右派材料和批件等等，故事之多，可以新编一部“笑林广记”，绝对让人捧腹。试举一例，某小组 20 余人开会，平时都是同事好友。现在要查出谁有右派言论，面面相觑，无人发言。冷场很久，忽一人自觉无事，内急如厕。出门后会场有人提示，这样严肃的斗争，他缘何离席？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把鸡毛蒜皮之事，说了一些。该君归来落座，帽子已带上矣。与会者，我之友廖君，系工程师，从此以后，大会小会，不敢如厕。似此等笑话，该有多少辛酸和余悸！

右派即使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改造好了，批准摘帽，仍然有臭名：“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随时可以戴上。”运动再来，还是要算老账。

右派改造待遇，最不能忍受者，是其地位在刑事犯之下。用刑事犯管右派，理由是刑事犯——人民内部矛盾，刑满即为人民；右派——政治上的敌人，是最危险的，得严加防范。刑事犯有刑期，右派则不判不审、遥遥无期，直到老皇驾崩，开了新政，得以重见天日。

中国语言丰富，对右派不叫平反，或者是顾虑平反要索赔，或者是留个尾巴——反右正确论，创造“改正”这个术语，语意含糊而双关，是当局改正了它的错呢？还是右派改正了自己的错呢？可以作为扩大化的收场，即改正了扩大化。有人讽刺说，当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不是也可以把给予犹太人的灾难称为“扩大化”了呢？

根据历史史实，和反右给中国带来的后果而言，是否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反民主、反科学、丢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把民主与科学还给西方资产阶级的，给中国反剥夺反特权民主革命以巨大创伤的运动呢？意识形态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些传统观念的活载体不就是这批有点现代公民意识和科学知识的右派么？

与反右派紧密联系的是反右倾，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一位“为人民鼓且呼”，那位曾夸为“横刀立马，有我彭大将军”，功勋卓著、生性耿直的彭德怀元帅，对大跃进失误，上了万言书，龙颜不悦，沉下了脸，风云突变，以何患无词的方式，在群臣跟风的氛围中被打成反党俱乐部并里通外国。以此为契机，开展一次完全针对党内同志的

反右倾斗争，凡有不同意“三面红旗”，有说“饿死了人”的，都打成右倾分子。

到 1962 年，饿死 2000 万人以上已成铁案，从不下罪已诏的人也承担了责任（七千人大会上），于是，在刘邓主持下右倾帽子一风吹，计平反干部 600 万人。1962 年 5 月上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 40 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 1000 万人，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够不上“干部”的打成“坏分子”的命运如何！尚存疑案，大概多为不了了之，留到文革算账。右派沾了点光，摘了一批帽子。这次是平小不平大，右倾头子们彭、张、黄、周不得平反，留作反面教员。究竟小右倾们对党还是有功的，事情还得他们来做，党内同志嘛！而改造了 4 年的右派们，服刑期相当于一个抢劫犯，还是没有改造好，继续改造吧，只是庆幸开始不再饿着肚子干活了。

反右倾也是死了人的，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数得上姓名的就有不少，判死刑的极为个别，而大部分右倾分子死的人，主要在文革时算老账上，被群众打死、逼死。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含义是和“革命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了界限。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纯洁了，实际是完成了包括对党内讲真话的干部群众的封口工作。从此“宁左勿右”，“宁捧勿犯”，许多已经不是政治观点问题，而是承不承认实际发生的事实的问题。一些党内同志凭着对人民苦难的直观印象和起码的做人良心开了口。他们以为与右派们出身不好，受的教育有所不同，因此说点实际情况，即使这样也受批判。这次运动，在反右派基础上雪上又加霜，包括党内的中国知识阶层，彻底地被击垮了。

（5）大饥馑：1958 年由毛发动的“大办钢铁，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全国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前进。次年即 1959 年到 1961 年间，中国即出现连续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农村成批饿死人，甚至城市的人吃大麦粉、杂粮，小吃几乎不见影，发生大街夺食现象。这三年饿死人数（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从以下资料可见其梗概。最高位数是 1980 年高级党校 29 个省委书记读书班的估算是 5-6000 万。最低位数是 1981 年 6 月在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内部数字——1697 万（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提供）。一般说法是 3000 万，原因是《中国统计年鉴》公布过 60 年比 59 年人口减少 1000 万，统计是上年 7 月到次年 6 月，三年就 3000 万。但另有一组数字，也有一定依据，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 2000 年第 3 期著文称，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000 万。有材料证明李井泉主政的四川饿死 1250 万据《廖伯康回忆录》。如果此数成立，全国 4000 万以上就不假。金辉在《社会》杂志 1993 年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文中指出低限值也在 4000 万之巨，可作参考，证明了 3000 万之说只少不多。笔者态度是别人死了，你说他还活着，别人活着，你说他死了，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如果有证据更为充足的数字，则抱修正错误的态度。（2007 年 11 月 16 日，解密档案：1959—1962 四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3754.8

万人——笔者补注）

三千七百多万人的死亡，多大的民族灾难！如何对待，是嫁祸于天，文过饰非；还是实事求是，承认错误？百度网：作者史海泛舟有一篇文章《揭开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迷雾》中，依据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纪录，全面查出历年的旱涝灾害和干燥度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年的旱情基本属于局部性。1959 年五省两个地区旱情较重，但时间短。1960 年 8 省 4 地区遭旱，干燥度大于 1959 年，干旱范围比 1959 年略大，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1961 年十个省雨量偏少，但灾情轻。再从 1895 年-1979 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 1959-1961 三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从旱灾严重程度看，1972、1978 年旱情是 1949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但未发生饥馑断粮现象。所以，该文作者得出结论是：“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接着他问，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他考察了 1960 年 5 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字样，是宣传机构为了开脱当政者的罪责，编造出的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为天灾。1960 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升平景象的口吻，说是“过去的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此以后，被灌输了的概念——“三年自然灾害”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语言，掩盖着三年惨痛的历史和 3000 多万饿殍的冤屈。

造成这次大饥馑的原因，它是错误思想指导下实施错误政策的结果，①在 1957 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党魁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 15 年超美国，毛泽东就提出 15 年超英国。于是 1958 年的钢产量要一年翻翻，达到 1070 万吨，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开始了大办钢铁——大跃进。毛相信人海战术可以赢得战争，同样可以用于工业，农业及经济文化领域。把 9000 万青壮劳力全集中到遍布中华大地的小高炉上，砍森林、砸饭锅、全供炼铁。一乡一县，频传捷报，炼的都是一堆废铁砣子，把好端端的丰收年景的谷麦不收，要去超英、赶美。这就是在彭德怀诗句中“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当时景况。可谓劳民、伤财、浪费、破坏生态四受其害。如此完全没有科学常识的蠢事，炼钢炼铁需要的温度，人人可知。却无人开口说不对，其源在反民主、反科学，谁敢吭一声？接着大放增产卫星，你说亩产 53000 斤（湖北），我说 108000 斤（安徽），一直放到 13 万斤（广西）。居然上面听信，还担心粮仓太少，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大办食堂，小锅小灶一概掀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吃饭不要钱，似乎伟大的 1958 年，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人间奇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大写诗歌，豪情壮志，气薄云天，这便是中国热气腾腾的年代。整个民族全是诗人，无穷的浪漫。实际是高征购：大交公粮，那队伍也真是壮观，只是生产队仓库已经所剩无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无偿挑谷。作者当时是身历其境，挑到山沟深处都无谷可挑。那些放卫星的地方，就是日后死人的地方。毛在 1958 年 8 月 19 日对省委书记们说：“全国东西调不上来要强迫命令，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下面就开“逼粮会”——捆打吊。共产风是谁刮的？可怜那些留点口粮的小队长们，莫不打成瞒产私分，右倾思想，受罪遭难。怎叫1959年不挨饿？②长期实行的统购统销，割断了城乡关系，每人定量分配，没有流通交换，粮食全由国家管着，致人无可籴之米，家无隔宿之粮，借无处借，讨无处讨，要饿一起饿，要死一块儿死。③严格的户口制度，让你不得离村一步，何况民兵把守，谁敢逃荒？逃荒岂不丢太爷们的颜面，更大了说，岂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到处抓盲流，查黑户，你能跑出如来掌心？④与苏联大饥荒时国家出口大批粮食相类似的一着：要原子弹、导弹，不要活命的粮食。1959年出口415万吨粮食，即当年6月全国粮食储备343亿斤的121%，换取黄金和美元购买核子武器设备与技术。若不出口这些粮食，用于救灾，也不会发生大饥馑。⑤人命服从政治，庐山会议本拟反左，但不顾老百姓的命，反“军事俱乐部”要紧，中断了本可亡羊补牢的进程，使一年延长至三年，凡此种种，交互作用，构成中国人民的厄运。

（6）四清运动，正规的名字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社会主义有阶级存在，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还要复辟。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的右倾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修正主义。”他说：“如果我们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实际上，毛此时对在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恢复国民经济元气的各项措施中的单干，“三自一包”是很反感的。他说，“两极分化，不出一年，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在1963年5月关于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要好好准备，先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队伍，再就是生产队干部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运动开始，陈伯达的“小站蹲点”所见：现在底下干部，90%是些小国民党，矛头直指那些犯有或多或少的四不清的干部。毛也说，现在全国有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秘密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刘少奇后十条重在整下面的地富反坏右及对体制不满的人，并提出“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1965年，毛的23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决内部矛盾发展到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以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为主。刘少奇已经成为毛的主要革命对象，但他还沿袭着过去土改，反右、反右倾的从上到下的老办法对待“四清”，搞一些过左行为，如京郊发生自杀60余起的事例，毛批判刘“形左实右”。既然“四清”解决不了毛心目中的大问题——完成政治上对资产阶级全面剿灭，障碍全在刘掌握的党政系统，于是“四清”向文化大革命发展乃是必然。中国人民的十年浩劫就这样开始了。

（7）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日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中国文革领导小组垮台为止，是十年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

动的，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它以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指挥下的党政系统和清算建国以来17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政治目的，以林彪控制下的武装力量为后盾，以陈伯达、江青为文攻助手，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以直接发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实施暴烈行动为手段，以宗教式的狂热，对领袖神的崇拜的精神支撑的，对传统观念即私有制社会的思想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和斗争的全面的造反运动。《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军民至高无上的宪章，最高指示即现行法律，全国人民以是否忠于毛主席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公安六条”则成为专政的刑法依据。

也许毛认为这场革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贡献，他坚决地执行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如今是他在占世界人口 1/4 的大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苏联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只有中国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于是他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件是发动了针对中国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试验。他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不使共产主义失败。但他对后者信心并不足，尤其是连林彪也要背叛他，对他打击最大。无奈起用保证永不翻案的明知是“棉里藏针”的邓小平来帮他收拾全国无政府主义的残局，但“四五”天安门事件一发生，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把邓小平当靶子斗。毛的反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大的，甚至决定重上井冈山，至死不变。他可以对尼赫鲁说：“全世界死一半（10 亿），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有什么不好？”对于几千万中国人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就是这样的毛泽东思想背景下的革命，它的复杂曲折过程，残酷惨烈的程度，所带来的后果，那些虎口余生的人们，已经在各个个案方面，各领域的影响方面，写出了许多专著和回忆录，进行了反思、沉思和痛思。本书更无法尽述，只得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灾难的主要方面，叙述如下：

①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劳改、关牛棚及株连人数：迄今为止，可信的数字公示是1978 年 12 月 13 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的 2000 万人。其他各种渠道展现的数字为：最高位数，包括多派群众组织武斗死亡，杀戮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判刑、私刑、折磨致死，自杀身亡等为 773 万人。最低位数为 1728000 人，其中执行死判为 135000 人，武斗死亡 237000 人，劳改 420 万人，关牛棚（即群众专政，非法院判刑的改造）更倍其数，受到株连批斗超过 1 亿人。这是旷古未有的民族大灾难。

②文革的恶劣后果：文革对经济、政治、文化、心理、道德的破坏，几乎是全面的。

A、经济损失：据有关部门估算，经济上损失国民收入 5000 亿元，加浪费 8000 亿元，共 13000 亿元。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近 30 年，全部基建投资为 6500 亿元，固定资产就是 5000 亿元。就是说，不搞文化大革命，要多 2.6 倍的固定资产。若当时以 10 亿人口计算，则平均每人损失 1300 元。这对中国当时只几角甚至是几分

钱一个工分的农民来说，是何等珍贵而可怕的数字。

文革中政策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基层执行的是“左派造反，右派生产”。左派战斗队白天打派仗，晚上还要斗、打走资派。生产组织系统全部搞乱，批“唯生产力论”，谁敢促生产？斗走资派、公审判刑，动辄召开万人大会，时间全浪费在革命中。造成一种气氛：脱产闹革命光荣。勤恳工作的批为，“只拉车、不看路”，谁能安心、老实干活呢？

B、革文化命：运动初期，是红卫兵“破四旧”，抄牛鬼蛇神的家，可惜许多文物、字画、古玩、典籍、书稿，悉数烧毁。其中抄家者私藏财物，趁火打劫者，亦复不少。大的方面，毁名胜、破古迹、捣寺院、烧神龛，比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曾从上到下实施毁寺灭佛）尤有过之。在反封、资、修的旗帜下，对中华文化实行了一次空前的大破坏，大扫荡。

对于著名的文化人，则横施暴虐、批斗、捆绑毒打，谩骂侮辱，逼人上吊、投河、服药、自杀，有“名人自杀档案”一文，列举了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就有 29 人，其中有老舍、赞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刘授松夫妇、邓拓、罗广斌、杨朔、吴晗、范长江、言慧珠，上官云珠、严凤英等著名人物。这样的文革，完全是在革文化的命，让中国倒退到野蛮时代。

C、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一定有着正常的社会管理、生产生活的秩序。在文革中，几乎是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行动。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红卫兵小将充当了这个革命的先锋，在新的司令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采取大民主方式——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批判、大串连、大批斗，组织各种战斗队，以捍卫毛的革命路线之名，揪斗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停课闹革命”。不仅原来的阶级敌人成为算老账的靶子，扫四旧把他们抄家，带高帽游街示众；而且把新的阶级敌人——几乎是全部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揪出来斗他们执行修正主义黑线的罪行。文革成了革过去革别人命的人的命。群众完全是不理解的，于是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还按十七年的常规，懂得些“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而造反派则是按 40 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办法在革命，只要是造反就有理。其中“勇敢分子”是不少的，然而他们主观上认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老革命派和新革命派相互革起命来。导致到处打派仗，“全面内战”，动用各种武器，相互射击，只是没有形成肉搏战，而是街垒战。各据大楼据点，可怜无辜行人，死伤亦复不少。把好端端的基本群众的团结，也给分裂了。于是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把造反组织中“不纯分子”清理出来，又是一大批挨斗受罪。

1967 年一月风暴，上海工人夺了市委的权，王洪文也就成了新革命派的红人。整个九大是造反派的党代会，把八大全给否定了。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写入党章的毛的接班人。一个新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实际上红白黑，五颜六色俱全。只是林彪势力迅速膨胀，威胁到毛政权，又来抑制林彪。1971 年 9・13 事件后，又来反林彪系统，十次党代会加强了四人帮的势力，提拔王洪文为副主席，其实他只是一个象陈永贵为农民的招牌一样的代表工人的幌子。得毛的革命真经的是张春桥，他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是这种思想引申出来的。毛的去世和四人帮垮台结束了这条道路，十一大清算了四人帮体系。十年中开三次党代表大会，每次都标示着一个帮派的垮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历史回到八大原点，再把凡是派即继续按毛的指示办事的华国绛，汪东兴一派挤下台，邓小平执政地位才算确立，中国走进改革开放新时期。

文革十年随着上面政局的千变万化，底下的群众就在不断“翻烧饼”政治气候中过日子。经常站错队、说错话受到追究，甚至有的丢了性命还不知错在哪里，罪来自何方，思想上，心理上全是一片混乱，个个认为是上当受骗。最后是一种鄙视、厌恶、漠视政治的倾向大增，积极性再也无法被政治宣传调动起来了。逍遥派成为最大赢家，不说、不想、不管是安身立命之道。

D、对教育的打击：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全赖发展教育事业。由于批判建国后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盘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鼓动学生造老师的反，鄙之为臭老九，一钱不值。整个社会处于无教养的状态，“知识越多越反动”，以无知、老粗为光荣，意识形态中只有体力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智力劳动的价值被忽视甚至抹杀。中国传统文化师道尊严，薪火相传都被打翻在地，还谈什么教育？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便什么也不用学了。在教育战线上要无产阶级占领阵地，于是废除高考，选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中小学生全来“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十年间，整整一代人没有受到正常的文化教育，坑了一代人，迨及他们做父母时，也就无法教育下一代。文革整了老一代，坑了中一代，害了下一代，许多老干部（走资派）高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家庭许多孩子没有读到书，可能是他们心中之痛，谁实为之？文革祸及三代，决非虚言。文革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只知造反，不知生产”的青年，工作岗位廖廖无几，不上山下乡又往何处安置。于是一条“金光大道”等待着他们，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完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国外在向智能时代前进，我们向“面朝黄土背朝天”后退，名之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炼那一颗革命的红心向阳开。当时“不学 ABC，也一样干革命”，交白卷的竟可以称为英雄，会读书的叫“五分加绵羊”，批“母爱教育”，“人性教育”，不就证明这只是个“仇恨教育”、“狼的教育”的时期么？

E、对人性、道德的摧残。我们从 A 项所述仅为死人数量上的叙述，只说灾难的规模和广度，每个人的死都有一本血泪家史。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其凶恶、残忍、冷酷

的程度，恐怕也是空前的。巴金不明白，人为什么一夜变成了野兽，大概是巴金心地太善良，道德情操更高些的原故。笔者漂学了点犯罪学，倒是明白一点点，人性是在天使与野兽之间，所以宗教要让天使们，善良的人们灵魂上天堂；野兽们灵魂入地狱。一种仇恨教育可以煽动人的犯罪心理，加上“造反有理”，过火行动受到鼓励。革命小将开始比赛着谁更能出新招，以虐待别人为快乐，甚至产生杀人狂，虐待狂的变态心理，以凌辱伤害弱者心身为乐趣，听呻吟、哭泣、嚎啕象音乐，何况虐杀的是敌人，还能得到“革命小将”的光环呢！为什么在他们施虐以后会围在动弹不得的将死的人身旁狂笑呢？他们的得意不亚于杀鸡杀猪时，“终于制服了你的挣扎”的快感。然后还能在伙伴们中间夸耀自己如何与众不同，归功自己有独到之才、新奇之举。这是善良的、理性的心所体会不到的。如果不是这造反的氛围，杀人不偿命的社会秩序，而在学校教室念书，学知识；或是在教堂作弥撒，作忏悔，一夜又怎么会变成野兽呢？

震惊一时的湖南道县杀五类分子和家属包括汉奸、士兵、保甲长、投机倒把、有劣迹者等 24 种人的惨案是怎样发生的呢？成立革命组织时就没有个章法，保皇与造反全凭自发建立，任何组织都可能有些问题的人进入，一旦有敌人或其子女，就成为借口来杀人。谣言满天飞，道县就是以“地富要暴动”的煽动杀起来的，又得到人武部、民兵的支持。

于是一场剿灭反动阶级家庭成员的惨案发生了。1967 年 8 月 13 日-10 月 17 日，66 天 10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杀 4519 人，自杀 326 人，有的大队是一夜杀尽，年龄最大 78 岁，最小的 18 天，杀得河里浮尸不断，村中更无啜泣之声。后来查明惨案杀人者 14000 多人。该县属零陵地区，该地区非正常死亡 9093 人（被杀 7696 人，被逼自杀 1397 人）。按阶级成份为四类分子 3576，四类子女 4057，贫下中农 1049，其他 411 人，未成年 826 人。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历时两年多广西对 4·22 造反组织的群众和五类及其家属的大屠杀。其间还发生吃人惨剧。

经过有心人（《古井》作者）通过文革后广西建立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系统，直接看到凶手们口供档案，采取现场查访，与凶手们面谈，走访受害人亲友等方法了解到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和吴若愚写的“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所揭露的广西支左部队，区、地、县人武部会同联指（革命群众组织）对 4·22 造反派和五类份子及家属的屠杀，远远超过道县。全区共杀 10 万多人之众，1968 年 7 至 8 月一个月，全区共杀害 84000 多人。残忍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仅举其中五则，足以使人心灵震颤，手足发凉，难以卒读。

a、“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枪杀有之，成批敲死到处有之，成批爆破致死者有之，成批戳死者有之，成批掷下矿井者有之，成批丢下山洞者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者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b、“1968 年 4 月 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两大队分四批杀 24 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公社被杀 180 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九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 17 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割乳房，……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收取改嫁费。”

c、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杀孩子斩草除根，杀男不杀女，吃奶的孩子不放过。桂北融安县有条寡妇街，男人男孩全杀光，妇女的成份好，也保不住自己的孩子，留一个也不行。

另一处坑杀 20 余人，其中一地主，他请保留一孩子留给贫农成份的妈，遭拒绝，他一手抱一孩跳入坑洞中。

还有一处，丈夫儿子被杀，改嫁一人，到 80 年平反时知是杀他前夫凶手，竟杀死其后夫二子，让他也断根，旋即疯癫了。

d、钟山县某村打一矿区 4·22 派，死一人，俘获 3 人，要用其中工程师（国际上有名的矿业专家，其妻为全国人大代表）两人生祭，罪名是帮 4·22 派设计工事，工资高达 100 元。一声枪响，几位姑娘冲上前，马刀起处，双头落入墓坑，然后放上该村牺牲者棺木安葬。该县鼓励女子杀人，杀几人称几姐，有至九姐、十姐的。

e、有心的作者亲访 86 岁的杀人取肝的易晚生，这位曾在游击队时，杀过敌人吃过肝的老战士豪情满怀地讲述他如何在文革中杀地主幺儿子（父兄当土匪，已在土改时镇压了）的情形。这个当时还小的无人养的孩子到邻村做儿，劳动生产，如今已是个 18 岁健壮青年。本村无人可杀，想到他，捉他时不肯回村，便用猪笼装上，抬回村绑在树上毒打，不解恨，用烙铁烙，昏死过去，拖到河边一块岩石上，四人压住手脚。易晚生说：“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舀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村里人拿回去吃了。我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个老头叙述时泰然无事。（作者慨叹：他是革命前辈呢？还是残暴凶手呢？这是不是一种革命心理呢？）文革中老人所在县——武宣县，至少吃掉 200 人。

广西 1980 年后，对这些冤死的鬼魂进行了平反，凶手们以开除出党顶杀人罪。而在杀时，以 3.6-5 元杀一个人的奖励，杀了许多人。当然，文革中杀人入党的很多，甚至当上县以上干部的。还有把人头当兰球投篮的也入党。那些受到处分，判刑的凶手们还觉冤枉呢！——“号召指挥杀人的区委们，支左部队，县乡人武部门的官被提拔，要我们顶罪？”

写到这里，可能达到摧残人性的顶点了吧？至于文革期间，通过检举、揭发、划清界限，造谣、诬蔑、陷害造成冤假错案，被害者入地狱，害人者上天堂，流氓无赖整正派有良心的人，比比皆是，把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尊老爱幼、尊师信友，人伦道德全给从心灵上摧毁，其破坏性还有什么能比的吗？

要反思文革的历史，接受文革的历史教训，应该是全民族的事。只有真正接受历史教训的民族，从公民，学术界，理论界，政法界，各个不同层次上都来进行，象德国民族对待自己法西斯罪行一样，深刻反省，向被害的犹太人认罪，建博物馆，支援犹太人建设新家园，才能使民族在道德上得救与复兴。

F、对思想的禁锢。文革时期，极力神化毛泽东，意识形态本来还有理性成分，被林彪“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去理解”等等，不断强化为毛就是真理的化身，救苦救难的大救星。对意识形态进行宗教化，并赋予仪式化形式：人人带语录，学语录，讲话之前背语录，早请示念经，晚汇报念经，饭前念经等，表示对神的虔诚。整个中国象欧州中世的教会统治，对异端异见完全不能宽恕、容忍，施以火刑。把所有理性成分消融于宗教虔诚与狂热之中。迷信个人达到教徒信神的程度，是非定于一尊，生死决于一言。让人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达到的效果，竟能使有的被害者，临死还要“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还要毛为他洗清冤屈。毛在这点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他高于其所有政敌的地方。他能让被害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后灵魂还要继续当他的奴隶。当意识形态宗教化以后，就能产生这种神力。

当毛把阶级的经济定义扩大到政治领域，就开始了以言论定罪，扩大到思想领域，就是扩大到除赤贫者、无思想者以外的所有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嫌疑犯，再上升到世界观高度时，恐怕连创论者本人也不能免，就那么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大公无私了吗？这就是毛领导历次运动的底蕴所在和敌人越来越多以及原来的自己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也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意识形态的绝对排他性、一元性、五统一性就从根本上杜绝任何新思想出现、生长的可能。那些有点非毛思想成为反革命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这种思想禁锢是彻底的，加上死亡的威胁，步步高升的利诱，革命桂冠的荣誉，有几个布鲁诺式的张志新、遇罗克、陈昭、顾准去冒犯神灵送死的思考者？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中国重大文史公案》一书中，曾就学术观点综述为十种，这里按其重要性排一个序，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①乌托邦碰壁说，（准确表达应为追求说），理论本身的乌托邦和追求信念的无比坚定性与彻底性。②封建遗毒说：文革是皇权专制历史文化的回光反照。③毛泽东帝王思想说，这是个人因素，也是②的产物。有资料表明，在狂热的 1958 年 6 月 28 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目前太平洋不太平，将来归我们管，才算是太平洋。”8 月 19 日对省委书记说，“将来我们要搞个地球管理委员会，搞个地球统一计划。”（张锡锟网上提供）毛称帝之心，岂止中国哉！④东西文化冲突说：这是观念层次的解说，即专制文化与民主观念的冲突，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观念。⑤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这是《决议》中的结论，反映当时党的主流认识。⑥阶级斗争必然说，与⑤是同一范畴（阶级斗争）不同程度（恶性、不恶性）路线斗争语言的表述，都是以阶级斗争为其前提的。⑦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是外国人看的表面现象，实质是党内各种政治主张的斗争，不排除有个人争夺

统治权的斗争。⑧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这倒是文革中一定的群众基础性原因，斗走资派的激情不亚于斗黑五类。⑨人性兽化说：这是从人性层面提出的解说，其实，提出者巴金心里是亮的。不然，他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干什么？就是在反兽化。兽化是狼的——即仇恨的、吃人有理的教育造成的，这里没有爱，同情与善良，只有权力与物欲，贪婪与凶残。⑩奸臣祸国说，[19]把它排在末位，是因为持此论者还没有摆脱“我主圣明”、“清君侧”那一套。中央文革权倾一时，谁授的权？倒不如说，吾皇帝后，聘了三个厨师开了个中国特色菜的现代专卖店。

以上十种，各有其角度和合理的地方，笔者看法是“意识形态主导说”，即在以暴力消灭剥削阶级原罪的理论指导下，在深厚专制历史文化根基的土地上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已经把全国的权力与财富全集中在党政系统手里却又无法解决贫穷问题的时候，不去让财富迅速增值，即抓生产，以经济成果改善民生，实现现代化；反而把原因归咎于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就怪罪想对计划经济有所松动的右倾分子，不让农民有点自主权（实际上是农民自由权的一部分），兴起一个兴无灭资的思想浪潮，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正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妨害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可纲举目仍未张。毛至死忘不了灭阶级，公有制两条，也一定不丢“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毛语），以此和帝、修、反斗争到底。这是发生文化大革命主导性的原因。恩格斯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终极原因。以上十一种各层次各角度的合理因素相互作用才是真正的原因，而不能孤立地只看某一种原因。

毛泽东自诩为“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倒是个最简要能说明文革发生的原因的语句。前一人是意识形态的首倡者，占主导性，后一人代表着中国政治特色，专制霸气的品格，统一宇内的雄心和不怕死人的决心。前无古人的权术家、军事家、谋略家，则是个性。表述中间只需架上一个列宁斯大林和苏式体制的桥梁，不仅可以分析文革现象，还可以分析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不展开叙述，等待史学家作更好的分析。

8、灾难的余波：文革的结束，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批了极左，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则让个体经济作公有制的补充，特区建设，引进外资，私有制悄然地然而迅速地发展了经济，以致宪法不得不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也就是承认雇工剥削的合理性也就是阶级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原点被 30 年经济发展所否定，理论上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而实际国家资源的大转移，即原来国有经济的党政集团，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早就和他们的子女，亲戚六眷、私交故旧通过设机构、办公司，各种手段化公为私，使国有、集体资产严重流失。农村承包时，28 亿落入集体干部手上；商业、外贸领域，5 万亿流入私人手中；双轨制依靠批条 350 亿差价等，使权力资本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后的先富起来的巨富就是这样形成的。官们手上有权，各种审批都要以钱开路，官商勾结，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的盛行，构成新的社会不公平。一场反官倒、反腐败的自发运动在学生中酝酿。政治方面，反自由化，一个组织生活会可以

让总书记下台，他的去世让人们对这位力主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得民心的政治改革家寄以哀思，引起1989年当时叫学生暴乱，后来知道理亏，改口叫风波，当政者不采取对话而采取用机枪和坦克说话的镇压方法对待并不违反宪法的开放言论、报禁，用社会舆论监督非法侵吞国家资产诉求的正义行动。尽管学生运动客观上是帮了改革派的倒忙，又让一个总书记下台。“6·4”风波究竟死了多少，有一本寒山碧写的《天泪》中有某医院发言人称死亡2600人以上，其中学生1000人，加上风波后全国各地镇压约1000余人，总共4000人左右，因为没有确切统计，而官方说法是军民只死200人，学生死23人，军队伤5000人，群众伤2000人而已。这次事件也是死人不少的一次，而造成人民的精神创伤更是灾难性的。因为5·4运动，12·9运动，5·20反内战运动，反动当局都不曾这样做过。从此，权力资本、意识形态、集中体制三者交互作用主导着政治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更为艰难了。

总结本段建国后中国发生的灾难总死亡人数是4781万1689人，其中饿死者3754.8万人；监禁、带帽、监管、批斗人数为12415万4594人。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所述运动中人数，而不包括平时被镇压、专政人数。其中“坏分子”定义含混，有右派性质的工农、四不清干部、生活作风等问题，带不上地、富、反、右帽子的统称坏份子。于是，中国存在一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等黑九类。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加上台属，有人戏称是中华第57个民族中除汉族外的第二大民族——黑族。他们在这个国度里受着无情的镇压和歧视，象黑色人种一样生来就黑，仅仅因为生在剥削原罪家庭，而在劫难逃。

四、结束的柬埔寨

素有佛国之称的柬埔寨王国，大多数信仰佛教，人民善良而纯朴，是一个人口只有787万的小国，高棉族占人口80%，故该国又称高棉。74%人口从事农业。它又是一个风景秀丽、一年三熟富庶之乡，森林面积74%，是组织农民武装革命理想的国度。一批留学法国的学生，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人，结合本土的同志于1960年9月30日成立柬埔寨劳动党，1967年改称柬埔寨共产党，虽然成立很晚，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经验在前，发展却是迅速的。1962年，其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开始有了个不祥的预兆。此后，留法派一直掌权，波尔布特为其不可动摇的领袖，绝对的意识形态权威。1963年，他们进入丛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67年，爆发农民反征税的起义。1969年，美对越战争频频失利，恼怒于柬埔寨中左政府成为南越革命的庇护所，提供丛林运输线，对其实施狂轰滥炸。1970年5月，美国扶植朗诺发动政变，推翻王国政府，使柬埔寨原来掌权的国王和革命的红色高棉联合起来一致抗美。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在抗美救国的旗帜下迅速壮大，73年就达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领土。1975年对孤城首都金边发起总攻，朗诺逃走。4月17日，金边解放，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执掌政权。从建党到夺取政权，只用了15年的时间，不能不说是意识形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位波尔布特，他是想“青出于

蓝，而胜于兰”，做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带有很大的原教旨主义的坚定性。他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尽快地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的需要，就是能够吃饱肚子之需，他的能，就是能从事农业体力劳动之能。在中国文革的思想影响下要彻底铲除帝、修、反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剥削。目标超过列宁和毛泽东。他认为苏中搞得不彻底，他想从一建国就根除旧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观念，消灭一切差别，避免出现修正主义的麻烦。在红色高棉执政 3 年 8 个月 20 天中，展现出一幅意识形态统治一个国家的难以想象的图景。

（一）柬共的内外政策。柬共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解放区实行合作化运动，用农业生产、生活集体化为样板改造社会。从社会结构到生活方式全面实施解构与重建。

1、划定政治权利界线。把服务于朗诺政府所有人定为反革命，杀无赦。以当年 4 月 17 日为界，把国民分为“旧人”（老区人）和新人（4.17 人）即接收来的人，政治权利不同。旧人为充分权利者，其中分为三等：一级、二级、三级完全权利者。新人即待选者，意即需甄别处理的人。又分为两类：无或有亲友为反动政府服务者，是新人之多数。建国后就实行人口类别登记，人分五等，因为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第四、五类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成为专政和改造的对象，旧人有权监督改造新人。

2、消灭城市。柬共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敌人的巢穴，必须予以消灭。金边一解放，一周之内，或遣散或武装押送往农村兴水利，种稻田。反抗遣散者，以反革命论处，格杀勿论。原来近 200 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成为空城。只剩 3 万人，即柬共军政人员，一个商场、一家医院。无论职员、店员、教员、学生、医生、护士、自由职业等等人员一律下乡。废除货币与市场，原来钞票，皆成废纸。银行、电讯、交通全部停摆。因事出仓促没有计划，城市居民，长途遣送，有的无具体地点，又无充分供应，沿途与目的地老弱病残死者加被杀戮者 3 万人以上。

3、消灭知识。柬共视知识也是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藉及印刷品，认为那是传布西方文化的工具，严禁任何形式的西方文化。只传达革命口令，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消传统戏剧。比起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更为彻底，柬共干脆用锄头挖去反动的根。

4、消灭私有制。全吃公共食堂。即使有政治权利的旧人，也不能自由流动，统统编入合作社集体劳动。没有自留地，私藏粮食或偷窃点蔬菜查出来要处死。柬共比中共在消灭私有制上更坚决：“中国人（在柬的专家们）还拿工资，中国人还养鸡鸭自己吃，是不是变修了？”他们认为自己反对帝、修、反最为彻底，消灭私有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中国还只是斗私批修，柬共却做到灭私斗修。领袖们比巴黎公社主张公职人员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工资推进一步，索性不用钱，无工资可拿，可真做到了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中国人还只写了一篇文章，有那么一个远景。在柬埔寨，经济差别消灭了，但政治差别扩大了；剥削消灭了，剥夺扩大了。结果是一个党剥夺了所有被它改造的人民的所有权利。财产可以再生产出来，但人头和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无法

生产出来。以消灭剥削开始，以普遍剥夺告终，这就是意识形态悲剧所在。

5、消灭宗教。柬共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唯心主义阵地——宗教，采取封闭一切寺院、教堂、清真寺，强迫僧尼还俗，从事劳动的方法，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禁绝一切拜神祈祷活动。强迫穆斯林吃猪肉，佛教徒婚配。以此达到都来信唯物主义。

6、对外政策。除和反修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埃及有外交关系外，无使馆、无外交、自我封闭，也是其内政无交换的延伸。世事不知，生产单一，自建桃花源。向原始共产主义回归。

以武力为后盾，以民主柬埔寨国家的名义，坚决执行以上的政策，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重组社会。柬共彻底反对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实行一切公有、创建一个绝对平均的农业共产主义社会。这就要求各民族统一于其集体生活、思想模式之中，把民族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一切全都取消掉。把意识形态纪律置于一切规范之上，凡不合新生活、思想模式者，一律强迫改造直至杀戮。这样，国内各少数民族就遭到厄运，使民族屠杀合理化。柬共对 2 万越南裔人全部杀光，华裔 43 万人杀 21.5 万，老挝人 1 万杀 8000 人，伊斯兰 25 万杀 9 万，合计为 33.7 万。其死亡比例超过杀高棉人的比例。给那些认为阶级矛盾没有了，民族矛盾自然就没有了的思想家追补了一堂现实的课。

重构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全民实物供给制，在公共食堂吃饭，任何家庭不得单起炉灶。一切按需分配，而分配什么、如何分配则掌握在红色高棉管理人员手中，因为集体和强制劳动效率不高，粮食又需出口换取武器。公共食堂每况愈下，直至吃糠咽菜，鱼米之乡竟成食不果腹。这种情况又死不少人。食是如此，衣呢？全国统一穿黑色农民装。住呢？不能盖洋楼，竹篱茅舍吧！行呢？抛弃小汽车，只有运输车，人走路吧！一派复古气氛。家庭生活也受到致命打击，结婚得组织安排，夫妻因大干快上而离多聚少。特别是改造对象——4 月 17 日人，每周三次“生活方式会”，无穷的检讨，检举揭发，鸡毛蒜皮，狠斗私、修一闪念。就是旧人，也是个在一块土地上修理地球，动弹不得。思想不能信教，只能信波尔布特。这样的佛国，当时大概连念句“阿弥陀佛”也是不敢的了。

这个神秘国度所发生的近乎荒诞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只有在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因为它没有新闻，更没有新闻自由，除了它自我封闭，还有的国家帮着它封闭，恐怕有损意识形态的形象。

（三）镇压与清洗。柬共的镇压与清洗，分三个阶段：

1、对朗诺政权军政人员的镇压。这是对明显敌人的镇压，金边解放时有 200 万人，逃往曼谷的 40 万，遣散 100 万，其他消失了。处决方式用卡车装去用棍棒斧头打死、砍死，以节约子弹，部分才为枪杀。其中妇女要受双重罪，死前强暴，蒙上眼睛，赤

身击毙。婴幼儿则树上撞死、地上摔死。金边南部在一所中学内成立审判中心，这里处决了 2 万，代号为 S_21。现有 S_21 大屠杀纪念馆，其中排列着按性别、年龄分类，分 17 层共 8000 个头盖骨（网上有照片）。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非共生实物展览。据说类似这类纪念馆还有多处，大概也只有佛国才有这样的勇气摆出累累白骨的灾难惨景。恢复了人性与人道！

2、对 4.17 属候选人一类的镇压。凡有劣迹者，杀；反抗下乡政策者，杀；不服管教者，杀；就这样柬共认为还有占人口 2%的反革命没有杀，继续肃清反革命。拒绝尝试用和平改造，说服教育的方法，是反革命就杀。一直到一切有产者、知识分子、会外国话的，带眼镜的都不放过。

3、党内大清洗。1976 年夏，即取得政权后一年，波尔布特鉴于党内非党意识形态表现的存在，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开始作外科手术，割掉自己同志的头。1977 年，民族阵线 13 个领导 5 个被处决，即国家主席团副主席，内政，新闻和宣传部部长及两任商务部长。1978 年仅在东区原来支援越南反美的亲越派，由塔莫领导清洗杀掉 10 万干部和军人及其家属。2 万人关押在图士伦，只 6 人生还，其手段不为不狠。

柬共执政三年，其总计屠杀人数是多少，现王国政府的公布数是 300 万，国际社会数为 170 万。最保守估计数为 40 万。如果以柬原有人口数，减去 1979 年越南占领后总人口数 640 万人，应为 140 万，但有至少 40 万难民出逃，则为 100 万人左右。如果把柬共革命，美机轰炸，朗诺与民柬内战与越南入柬战事、杀少数民族及其他饿死、累死、吃磨菇充饥毒死、自杀等等非正常死亡统计在一起，可能接近 200 万，即全国的 1/3 死亡的民族大灾难。

（四）悲剧的结束。1978 年底，越南以反恐怖、反种族屠杀的名义入侵柬埔寨，两周即打败柬共军队。1981 年，柬共自动解散，但柬军仍坚持丛林抗击。1989 年越南迫于联合国压力而撤军，1991 年 10 月柬各派签订“巴黎和平协定”。1992 年 2 月，联合国派 2.2 万名工作人员，进行并监督全民选出联合政府，柬仍恢复王国，红色高棉拒绝与宿敌洪森合作。1994 年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原二号人物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分离，率两个师转向政府，王国既往不咎，仍有其政治地位。1997 年 5 月，民柬军丧失 80%，宋成准备效法英萨利，波尔布特得知后，杀害宋成夫妇及其 8 个子女 10 人，这是这位共产党人最后残忍的一笔，于是成了众失之的，众叛亲离，纷纷走出丛林，乔森潘与谢农回归政府，1988 年成为红色高棉的终结年。

波尔布特逃往泰国森林，17 年没露面，柬政府已废止死刑，只判他终身监禁。90 年代国际社会则强烈要求送国际法庭公审，柬人仍不送交，继续着“佛国精神”。而波在病故前留给世人的遗言却是：“我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屠杀人民”。那么，世人要问：共产主义理论观念，是不是要更多的人头落地呢？相反，我们从人性回归了的乔森潘写给世人的《自由书》即《柬埔寨的当代史和我的处境》中承认，民柬执政期间“极端的革命，给这个国家带来恐怖与仇恨。”[20]

恐怖生于仇恨，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宣传仇恨，而是化解仇恨，从爱惜生命出发，就会以改革改良的方法去渐进地除去社会弊端，使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如果只迷信杀戮与镇压，它就会产生“柬埔寨现象”，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会造成多惨的结果。

在经济发达然而充满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矛盾所产生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半个世纪，英国排斥它，德国也排斥它，一直东移到俄罗斯找到了根据地，成就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再东移找到了发展它的肥沃土地，那是有着农民起义杀富济贫传统的历朝历代实行皇权专制的国度，最后竟然能在一个经济虽然落后然而人心却是祥和的佛国显示出巨大的魔力，确实令人惊叹！是不是能由此推论：愈是贫穷，愈容易产生仇恨，愈能接受这种宣扬暴力的意识形态，而其结果，是玉石俱焚，人我皆亡。但波尔布特至死坚持他的理念。他的理念，条条源于《共产党宣言》，不信，重读这部经典文本吧。只是把两个决裂，干脆改为两个消灭，乃波尔布特的发明。

是不是意识形态灾难到柬埔寨就最后结束了呢？很难说，在世界范围，受中国文革的广泛影响，许多共产党成为毛派，或分裂出毛派，领导着他们的穷人闹革命。如果不能缩小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意识形态还总是有它生长的的土壤，各国的毛派游击队不还在活动吗？

总括这三个国家死于意识形态者及受它影响饿死者总数是 7481 万 1689 人。作为本节的结尾，笔者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写的是黑字，却是鲜血凝成。但又诚惶诚恐，一怕我没有写清楚他们的苦难，对不住我要向他们负责的在灾难中死去的亡灵；二怕冤枉了活着的好人，许多人好心办了坏事；三怕有人会把我当他的敌人看待，要封我的口，不与谐言。因为利益相悖会产生仇恨，那怕是为了人类共生也不一定能保平安。

共生论者无你死我活的敌人，只有道理上的论“敌”。历史事实要摆明，不能说假话，文字中不是事实要纠正，作者的评说更有需商榷而不自知之处，但决不蹈妖魔化的覆辙，把人不当人；尊重论敌，向论敌学习其正确之处。目的是人类要共生，你我要共生。共生论者反对宣扬仇恨，宣扬的是爱与宽容——它是共生的精神。相信共生理性，而不应感情用事而“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才能把共生的道理讲透。愿与世人共勉之。

第三节　恐怖主义灾难

由极端暴力行为所造成的恐怖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非共生的突出表现，始终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与和平秩序，各种惨案的发生就充满着恐怖。原始的部族仇杀是恐怖，战争中施加于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杀戮是恐怖，统治者对治下人民无法无天地妄施残杀是恐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是白色恐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报复性残杀是红色恐怖，黑社会、三 K 党、黑手党实施的暴行是黑色恐怖，凡是铲除异己、恐吓异己的大量杀人都是恐怖。

但是，作为一种主义，它就有了特殊的含义，以区别于一般的恐怖行为。主义是

指“一种独特的教条、系统或论证”，或者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21] 正式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始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就说过：“没有恐怖的仁政会软弱无力”。他的恐怖政策结果是使 85%的死者竟是无辜受戮的第三等级自己人。从此，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内涵就是大量杀害无辜平民，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对无罪的平民使用暴力并残酷致死借以震慑人们屈从其意志是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

具有现代特色的国际恐怖主义，肇始于1968年，它已经不是个别的人的偶然行为，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其中目标不一定相同的、有预谋的、不断扩大的恐怖行为。到1969年，出现暗杀、爆炸、绑架、劫机、炸机恐怖活动浪潮。80—90年代有增无减，到1997年30年间，全球共发生国际恐怖事件15386起，死9560人，伤31320人。仅对90年代26件重大恐怖活动统计，殃及无辜死1573人，伤14138人。分析这26起恐怖事件，除 6 起针对国家领导人（包括中东和平创导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色列总理拉宾），3 起大规模绑架人质事件外，其他17起都是以无辜群众为屠杀目标的爆炸、放毒案。因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危害性、严重性充分认识，看不到这些是人类的又一灾难。多数国家认为这只是对美英的惩罚，没有及时联合起来予以强有力的遏制。结果是就在人类满怀和平发展的希望步入千禧之年（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自杀式飞机袭击纽约世贸大厦，使3113名无辜者顿时化为灰烬。这是对不远处的联合国总部的挑战，对世界人民和平愿望的挑战，达到惊人的程度，岂只是对美国一个国家的伤害。从此，人们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威胁到全人类的地步，甚至各大国都感到有恐怖主义的危险，才产生联合反恐的意愿。在这之前，还从本国利益出发，或者是利用恐怖主义危害敌国，或者对恐怖主义灾难只作壁上观。

一、恐怖主义灾难实况

1、死于恐怖主义人数。全球在上世纪（缺1999年统计数据），从1968年起的30年已如上述，其后分年予以叙述：

1998年：仅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和政府军屠杀累计为7.8万人。大案为美驻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死224人，伤者数千人。

2000年，死亡1774人。

2001年：全年发生恐怖事件346起，死亡3547人，仅9·11一次即有3113人。

2002年：死亡人数为2013人，大案是印尼巴厘岛一次死202人，330人受伤，和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人质劫持案，死120人，伤725人。印度的印度数与伊斯兰教恐怖造成758人死亡。

2003年：恐怖案190起，死1573人，大案是俄国北奥赛梯共和国别斯兰中学惨案，死300人，伤700多，多半是在校学生。

2004年：恐怖案625起，死2500人，大案是马德里车站连环爆炸案，死198人，伤1800人，直接影响大选。西班牙从伊拉克撤军，这是一次达到了政治目的的恐怖事

件。

2005 年：大案是伦敦在两周内发生连环爆炸案，死 56 人，伤 700 余人。未出三天，埃及沙姆沙伊赫旅游区爆炸案，死 83 人，伤 200 余人。

以上七年，案与案中间有间隔，其死伤人数较便于统计，而在伊拉克境内，巴以之间那里的自杀式袭击频频发生，已经无可计数。

总计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的 1968 年开始，有统计数据，死于恐怖的人数即达 100088 人。

2、造成世人的恐惧心理。

如果说，恐怖主义初期是要更多的人看，达到某种宣传效果；现在则是要更多的人死，造成实实在在死亡的心理威胁。因为恐怖主义是不分男女老幼的，也不管你是哪国，哪族，哪党，哪派，只要在它袭击目标范围内的人都得死，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普遍的不安全感。因为任何人在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上，就有可能在一声巨响中血肉横飞，尸骨无全；也许你和家人正欣赏旅游景点风光时，一声爆炸就进了地狱；也许晚上睡在你隔壁房间的人就是明天送你上天的引路人；也许你高兴收到一封信，那里面却有白色粉末炭疽菌，那是恐怖主义送给你和周围人的死亡通知书，这哪像一个人世间！

3、灾难的延伸。

不可预测的灾难是比灾难来临更为可怕。现代恐怖主义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而是具有雄厚资金来源，其成员具有较高的现代科技知识，他们已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有成效地进行我们已经看到的恐怖事件；今后还会以更隐蔽手段，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造成更大的恐怖。这就是“超级恐怖主义”。它可以向下述几个方面发展：①掌握核技术的核子恐怖。他们可以买核材料，苏联解体后，核材料、核技术大量失散，中亚地区已成为核材料走私的最大集散地，基地组织已派员前去。一旦得到这些材料与技术，恐怖分子就会向其对手和无辜人民发动核袭击，那就不是一个世贸大厦的事了。即使他们无法全部掌握制造技术，也可把放射性物质放进一般炸弹之中，名为脏弹。它在 100 米左右的高度爆炸，造成周围 100—120 平方公里的污染，即时死亡可能有限，但以后病残无数，谁还敢住那块地方？再者，恐怖主义可以攻击核电站，造成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洩漏的严重后果，9 万人的普里皮亚季小城成为永久的死城——无人能居住，并影响乌克兰东南欧各国数十年。②使用化学毒剂的化学恐怖。如投放化学毒剂，1995 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自制的沙林毒气，造成千余人受伤，多人死亡的惨案。或是向水源、食品厂投毒，或者是袭击有毒物质的大型化工厂，都会造成这种效果。这样的恐怖是防不胜防的，其制作与施放比核武简易得多。东京沙林毒气事件，仅是化学恐怖开始的信号。③使用基因武器的生物恐怖。炭疽菌事件曾使美国全境惶惶不安。基因工程的发展，使不同基因可以人为选择。据报道，伊拉克曾积极研制“骆驼豆”，阿拉伯人有先天免疫力，旁的种族就得遭殃。科学史证明，凡是

原理性已获突破的科学，技术性问题迟早会解决的。这便是灭种性武器的危险所在。希特勒灭绝种族的图谋，就有可能在另些人的手中实现。④网络恐怖。既然战争已进入电子信息战时代，网络黑客就可以破坏全球信息网，也可以攻击通信卫星，这种恐怖就可以制造全球性的混乱与瘫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⑤电磁恐怖。利用便携式强电磁脉冲发生器，破坏报警系统和计算机系统。它不像核爆炸单次电磁脉冲，而是连续的脉冲集，每秒频率可逾千次，是干扰无线通信的有力武器，也构成新世纪的威胁。

由上可见，人类的灾难在 20 世纪，是战争与意识形态，而在 21 世纪，主要的灾难将是恐怖主义。因此，对恐怖主义的防范与消除，应列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为此，社会科学要把恐怖主义作为新的重大课题加以研究，首先得解决对恐怖主义的认识问题。笔者在 2004 年作了些探讨，当时仅止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在刑法学、犯罪学、社会学三个学科层次展开讨论，指出恐怖之树深深扎根于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教派、各种社会制度、文化及其观念形态等土壤之中。抛开哪一种矛盾，也认识不了恐怖主义的全貌。而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又得从法律、政治经济和思想信仰三个层面由浅而深地加以解决。并由此萌生与恐怖主义思想（同死）完全相反的共生思想。用“共生”作为一种衡量、鉴别人间各执其词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尺度，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人类尚处于国家、民族、教派、阶级现实的利益冲突和不同信仰之间的敌对不能自拔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各种基于各自的立场所产生的主张、学说、主义、教义中的非共生因素的相互冲突，也照出有我无他——极端——暴力——恐怖——自杀同死的道路的荒谬性。从而得出共生理性是解决信仰问题、放弃暴力、消除恐怖、通向和平之路。

二、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

国际恐怖主义因其有三大特征：1、跨国性；2、非政权主体性；3、现代科技性，故又称当代恐怖主义。它是在一国之内杀戮平民为主的一般特征的传统恐怖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是二战结束，在冷战、非殖民地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劫机、爆炸和绑架成为争取独立的激进派武装行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具有跨国性质，其手段也就更现代化。进入 90 年代，它的特点：动机日益复杂，形式日益多样，长期目标日益隐蔽，短期意图日益残酷，可说是直接以剥夺平民的生命为目的、反人类的活动。其源头有如下几股：

1、极左的反政府与政治秩序的恐怖主义。从 60 年代末，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被平息后，其中一些极端分子开始考虑以暴力形式代替请愿、游行、示威等合法和平方式，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籍学生雷纳托 •库乔，他提出：“使权力机构的残废运动”。这种受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的人，很快在一些国家聚集起来，成立许多暴力组织，如联邦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法国的“直接行动”、美国的“黑豹”、“武装抵抗组织”、希腊的“11 月 17 日”、“反帝小组”等等。

这些组织认为，恐怖对政府更具威胁性，并称之为“武装宣传”。这些组织随着苏联解体，事实也教育他们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日渐式微。有的自行宣布解散，如日本的“赤军”，但其它仍然有少数在活动，成为极左的反政府的恐怖主义，至今为拉美哥伦比亚、秘鲁的“光辉道路”等游击队所奉行，这是一股。

2、极右的纳粹恐怖主义。70 年代后，德国新纳粹势力抬头，排外仇犹，并受到右翼政党的支持，搞纪念希特勒出生 100 周年活动。在 1992 年制造恐怖事件，17 人死亡。1993 年索林根纵火案，5 名土耳其人丧生。他们要建立“第四帝国”，恢复国家社会主义，实现“自由的白色欧洲”。俄罗斯的恐怖组织竟有 150 多个，遍及俄罗斯各地，其中新纳粹亦复不少。就连美国也有反联邦反国家主义的恐怖活动，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就属这类恐怖分子所为。这是一股。

以上两类，。目的相反，手段相同，应视之为世俗政治恐怖主义。

3、民族极端主义。这里指世俗的，以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利益为主旨而又采取恐怖极端手段的一派，因为一定民族信仰同一宗教，所以和宗教极端主义很难分开，但分开的标志是世俗的权力、资源、家园、领土、实际利益之争与宗教对立信仰之斗，还是能区分的，看以哪方面为主。民族极端主义是非理性非和平的民族主义激进派。这是一股。

4、宗教极端主义。历史上的宗教极端主义是指极端禁欲、苦行僧一类的极端。后来国家脱离了神权统治，在宗教与世俗政权关系上才出现“神权高于政权”的极端主张。还有的伊斯兰教派如瓦哈利吉派，宣扬并实施“非本派信徒皆为叛教徒，无论男女老少应一律杀戮的教规”；对异教、非教则更加严厉地加以排斥和杀戮。不把异教徒、非教徒当人，这就背离了宗教的主流，完全是恐怖，成为性质最为严重的一种恐怖主义。这是一股。

5、原教旨主义。现在人们一提原教旨主义就以为只是伊斯兰有原教旨，其实不然。原教旨主义原指基督教新教中的复古运动，意为“严格地遵守基督教信仰中原始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这种复归原始的思潮，在各教中，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都存在。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更有特定的含义，即“主张依伊斯兰教法和宗教领袖的解释制定国家政策、法律、宗教规范和社会准则，建立神权高于一切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就与世俗国家宪法、法律必然产生冲突。70 年代，原教旨主义思潮在埃及开始兴起，时任总统的萨达特就宣布“宗教里没有政治，政治里没有宗教”，应予以制止，结果他被这种“宗教政治”组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所刺死。原教旨主义的暴力派是搞纯伊斯兰国家政治的，属于恐怖主义。类似的组织还有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促进会、苏丹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印度尼西亚的穆汗默德协会等。它们都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它们都是按现代方式组建的宗教政党。这又是一股。

6、分裂国家型的恐怖主义。有称之为民族分裂型的恐怖主义。其实这种称谓不确

切。它不是从本民族分裂出去，而是从异民族统治或国家中央政权分裂出去。民族是基于血缘，有着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的生活共同体，远在天边，他也是这个民族的人。如果它有政权，它就是个单民族国家，很容易在概念上发生民族与国家的混淆。如果是个多民族国家，当国家不能平等对待各民族，就极易发生民族纠纷，产生分裂主义。民族是长存的，国家政权是有更迭的，政府更是有变化的。国家或地区分裂又与民族独立（或完全自治）权利有联系，一般用地区公民投票来决定。所以分裂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并不是对自己民族的。这种分裂活动，以民族独立（或自治）为其政治目的进行恐怖活动，与民族极端主义产生的恐怖主义相重合，是目前最为普遍、危害也最为严重的类型，约占世界恐怖组织的 1/3 是这种性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它的威胁与挑战。如中国的“东突”、俄罗斯的“车臣”、西班牙的“巴斯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菲律宾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印尼的“亚齐运动”等等，这是一股。只有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与英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车臣”问题则被俄罗斯强力解决，其他未见有和缓的迹象。

7、黑社会型恐怖主义。黑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它与商业暴利、贩毒、贩人、卖淫业有关，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哥伦比亚的卡利贩毒集团、美国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三 K 党”等，也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恐怖组织。常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相联系、勾结。这是一股旁支。

8、国家恐怖主义。这是很有争议的一种。战争中有大量的恐怖行为不应属恐怖主义，因为战争双方必须遵守战时国际法，而恐怖主义是根本不把国际法、国内法放在眼里的，是无法无天的。现代恐怖主义特点之一，是非国家主体性。但是，若是国家在与敌对方冲突中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如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对无辜难民的大屠杀，应视为国家恐怖主义。而非战时派间谍、情报人员在其他国进行组织、策划实施暗杀、屠杀等恐怖行为，则是战争行为的前期部分。只有把武装及情报人员（包括便衣）排除在平民之外，才分得清谁是无辜平民。一切恐怖主义主要是针对平民的，这是第一特征。如果把反恐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对其策划组织者的清除也视为恐怖主义，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主权国家决不能以对方平民为攻击目标。发生了这种事情，国家元首要出来向受害民族道歉，并给予实际的补偿和善后措施，不使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才免于恐怖的恶名，不使恐怖主义有所借口。

除第 8 项外，以上 7 种恐怖主义，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目的、不同价值取向的 7 股支流，汇集而成上世纪末期恐怖浪潮，危害人类，而起到主导作用，协调各派，构成全球性地下恐怖网络的则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

三、拉登和他的恐怖王国

奥萨马·本·拉登，1955 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他的家族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建筑商，拥有 40 亿美元资产，他本人就有 3 亿，后来发展到 5 亿。1979 年，苏军入侵阿

富汗，伊斯兰世界学者们组织阿拉伯义勇军进行援阿抗苏的圣战。24 岁的拉登，只身前往阿富汗，开始了他的圣战征途。80 年代，以他的财力、坚决的原教旨主义信念和现代科技知识，在阿富汗成立训练义勇军的基地。当时美苏争霸，他得到美国中情局的财政与技术援助，成为阿富汗抗苏七个游击队之一，并在关键战役中取得胜利。到 1986 年，平均每年给 5000 万美元给这些贫穷而勇敢的阿拉伯圣战者们，共 2.5 亿美元，甚至给予专打直升机的“毒刺”导弹和尖端技术武器，使基地如虎添翼，迅速成为圣战的特种部队。训练营地达 10 处之多。当时美国认为拉登是反苏的斗士。苏联撤军后，拉登和他的传道人（即老师）巴基斯坦人阿扎姆认为“不能解散这个成功组建起来的组织，应把它作为将来圣战的潜在的综合性总部。”于 1988 年成立“阿尔——伊达大本营——阿富汗基地组织”，学习原教旨，教材是“阿拉伯圣战百科全书”光盘，教授各种制造炸弹、毒气、暗杀，隐蔽联络技术。基地以培养阿富汗的阿拉伯人为主，招募全世界伊斯兰圣战者。后来，在美阿战争中，被俘的塔利班 1200 名战俘有 122 人来自外国的穆斯林，占 10%，可见一斑。圣战者自白：“当你有了枪，你就有自由，你就感到任何事情都可以做”，还要圣战到底。同时，拉登资助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达 4000 万美元，并与其首领奥尔玛和塔利班中的强硬派加强联系，使其政策向圣战方向转变，如炮轰巴米扬大佛像的事件，达到完全不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请求的地步。基地组织共培训 3 万圣战者，其中 4000—5000 名成为骨干，遍布世界各地，在 150 多个国家设基层组织，成为国际恐怖的策源地。

1989 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拉登无意参加阿富汗各派的政争，但留下“基地”，回到沙特。因反对王国政府允许美国把沙特作为进攻伊拉克的基地并制造恐怖事件。1994 年被取消国籍，驱逐出境，冻结其财产。他先到也门转苏丹。此前 1991 年拉登在喀士穆与苏丹政权中民族伊斯兰阵线首领图拉比合作，开始建立圣战的地下经济网络，办公司，代理人遍布世界各地市场，开新伊斯兰银行，聚集恐怖资金。这次到苏丹，在肯尼亚设立基地，支持索马里政府反美并对美特种部队进行袭击，其间他发动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苏丹迫于美国压力遣其出境。1996 年乃再次回到阿富汗，在阿巴边界兴都库什山脉建立永久性基地。1998 年，成立“国际伊斯兰圣战前线组织”，又名“反犹太人和十字军东征者（基督教徒）伊斯兰圣战阵线”。后又成立伊斯兰军咨询会，协调各地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由各团体的首领或代理人所组成。至此，拉登的恐怖王国就以地下政治、军事、经济、教旨、信徒的网络存在于世界，与地上的联合国、穆斯林的世俗政府、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民族，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相对抗。这个教、政、军一体的组织的宗旨是团结所有的穆斯林，完成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废除阿位伯国家的边界，成立原教旨、神权至上、政教合一，以古兰经为法律的穆斯林国家。恢复哈里发帝国昔日的辉煌，尽雪 800 年前十字军东征之耻，实现全球信奉安拉的统治。

要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又无一个国家作依托，拉登采取了独特的战略、战术，进行在规模上前无古人的地下恐怖活动。

1、宣传、动员广大穆斯林信徒向原教旨主义集结，接受圣战教育，培养视死如归的殉教精神，以可以在天堂永生的信仰来制造人体炸弹。这是重要的战略人力资源。有成千上万的这种圣战者，本身就是一支可怕的力量。恐怖王国有宣传委员会专司此事。

2、从各种渠道，聚集资金，包括宗教、慈善组织的资助，支持圣战的组织、个人的奉献、拉登与其他恐怖组织自身的财产的投入，恐怖经济组织的地上合法公司的收入等等，使其财源不断。拉登竟可以用 1500 万美元高价购买核材料。他什么不可买？对失散的“毒刺”导弹，美国开价是 10 万美元，拉登出 25 万美元。恐怖王国的货币与商业委员会掌握的地下财政网络，其隐密和廉洁程度惊人，即使美国中情局高科技和贿赂手段，都从来没有破过案，查出过一笔资金。

3、在开展圣战中，情报工作具有头等意义。美国至今捉不到拉登，是狮子抓跳蚤，叫做莫可奈何。恐怖事件，屡屡得手，足见其情报之迅速、严密、有效。恐怖王国的情报委员会似比中情局还管用。

4、恐怖王国的军事委员会是兼管采购恐怖装备和工具的部门。它在范围上联系着 1000 余既松散却又一致的恐怖组织和个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搞恐怖事件的参谋总部。他们在战术设计上非常周密，几个月前有的甚至几年前就策划、安排实施方案。国际社会在地上搞反恐怖，它就在地下搞恐怖国际化。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人们决不能小视。因为它深得孙子兵法要义：“故善战者，发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也只有拉登确实做到这一点。利用飞机、电子信息就能“发乎九天之上”，有广大信众就能“藏乎九地之下”，加上天国之民不怕死，岂奈他何？1996 年拉登在网上发布对美国的圣战宣言。他就凭一个地下王国敢于向头号超级大国宣战，这是任何地上国家不敢做的事。

9 • 11 后，美国虽然在国内加强了技术安全保卫措施，这几年似乎平安无事，但难得美国人在世界不丢命。

拉登有个 100 年的恐怖计划，他安排好接班人。他死了还有二代、三代接着来。圣战的长期性、隐蔽性和坚决性决定着反恐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难以速胜。

（四）怎样认识恐怖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整个在职期间，通过不少反恐公约和协定，但有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却未完成，即恐怖主义的定义不能得到共识。各国有各国的定义，各家有各家的定义，已有 150 多种定义。在他卸任时还在呼吁尽快促成此事，可见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就说明怎样认识恐怖主义是个世界性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反恐就缺乏学理和法理的标准及依据。阿拉伯国家普遍反对把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它是以反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为前提的。它与反侵略的正义行为相纠缠，即手段是恐怖的，目的又是有理的。伊斯兰世界更认为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天经地义的，视自杀式袭击者为勇士、英雄。美国对待恐怖组织的双重标准即对俄、中等其他国家有害的恐怖组织和对美英西方国家的恐怖组织标准是不一样的，

也造成混乱。它让许多国家和人民感到美国从国家利己主义出发，把恐怖主义作为削弱、分裂别国的手段，使受美国欺负的国家和人民不但不赞成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反而成为恐怖主义的同情者，为恐怖事件叫好、喝彩，扩大了恐怖主义的群众思想认同到非伊斯兰国家。以致有人还认为恐怖主义是民族解放、反殖民帝国主义正义之举。有人则认为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之类。

要认识恐怖主义，只有从全人类立场出发，抛弃所有宗教、国家、民族、阶级利己主义思想观念，才能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让我们看看恐怖主义的思想渊源有多么深厚，分析它的矛盾诸多方面。

1、宗教积怨。拉登要雪 800 年前十字军东征之耻，他还记着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的旧恨。与之相对的布什在反恐演说中，就说过反恐是新十字军东征，后来承认说了错话。但由此可见他的潜意识里对伊斯兰怀着深刻的敌意。他的理论形态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写的《伊斯兰战争的时代》，就定伊斯兰是西方的敌对文明，他引用英国《经济学周刊》的统计，自 1988 年到 2000 年间发生的 16 次大规模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有 11 次或 12 次是由穆斯林发动的。在 20 世纪末仍然持续的 32 场武装冲突中，占世界人口 1/5 的穆斯林居民，有 2/3 卷入到这些冲突之中。[22] 如果把恐怖主义的认识扩大、升级为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那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21 世纪，除了对西方国家继续实施恐怖外，伊斯兰世界的不稳定将以恐怖主义与各伊斯兰亲美的世俗政府的斗争为内容展开，拉登称他们为腐朽政权，即受西方影响的政权。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宗教和教派分歧与冲突。

2、民族新仇：巴以冲突最为典型，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异己存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几十万难民营中的人来说已经成眼中钉，肉中刺。美国偏袒以色列是仇美的关键，巴勒斯坦哈马斯大选获胜，说明按照美式民主标准也应承认其起码的谈判地位。你不谈，更证明它的极端主义敌对性的正确。可以让以色列以土地换和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以物质援助换安宁，创造政治解决的气氛？美英等国反恐战争尽管在国际上得到道义的支持，但对阿富汗、伊拉克民族来说，永远都是他们的伤痛，扩大了恐怖王国的民族基础。

3、贫富鸿沟：巴勒斯坦人很多在以色列做工，每次冲突关闭巴以关卡，巴人失业，生活无着，无产者、失业者是充满仇恨的。这里，阶级论也是很起作用的。就是民族恨加上阶级仇，其强度不是亨廷顿所能感受的。因此不能把万千人民的实际生活，多民族、教派的差异、各地区的不同组织不同诉求，抽象为一个伊斯兰文明，与之敌对。宗教、民族、阶级三者起到叠加效应，恐怖主义便无可避免。

4、宗教政党的中介作用。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就是政教合一的。出现世俗政府后（这是从西方和苏联两条路径进入的），如土耳其凯末尔、埃及纳赛尔、巴基斯坦真纳都成立世俗政府，本身是一种进步。它们可以使教与非教，不同教与教派得以在一个国家内过上平等的和平生活。但是，宗教团体可以组成适合新制度的宗教政党，争夺世俗

政权，又有回到政教合一的可能。世俗政权，如埃及总统、萨特勒说宗教里没有政治，恰恰是政治里有宗教。无论教与非教，只要是国家里的一个人就离不开政治，何况宗教团体有它的利益诉求，相同利益诉求组成政党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主张恢复旧体制的激进派所组成的伊斯兰党，名目繁多。如前述奉行原教旨主义在埃及、苏丹、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团体，它们可以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政治反对派的斗争。它们是恐怖地下王国到地上世界的中介与桥梁。

5、伊朗革命的鼓舞。伊朗霍梅尼驱逐西方势力，反对西化的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把亲西方的国王赶下台。尽管巴列维国王在世俗化、现代化方面取得许多成绩，但敌不过宗教信仰的力量。拉登曾为此感到很大的鼓舞，但伊朗与阿拉伯同教不同族，也有矛盾，拉登并没有与伊朗联合，但反西方则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伊斯兰究竟与国际恐怖主义是不同的。美国如果进攻伊朗，那又是在把伊朗往恐怖王国那里赶。

6、石油财富的支撑。海湾国家盛产石油，圣战者们许多不是因为穷而反对西方，而是信仰加利益冲突反对西方，恼怒西方文化、宗教对伊斯兰的侵入。恐怖王国能发展到全球规模，与他们的财力是大有关系的。西方老的新的殖民主义集中在中东掠取石油资源，也是造成仇恨的起因之一。美国取代了原英法在产油国中的地位，使排外情绪集中在美国身上。它要承受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殖民统治的后果，象在越南代替了法国所带来的后果一样。

7、现代科技的应用。恐怖王国的人，有钱，也有学识，在高科技的掌握与运用方面，一点也不比地上国家逊色。拉登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掌握着全球的讯息，遥控指挥，可以达到每一个角落。前述超级恐怖主义，就可能在他这一代或下一代实现，只要实现其中一项，就足以制造出人间更大的灾难。

8、信仰问题。恐怖主义许多问题，归根求源，核心问题是个信仰问题。我们先设三问：（1）为什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会源源不断，几乎看不到尽头？（2）为什么五个阿拉伯移民英国的青年，只在巴基斯坦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就可以谈笑自若地去干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作骇世之举，与无辜受害者同归于尽？（3）若说俄罗斯黑寡妇是有族仇家恨，那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就准备好了 3000 名妇女敢死队，这是为什么？只能是一个答案：信仰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如果不在这个层次上考察，是不彻底的。一般地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去考察都只能得到初中级层次的认识，只有从信仰层面去认识才能彻底。当非现世的宗教信仰被各种世俗权力、利益牵扯到世俗层面的具体生存、生活情景中，它就能把非现世的主体认识拿到现实世界来运用。这就是圣战者们视死如归的奥秘所在，他们把世俗的死，当作是神圣的生。

共生论者要揭示人类共生问题，最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死结。如果试图来解开这个生死结，首先得问什么是信仰？比较客观地说，信仰是信息不确定性的主体认定。所谓主体认定，是一个群体都这么认定它。一教，一派，一族，一国，一阶级，一团

体，多数是历史上或少数是现实中形成而与他们世俗利益、生存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视同生命价值的执着认同。所谓信息不确定性是指他信仰的目的物是未能得到实证的，或者是实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逻辑实证，能够证实与证伪。就在宇宙第一推动力和神的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唯心论与唯物论谁也说不服谁。在人类认识没有达到足以说明这些问题的高度之前，信息是不确定的。人类永远要为这些信息的确定性努力，这是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任务。而在此之前，只能是将人类的所有的经验材料凝成的科学认识作为进一步认识的阶梯，去认识宗教信仰为什么会获得这种主体认定。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是人一出生就处在不同的信仰环境之下，他的父母、家族、部族、民族就信着这个神，受洗礼、割礼一系列宗教仪式的规范，受着宗教教义的思想灌输，他们只有单一渠道去获得信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判断。这样，他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只是他的信仰。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那是对他人权利起码的尊重。你信的“不确定性”和别人信的“不确定性”是同等的，有什么理由信仰权利不平等？各宗教教派平等共生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前面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宗教里的共生因素的正面的作用，它是各教教徒们的共生基础。而从恐怖主义灾难中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非共生因素的负面影响，即异教徒和妖魔等观念对思想的控制，并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在他们实施袭击无辜人群时，在眼中看到的已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魔鬼，一群该死的妖孽。甚至是出现某种灵光的场景，而这正是几秒钟后的血肉横飞的惨状。一个金光四射的圣徒腾空而起，俯视着妖魔们和他自己肉身的一片狼籍。他们怎能不谈笑自若地去执行神圣的杀人任务呢？这都是对不确定性的认定。信仰—幻觉—上天=死亡，而给人间留下的是灾难。

恐怖主义是宗教信仰中非共生因素的极端发展的恶果。它是导弹、暴力能解决的事情吗？几千年的宗教信仰，能用几年时间围剿恐怖分子来解决精神上、思想观念上的谬误与幻觉吗？爱因斯坦说过，问题不能在产生问题的情景、条件下解决。因之必须在超乎信仰之上的认识层次中来解决。这个层次，在神学上无以名之，或可叫共生佛界；在人世间，有以名之，叫共生理性。如果上帝、安拉、诸教信奉之神是全知、全能、宽厚、仁恕的话，他们自己就会平等共生，和平共处的，犯得着这些信徒们、世俗人为它的荣耀而去争斗赴死吗？所谓妖魔，只是现世人间敌对者之间借宗教之名为自己消灭敌人而制造出的虚幻托词而已。恐怖主义者让人们看到遵从千百年前一些宗教中非共生因素，扩而大之，固而执之，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混乱与灾难。这便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相比之下，把恐怖主义仅止看成刑事犯罪的犯罪学、法律学、国际法学层次。追求目标是绳之以法，就只能治标，对一些恐怖分子的具体人而已。而研究恐怖主义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层次，则可以缓解敌对主义之间的利益矛盾，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这就涉及敌对一方是否能作出对异教、异族、异文化平等共生的抉择。首先是对伊斯兰教及其民族是否能采取

对话、示好、理解、谅解、谈判、达到和解的目的，使伊斯兰世界自身摆脱对恐怖主义的半认同状态，孤立恐怖主义，解决现世中的冲突问题。例如解决巴以问题，印巴问题，达到异教、异族和平共生的局面，就是说要把着重点放在世俗利益冲突问题上。反恐的功夫在恐外。这种努力越多，如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巴内外部冲突问题，每次的和平进展与巩固，都是对恐怖主义的削弱。

拉登和他们的地下恐怖王国存在的最深层的外部条件就是现世的支持各种矛盾冲突的信仰，正视信仰的成因、深度及其恶劣后果，才能设法造成各教、各族的共生环境，最后消弭宗教对立的信仰，才是消除恐怖主义最根本的道路，也就是人类共生之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记住仇，咬住恨，同态复仇，以暴易暴，都不是办法。若是因为反恐，扩大矛盾，把整个伊斯兰国家和他们的宗教作为打击对象，强调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同样会导致灾难的后果，只会让恐怖王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不以仇恨出发，缩小打击面，对各类不同教派要严格区分，加大支援阿拉伯难民、贫困居民的力度，千万不能做伤害和平穆斯林的事。就是打击恐怖王国也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国际社会要一致行动。美国不要以为包打反恐战争会打得赢，没有世界各宗教，各世俗国家的共同努力，恐怖王国是消除不了的。

对于恐怖组织，应是瓦解重于打击。瓦解的工作，比打击复杂得多，其效果也巩固得多。它要求做长期的、各个层面的工作，争取一切和平穆斯林与恐怖组织分离，只对其宣传、鼓动、组织、实施恐怖袭击分子给予严密侦缉，主动追捕，定人清除。只有和平穆斯林都反对圣战的恐怖分子才能最后完成反恐的任务。强调以密制密，恐怖主义者最大行动特点是隐密，没有一个国际有效而严密的情报工作，也是战胜不了它的。切断恐怖财源，杜绝武器黑市、缉拿罪犯都是靠情报。恐怖主义是小组为战，个人为战，大规模反恐战争，徒伤宗教、民族尊严与感情，弊大于利，欲速则不达。

总之，笔者对穆斯林世界，知之甚少，尤其对其心理研究，更为缺乏，许多判断，必有不妥，这也要穆斯林传道者、兄弟们有所指正。

（五）消除恐怖主义灾难是对人类文明、宗教伦理和政治智慧的极大考验。

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逐步脱离野蛮状态的基础上步步前进的。野蛮的标志是什么，是暴力、恐怖和战争，不惜杀人以逞。只有战争文化（军事学），没有战争文明。各地域、各宗教传统产生的文明未能反映文明的核心本质——不杀人的共生。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举止却包藏一颗杀人的心，算不算一个文明人？文明也是渐进的，没有摆脱野蛮的文明算是初级阶段吧？人类的精神文明高级阶段必然是共生文明，彼时才算得真正的文明。共生与反共生的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斗争、消长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恐怖是代表着野蛮，反恐的意义就是推进文明，让人间得到最持久的和平与安宁。

恐怖主义将宗教教义、民族主义非共生因素集中，提高为野蛮的反共生极端行为，让人们看到它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从而一方面以人间执法威力去缉拿恐怖分子，一方

面反思自己的信仰中的非共生因素，从而开启共生理性，也只有共生理性才能明辨恐怖主义，消除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对死难者是极大的坏事，但对冷战后的世界的和平进程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它促成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除了反毒品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问题能成为大国如此协同关注的焦点，从而采取一致的行动。正因为恐怖主义的国际性，促进了大国的合作，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反恐军事演习，都会给恐怖主义施以声威。这里面还有国际间的情报互换与交流，共同的威胁来自恐怖主义，彼此的威胁被共同威胁所减轻。国家利己主义产生的双重标准是极为有害的，它会使彼此威胁扩大，不能一致反恐，让恐怖主义利用大国的矛盾，继续其存在和发展。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与和平发展相对立是恐怖主义，各宗教的教主们、政治家们在反恐行动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你们是在为人类和平发展工作，那么就得对反恐事业给予更大的关注，发挥宗教伦理精神和世俗政治智慧来消除恐怖主义。

在世界宗教大会上确立的“宗教伦理”应成为各宗教徒的思想行为规范。联合国所通过的反恐公约应为签约国所共同遵守，这都是走向和平共生的具体体现。这些是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们的义务与责任。而认识恐怖，讲清恐怖，为反恐出谋划策是宗教、世俗学者们的责任。恐怖主义是人间的癌变，要像研究癌症一样，找到治癌良方。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相信反恐事业一定能成功，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事业。

就一般恐怖而言，在共生论者看来，仇恨产生暴力，暴力产生恐怖。只要是以仇恨立论，就是有暴力的癌病灶，其发展必然是恐怖。刑事犯罪领域如此，国际恐怖主义更是如此，各种非共生的信仰也是如此。“相信暴力是解决一切矛盾的良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为真主的荣耀而杀人（拉登语）”等等宣扬杀人有理的语言及其原理，是共生论者所坚决反对的。共生论者对反恐的提法是，以智力战胜武力，抗暴而不施暴；以宽容战胜仇恨，决不以暴易暴、同态复仇；标本兼治，以本为主，擒贼擒王，不殃无辜；仁德为怀，降级处理。从崇信暴力与恐怖的思想观念中摆脱出来，这对于反对恐怖主义和建立共生理性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节　核武扩散与新武研制的危机

所谓危机是已经看出可以造成灾难后果却又无法遏制它向恶性发展的状态。它使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如焚。从本节起，笔者将述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机。首先是与以上三节的灾难相联系的可导致核战争、核恐怖的核武扩散与为战争、恐怖服务的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的危机。这是带全世界性的危机，而不只是哪一国，哪一族的胜败存亡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危机。

一、核武扩散危机

核武器包括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自从二战中美国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迅速取得二战最后胜利，核武器便成为战争中的王牌武器，哪个国家不想拥有？何况和

平利用核能又有正当的理由。安理会五大国先后都拥有核武，苏联、中国是自行研制，英法是合作研制。说起来都是防卫的需要，高唱着和平，实际都是加强暴力，扩大实力地位以壮国威。从冷战时期，核扩散便开始，法国扩散给以色列，巴基斯坦自制，先苏后美扩散到印度，以后又扩散到朝鲜，日本则早有制核武能力，碍于和平宪法，并有核保护伞，用不着去耗费大量资财，实受无核武之惠。如果敌对一方拥有核武，另一方就有可能从地图上抹去。如果落到恐怖主义者手中，那将是世界真正的末日。

1、核弹对人类的威胁

现在全球部署着 13470 枚核弹头，另外有 14000 枚处于储存状态。俄罗斯部署 7360 枚，居第一位；美国 4896 枚，居第二位；法国 348 枚，居第三位；以色列 200 枚，英国 185 枚，巴基斯坦 30—50 枚，印度 30—40 枚，作为核大国，中国也不会少。全部破坏能力是夷平广岛的 100 万倍。人类就处于这样的核阴影下过日子。所谓部署，就是对敌方（或假想敌）的军事目标、军工生产基地、各大中城市、大型民用设施（如水电枢纽工程）都已经作为目标瞄准好了，只要按扭一捺，全部化为齑粉。核弹头的数量已足以把一般世界地图所有的城市都派上一颗而有余。而运载火箭的技术的发展足以让卫星升上太空，把彗星都给撞它一个窟窿，还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核弹的袭击？住在城市的人们，知否有多少发射架上的核弹在瞄准着你们？就在不久前，美国有架军用飞机，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上面误装了核弹头，舆论大哗。美国防部赶紧出来道歉，核弹怎能从头顶上飞过呢？多么可怕。而如果人们还在那里宣扬民族仇、阶级恨，宗教敌对，那就是在加速核弹早日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究竟人类共生的愿望大于同死，60 年来，拥核国家没有发生核战争，但暗中较劲，看谁的核威力更大，打得更准，射程更远，一刻也没停止过。到今天还在搞导弹竞赛，反导，反反导。搞到太空，打卫星，反打卫星，把脑力与财力花在如何威胁人类、屠杀人类的比法宝上，多么不值！各国首领们，只有一位法国总统说过：“不排除对恐怖主义使用核弹。”这是消除恐怖主义的办法吗？只怕是一颗核弹扔下去，一万个自杀式炸弹蹦出来。其他各大国首领总算保持正常思维，没有谁敢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说都不敢说，还敢做？只有那些“同死”思维的人才敢。所以，正常思想的人玩的都是这种相互讹诈、恐吓的核游戏。

拥核国家力主核不扩散，保持核平衡、核威慑地位，而无核国家，绝大多数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以和平自保。只是想称地区之王的国家则求之不得，这就是国家层面核扩散不扩散的焦点。其实，在人类消除战争的伟大的和平的事业中，防止核扩散只是万里长途的第一步。多一个人就多一种想法，多一国就多一个主意，对待核武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的态度是不同的，多扩散一人一国就多一份危险。因为在这一个非共生现实世界里，就不能保证敌对思想、主义之间就不拿这个武器作最后的赌注。拉登就是一个，剿灭异教徒的就是一派，意识形态敌对就冒过一次险，那是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2、核武扩散现状

核武是拥核国家的最高机密，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成品核弹，制核技术，运载技术（火箭），核材料。除成品外，哪个国家也不会控制得天衣无缝。自由经济有条规律，“有钱买得鬼推磨”，有需求就有供货的，有买有卖就有市场，就居然有人在迪拜开了个核“超市”，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贸易之都，国际新兴明星城市。这个核“超市”，货源充足，来自中亚地区黑市和自制；明码实价，8 万美元一台生产浓缩铀的 P_2 离心机；还有技术售后服务。老板名叫卡迪尔汗，巴基斯坦商人，早期入荷兰核能研究机构，掌握核技术，回国领导六次核试验，成为巴国核弹之父。荷兰法庭缺席审判他盗窃技术情报罪，后来就做起大生意来，对象是要核国家，1988 年就和利比亚谈核生意，先后 13 次到朝鲜。他的离心机，马来西亚生产，德国苏西尔有他的计划部，南非工业园都能生产核弹。只要有 24 公斤的浓缩铀便可制 1—2 枚核弹，一个地下与地上相结合，核交易网正在形成。现在已不是 60 年前的原子弹，它的机密已经流入许多国家许多核科学家之手，扩散是必然的了。一个人就能让几个国有核弹，只看出不出得起价钱而已。好在 9·11 之前拉登没有找到卡迪尔汗，否则又该是另一番恐怖景象。更有幸的是，卡在意大利被捕，一直被软禁。

核扩散另一个渠道，是解体后的苏联，原来分散在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沙漠地区，有许多核设施，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和物质，管理原来就不严，在实行自由经济大背景下，拿技术，盗物质，贪污受贿，比黄金还贵的核原料就是黑市上的抢手货。核黑市中亚有，巴尔干也有。在核扩散的问题上，最为严重的是俄制手提箱战术核武器，只需 1—2 人即可携带，当量为 1000 吨的 TNT，已丢失 100 多件。它如果在人口密集区只炸一个，就是一个大灾难。

现在查明的就有如下事实：“1991—1992 年，仅德国查获的核材料及与核相关的材料走私案多达 124 起。德国、匈牙利和瑞士共查获走私铀 59.2 公斤”。又据报导，六枚保存在哈萨克斯坦武器库中的核弹头已不翼而飞，其中三枚本来是用于装备战略核导弹系统，另三枚则是用来装备战术核导弹系统的。俄罗斯军方不久前公开承认，俄罗斯已丢失十多个核弹头。[23]连战略核弹头都散落到私人手中，核武已进入走私武器的行列，这些都是危险所在。

考察核武扩散不能不联系到轻重武器的黑市交易，而扩散途径就是武器走私，其严重程度已成为全球性的大问题，从手枪、飞机到核武应有尽有。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全球走私武器的交易额已由 1992 年的 185 亿美元狂升到 2002 年 1000 亿美元左右，各种性能更先进杀伤力和破坏力更大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进入走私武器的流转之中。

俄罗斯在原苏联时期就是个军火生产大国，改制后仍然是个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其国内武器走私就非常猖獗，走私主角是俄军官兵，还不乏高级将领。2001 年，倒卖武器犯罪案件超过 6.5 万起，2.6 万人被起诉，一些军人被判刑。俄军事检察机构称，

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指挥官参与向格鲁吉亚非法出售装甲技术设备和弹药；数名海军将领向国外出售军舰，盗卖先进的苏一 27 战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空对空”导弹、核潜艇核反应堆操作控制仪及零件、C—300 防空导弹装置上含金与铂的电子板等。[24]在常规武器（包括轻重武器）方面，根据上述和平研究所报告，俄罗斯武器出口已超过美国，居世界之首，占世界交易总量 36%，法国、美国、德国紧跟其后。共占全球总出口额的 2/3。常规武器在当前还是主体，世界各冲突、战争地区用的还是常规武器。2001 年世界军费开支大约为 8390 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2.6%，人均达 137 美元。1998—2001 年间，军费开支增长率最高地区依次是：非洲 31%、中东欧 28%、南亚 26%、中东 25%。令人惊讶的是非洲 8 亿人口拥有 5 亿轻武器，武器储量竟达到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支枪的程度。西非地区有 1000 万件流散民间，非法武器交易额为 70 亿美元。进口大国则有沙特、土耳其、印度、希腊、韩国、巴基斯坦和以色列。[25]这都是有冲突危机地区，武器流向已成为地区动乱、杀戮的晴雨表。

3、核扩散的根源

核不过是武器中王牌，杀人以万、十万计，但与重武器（飞机、大炮、坦克）、轻武器（机枪、步枪、地雷），这些常规武器杀人以千百计或个别计，程度不同，本质不变，都是杀人，只不过是 50 步笑 100 步。既然国际上有个公开的军火市场，就难免不出现核超市。像其他违禁品（如毒品）一样，各国的打击力度、管理方式不一，地下活动始终存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还以此牟利。我们的眼光不能只限于核扩散，因为原来核扩散的概念是向无核国家扩散，现在已经有向恐怖组织和极端集团扩散的可能，而且开始走进武器走私的行列。因此，必须把核扩散与武器走私，军火交易综合起来认识它们的关联性和严重性，不能孤立地只讲核扩散。国际社会关心核扩散，作出了很多努力，对走私武器关注度不够，对军火交易更视为正常。这好比看一棵树，只见树盖，不见其干，更不问其根，这三者恰似核武扩散，常武走私，军火交易的关系。

从根谈起，世界军火贸易，也就是正常国际转让。国与国之间常规武器的买卖，一般应向联合国申报并接受监督，但在苏美争霸冷战年代，各向其友好国转让，出售武器就是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方法，谁也不会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冷战后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冲突双方各找其卖主，且不惜代价。军火出口国大发“死人财”（一般说法是战争财，笔者强调战争就是要大量死人的），一些国家口里高唱和平，一边心里巴不得打得越大，越激烈越好，其心可诛。另一种交易叫灰色转让，是政府不出面，默许一些代表政府的机构、公司、实体向非国家实体、组织甚至他国反对派组织出售武器。目前全世界共有 98 个国家的 1000 个公司正通过灰色渠道转让武器。如 2001 年尼加拉瓜警方向危地马拉的一位以色列商人出售 3000 支 AK—47 冲锋枪和 500 万发子弹。该商人用伪造的巴拿马文件转手卖给哥伦比亚非法武装组织。2004 年才被揭露[26]。这种灰色转让实际就是通向黑色市场的大道。其他没有揭露的国家和公司就不知该有多少。

再说树干，就是武器黑市市场和武器走私。连国家一级都在那里对联合国阳奉阴

违，做武器生意扩大财源，就更不用说非法的个人和铤而走险的走私者了。经营着最丰厚利润的军火生意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货源是不愁的；对有雄厚资金又没良心的商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何况他们在这国暴露，就转向另国，又不得判死刑，何乐而不为？这就是坚挺有力的武器扩散大树的干。

后说枝叶繁茂的树盖，在大量武器扩散的枝枝叶叶伸向世界各地的渠道中，就会开出核蘑菇之花来，它能结出人间最大的死亡威胁的核果。这比毒品的危害性大万倍，人们吸毒还只是瘾君子慢慢地过着瘾自杀，死的是个人，害的是社会。而核需要者都是仇恨者，敌对者，死的是别人，毁的是人类。当然，反弹过来，自己也不一定能活，结局是同归于尽。其他高新尖端武器也是些奇花异朵，大小不一，功能一样——更多地杀人。

我们在上一节分析了恐怖主义者想杀人的主观根源，这里揭露的是恐怖主义者有更多杀人的物质条件——武器的获得。主观上要杀人，客观上能杀人，二者又互为因果，构成实实在在的人类的危机。

探讨武器扩散（包括核和所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危险的根源就是：

（1）暴力主义。相信武力能解决国、族、教、阶级之间的纠纷与矛盾，相信暴力是压服对方的唯一手段。一些掌权者心怀仇恨或野心，心目中只有“征服”的概念，因为他们的道理，根本就不能说服人，就只能是以国、族、教、神、阶级的名义，用蛊惑人心的办法，煽动仇恨，以售其奸。他们看不到彼此有平等共生的可能，因此要武装到牙齿，要大炮不要黄油与面包。

（2）巨额利润。武器生产，销售的利润，颇大于其他行业，而且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扶植，推动武器出口。目前全世界的军事人员约 2800 万人，而从事军火工业的人却近 1 亿。武器的发展与扩散造就了军火工业长盛不衰，军火工业的存在与发展又推动军火贸易进一步发展。有专家估算，一架 F_16 战斗机售价 5000 万美元，利润在 50% 以上。国际军火市场年成交额在 500 亿美元以上。只要有军火生产能力的国家，哪个不把武器生产当作聚宝盆？

俄国已经在军火贸易上跃居世界首位，取代了美国传统地位，大概这也算复兴崛起之路吧？美国是发两次大战，甚至是世界大部分战争财起家的，一贯地隔岸不仅观火而且送火。强大的军火利益集团历来是共和党的经济后盾，能推动美国“先发制人”，动不动“武力解决”的好战政策。每发动一次战争，美国人一样地死，肥的是军火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发财——死人——更发财——更多地死人，还包括死自己的人。不过这条路径，因其绕的弯子太远，太复杂，人们不去深究而已。

（3）国家屏障。以独立主权为特征的国家，往往从国家利己主义出发，对于防止武器扩散，缩小冲突规模，减少伤亡，达成和解起着阻挠、屏蔽、甚至是破坏性的反作用。它一方面逃避联合国对军火贸易的监督，一方面总是在做明为他国实为害他国以肥己的勾当。这是国家行为规律造成的。它可以不顾他国人命，大量出口军火，还

向本国人民表功，就业率高了，国家富了。军火商和走私集团在国家屏障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从世界共同利益和国家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上可以看出武器扩散的根源所在。

综此三者，在这些根源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核武及常规武器的扩散是会以各种方法存在，从而构成难以克服的危机。

二、新武研制的危机

新武是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统称。自从有核弹以后，军工科学家们开始改进其运载工具，于是火箭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导弹族群，从中远程弹道导弹到洲际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最远能达到 12000 公里。由于制导技术的发展，又使精确度越来越高，精确制导导弹可以从建筑物气窗深入到内部爆炸，形成战略导弹一族。导弹在远程化的同时向小型化推进。其形式复杂多样，先是地对地，固定发射打固定目标，后是运动中发射打运动中的目标，地对空，空对地，海军舰艇发射，海对空，飞机上发射，空对空。把炸弹、炮弹、鱼雷都更新，升级为导弹。夜视器材等光学电子设备的进步，在夜间和不良气候下，也能实施全天候，全时辰的攻击，形成战术导弹一族。型号繁多，不胜枚举。最后发展到太空，搞所谓“星球大战”；钻地导弹，能炸十米深的目标。于是天上地下，海上海底，导弹所及是无往弗届。导弹族群给人类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说核武是老虎，火箭就是它的翅膀，这些飞虎便是人类生命最大的威胁。

同样，危险的还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化学武器。以毒害作用杀伤人畜和毁坏庄稼的化学物质叫毒剂，装有并能施放毒剂的各种武器和器材即化学武器，包括装有毒剂的炮弹、炸弹以及飞机布洒器等。它以其易行性、散发性、多样性、突发性和隐蔽性而被用于战争，尤其是侵略者、进攻者所常用。大规模使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快有 100 年的历史。

1914 年，德国违反海牙禁止使用毒气国际公约，于当年 9 月，首先使用了刺激性毒剂。1915 年 4 月 22 日，在比利时伊普雷地区用 5730 只钢瓶施放 180 吨氯气，造成 15000 人中毒，5000 人死亡，2400 多人被俘。在一战中，各交战国生产毒剂约 18 万多吨，用于战场上 11.3 万吨，遭受杀伤人员达 130 万人之多，还产生恐惧症，失去作战能力倍于其数。

鉴于毒气的祸害，国际联盟在 1925 年 6 月 17 日通过“在战争中禁用毒物，有毒气体和细菌”的日内瓦议定书。但是，侵略者是永远不顾国际信义的。1932 年，日本在东北使用窒息性和糜烂性毒剂。嗣后，在侵华战争中，凡遇战斗不利，形将被阻或被歼时，莫不施放毒气以扭转局面。1935—1936 年意大利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大规模化学袭击即达 19 次，15000 人中毒身亡。二战后，联合国更强调不能使用毒剂。但美国在越南也使用 CS 毒剂、失能性毒剂（BZ）达 7000 余吨。还掩耳盗铃，不毒人杀庄稼，用了 7.8 万吨的植物杀灭剂，把庄稼全杀灭，人吃什么？一样地死人。在两伊

战争中，伊拉克就对伊朗进行了 15 次大规模的化学攻击。看来，这些使用惨无人道化学武器的人，其心可诛，其败也必。因为它是违反人类共生愿望的典型形式，历史要叫它死亡，必先让它疯狂！

但是，当前的危机在于各国尤其是大国并没有接受这种教训，仍然在准备着化学战，已经装备有全套的化学武器：神经性毒剂（沙林、VX、棱曼、塔崩），糜烂性毒剂（芥子气、路易氏气），全身中毒性毒剂（氰氢酸、氯化氰），窒息性毒剂（光气、双光气），失能性毒剂（BZ），刺激性毒剂（CS、苯氯乙酮、亚当氏气）和各种植物杀灭剂（灭草剂）等，并形成系列化、通用化、多类型的化学武库。

问题还不止于此，化武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研究毒性更大、作用更快、防不及防、少量即死的毒剂；研究渗透力更强，使防护器材（如防毒面具）失去作用的方法，人们很难预计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的灾难。

联合国反映着人类反对化学武器的愿望，于 1993 年 11 月 3 月签订了“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国际公约”，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但没见有哪国带头公开地拿出他们的化学武库全部销毁的事例，见到的倒是在防化学战的名义下继续增加防化力量和研制，攻防相长，无有穷已。

倒是美国别出心裁，新的战略计划研究一种既能使敌方战斗人员失去能力，但又不致死的新型失能剂，这也许合乎人道主义。这无非是中国叫“蒙汗药”的制剂的高精化。这蒙汗药——失能剂，也就是麻醉剂，使用它的历史也不是光彩的，在麻醉犯罪方面，不知害苦了多少人。为什么要人处于失能状态？必是你有所图谋。也许对直接暴力有效，象对精神病人一样。

由此笔者联想，人们之所以想用暴力、恐怖与战争解决冲突问题，不就是被许多甚至全部非共生的教义，主义“蒙汗”、“麻醉”了么？自己被大麻醉，还要去研究麻醉人，可笑不可笑？但在国家这个共生圈未扩大到全球共生之前，国家壁垒仍然存在的历史阶段中，它又是笑不起来，且是可哀的事情。

2、生物武器。指利用致命细菌迅速传染的性能向敌方投掷或施放细菌的武器，造成敌方发生瘟疫以达到大规模杀伤敌方人员和平民的目的，故有“瘟神”之称。人类对瘟疫避之犹恐不及，防之犹忧有隙；但在战争中，还把瘟神请来杀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战之罪也。生物武器历史较短，因为以前尚无防护自己感染的技术手段，这也是科技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出现的。始见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在常德等地区撒放细菌，设在东北平房屯的 731 部队，即日本军方研制生产细菌的基地，掳去中国战俘、劳工，做介体试验，令人发指。

1952 年，在朝鲜战场上美机就不时投下苍蝇细菌弹，笔者就参加过上山打灭苍蝇的“战斗”行动。

1984 年，美国大西洋一潜艇基地发生罐装食品橘子汁被污染了肉毒毒素，造成 63 人中毒，50 人死亡的事件，后来查明是生物恐怖袭击引起的。

1995 年，在日本查抄奥姆真理教实验室时，发现所研究的病原体有炭疽杆菌，Q 热柯克斯体和肉毒毒素。美国的达格威试验场，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也在进行这种试验和研究。令人最为担忧的是生物武器研究是能结合防止传染病进行的。它可以和平利用，为人类免于这些疾病，也可使用于战争，扩大灾难，像原子能一样，都有两重性。民用转军用，不用很长时间，即可转化。人类必须有所抉择，是请瘟神还是送瘟神？

1971 年 9 月，由美英苏提出，联合国第 26 次大会通过，1975 年 3 月 26 日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已有 158 个国家签字。但愿它们签字算数，不使“瘟神”肆虐人间，不让危机走向灾难。

话说回来，在共生理性没有取代非共生的思想观念之前，研制细菌用于害人的危机始终存在，有谁能保证谁不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呢？因为它究竟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现在还不是一个没有武器的时代，更何况还有个虎视眈眈的恐怖主义呢？

至于人为改变基因的灭种武器，目前尚无真实确切的资料足以证明，也许还在试验阶段，不作赘述。但作为现实的机器人，让它代替士兵去作战，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已方不死人，专死敌方的作战方式，未尝不是好战者们感兴趣的领域。总之，人们只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什么武器都会产生出来，构成人类新的危机。

第五节　自然生态危机

所谓自然生态，指的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客观自然环境，包括天体、地球、无机物、有机物、动植物界等一切除人类以外的物质世界。首要的当然是我们共同家园、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状态。有人称为地球生态。但地球生态是天文学，地球在宇宙环境中的生态状况。二者是应有所区分的，其共同点则是指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由于人类种群的急剧膨胀，物质需求陡增，在工业时代，科学的发展又提供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达到空前程度，加上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观念不正确，把自然当作奴仆，称王称霸，无限制掠夺、利用，取精华以肥己，弃三废于天地，缺乏天（自然）人共生的观念，不能善待自然，造成自食其恶果的各种生态危机，已经到了“人与自然互相抛弃”的程度。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带有丰富的平等对待自然的思想，并把精神境界融入大自然的“天道”——生生不息的自然秩序之中，达到一种与天地并生的和谐境界。因此，用明晰的、具体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天人共生”理念来考察自然生态危机，是本节的任务。

生态危机内容十分广泛且相互牵连，如森林、矿产、水源、能源、气候、物种、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叙述的系统性，本节采用中国古代物质分类五行元素，金、木、水、火、土加气（候）、物（种）七个方面分述之。

一、金的危机——矿产资源耗竭

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储量再大也有用完的一天，它包括：金属矿产（如金、银、铜、铁、锡等）、非金属矿产（如盐、硫磺、硝酸盐等）和建筑材料（如花岗

石、石灰石）。目前一般说的资源危机就是指地球上的矿藏储量正处于耗竭到足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据美国科学家埃利希夫妇对全球主要矿产资源可供开采年限测算，到 2020 年，大多数矿产——铜、铅、铝、锡、锌、镍、金、银、铀等都将开采殆尽。美国已经用尽了所探明的锰、铬、镍和铝土矿。目前，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铁，一半用量的铝、镍、锌和全部用量的锡。这说明工业愈发达，资源耗费愈大，美国首先就产生这个问题。

矿产分布不均还是各国的局部问题，只要保持和平环境，还是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解决一国短缺的问题，而全球资源耗尽则是矿产危机的实质。

二、木的危机——森林植被的破坏

森林和植被是地球陆地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可再生资源，即人工可以培育生长的资源。它在整个生物圈中的能量交换、水蒸气交换，二氧化碳的固定和氧气的释放，气溶胶的释放、稀释和吸收等，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形象地说，它就是地球的肺。1998 年覆盖面积为 50 亿公顷。分布情况是拉丁美洲最多，为 5.5 亿公顷；北美次之，为 4.7 亿公顷。危机在于每年减少 1800 万公顷。地球森林原有的面积 8166 万 km^2，只剩 2800 万 km^2。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自 1950 年以来，全世界森林损失了一半。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森林面积占陆地面积 1/4，1978 年降为 1/5，世纪末降为 1/6，这种趋势将持续到 2020 年的 1/7，仅存 18 亿公顷。发达国家如美、加、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从 60 年代起就注意到保护森林的问题，处于稳定甚至发展的状态。但在发展中国家，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尤其是热带雨林的破坏更为严重，总面积原约为 19.35 亿公顷，每年减少 2000 万公顷以上，林地改作他用每年就达 750 万公顷。联合国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对 76 个国家的森林状况的联合评价，大部分热带国家森林在枯竭和退化，南美、中美地区最为严重。毁林面积占森林面积一半以上。号称世界“供氧超级肺”的亚马逊河流域，每年 4%森林被毁。

大面积森林破坏和退化，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它是使气候变暖原因之一。造成干旱、沙漠侵蚀，土质沙化，洪涝灾害，物种消失，甚至少数人种的消亡。如巴西印第安人 450 年前有 500 万人，现今生活在亚马逊河两岸只有 20 万 人了。

再看中国，毁林炼铁、毁林造地，和大开发中乱砍乱伐，造成森林面积下降，情况严重。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消失 1/3，海南岛天然林只有解放前 20%。全国森林覆盖率只世界覆盖率（27%）的 61.3%，人均森林面积只世界人均的 1/5，而林地减少为非林用地每年平均达 416.3 万公顷之多。

森林面积大幅减少后果是，水土流失严重，造成荒漠化、沙化、沙尘暴等等恶果。

草原植被是自然生态中重要方面，它对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发展畜牧业，保护物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草原面积本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澳大利亚，面积为 173.9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18.2%，超过耕地面积，对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是个巨大的生态屏障。但现在却以每年 13300 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三化——退化、沙化、

碱化的草地已达 106.12 万平方公里，占了草地面积 61%。内蒙古草原仅因搂发菜就破坏了草原 1.9 亿亩。草退沙进，日甚一日。国家花了很大财力与人力去阻沙固沙，但正如一位高官所说，点上治理，面上恶化；局部治理，整体恶化；治理赶不上沙化、退化。

湿地植被和海滩红树林带也是同样地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十分困难。

三、水的危机——它包括淡水短缺、海水上涨和水污染三个方面

1、淡水严重短缺。生命产生于水，水是维持生命不可须臾离的物质。地球上本不缺水，地表水面积是陆地面积的两倍多，占 71%。其体积为 13.86 亿 km^3。但是，淡水总量只有 2.53%，其中 68.9%，又分布在两极冰川与永久积雪之中，30.36%分布在地下。适宜于人畜禽饮用和灌溉的江河湖，地下淡水却不到淡水总量的 1%；且分布极不均匀，尤以中亚南部、阿富汗、阿拉伯和撒哈拉地区为缺。随着人口的增长，用水量大增。从 1900 年到 1975 世界人口翻了一翻，年用水量由 4000 亿 M^3 增到 3 万亿 M^3，大约增加了 6.5 倍。其中，农业用水增 5 倍，工业用水增 20 倍，城市生活用水增 12 倍。60 年代开始，城市化迅速，到上世纪末约有 40%人口居住在城市，加上工业化使用水量又增加一倍，即 6 万亿 M^3。许多人口比较集中的国家，已经明显感受到水的严重不足。据估计，世界上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陆地面积 60%，遍及五大洲各地区都有水资源短缺的大块陆地。美国向加拿大买水，德国向瑞士买水，阿联酋一个国靠买水过日子，1 吨石油换 100 吨水。中国母亲河——黄河，最长断流期已达 227 天。669 个城市，400 个供水不足，100 个严重缺水。一些城市限水用量，有些地方用嗽口杯量水使用。

地上水不足，人们便去采用地下水，地下水耗竭，也会产生土地坍塌和海水倒灌，那时采来的水也是不能饮用的。中央台曾报道，京津唐地区地下水已用去 9/10，黄河平原是 1/2，辽河平原是 1/3。

2、海水上涨。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冰帽和南极冰盖逐渐消溶，导致海平面上涨，现在每年是以 0.5cm 在上升。只要海水上涨 1m，世界沿海各大城市，上海、伦敦、纽约、威尼斯、曼谷、悉尼都会被淹，加上大洋中诸小岛国约有 10 亿人口都将被迫放弃家园，在 100-200 年间，将成为实况。全球 GDP 的 1/5 将泡汤。上海的海拔只 1.8m—3.5m，可计时而待，珠三角、长三角、黄三角俱有泽国之虞。而只要上升 30cm 时，中国海岸低洼地 2300km^2 进水，占国土面积 2.3%。如果格林兰冰块消溶，海平面则上涨 7 米，那更是难以想象的景况。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中国冰川学家韩建康、谢自荃提出乐观的测算：南北极冰川溶化还会导致海平面下降。理由是地球变暖，蒸发量大，极地降水量大，气候上升 5℃，可使南极冰量增 1000 万亿吨。结论是近 100 年不会出现明显升降，但愿如此，百年后留给子孙面对。

3、水体污染。在淡水本来就短缺的情况下，大量水体污染更是雪上加霜。全世界

现在约有 4200 多亿 M^3 的污水排入江湖河海，造成 5.5 万多亿 M^3 水体污染，占全球径流总量 14%。估计 15 年内，污水量还将增加 14 倍。而稀释这些污水，又需要河水稳定流量的 3.3 倍。水污染的恶性发展，有增无减。其污染源是工业与城区的污水排放，酸雨、热污染，农业区的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灌溉中的盐污染等等。其中，酸雨情况尤为严重，20 年间欧美雨水酸度增加了 20%，造成一半河流和 75%的湖泊酸化（美），酸雨将是最严重的污染，人们已称之为“空中死神”。另一方面，病原体和富营养化，抗生素药物等影响水质普遍下降。全球已经约有 10 亿人口喝不上清洁水，80%的疾病是由不洁净的水引起的，造成每年 1000 万人死亡，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就在 2007 年，太湖的兰藻长满湖面，腥臭无比，造成无锡市及周边地区 200 万人不得不买瓶装矿泉水饮用，这便是明显的水污染后果的事例。江河湖的普遍污染，鱼类显著减少，影响整个渔业和人民生活。

海水污染接踵而至。每年成千亿 M^3 的污染物向近海流去，百川汇入大海，使海水也受到严重污染。昼夜不停的海上运输，石油自然与人为泄漏，废物向海洋倾泻。还有核试验，放射物质污染，弄得海洋也受很大影响，生物污染产生赤潮，鱼类难存，海水变黑，其污染面积，中国已达 2 万 km^2。赤潮面积有时达到 4000km^2，时间持续达 35 天。海洋污染特点是污染源多，持续性强。还有从大气中扩散的，扩散范围广，不易降解，成为永久性的祸害。

四、火的危机

首先是燃料（石油）的危机。自从人类发现火，利用火以来，就一天也离不开火。生火的燃料经历了植物燃料漫长的历史，到了产业革命，矿产燃料——煤取代了薪柴和木炭，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能源。从 1860 年到 1920 年，煤炭在世界能源构成中所占比重由 24%激增到 62%。人类从 20 世纪初，进入“煤炭时代，”煤炭及其提纯制品——焦炭成了工业的主要“食粮”。直到 60 年代，石油异军突起取代了煤炭的地位，成了“工业的血液”。汽车、飞机燃油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石油以其价廉、方便、热能高的优势，各工业部门包括电力部门纷纷改用石油燃料。人类进入“石油时代”。石油与天然气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生产与生活方式，石油的需求量激增。而石油与天然气属不可再生性的矿产资源，储量有限，用量无限，就构成面临耗竭的状况，所谓能源危机主要是指石油枯竭的危机。这种状况表现为两组数字：据美国地质普查局格罗斯林和休伯特在 80 年代初期估算，世界石油最终储量为 2740 亿吨；联合国对石油储量研究报告到 2000 年世界石油开采量为 89%，到本世纪中期，将开采完毕。同时，石油危机也表现在价格方面，1970 年，每桶才 1.8 美元，1973 年 6 月每桶涨到 3.37 美元，减产、禁运、提价成为阿拉伯国家手上的反美以的武器。1974 年 1 月 1 日，又上涨 245%。到 1980 年底，原油价格提到一桶 45 美元，到 2007 年，又翻了一番。因为这种价格危机，并不是真正石油枯竭的危机，而是涨价后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利影响带来的危机，我们这里讲的是枯竭危机。

其次是因为争夺石油资源，各国都有其石油（能源）战略，彼此的战略冲突又会导致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危机。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一直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它可以解释许多大国、地区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的部分内在原因。而海湾战争起于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就是去抢石油。战争直接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突出例子是萨达姆为阻止联军进攻，一次焚烧科境内全部油井，开管道纵火，烈焰冲天，日月无光，其烟尘跨南亚而达喜马拉雅山。何等惊人！

再次，人们往往只注意战争的胜负对人自身的影响，却很少去关心战火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算算环境的损失，胜负双方都是输家，都要付出环境历史的代价。燃烧弹对城市燃烧的浓浓黑烟、汽油弹所造成的森林大火，橘子弹（orangeagent）除草剂对植被田地的布撒，使天空与地面的污染激增，非平时生产污染可比。特别是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更是为害至烈。美国制造原子弹初期的汗福特核料厂，其反应炉向空气散发大量放射性尘埃，其中碘 131 比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高出十倍。华盛顿州东部受害儿童高达 20 万人。附近米沙村 28 户 106 人中至少有 24 人死于癌症或患上癌症。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非但战时如此，平时也是“害人必殃己”，最后从环境上人我俱害，这是不是一种生存逻辑？只不过是有的国家保守自己死人的秘密而已。一次蘑菇云对大气的污染究竟几何，环境学家也应算个账。但往往军事与战火污染，可以被列为排污法规之外，却是一种悲哀。

最后，地球升温，气候干燥，森林草原大火频发，也是火的灾难。2007 年希腊森林大火，烧掉半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地上损失，天空受害。都属于火的威胁。

五、土的危机

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和不能善待土地造成诸如耕地减少、地力下降、土地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等，对地球村民来说，莫不存在较大的危机，简述如下：

1、耕地日蹙：耕地是土地的精华，耕地数量的多少，质量的肥瘠直接关系到各国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世界现有耕地面积为 13.7 亿公顷，占土地面积 10.5%。但每年要缩小 500-700 万公顷的耕地。因工业化的非农业用途导致人均耕地下降超过 50%的国家，上世纪 30-70 年代是德国、日本、中国和荷兰。90 年代后，中国位居榜首，从 1996—2005 年 10 年间耕地减少 1.2 亿亩，约占总量的 6.6%。现人均 1.4 亩，不足世界人均的 40%，以致国家必须保住 16 亿亩的底线。土壤的沙化，良田变荒漠是耕地危机最为严重的方面。世界受其威胁人数达 8.5 亿，全球有 2100 万公顷农田变得完全或近乎无用。每年损失农牧业产值达 260 亿美元。土壤侵蚀（包括水蚀和风蚀），水蚀导致水土流失和河道淤塞，风蚀造成的土壤薄土层的流失和土壤盐渍化。地表土流失也很严重，每年世界耕地表土流失量达 240 亿吨，前三名是中国——50 亿吨，印度——47 亿吨，美国——15 亿吨。一方面是人口剧增，一方面是耕地锐减，将何以堪！

2、地力下降。土地在数量上的锐减，如果保证耕地质量即肥力稳定尤有可为。但是，土地质量因为大量使用无机肥料而造成的土壤板结，质量显著下降。化学肥料的

短期效果不错，使农民放弃有机肥，追求近期产量而忽视长期的地力保持。在植物生长链中割断了无机向有机转化的过程，土地菌类及有机物大量减少，土地成了矿物的堆积，许多特色品种菜蔬都纷纷绝迹，与肥料单一化就大有关系。

我国黑龙江、吉林两省的10万平方公里的黑土曾是世界三大最肥的黑土地之一（另二处为乌克兰，密西西比河），每年以 2 亿 M^3 速度表土流失和土壤有机质 1.3%速度下降，加上风蚀、水蚀，黑土层由开发时 60-80cm 减至 20-30 厘米。黑龙江宾县就是肥变瘠的典型。该县 1994 年一场大洪水，将 8 万亩耕地冲毁，这层 400 年才生成 1cm 的肥沃松软的黑土被剥去后，剩下有机质含量极低的“破皮黄”地表，根本无法耕种，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滩。

3、土地污染。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的广泛使用，工业污染物的直接弃置，间接经水流、大气各种渠道，最后都由土地承担。最明显的是酸雨，最早发生酸雨的地方是西欧和美洲东部，是工业化的负面效应，现在扩展到印度、东南亚、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酸雨到地面后得不到中和，可使土壤、河流、湖泊酸化。导致湖中鱼虾死亡，林中树木枯死，农作物减产甚至全毁。据欧洲大气化学监测网近 20 年连续监测的结果表明，欧洲雨水酸度增加了 10%，中北欧酸雨的 PH 值多为 4.0-5.4。而低于 5.6 时，就会造成对人的直接危害。煤和石油的燃烧是酸雨形成的主要祸首，即烟囱排放出的二氧化硫和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的烟气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相遇就形成硫酸和硝酸小滴，落到地面就是酸雨，人称死亡雨，有多少生物不害怕硫酸和硝酸呢？

4、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是生态恶性循环链中的重要的中间环节。森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地力下降；耕地缩小——大量垦荒——毁林造地；再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化。严重的例子是我国的母亲河——黄河，由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年均入黄河泥沙达 16 亿吨，水体含沙量平时是 37.6kg/m^3，汛期达 50kg/m^3。约 4 亿吨沉积到下游河床，逐年河床升高，现已达平均高出地面 4-6m，成为非常可怕的“地上悬河”，真叫“黄河之水天上来”。为了冲沙入海，每年要用 150 亿 m^3 的水，使本来缺水的高原地区更缺水。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水土俱失！

世界水土流失年总量是 600 亿吨，中国占 1/12，是最严重的国家。中科院副院长，院士杜祥琬透露中国不同程度水土流失，已占到耕地的 43%。每年 50 亿吨泥沙入江河湖海，造成 50 年来兴修水库库容大为减少，仅四川省就损失 1 亿 M^3，相当每年损失一座大型水库。长江大、中、小水库淤积分别为 5.04%，9.36%和 21.4%总损失是 14 亿 M^3。自然湖泊受害严重，八百里洞庭，解放前水面为 4350 平方公里，1977 年只有 2740 平方公里，到现在只见芦苇，难见碧波。河北白洋淀更是干涸得底朝天。

由水土流失造成航程缩短，长江（包括支流）由 7 万公里（1957 年）减至 3-4 万公里（90 年代），并引发地质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水流更是险情四伏。1982 年，川东万县地区，就发生 8 万处。1975-1984 年十年间全国 18 个省市因泥石流死亡 2136 人，毁田 4.38 万亩。

5、沙漠化。全球沙漠面积为 3140 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 21%，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面积的总和，并以每年 3__7 万平方公里速度在扩大。半个世纪，非洲撒哈拉沙漠扩大 65 万平方公里，南部西非地区是最严重的地区。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受害。人类 1/6 的 10 亿人是住在荒漠化土地上，干燥度 D 在 7-10 之间，而沙漠则为 D＞10 以上，也就是最贫困人口地区。他们原住地已寸草不生，逃难他处，称为“生态难民”的竟超过战争难民 1490 万（2002 年），达到 2500 万（包括水危机的难民）。我国情况亦不容乐观。沙漠化速度惊人，解放前，沙漠是 66.7 万平方公里，到 1985 年扩大到 130 万平方公里，荒漠化以 4%速度递增，北方沙漠已逼近北京，最近的距天安门只 70 公里。原来寄希望于“防风固沙”的三北工程。也因降水量在年 400 毫米以下只能种草，不能种树，种树存活率只 25%，保存率只 13%而收效不显，投了 2000 亿，也未挽回颓局，北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情况已经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风沙漫天”的地步。沙尘暴频发，近 4 年发生 53 次之多。南水北调，可救燃眉，但对北方荒漠化来说，仍无济于事。如果不设法从西藏调水，荒漠化难解救。随着地球升温，今后还更加严竣。所以沙漠化问题是土危机中的最大问题。

六、气候危机

构成自然生态重要部份是大气环境，对人类生存生活有很大影响的是气候的变化和空气质量。这方面的危机表现在下述五点：

1、全球变暖。因为大气中存在适度的二氧化碳（CO_2）等温室气体，才使地球平均气温维持在 15℃左右，适合各种生物的生存。由于工业化向大气中排出大量的 CO_2，使温室气体浓度急增，其浓度已达 368PPMV，是地球 42 万年以来的最高值。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温升高。20 世纪是 1000 年中最暖的 100 年。有数据，过去 140 年间，全球平均升温 0.6℃，13 个最暖年份都出现在 1983 年以后。北极夏季每年增加 14 天，中国玉龙山雪线以每年 10m 速度上升。90 年代比 50 年代平均气温上升了 0.9℃，同期冬季上升了 1.1 度。预计 21 世纪将上升 1.4℃以上，这种气温加速上升还会从变暖发展到变热，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影响。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还有深海和冻土层中甲烷冰 CH4·8H20——可燃冰溶化与海洋吸碳能力下降有关，形成越暖越化、越化越暖的恶性循环。

澳大利亚著名科学家提姆·富兰纳瑞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在《泰晤士报》撰文指出，过去气候科学家的十大预言，几乎全部成为事实。它们是（1）地球变暖；（2）2000 年可见其迹象；（3）海平面上升；（4）冰川将融化；（5）飓风增大；（6）物种开始灭绝；（7）澳大利亚更干；（8）热带病增加；（9）粮食生产困难；（10）海洋酸化。

全球变暖已经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住在长江流域的人在上世纪 30-40 年代，年年冬天有大雪纷飞，有的年份滴水成冰。而在 60 年之后，就较少见到雪了，经常出现暖冬现象。纬度越高，升温得越快，黑龙江夏季的温度有时竟然超出长江一带。

2、臭氧层的破坏。在高出海平面 20-30 公里范围内的大气圈平流层中，有一个臭

氧含量较高的臭氧层。它虽然只占大气质量的百万分之一，但它能阻止太阳光中大量紫外线照射地球，有效地保护人类和生物的生存，称为“臭氧屏障”。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首先观测到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且正以每年一个美国的面积的速度增大。世界气象组织报告，南极臭氧层衰退已达到极限，除赤道外，其他所有地区臭氧量也在减少，中纬度地区近 30 多年来平均减少 8-10%。“第三次欧洲臭氧平流层试验公报”指出，2000 年 1-3 月间，北极上空 18 公里处的平流层里，臭氧含量累计减少了 60%，这是十年间损失最严重的一个时段。臭氧层的破坏等于给地球上空开了个大天窗，让紫外线直接照射人体与生物，使皮肤癌和白内障患者明显增多，损坏人的免疫力，使得传染病增加，生态系统也同时受害并引起光化学污染等。[27]其原因是①使用冷冻剂、喷雾剂、所排放的如氟利昂、氯代甲烷、四氯化碳等同臭氧能发生分解反应；②高空飞行器排放的氧化氮气体（飞机废气）也与臭氧发生化合反应而消耗臭氧；③大量含氮燃料的使用所产生的氧化氮和氧化亚氮，进入平流层后发生反应，消耗臭氧，估计臭氧减少 15%。相关研究认为，臭氧减少 1%，紫外线强度就增加 2%。臭氧层的破坏是个无可挽回、日益扩大的过程，对人类生存具有巨大的威胁。[28]

3、异常气候灾害。飓（台）风，英文 hurricane，词源是加勒比海地区传说中“罪恶之神”。飓风是西半球称谓，台风是西太平洋地区说法，即风速到 33m/秒以上的热带气旋。它分五级，5 级就是“顶级杀手”，时速超过 249 公里，海浪高达 5.5M 以上，所经之处，房倒屋摧，连根拔树，并伴随暴雨，导致洪涝灾害，甚至引发山崩、海啸、泥石流。在美国 1992 年“安德鲁”飓风造成 265 亿美元损失。2005 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则使美国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两个州成为重灾区，新奥尔良市顿成泽国，情景如同原子弹摧毁广岛一样。死难人数为 1069 人，100 多万人紧急逃离，损失财产 1500 亿美元。

2004 年印度洋发生的地震海啸，影响到东南亚、南亚、东非 10 多个国家，近 15 万人死亡，受灾最重的是印尼（死 9.4 万）、斯里兰卡（死 3.5 万）、印度（约 1 万）和泰国（死 5246 人）。虽说这种由地震引起的海啸是人无法阻挡的，但受灾各国的预警系统的欠缺和信息之不灵加重了灾情则是显然的。

近两年由台风引起的特大水灾，热带雨林国家水灾频发。孟加拉可说是年年有水灾，中国东南沿海更是洪灾不断，仅 2007 年上半年就 10544.8 万人受灾，死亡 425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6429.7 公顷，绝收 1/6。而且不仅沿海省份，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省也深受水灾之害。

旱灾方面，最为严重的是撒哈拉沙漠周围地区，80 年代初，大旱遍及 34 个国家，1 亿人口遭受着饥饿与绝粮。其次中国，1950-1986 年，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 1.1 亿亩，后阶段 1978-1986 年，每年旱灾面积达 2 亿亩。连北美，澳洲也已出现大旱现象。

热浪方面，2006 年，40℃高温让欧洲人热昏。英国夏天凉爽，历史上 7 月份最高温度是 1911 年，曾有过 36℃的纪录。可是到 2006 年，地铁温度达到 47℃，英国人开

始用扇子了！

在法国，2003 年因高温发生 1500 人患病死亡的悲剧，2007 年直接中暑死亡者达 40 人。半个法国发出橙色最高级别的警报，实行抗暑全民总动员。

2006 年在美国，加州最高气温达到 51℃，造成 141 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牛热死。个别地方弗雷斯诺县甚至持续 2 周的 44℃以上。

在西班牙，河水温度升高不能用于核电站冷却，不得不关闭核电站，电力不足，热魔更肆虐，恶性循环。这年欧洲空调脱销。

再看亚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南部温度比常年高 3 度，中国中部比以往高出 5 度，南美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及巴西气温比平时高 7 度。

而在 2007 年夏季，意大利达到 45-47℃的水平。有些人受不了高温就自杀，也时有所闻。美东部达到 47℃，拉斯韦加斯竟到了 70℃。

4、大气污染。空气中所含污染物达到有害程度，超过环境质量标准为大气污染。目前已知污染物有 100 多种，按存在状态分为两大类：一是气溶胶状态污染物，主要有粉尘、烟液滴、降尘、飘尘、悬浮物等；一是气体状态污染物，主要有以二氧化硫为主的氧化合物，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合物，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氧化合物以及碳氢结合的碳氢化合物，还有有机污染物。由于新开发物质的层出不穷，今后其品种与数量只会有增无减。

大气中有害物质，浓度越高，污染就越严重。这种浓度，除由排放总量决定，还受排放源高度、气象与地形有关，形成不同的污染状态。风大，稀释得越快，但范围更广，扩大污染面。风小，污染浓度增高，往往造成严重大气污染事件。降水，本可对大气产生净化作用，但污染物又会造成酸雨，污染水体和土壤。地形复杂，形成局部地区热力环境，如山谷风，海陆风和城市的热岛效应；盆地，烟气不易扩散，烟云缭绕，经久不散；沿海沿湖地区，则依风向形成污染带等等。总之，只要大气中存在污染物，就避免不了它的各种存在形态，对人类构成本质相同，形式各异的污染。

七、物种灭绝危机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生态的基础，而物种则是在生殖上相互隔离的自然种群，构成生物存在、进化的基本单元；相同物种的同质性、繁衍性与不同物种的异质性、竞争性，构成物种的多样性是物种存在、发展、或退化，灭绝的生态过程。对于人类来说，动植物物种构成，是自然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约 35 亿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地球上总共形成 500-1000 万种由低等到高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在不同地质年代中，有更多的物种已经自然灭绝，但由于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统治、索取和杀（对动物）、伐（对植物），打破原来物种形成与灭绝相对平衡与稳定状态。如脊椎动物每 3000 年形成一个新物种，同时又灭绝一个老物种。但是在地球上人口激增、科技大发展的近 200-300 年来，物种形成速率大为下降，而灭绝速度却急剧加快。从人类有记录以来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情况是：在 1600-1950 年间，灭绝了约 113 种鸟和 83 种哺乳动物，灭绝

速度较前增长了 4 倍；在 1850-1950 年间，平均每年灭绝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 1.3 万个鸟类和哺育动物物种之中，灭绝速度是原来的 1000 倍。按当前灭速继续发展下去，则每 10 年地球将失去 5-10%的物种。这个速度是自 6500 万年前白垩纪末期地球最后一次包括恐龙在内的物种大灭绝事件以来的最高速度。具体地说，到 2020 年，地球物种将被灭绝 5-15%，而对现存的约 1000 万个物种来说，每年将灭绝 1500-5000 种，就是每天在灭绝 50-150 种。

据 1987 年的“世界资源报告”提供资料。人类所知的 160 万种动植物中，50 年后，将消失一半以上。美国哈佛大学昆虫学教授爱得华·威尔逊指出，人类目前尚未认识的物种数量更多，可能高达 3000 万种，更多的小物种人类未发现就会被消灭，而这些生物是不可缺少的生态链条。它们（包括微生物）在地表肥化土壤、制造空气，维持地球生态的平衡。因为仅只多种昆虫和节肢动物在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方面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它们都灭绝了，人类只能存活几个月。

由此，启迪共生论者觉悟到，物之异于己者，虽至微至小，人们往往不屑一顾，而其存在，利于己者，都至广至大，认识之未及也。“铲除异己、必祸自身”，非但人事如此，物事亦然，此乃自然规律，善待万物，生态平衡，共生之道也。

然而，正是因为人们的短浅眼光和有利可图的商业机制，导致贪欲无厌、乱砍乱伐、滥捕滥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计后果地破坏自然，才有以上七种危机的存在。它们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恶性循环，造成自然生态的总体性危机。幸得自然科学的发达，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切，在危机加深的新世纪到来之前即开始全球性的保护生态的行动，在联合国的号召与实际推动下，各国政府也都积极行动起来。环保主义者，动植物保护主义者的组织遍及全球，奔走呼号“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使世人已经认识到环保是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愿望并日益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这是克服危机的希望所在。

造成自然生态危机的是人，解铃还需系铃人。摆明生态危机的客观严重性，是为了人类应彻底地放弃已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予取予夺，不要再当自然的霸主，而要与自然平等共生，天人共生。才不会破坏人类共生的基础——自然生态。

共生论者对克服自然生态危机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人类在面对自然生态危机面前，利益是一致的，认识也会趋于一致，共同应对。“天作孽，犹可活“，以现在高科技发展水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改变生产模式、实行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困难并不比办法多。如能源危机，可以节约能源、开发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原子能，甚至牛粪也可以发电（以色列）。森林植被危机，可以种树、种草，保护湿地等，最后还要改变沙漠。矿产资源危机可以深探细找，还可上其他星球上去发现，去开采。物种危机，也可用抢救濒危物种，运用生物工程、基因工程改进或开发新物种等等。问题在于人类本身未能共生，遑及这些需要全球来解决的危机。集全球智力、财力、人力去克服自然生态危机还是可能的，而置环境于不顾的各种争

斗与贪利的权力和财力不能用于谋人类的共同利益上来则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已经把自然环境弄得如此不堪，再也不能走放肆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的老路了。

作为本节结尾，将所述七个方面危机绘制一简单的自然生态危机关系图式，以作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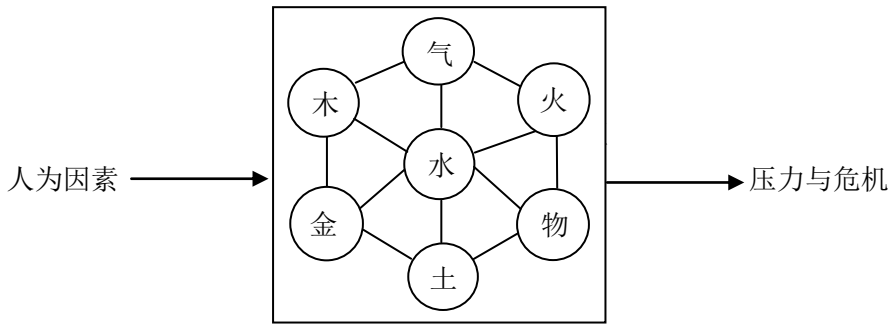

图 3-1

文字说明：

1、人为因素：无厌的索取，不计后果的破坏自然，有利必图的商业机制，超级的享受与浪费，缺乏与自然共生的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等等。

2、生态恶化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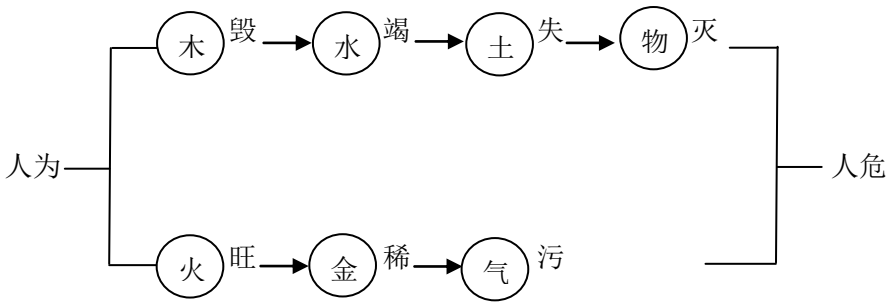

图 3-2

3、木毁：毁坏森林、草原

水竭：淡水枯涸、咸水上涨、一边旱，一边涝。

土失：沙漠化、贫瘠化

物灭：灭绝物种（动植物、微生物）

火旺：工业火、森林火、战火

金稀：矿产枯竭

气污：酸雨、温室效应——地球变暖、气候异常、核辐射污染

4、结论是：人为人危、尽做些自己危害自己的事。唯一的解救方法是节能、节水、节物。减排：排污气、污水、污物。物尽其用，循环利用，保护生态，天人共生！

第六节　恶性传染病与麻醉品滥用的危机

历史上造成人类的灾难除了战争，屠杀、自然灾害以外，就莫过于恶性传染病（瘟疫）了。像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热带的疟疾、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都曾经使一些民族处于濒危，死者动辙几十万，而有些传染病如结核病、麻疯病则困扰着各民族很多世纪。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传统传染病逐步能得到控制与治疗，保证了现代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但新的恶性传染病又不断出现。上个世纪，最严重的 1918 年，在西班牙发生而传播到欧洲全境和北美的世界性流感就夺去了 2000 万人的生命，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一倍之多。1957 年和 1968 年的亚洲流感也造成 150 多万人死亡。新世纪威胁着人类的恶性传染病，当数艾滋病、人禽流感和 2003 年一度造成世界性恐慌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好在如今世界人民有个“世界卫生组织”（WHO），它是全人类的总卫生部，对于恶性传染病的疫情掌握、普及防疫知识、组织抗疫活动，督促、协调各国行动等方面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传染病的世界性、无国界性，客观上也帮助人们树立全球防疫意识，产生人类共生共识一支先遣队，在对抗疾病领域里先联合起来。

麻醉品滥用（即吸毒）危机和恶性传染病有其相似之处。吸毒一样带传染性，只不过后者是细菌，病毒入侵人体，前者得经过“人”的传导，患者“引毒入身”，自找麻烦与死亡而已。毒瘾本身就是一种生理、心理疾病。二者分述如后。

一、恶性传染病

所谓恶性传染病是指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的需要严加控制与防范的传染病。依其严重程度、发病速度由国家防疫法规定分为三类，实指控制力度的分类，不是病种的医学分类。甲类：鼠疫、霍乱。乙类：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人禽流感、麻疹、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淋病、梅毒、血吸虫病、疟疾等 25 种。丙类：流行性感冒、腮腺炎、黑热病、麻风病等 10 种。新世纪带全局性的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是艾滋病、SARS 和禽流感三种。

1、艾滋病。它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它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难以治愈的感染导致死亡。它的最大问题是感染者并不立刻有反应，而是携带病毒在 1—2 个月后才能从血液中检测出病毒抗体。传染前携带病毒者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发病前的潜伏期能达到 7—10 年之久。他们通过血液——对抽血、输血的人、乳汁——对婴儿、体液——对接吻、性交者，传播艾滋病病毒。也就是说，发病前已将大量病毒传播出去，感染者并不觉查，而发病以后，至今无有效方法治愈这种病，成为迟早要死的绝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2007 年艾滋病疫情的更新报告，用改进后的估算方法，估计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共有 3320 万人，2006 年为 3270 万人。一年

增加 50 万人，非洲情况最为严重，约有 2250 万人，占全球 68%。南非 4000 万人，感染者 800 万，达到 1/5。八个非洲国家，新增与死亡人数均为全球总数 1/3。亚洲国家有感染者 490 万人，死亡 30 万。印度尼西亚是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越南近五年也翻了一番。到 2003 年全球有记录艾滋病累计死亡 2500 万，何等惊人！

中国疫情在 2007 年 12 月 1 日发布，“除云南外，新疆、广西、四川、河南、广东等省区估计都达到或超过 4 万例。”就这 6 省区即达 24 万人以上，其他各省呢？其中云南注射毒品者中感染率高达 80%，中国正面临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如何将疫情数量化和准确化则是对政府与卫生部门的考验。有联合国卫生官员已警告，若是中国艾滋病人超过 1000 万，则全部经济建设成就将付之东流。问题不在于艾滋病人有多少，而在于不知道以多快的速度在传染，不去查明疫情的漠视与敷衍，甚至隐瞒的态度比艾滋病本身更为可怕。

对于庞大的艾滋病感染者群体，他们多数是通过卖血和输血中被动感染的无辜者，有的则如同梅毒、淋病一样，是由性混乱自染的，特别是通过母乳传染的婴幼儿们最为可怜，都面对着或迟或早的死亡命运。他们日子怎么过？人们又怎样对待他们，这是对人类同情病患者的爱心考验。人们如果远离他们，歧视他们则是加速他们的死亡。于心何忍？国际社会开展“红丝带”运动，深得患者和世界民心。除了寄希望于医学科学家加速研究防治艾滋病药物和疫苗外，社会和政府更需多加实际援助。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将提高人类人道主义的水平和荣光。

2、非典型性肺炎。发生在 2003 年的 SARS 病，中国简称之为“非典”。它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病毒。俄罗斯病毒学家认定是麻疹与腮腺炎病毒合成，只能在实验室中找到，自然环境中不可能，也就是说是人为制造的病毒。此论未见不同意见，应可认同。这种病毒以其高传染性、发病急、死亡快的特点一时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首见病例为 2002 年 11 月 26 日，佛山市死了一个河源农民，一个鸡贩。另有三人：一个养猪农民，一个海鲜贩子，一个 10 岁男孩送到广州医院，相继死亡，传染医护人员 5 人。2003 年 2 月 11 日广州中山二院刘建伦医生到香港，在电梯上传染 7 人：一个多伦多 78 岁老太太，回国后该地即发现感染者；一个美国商人，次日到越南即发病；三个新加坡女人；一个香港男人；一个温哥华人。香港这种国际都会的大流动量，在不到半年时间，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越南、新加坡、泰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 15 个国家都发现疫情。[29]香港为重灾区，感染者 530 人，死亡 13 人。全球总患病数为 8422 人，死亡 990 人。中国大陆患病数 928 人，死亡 373 人。台湾患者 660 人，死亡 81 人。一时之间，因感染速度惊人，死亡率高。闻“非”色变，惶恐万状。这种病毒在空气中存活时间很短，只要实行严格隔离与环境消毒，不会大规模传播。经国际社会和中国军民，尤其是医护人员奋力拼搏，终于在 6 月份基本控制，得免于更大灾难，但“延迟处理”，未能让世界卫生组织及早进入疫区查验，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教训还不在于 SARS，而在于头脑里有“死人事小，面子事大，内外有别”

的“病毒”，缺乏全球观念。SARS 可是没有国界的！

3、人禽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_5N_1）是又一恶性传染病。它是由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亚型引起的传染性病综合症，被国际兽医局定为 A 类（即甲类）传染病，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感染鸡群往往在很短时期内全部死亡。最早记录在 1878 年，意大利发生鸡群大量死亡。到 1955 年，科学家才证实其致病病毒为甲型流感病毒。根据其表面蛋白质不同被分为 H_1—H_{15} 十五种亚型，其中对鸡鸭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H_1 和 H_7 的亚型，对人则为 H_5N_1，H_7N_2、H_7N_3、H_7N_7 等型病毒，以 H_5N_1 最为严重。100 多年来，人类对人禽流感并未找出更好的治疗手段，因而致死的颇多，只有严格封锁疫区，灭杀鸡群，对环境实施消毒等方法，不使其蔓延。

禽流感病毒在寒冷天气条件下（4℃以下），在鸡的排泄物中可存活 35 天，在 37℃以上高温条件下只能存活 6 天。当欧亚候鸟天鹅、雁群、火烈鸟每年越冬飞行时，就会把病毒带到温带、热带，先是发鸡瘟，后感染到人。自 1997 年香港死于该病 6 例以来，到 2007 年，在全球确诊的 291 例中，共死亡 172 人。其中以亚洲印尼最为严重，81 例，死 77 人；越南第二，92 例，死 42 人；埃及 18 例，死 14 人；泰国 18 例，死 13 人；东埔寨 6 例，老挝 2 例，全都死亡，说明它的死亡率极高。WHO 公布的死亡率为 59.1%，是对生命威胁极大的传染病。

禽流感病毒的变异性令人担忧，H_5N_1 病毒在 1959 年英格兰发现，以前是没有的。

所有恶性传染病虽其等级不同，防治效果各异，现在虽然控制了许多种，但它们的变异会带来何等后果，很难说不会出现与 SARS 和人禽流感不同的新病种。人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才会免于突发性的危机。

以上三种，长期危害还是以艾滋病为主，而在某些地区，像非洲传统传染病仍然不时流行，也急待努力解决。

除了恶性传染病以外，还有一种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病，姑且名之为“污染病”，即环境污染中有毒物质侵入人体所导致的病症，也会日益显露其危机性。上世纪所发生的有毒物质进入人体后，造成新的病种，症状特异，引起人们对污染致病的严重关切。这里简要地用典型事例说明如下：

上世纪 50 年代在日本发生的水俣（yǔ）病。1925 年水俣镇建造一座氮肥厂，常年排放含汞废水，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剧毒性的甲基汞，而且毒性是永久性的。它直接溶于高脂肪鱼类、贝类和其他生物体内，先是猫捕食了含甲基汞的鱼贝，1950 年，发现一些猫行动反常，步态不稳，抽筋麻痹，最后跳水而亡。1953 年，有一个人由口齿不清、步履不稳、肌肉震颤到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神经失常，惨痛而死。1955—1961 年间患者达 87 人，都是因食用了含甲基汞的鱼贝所致。甲基汞能阻碍细胞新陈代谢，造成神经功能紊乱、言语错讹、视力模糊、精神失常，最后在痉挛中死去，这种病症便称为水俣病。

在日本富山神通川上游有座炼锌厂，把含镉的废水排入河中，农民用这种水灌溉

农田，使镉附集于稻米之内，成为“镉米”。人食用后，逐渐引起镉中毒，患上“骨痛病”。1955 年，一些人从关节痛到全身骨痛，最后骨骼软化、萎缩，疼痛而死。医生们对一尸体进行解剖时竟发现，全身有 73 处骨折，一碰就碎，何等骇人！[30]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原苏联基辅地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反应堆爆炸，带有严重放射性污染物质随风飘荡，把死亡威胁带给东欧各国，大量人禽因受到放射性物质伤害，产生后遗症类的辐射病变而死亡。应该说，这也是“污染病”的一种。

至于直接由酸雨、毒雾，各种污染物质产生的中毒，在较短时间死、伤、病、残，虽然如日本米糠油事件（受害者 13000 人），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泄毒事件（20 多万人受害，2500 人“电击型”死亡），死亡枕藉，症状显著，但属于直接中毒，像食物中毒一样，就不能列入“污染病”了。笔者提出“污染病”的概念，旨在重视环境污染对人体病症的关联性，警惕污染物摄入人体的潜伏成长期中的各种变异性病变的发生。未知能得到生物化学、病理学家们的认可否？敬待指正。

二、麻醉品滥用的危机

国际上把吸毒称为麻醉品滥用，因为麻醉品，如吗啡、可卡因这些麻醉品用于医疗，有镇痛、抑制神经活动的作用，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滥用并成瘾，就会产生慢性自杀的后果。吸毒对生命健康的损害，并不亚于某些夺命的病症。尤其对青少年一代，为害至烈。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大公害。

1、毒品扩散的三环节

毒品扩散与武器扩散有相似之处，不过一个是满足“快乐的”接受自戕、自杀的吸毒者的需要；一个是满足谋求杀人的人的需要。前者是个人的选择，后者是国家政权的影响，都是致生命于毁灭。吸毒问题主要由三个环节构成：吸毒人群的强烈需求，毒品市场的扩大——贩毒走私谋暴利者的无孔不入——种植国的经济利益和种植地区农民的生计。据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提出的《1997 年度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发布的数据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十年来仍然存在汹涌的暗流，为害人类。

（1）吸毒人数迅速扩大。吸毒人数已占世界人口总数 1/100，即 6000 万之多。其中，1300 万人服用可卡因，800 万人吸海洛因，人工合成毒品增长最快，服用安非他明（冰毒）已达 3000 万人。吸毒人群每年以 3%—4%的速度在增长。吸毒低龄化问题严重，美国服用大麻少年年龄已降到 14 岁；8 年级学生人服用大麻与可卡因人数，1991—1994 年，三年翻了一番。中国少年十几岁就有吸毒者，中外无异。中国在 1992 年统计成年人吸毒数不足 1 万，1997 年过 10 万，到 2006 年过 100 万。根据毒品统计规律，发现 1 个吸毒者与背后未查明的隐性吸毒者比例为 1∶5，中国就有 500 万。全球经常与不经常吸毒人数达到 2 亿，形成巨大的毒品销售市场，美国毒品消费量占世界 60%以上，每年用于吸毒资金达 670 亿美元。

（2）毒贩猖狂，走私猖獗。全球毒品贸易额达到 4000 亿美元，仅次于军火贸易额，而高出石油贸易额。仅 1995 年，查获走私毒品总计为 305 吨，包括可卡因 251 吨，

海洛因 31 吨，吗啡 13 吨，与总产量 1700 吨相比，为 17.94%，未查获的达 82.06%。这种逃避国际刑警和各国缉毒警察监控的地下走私网络，系由无数贩毒集团联系广大的个体毒贩所组成。仅以印尼加卡尔贩毒集团为例，成员有 12 个国家的人，即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美国、尼日利亚、波黑、肯尼亚。它的原料运输线：由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从“银新月”地区进货，（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山区连片种植区，如同新月，故称）中经吉尔吉特市——苏斯特口岸，用汽车或空运至中国乌鲁木齐、兰州、转运至广州、香港到印尼总部，加工提纯为海洛因、吗啡等成品，稀释、分装，销往世界各地。贩毒集团资金雄厚，可以用 4500 美元/1000 克高运费给毒贩。他们雇用黑人或当地妇女，单线联系，以人体携带为主，用手机暗号，体内藏匿等各种伎俩，通关过卡，获取暴利；即使查获，也找不到发货收货两头案犯。

更为嚣张的是中南美产地贩毒集团，海上走私，经常以吨计，有船只，还有飞机，由中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国中转，直销欧美。南美产地国哥伦比亚尤为突出，罪恶昭彰的“贩毒王国”卡利和麦德林贩毒集团都是拥有数千名武装，长期与政府军对抗，形成国中国。80 年代覆灭后，由北瓦利贩毒集团接着干，通过墨西哥和中美国家，用潜艇、飞机向纽约、西班牙等处发运，每月平均达 20 吨。2006 年 6 月，哥政府捕获其二号毒王伦顿及 34 名党羽，捣毁其巢穴，缴获 12 架飞机。墨西哥贩毒集团仅内讧就造成 500 多人死亡，头号毒枭彼森特·卡里略，被称为“空中霸主”，用波音 727 向美国运送可卡因，可见其规模之大，秘密通道之诡谲。

在亚洲、缅甸沙坤曾是世界头号大毒枭，他统治着一个邦，实行的是缅北民族邦地区传统的“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政策，政府也无可奈何，那里无须暗道走私，像正常贸易一样，只发货就是。他死后，魏学刚在掸邦地区效法沙坤，成为亚洲头号毒枭。他的陆上销售路线有 19 条，包括我国云南边境。泰国有 5 条，使一个 6300 万人口的国家，吸毒者占 5%，严重上瘾者达 70 万人，贩毒团伙 622 个，年销售“疯药”（摇头丸）6 亿粒。毒品祸邻，如斯之甚。

（3）原料的充沛，烟农的生计。世界有四大毒品原料产地：金三角、银新月、银三角及黎巴嫩贝卡谷地。金三角指缅甸、泰国、老挝三国北部边境山地，盛产罂粟，初级产品，即鸦片；提纯品，即海洛因（白面）。加上银新月地区，1985 年种植面积共为 11.7 万公顷，到 1996 年，扩大到 25.2 万公顷。即全球总种植面积 39.2 万公顷的 64%。产量则翻了三番。银三角指南美哥伦比亚、秘鲁、波利维亚山区，盛产大麻，古柯，可吸食，提纯制成可卡因、吗啡。种植面积 14 万公顷，产量翻一番，达到 1000 吨。以上数字说明，仅罂粟、大麻的种植就足以害苦人类，何况还有人工合成的毒品。冰毒就是去氧麻黄素，更不能用种植面积来计算，可说是取之不尽。1980 年后第四产毒国黎巴嫩从一个山地小国跃为毒品生产大国并形成毒品中转集散地。联合国和各国通过 1991—2000 年的禁毒十年活动，可说是尽心竭力，但仍不能遏制吸、贩、种、制毒

的势头。毒品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其中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烟农的生计问题。罂粟、大麻种植区的农民，多为贫瘠山地，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种植习惯，生计全靠此道。虽然他们在近 4000 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并没有得到一两烟土一两黄金，哪怕是 1/1000 的销售价，而是如同五谷杂粮一样贱卖出去，仅供糊口，得暴利的都是制毒、贩毒的不法之徒。毒品问题除禁贩，打击走私解决中介环节和严格禁吸两个环节而外，重要的是要把种罂粟改变为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能够改善烟农生活。数十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就养活着成百万的烟农，本身就是个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一般地说，产烟国多是欠发达国家，无财力、技术、能力去改变这一现实。国际社会要会同生产国从改变生产产品入手，以资金和技术力量支援这些生产国。如阿富汗政府明确表态不种毒，这就要国际社会大力解决它的烟农的生计问题，才是长久之计。否则，威胁人类的毒品生产的客观条件始终存在。

2、毒品与其他危险领域的关联

一般论及毒品的危害是从个人、家庭、国家、民族角度去观察，得出结论多是家破人亡，国弱民穷。若是从全人类角度去观察，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毒之为祸，殃及人类的宝贵生命、和平生活、经济发展、全球共生。1/100 人口的吸毒者影响所及，至少把 1/10 的人口拖入灾难与危机，耗费几百万人的去从事禁毒、缉毒、戒毒、治毒工作和数以千亿计的财产损失。因此，必须把毒祸与人类面临的危机联系起来考查，毒祸危害生命与健康，降低免疫力，削弱身体素质，扩大传染病，导致犯罪率上升，冲击道德底线，阻碍社会发展，直至引起武装冲突，内乱内战，与恐怖主义相利用、勾结，等等。无一不是在危害人类，仅从四个最为严重方面述之。

（1）与传染病的关联：吸毒人群普遍精神萎靡，体质孱弱，免疫力很低，成为传染病首当其冲的对象，如肺结核、海洛因肺气肿、肝炎、脑膜炎等等，最为严重的是与艾滋病的关联。有 22%的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携带者为吸毒人。通过血液传染的艾滋病，在吸毒与卖淫人群中找到它的最好的扩散渠道，而吸毒与卖淫又是互为因果的。全世界直接死于吸毒者每年为十万以上，而感染着其他病症死亡十倍于此。

（2）与刑事犯罪的关联。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其国的正常生产、生活的秩序的行为规范的最低标准，就是刑法，触犯刑法的就为犯罪。吸毒与犯罪可说是密不可分。因为吸毒成瘾，不吸像猫子抓心，千蚁啃肉。而毒品又异常昂贵，一天可以花几个月所得。只有千方百计，无不其极地弄钱买毒，有多少得花多少，直到倾家荡产，卖妻卖女，甚至发生兄弟卖妈妈去吸毒的事例[31]。没有钱，就由借而偷，由偷而盗，由盗而劫，诈骗，杀人，男的走强盗的路，女的走娼妓的路，更普遍的走以贩养吸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吸毒人群，在罪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直至因毒而死，因刑而死。据美国司法研究所一项对犯人吸毒检测化验结果表明，在犯有暴力罪或谋财罪的案犯中，至少有 45%使用过一种或一种以上毒品；费城男犯人中吸食可卡因的高达 75%，82%兼用过其他毒品。英国调查有一半吸毒者靠犯罪取得毒资；而在贩毒集团对抗反

毒行动中，哥伦比亚从 1980—1989 十年间，被毒贩暗杀的人数就达到 14719 人，包括一位部长、一位省长和 72 名法官。在吸毒者方面，吸毒团伙也就成了犯罪团伙，西安一起吸毒团伙案，9 个月中即盗窃作案 72 起，盗窃财物价值 17.6 万元，大部分用于吸毒。一些青少年发展到以卖毒、卖淫养吸。他们常与零星毒贩相互勾结，不择手段引诱，教唆，威胁他人吸食毒品，使吸毒成风。许多毒徒进入了地下贩毒网络，贻害一方。

（3）与恐怖主义的关联。所有恐怖组织都要筹集资金，其中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贩毒。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基地组织利用毒品走私大量赚取外汇，扩充经费，用以购买先进武器，进行恐怖活动，实行“以毒养恐”毒恐结合的路线，而使贩毒势力大为膨胀，出现“毒品恐怖主义”。他们在世界各地进行毒品与武器的交易。这种人类自杀与杀人的“商品”交易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与反政府武装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也使暴力“革命”与暴力暴富结合，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祸害。地下的武器走私与毒品走私网络，有时就是合二为一，有时是并行不悖的。

（4）与生态危机的关联。为了扩大毒品种植面积，大批毁坏森林植被，把本可荫庇子孙的林地变成毒化人类的源头，该是多么可悲的事。大麻烟气含有致癌物质，比一般烟草致癌率高出七成。吸毒人群每日里吞云吐雾，纯属污染空气，至于在制毒过程，所排出的有毒物质和废水，又污染着水源，危害生态，不一而足。

综上四点，可以看出毒品是人类的一大毒瘤，它是从种植——生产——贩毒——吸毒全过程地危害着人类，促进、加速各种祸害的到来，全球各国、各族、各教只有齐心协力，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施行，务见实效，才能免除毒祸。

3、爱惜生命，拒绝毒品[32]

青少年是人类的未来，美好世界靠他们来实现，但他们都不知道人生的道路上又有多少诱惑与陷阱，这都是前辈和我们这代人留给他们的负面遗产，毒祸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特有诱惑力和最深的陷阱。如果我们这一两代人不能遏止住毒品的蔓延，未能挽救住吸毒人群的生命，就是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

共生论者是珍惜每个人生命的，为人类人杀人而痛心疾首，更为自杀者而惋惜伤悲！吸毒恰恰是一条慢性自杀的不归路，并且在毒瘾发作、索取线财时会成为杀人犯，甚至是包括自己的至亲。美国就有一吸毒母亲杀死两个女儿的惨案，世间还有比这更悲惨而又可憎的事么？

有个流行的提法，“远离毒品”，但毒品并不远离你，就在你的社区、街道、村落里。似应该改为“正视毒害”或“拒绝毒品”才会理性地去防毒禁毒，而“跟着感觉走”的时尚则是误导青少年走进陷阱而犹自得其乐。这个所谓“感觉”就是吸毒时的一身轻松，飘若登仙，不知痛苦，无所畏惧的“过瘾”状态。若要不吸，马上就是另一种感觉，可以砍下自己被锁住的手也要逃走去吸毒。这就是人对麻醉药品的严重依赖性。它的药理是吗啡呔取代了人体能自生的类啡呔维持脑神经稳定的作用，若是不

吸取吗啡吆，人就如疯如狂地浮躁不安，不顾一切，势在必吸，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在世界反毒禁毒行动中，对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其中尤其要对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防止染毒的全球义务教育，使青少年不致成为吸毒人群的新生代。首先认清毒品的危害，在未接触毒品时便树立防毒意识，不要让他们吸“第一口”；要比预防传染病还要警觉地防止毒品对他们的侵害。教育中要突出两方面内容：一是知晓毒品的危害，它和生命的关系；二是染毒的具体途径，在何情境和心态中会染上毒瘾。要在亿万青少年的心中筑起一道防毒、拒毒的万里长城，我们青少年才能在他们一生中避免掉进毒品的深渊。

笔者根据亲身对毒品犯罪的调查研究。总结出十条致死路和 20 种染毒情况，这是无数吸毒者的生命和血泪凝成的教训，不得不提供青少年及其家长们参考。

（1）吸毒致死路：①染上毒瘾，绝大多数只能活十年；②过量致死；③虚脱致死；④感染艾滋病致死；⑤呼吸道感染致死；⑥肝脏感染致死；⑦六成脑病致死；⑧不堪毒瘾折磨自杀致死；⑨为筹毒资，谋财害命，法所不容，判死刑；⑩以贩养吸，罪加一等，也是死路（后二者根据中国刑法），条条路通向死亡[33]。

（2）染毒 20 种情况：①未知事物对青少年特别具有吸引力，70%的初染者是好奇心驱使，看到别人吸，总想尝一口。②最易染毒者是烟民，抽香烟的人已有尼古丁依赖，染毒只一步之遥，都是刺激神经。吸用方式相同，轻车熟路，烟民是吸毒的后备队伍。因为冰毒、可卡因、海洛因毒性即其成瘾性——药品依赖性大于鸦片 100 倍，鸦片烟大于香烟 100 倍。一般常人可以戒烟，但吸毒者绝难戒毒，便是这个道理。全球烟民总数是 13 亿人，普遍禁烟不仅对烟民有保护健康的作用，而且对禁毒也起到减少后备队的作用。③从众心理，青少年聚集一起，多数吸，少数也就跟着吸，说不出理由，跟着玩。④追星族对偶象的崇拜。明星的演技学不到，学其吸毒倒学得快，一吸上口，就进入成瘾的快车道。⑤讲时髦，社会上有歪风鼓动，“不会吸赶不上新潮”。⑥富者摆阔气，中国汉口汉正街，第一批致富者盛宴时，最后一道菜，就是“白粉”，其结果没几个不栽在吸毒上。⑦情侣中有一个吸，就不愁另一个不吸。⑧家长吸毒，子女们也就学着吸，家长传染给青少年比例高达 70%以上。⑨社区村寨吸毒者扎成团，也最易发生“滚雪球”式传毒染毒。⑩影视录像传媒的影响，如摇头丸舞会终夜不散疯狂的场面，刺激稚嫩的心灵，很少不上当的。⑪毒黄相长。凡吸毒者，淫心特重，不知羞耻为何物，有舞伴，性伴吸毒，很少能逃脱吸毒的命运。⑫失恋时的苦闷心情，感情脆弱的人，把酒消愁不够，吸毒则完全可以忘记痛苦，这样染毒的人不少。⑬受到挫折时，意志不坚强，为逃避现实也容易吸毒。⑭人生得意时，自己为自己喝彩，锦上添毒的也有。⑮生病、伤痛时，为镇痛，稍为过量或多次使用，也能染上毒瘾。⑯受人诱骗，如“止痛烟”实际是毒品，或是勾引异性，或是报复，或是扩大毒徒成员，都可设置这种陷阱。⑰为赌气，夫妻间、上下级，就有用吸毒的方法来打击对方。有个惨痛教训是一位缉毒英雄竟也成为毒徒。⑱为了应酬交往，出于人情、面子而沾染。

这样人比例还不小，占 16%，这种多是成年人。⑲自认坚强，不信能成瘾的科学道理，也陷入其中。⑳生活无目的，看事悲观，自我封闭，用毒品麻醉自己的人，常选择这条道路。

记住染毒关，不吸第一口。这是生与死的选择。警惕啊！世人，青少年们。

对于已经染上毒的 6000 万人，除非你们真的不想活，就下定最大决心，戒掉毒瘾，战胜自己。从难度来说，战胜自己比战胜他人要困难得多，何况你们有强烈的生理和心理的毒品依赖性？缉毒有英雄，超乎常人；戒毒也是英雄，超乎同类。其意义等于救人类一分子的命。吸毒者，快点戒毒挽救自己的生命吧！亲人们在等待你，社会在帮助你，世界也在等待你！6000 万，多么巨大数量的人们啊！只有你们的实际戒毒行动，才能最后消除人间的毒害。

最后，不能不在这里指出吸烟对生命健康的危害，每年死于因吸烟而引起的癌症、肺结核、心脑疾病等达到 500 万人。超过全球死于结核病人数。联合国专家预计，2020 年死亡人数将达到 1000 万人；2025 年，烟民将超过 17 亿；2030 年，西太平洋地区死亡数将上升 4 倍。在全球 13 亿烟民中，中国有 3.5 亿，每年死亡于吸烟而致疾病达 120 万人，占全球总数 1/4。人们总认为烟草业对国民经济有很大贡献，其实，这种贡献远不能抵销对家庭、公共健康、环境等开支的损失，GDP 上去了，3.5 亿人健康状况下降了。

与烟民一起生活、工作或交往的人们，处在吸烟者污染空气的环境中，是不断吸入烟气的被动吸烟者，致病概率更高，估算中国有 5.4 亿人受污染，加上吸烟者，受烟害的人是 8 亿 9 千万人，占全国人口 68.46%。面对如此惊人的数字，烟民们还不应该惊醒吗？

发达国家有识之士已经把吸烟对他人的危害，提高到侵犯人权的意义上来认识。因此，普遍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受到广泛的拥护。这是文明的又一大进步，也是人类共生在一个具体领域中的进展。

第七节　属于人自身的危机

以上各节叙述了人类的灾难与危机，读者可以看出可怕的过去和堪忧的将来，但更带根源性的危机则是人自身出了问题。例如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素质下降、缺乏危机意识、普遍的信任危机、深刻的精神危机等等都在不断地影响人类共生的进程。危机是人造成的，它是人类活动及其负面后果对人本身的否定，因之，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危机，正是人们缺乏共生理性的认识与觉悟的行为才导致各种灾难与危机的发生。

一、人口数量急剧膨胀

在农牧时代，人口增长还比较缓慢。17 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后，情况大为改变。从 1830 年开始加快。当时，世界人口数量是 10 亿，其后每增加 10 亿人口的时间在缩短，试比较下列数字：

1830—1930	100 年	第二个 10 亿
1930—1960	30 年	第三个 10 亿
1960—1974	14 年	第四个 10 亿
1974—1987	13 年	第五个 10 亿
1987—1999	12 年	第六个 10 亿

世界就是以 60 亿人口数量进入新世纪，2007 年，人口已经突破了 65 亿。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与世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日益显著，成为人类社会根源性的危机，所有其他社会危机都可以从这个超载的地球找到其源头。那些越穷越多生的国家的贫困、失业、教育、疾病、债务，直至生态等等方面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都是人口不能按其国情适度增长产生的后果。而专家测算，世界现今的适度人口为 45 亿，65 亿则超过了 7 成，再过几年，一个人的饭有两个人来吃的局面就要到来。那些现在挣扎在饥饿中的人们和孩子们，就更得靠救济过日子。这种状况，在联合国的 2002 年度世界人口报告指出，到 2050 年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将增加 30 多亿，超过 81 亿，而发达地区的人口则减少到 11.8 亿。这个 1 与 8 之比，就是世界危机与灾难的人口根源。人类如果不在未来 40 年改变这种趋势，控制人口疯长，只有两条路：一是 80%的人“靠喂奶过日子”；一是越生越穷越叫不公平，越穷越革命，烽烟四起，动乱、战争、灾难就难以避免。

由于人类处于分国管理的现实中，各国的生育制度、人口政策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育观念不同，造成人口增长率的显著差异。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先后出现负增长，虽然对总人口数膨胀有些减压作用，但它们人口基数不大，影响不算大。但就智能时代对新生代素质的要求来看，倒是可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人口基数小，还在萎缩，负增长未必是好事。

遏止人口急剧膨胀的任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事，它既有碍经济的发展，即使成绩很大，也要被新生儿吃掉。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很难摆脱贫困。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实现了非殖民地化，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自主后，都获得一定的发展。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人口超过 1 亿的大国从 1950 年前的 4 个到 1987 年增加到 10 个。在控制人口急剧膨胀方面，人口基数已经很大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尼日利亚这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责任尤重。众多人口增长快的小国也不能小看自己的责任。“聚沙可以成塔”，都要对地球村负责。

中国人口增长过程，有过“康乾盛世”人口翻一番的辉煌，但第二次“辉煌”，1950—1980 年翻一番却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误。在传统的农牧社会，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支配下，人多势众的战略考虑中所形成的“人手论”对“人口论”的批判，多生了 3 亿。大锅饭没有吃的，于是不得不急刹车，“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定为国策，总算是遏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但城市与农村的效果并不一样，农村非生个儿子不可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现实原因是农业生产对男劳力的需求，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城市居民人口

结构变成老少三代比是 4∶2∶1。广大农村三代比是 4∶男+N∶男+N（N 即无数女）。男始终不减，只会多，不会少。这种生育意愿与国策的矛盾就是计划生育的难点所在。在生育观念未改变以前，人们总是在千方百计超生，害怕断子绝孙，香火不继。B 超应用以后，更是择男不择女，造成本应女多于男，结果却是性别比的失衡，男比女竟多出了 3200 万人的局面。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都一样，即越发达的地方，以知识生产为主的人口递减，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口猛增；养得起的不能或不愿多生，养不起的却在多生。联合国计划到 2015 年使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怎样解决贫困问题，有人提“贫穷猛如虎”，似乎是先得解决贫困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算算人口账，倒不如说，富裕的前景是被过多的“小虎子”们吃掉了的。当然，许多获得独立后的国家的当政者是否能让本国有个适度人口的政策也是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再加上“苛政”、“内乱”、“屠杀”，不务和平生产，不顾民生，就更增加该国人民的贫穷了。

人口急剧增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比较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出现负增长，关键在于知识化。智能时代的生产，减少了对体力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过剩，所有自然劳动力若不掌握知识与技能都将面临失业的危机。农村耕地有限，自然生态恶劣，人平可耕面积在缩小，农村这个蓄“水”池已经曝满。所以，生一个就得养一个，养一个还要教一个，否则就是多一个靠别人养活的人。历史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容不得我们用农牧时代，甚至是工业时代的观念来对待生育问题。凡是有点科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瞭人口与生活质量、家庭财富的关系，也会知道节育的各种方法，摆脱那种除了性生殖外就无其他快乐的自然动物状态和各种妨碍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所以教育是节制人口的关键环节。

世界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 45 亿的供养底线。为今之计，也是社会学界普遍认同的一对夫妻只生两个为好。一则是保持人口现有水平不再大增长，二则也保持数量与质量的平衡。这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当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总人口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总人口 7%时，这样的年龄结构称为“老年型”人口，这个社会即称之为“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医学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这本身是好事，千百年来人类希望长寿的愿望在逐步实现。但老人要健康长寿才算真好事，若是不健康，无论对社会、家庭还是自己，也不见得是好事。老龄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压力也无疑是存在的。就社会劳动力而言，知识劳动老人与体力劳动老人的差别是很大的，当体力劳动者到 60—70 岁不能胜任体力劳动时，知识劳动者则还可以其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做有益的工作，直至脑死亡为止。如学者、专家、医生等，80—90 岁还在贡献他们的才能，比比皆是。但对一般劳动者而言，到 70 岁以后，也就无事可干，颐养天年。所以，老龄化问题严重性主要表现在老年的赡养、医疗、护理及临终关怀

等问题上。而影响社会生产则是 50—70 年代世界生育高峰所造成的进入老龄期人口过多过急的问题，而不是正常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按照 60 岁的老龄标准，首先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是 1930 年的法国，随后一个世纪，西欧、北欧，接着北美、日本、澳大利亚陆续成为老龄化国家。1950 年，全世界老龄人口约有 2 亿，1970 年，达到 3 亿，2000 年达到 6 亿。联合国基金会估计 2020 年将达到 10 亿。1950—1975 年间，老年人口还比较均匀分布在各国，1975 年后，发展中国家比例开始上升，2000 年，达到 60%。“银色浪潮”对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来说，是老年人的灾难。对福利国家来说，低生育率又产生中青年劳动力的缺乏，不得不择优接受外国外族移民，像法国就靠移民来充实劳力，增加人口；外来移民又不能很快溶入欧洲社会，又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老龄化是个自然规律，无可回避，人们如何对待老龄化的趋势，则是 21 世纪的重大任务。

三、人口素质严重情况

由于世界各地区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发达国家已进入智能时代，欠发达国家还处于前工业时代，有些部族甚至还停留在半原始状态。素质问题几乎无可比性，但就人口总体来看，还是能叙述一些情况说明问题。

1、病民——残疾人：世界现有残疾人 6.5 亿，艾滋病人 6000 万，吸毒人 1 亿，合计是 8.1 亿，占总人口 13.5%，还有每年因交通、工伤事故致残以百万计的人未计算在内。

2、饥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字为 8.4 亿，占总人口 14.5%。那些骨瘦如柴、嗷嗷待哺的饥民和孩子们，他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仅 2001 年，饿死数为 395.5 万人，有什么身体素质可言。还有 19.6 亿贫困人口，其中日生活费不到 1 美元的有 13 亿。他们是饥民的后备大军，一遇天灾战祸，立即会成为饥民。平时也是长期营养不良，成为疾病的后备军。这二者相加占到人口的 46.67%，这也旁证专家们根据资源与人口关系所测算的数字，说地球可承载人口为 45 亿的估算，要引起对人口控制的高度重视。另一种观点就是以现在世界生产规模，这 60 亿人口是能够养得活的。发达国家（占 1/6 人口，即 10 亿人）生产总值为世界的 86%，而另一极 100 多个国家仅占 14%。160 个国家外债总额 215 万亿美元。其中 49 个最穷的国家外债占 3320 亿美元，连支付利息都困难，都快成为债务奴隶了。因此，主张免除债务，加大救济。但发达国家支援不到位，联合国费九牛二虎之力，筹措扶贫基金，每年仅能减少 250 万赤贫待死的人，仍然不能扭转 2002 年以后恶化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呢？只要看看 1998—2001 年，军费开支增长率最高地区就是非洲，达到 31%。一些国家举债去干什么？打仗。越穷越多生孩子，越穷越要打仗，这才是症结所在。

3、难民：60 年来，人类因战争、灾害被迫离开故国家园，流离失所人数达 7500

万人之多，至今仍有 2000 万人。可分为四种类型：

①生态难民，由于沙漠化和连年干旱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永久离开家园的人口为生态难民，全球有 1500 万人，仅撒哈拉地区就有 1000 万人。

②战争难民，指为逃避战祸，惧怕敌方杀戮而离开本国的人口。联合国难民署在 2006 年底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指出 2006 年开始回升，从原来 990 万增至 1020 万，其中阿富汗 210 万，伊拉克 220 万，逃入国是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难民营最多。巴勒斯坦 440 万，长期得不到解决，几乎成了永久性难民。美国难民与移民委员会公布的 2007 年难民概况比前一年度上升了 14%，当年达到 1789.88 万人。除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巨大的战争难民外，还有中东地区的 3 万多名，发生再逃难的情况。辗转流离于异国之间，何其悲惨。

③政治难民：和各国当权者政见不一，为避免政治迫害，而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及其家属为数亦不少，全球达到 200 万人。

④经济难民：这就是逃入国称之为“非法移民”的一类，为数庞大，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和国家的移民。他们碍于移居国的种种法律限制，采取长期滞留，潜入偷渡，伪造证件，蒙混过关等等手法，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原住国未能给这些人以就业发展的机会，反而无视这些人的苦难，责怪他们甚至暴力禁止。这个问题为什么就不能采取短期劳务出口或长期的双重国籍的方法让人口作世界性的流动，缓解原居国和寄居国的一方贫困，一个需劳力的矛盾呢？移民与难民，中上层以经济和智能实力迁入就是合法移民，下层人民为生计冒死前去就是有罪，经济难民的“难”就在这里。

以上四种难民，有的是分散的，有的是集中的，全世界到处设有永久性和临时性的难民营，他们生活难保，教育更谈不上，人口素质大概只能以产生多少恐怖、暴力分子来逆向计算。这也是人类的悲哀。

4、文盲极为普遍。智能时代一切依靠知识，文盲却是远离时代的自然人，都还没有跨进时代的门槛，全然与现代信息无缘。他们艰难地活在世上，是人类最为可怜的部分。全世界现仍有文盲 9 亿人，占人口 15%，其中妇女达 6 亿。中国从 2000—2005 年，15 岁以上的文盲从 8700 万增至 1.016 亿，到 2006 年底，文盲半文盲数为 1 亿 8 千万，这与中国 GDP 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形成很大的反差。原因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文盲人太多，只要适龄儿童能上成学就已经足以自慰了。教育似乎与已成为劳动力的文盲无关。所以，结合职业技能教育扫盲学文化应为提高国民素质的要务。

就世界范围而言，妇女教育在某些宗教社会就本无此说，造成 2/3 的文盲是妇女。而在智能时代，妇女只要获得知识，就如同男性一样能做贡献。同时，妇女知识化对降低生育率也是大有帮助的，女人的职能只是做家务、生孩子的时代应该让它早早结束。

如何克服人口膨胀、老龄化和素质低的危机？人口学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多的研

究，学科也很成熟。笔者学习之余，发现对待人口问题实际有三个角度，也就有三种理论观点。人有三个重要器官：口、手、脑。口是要吃饭的，手是可以做事的，脑是可以想办法的，平衡口与手关系的。人口论多半算的是经济账，重在人与资源、生产力的关系；“人手论”（虽然没有公开这么提过）算的是政治账——人多力量大，也不怕战争，经得起减少，倒是对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些用。笔者从智能时代特征、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提出一个“人脑论”来，也就是人口知识化，才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办法。“人手论”是农牧时代的思想产物，人口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人脑论是智能时代的产物。“人手论”是地广人稀，需要劳力，多多益善，追求着人丁兴旺，家、族、国人多势众，利于争斗与战争。工业社会，生产、生活与资源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变化也很迅速，分科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与问题之风盛行。在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的研究中，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理论研究先驱马尔萨斯 Malthus, Thomas Robert（1766-1834）于 1789 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是为世界第一本“人口论”，揭示人口成几何级数，粮食只能成数学级数增长这一事实，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人口扩张到生活资料仅能维持生存的极限时，就会出现饥饿、战争和疾病。唯有“避孕”和自我抑制才能遏制人口的过度增长。这种真知灼见，已为 200 年来历史所证实，但当时与社会主流意识不符，只得匿名，但还可以发表。中国社会学家吴景超 1942 年在重庆就主张中国要节制生育。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 1957 年的《新人口论》力主计划生育。但与“人手论”发生严重冲突，较量结果，“人口论”大败，现在是吃不尽的苦头，数不尽的弱势群体，即使经济两位数增长，把 13 亿一除，人均数总难以上去。但有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光环，人多力量大的气势。

“人手论”是盲目自信，人定可以胜天，过分乐观。人口论把账一算，往往悲观，马尔萨斯就是个经济悲观主义者，认为贫困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34]二者各执一端，时代的进步，使工业时代的理论观点，到智能时代，已经落后于形势，需要有更新的视角。劳动力需求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然劳动力，而是要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劳动力。否则便会排斥在跨国智能化生产体系之外，停滞在农牧时代，继续着无止境的贫困。而知识劳动则可以使人从机器的附属物的被动状态甚至被形容为“枯燥劳动”、“苦役折磨”、“否定自己”、“人的异化”等等逐步进到具有创造性、自主性、机器的主人的状况。人脑的力量，即知识化的力量使世界焕然一新。人脑论观点便是根据这一客观形势和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提出来的。

人脑的开发，是最伟大的开发。据说，一个大脑有 140 亿个神经单元，现在还只用到其中很小的部分，就已经在追星宇宙，遨游太空。把我们的智慧用于科学探秘，它可以带给人类无穷创造的乐趣与福址。

思想的解放，是人类最高层次的解放，摆脱一切非共生的思想、观念、理论、主义、教义的精神束缚，人脑潜能的开发才不会受到干扰，全部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解决人口危机，一样得靠人脑的作用。一方面是生育观念的改变，一家只生两个，男女都一样；一方面是科技扶贫，科技致富。下面举数例说明这个问题。

1、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大脑加上他的研究团队，每年可帮助增产粮食 100 亿公斤，解决 4000 万人的粮食问题（每人以年 250 公斤计），这不是人口学公式能计算出来的。他荣获“拯救世界饥饿荣誉奖”，证明人脑的力量。

2、一个以色列，处于贫瘠荒漠之地，没有足够耕地，就搞无土栽培，成为无地兴农的国家，粮食自给而有余。

3、印度是 11 亿人口大国，历史上也是个贫困大户。20 年时间，一跃而成为经济大国。他们送上天的七颗卫星，搞和平开发项目，帮助广大在干旱缺水地区农民找水打井，井井出水；实行“墙洞电脑项目”，即在村庄、车站人多的地方，在墙上打洞安装电脑，让辍学儿童围在那里接受文化和智能教育，有许多成为 IT 专家。比尔·盖茨考察了印度后说，“21 世纪 IT 大国是印度”。全民的 IT 教育，可以让一些不发达国家作时代的跨越，这是极好的全球性的机遇。

如果说，十六世纪，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引导着 400 年知识的历史发展。那么，现在就要说，“知识是解决人间各种危机的决定性力量”。“人脑论”充分估计到开发人脑对解决危机的意义，也就强调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人与物的关系，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可以得到解决。可惜的是关于人与人、国与国、族与族、教与教关系的“知识”却是充斥着缺憾，甚至是错误的，使人类至今还不能完全摆脱灾难与危机，获得这样一些错误的知识所形成的观念却在妨碍着人类共生。这种教育只是在起反作用，抵消、浪费或封闭、禁锢人脑的作用的正确发挥。因此，社会科学知识的接受不可不慎。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真和假不是短期所能证实，它又不能作重复性的试验，且有不同利益在纠缠。一般地说，只有人类共生的价值观加上科学理性才能作出鉴别和选择。

提出人脑论，强调知识化，克服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状况，主张一家生两个，国际社会要大力帮助贫困国家人民脱贫、扫盲，用知识、科技扶贫，应重于单纯救济。贫困国家的发展，对发达国家不是威胁，而是多出一些共同发展的伙伴。而贫穷国家当政者，既然独立了，就要自己负起对人民的责任，不再争斗打仗。贫困是要靠发展生产来解决，不是靠争斗能解决的。这就是共生论者对人自身危机之一——人口危机总的看法。

四、高科技发展中的危机

人的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如此神奇，古人想象的事物，今人就能实现它；今人的想象，后人也会加以实现。古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人，但今天科技也能“克隆”出人来。高科技的力量已经达到近乎“神”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是巨大的，普世的，然而就在人们欢庆每次非凡成功的时候，也同时产生人和他的创造物相互矛盾的状况。危机开始时并不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物的负面

影响逐步显现。当第一座工厂烟囱向蓝天吐出烧煤的浓烟时，有谁能预测出几百年后给人类造成全球性的污染？当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时，又有谁能预测到只 50 年后就会瞬间夺去二十几万日本人的生命？机器人、克隆人的出现，是福是祸从科幻作家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想象到它们既可喜又可怕的情景。如果 SARS 病毒是人工合成的话，在科研活动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可控制的病毒呢？凡此种种，都不能不给人们以极大的危机感。这种危机因人类尚存在非共生的敌对思想观念，互相要战胜或消灭对方而益见严峻。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去残害敌人，人为地加速这一危机的到来，因而要正视这些危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

1、核能技术。究竟核裂变聚变技术会发到何种程度，核武已经把人类弄得惴惴不安，核弹始终是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仅此一项就足够毁灭地球。未来的发展，是和平利用解决人类能源危机，还是导致人类的覆灭，必须有个共生理性的抉择。

2、化工技术。现在已经在生产种类繁多的害人的毒物，毒液、毒气，生产成千吨的麻醉毒品，还有大量的含毒废物、废水、废气不断从正常生产中排放出来，今后又知有多少新的有毒物质出现，都是难以预料的。

3、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无疑对农作物，动植物品种的改良，药物的增进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但它的负面作用、制造细菌、合成病毒等方面都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威胁。基因工程的发展，改变基因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是会出现更多可亲可爱的动物品种呢？还是会出现比飞狮飞虎更可怕凶恶的“怪兽”呢？

4、克隆技术。克隆人现在是用法律形式禁止，但技术文明发展规律，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会不会突破法律的约束呢？让人的副本——克隆人和真人共生的条件又是什么？如果两个一样的人，会引起我们意想不到的纠纷和困难的话，让一个飞向宇宙，让生命扩展到其他星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5、智能机器人技术。会不会人机合一，既克隆又智能成为人类的未来人，所谓综合人、单面人等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技术文明将发展到何等程度，因科学的发展，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互启互动，综合效应，必然产生更新的技术。

总之，在人类缺乏共生理性，有敌对思想的世界里，有人往造福于人类整体着想，就有人为局部某部分人着想，技术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不仅前途未卜，而且危机始终存在。

正像美国物理学家阿特·霍布森所著《物理学（基本概念及其与方方面面的联系）》所说：“也许技术文明不能存活很长，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技术的滥用摧毁了他们继续作为一个技术文明而运转的能力”。[35]技术滥用是关键，怎样能防止滥用呢？也只有共生思想支配下的科学理性。它不仅要防止故意不计后果的滥用，而且还会谨慎地防止无意的始料不及的灾害的发生。

五、信任危机

在一个人类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中，一个与这种关系完全不协调的相互猜疑的不信任心理现象普遍存在。国与国、族与族、教与教、组织与组织、群体与群体、集团与集团、家庭之间直至个人与个人，互不信任，这个危机是致命的。由于过去国、族、教相对隔离，信任问题不太显露。现在都挤在一个地球村里，空间距离已被“天涯已比邻”的现实所取代。各共生圈出于历史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不同途径所形成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在强权政治以征服为主的年代里，历史上就存在交往中、接触中、文化上、贸易上的许多恩恩怨怨。有的受到异国异族的直接统治，成为殖民地或附属国。统治者之间的争斗称霸往往又煽动起民族或阶级之间的更大仇恨。因此，民族国家相互不信任甚至深怀敌意可说是其必然结果，严重影响全球和平发展的进程。

信任，是人类良性互动的心理基础，也是合作双赢商业活动的主观条件。不信任是自我防卫的本能，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人间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采取欺骗的手段是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上当受骗的命运。生活经验告诉人们，别人是不可信的。于是，人的孤独感，人际的疏离感，国际的不安全感，都次第展开和加码，造成即使是生活上能过得去或享受富裕生活的国家的人精神上却也一样要面对负担沉重的心理环境，更不用说广大贫困人民的猜忌与恚恨，它阻碍着和平共生，四海一家亲如兄弟关系的发展，不能不对此加以分析。

1、政治制度和观念的分歧所造成民族国家间的信任危机。我们可以从上世纪长达46年的冷战时期看到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关系的紧张和对立。这种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冲突造成东西方长期互不信任恶果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消失，却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更强烈地表现出来。

美国、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伤害带来的后果不仅刺激了恐怖主义的成长，而且把两大文明的民族增加了不信任。“文化冲突论”就是信任危机的产物。

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作为不信任与疑惧也不因获得独立改善多少。

大国之间由于利益和势力范围消长也是充满着不信任。

由于不信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谁也不相信有个“天上掉下来的和平”，只有用扩充军备，研发新武器来保证国防，用实力说话，搞实力平衡，实际是危险的平衡，不明白和平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决不是军备竞赛所能达到的。信任，是双方的事，各国必须做出足以让对方信任的实际行动的事，才能建立信任关系。那些言而无信，随时违约，撕毁协议的能获得信任吗？

在另一方面，国家内的信任危机突出表现在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方面。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反政府武装长期对抗，以及各种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活动，都是有过长期信任危机发酵的过程，其实和平请愿、示威游行的人民还是保留着信任的最后底

线。如果完全不信任，他们何必这样去做呢？聪明的执政者会珍惜这尚存一点的信任，还可以变为好事。相反，用刁民捣乱，无故闹事，不服管教等等眼光去看待，那就会丧失最后一点信任，更不用说用子弹和坦克去对待他们，那性质就变为“以民为敌”了，也许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2、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造成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不信任危机。无论是经济、文化组织还是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是一个行为主体，都有个组织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中，如果不遵守自古以来而为资本主义规范化的公平、自愿、平等的交换交易原则，那就是一个充满欺骗、狡诈、陷阱、风险的大战场，所谓“商场如战场”。每个资本经营者都挖空心思为多赚钱而战，伙伴关系远远少于对手关系。就是一个经济组织内部，也充满着能力上、效绩上的竞争。世界就处在处处有攻防，人人不信任的不断恶化的环境之中。在政治领域，在夺权保权的尖锐斗争中，所有人能想到的办法，都能施展出来。如果不是成熟的和平理性的民主体制，各种人间罪恶、丑态、见不得阳光的事都可能发生。军事领域、情报领域它的整个存在基础就是不信任。只有非盈利性的慈善组织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3、生存竞争与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人际关系中普遍的不信任。在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个人必然是把这种观念带到人际关系中，甚至渗透到家庭中来。托夫勒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血缘，爱情，友谊，乡亲和社会关系，统统都受到商业性个人利益的玷污和腐蚀”。[36]就是现实世界的写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表现得异常明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厚黑盛行。从物的商品化，通过“拜物教”、“金钱与享受至上”，到人的商品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满足物欲就行。除了钱财而外，再无别的追求；除了钱财而外，再无别的损失。直到象马基雅维里说的：“一个人宁愿让他父亲死掉，也不愿使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的程度。自然亲情尚且如此，何况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友情和短暂愉悦的性爱？人际关系的疏离、冷漠、互不信任、互相怀疑，把别人想得很坏。像萨特说的：“一个人或者超越他人，或者自己被超越”、“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他人就是地狱”[37]等等。整个社会不信任气氛，污染着人们的心灵，也就是人们精神压力和心身交瘁的环境。

有论者提出造成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信仰，如果都是同一种信仰，就不会发生危机；于是他们在论述这类问题时，冠以信仰危机之名。如果读者能认同“信仰是信息不确定性的主体认定”的客观性的话，那笔者就要大胆地提出信仰危机是个伪命题。理由是：

①一个信仰对于这个信仰认定的主体来说不存在危机，就好像基督徒信仰上帝，穆斯林信仰安拉一样，世界上 84%的宗教信徒不存在信仰危机，他们信得好好的，能说它有危机吗？危机只发生在像尼采那样，说“上帝死了”，动摇了宗教信仰的信心，尼采一类人他本身也没有危机。又如，儒学统治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信三纲五常信得

好好的，没有危机。工业时代来临，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危机。危机是儒学信仰者看到不信仰的人多起来，“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因而惊呼危机的到来。类似的还有原来所信仰的主义，当这种主义的思想统治面临挑战而无力自拔的时候，站在原有的主体认定的角度，也会提出信仰危机一说，以恢复其原有的信众。

②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在教义与主义的分歧上产生的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互不相容的局面，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与危机，甚至互相杀害摧毁，这是社会危机，也不能算信仰危机。如果一些人改变他原来的信仰，改信别的什么宗教或主义，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也算不得信仰危机。危机来自只能信我的，不能信别人的信仰垄断与禁锢，这也是信仰的副作用。其实，说信仰危机的倒是他自己是否也怀疑其信仰，这才是“信仰危机”。危机产生于信仰内部，对于理性认识问题的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信仰危机，相信理性，而不大相信信仰，才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维方法。

③一些人把社会风气不正、道德滑坡、贪污腐败、贿赂公行等等社会负面现象也归之为“信仰危机”，好像早就有个包医百病的信仰良方，只要信了它，就会药到病除，天下太平。考之史实，现在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信仰。因为各种信仰，仔细分析，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非共生因素，即使如佛教这样高境界的宗教，他们主张废弃婚姻，结果必然是人口绝对负增长，没有人类那个“信仰”谁来信呢？就不用提那些主张暴力消灭异己的宗教教派和主义了。

共生论者不认为信仰比信任更重要，信仰着不确定的目标远逊于有确定的对象目标的国与国、人与人的实际关系。只有人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那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有心理基础，不信任是爱的腐蚀剂，让世界充满爱，就是以世界能相互信任作为前提的。而各种信仰的矛盾冲突，恰恰是不爱成仇的根源之一。

了解智能时代全球多元一体化的总趋势，理性地认识信仰及其与信任的关系，用了解直至谅解对方的心态与方法，在人我之间、异己之间、国与国之间，拉近心理距离，架起信任的桥梁，才是人类幸福未来的保障。

六、精神危机

属于人自身的最深层的危机是精神危机，它是指关于人的对自己生命、生活的自我关照时所感受到的本我、自我失落的危机。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当人们独处的时候，除了物化了的人以外，有点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这类问题，结果很多人会感到茫然。这些似乎是人生哲学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紧迫的现实问题。这就是人们解决了生存、生活问题，物质的、外在的条件满足之后，他们必然会遇到的、存在于自我内心的要求解答的问题。引发这个问题是北欧国家的自杀率居高的现象。1990 年位居世界首位的芬兰，自杀率达到 3/10000（2005 年才降到 1.8/10000），同期韩国则升到 2.61/10000，日本升到 2.03/10000。按常理，生活有保障，衣食无愁，享受着人生的各种乐趣的人们应该是乐生的，为什么反而厌世

呢？是不是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和以后还要追求某种精神的目标呢？人继续活下去才有动力和勇气。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空虚和无聊，中国有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当一切荣华富贵梦醒之日，就是人生意义在拷问自己之时。现在，北欧国家提供一个范式，世界 2/3 的人还在为生活得像他们那样而追求、奋斗孜孜不倦的时候，他们却以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自杀回答我们。

北欧各国都是信教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应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的。那么，我们会问，精神家园究竟在哪儿？人的精神家园是什么？这是个人类未来学的重大课题，现在就得思索。

精神危机形象地说，就是“精神空虚症”，也并不是北欧自杀者所独有，几乎是个比较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发达国家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享乐主义的消费社会发展到极端，“物极必反”，也就会感到精神的缺失。当宗教这个“精神家园”尚不能发挥其全部“拯救灵魂”的作用时，也会感到这种缺失。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孤寂感和失落感极易染上精神空虚症。中年人因感情无皈依，竟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而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为玩世不恭和反传统，“嬉皮士”运动也是它的反映。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出于生活所迫，看空一些世事的悲观失望的人们也容易走入虚空。宗教也就成为他们的归宿。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精神空虚症的大医院。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宗教信徒在中国的激增 6000 万人，达到了 1 亿，可以证明这一点。

“人为什么而活”，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四种类型：①为活而活。活着就是一切，目的是说不清楚的；能维持生理生存和一家生计，活下来就不错。这是挣扎在生存、生活的底线上的贫苦人们只可能为一己一家的活法。②为神而活。宗教信徒们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安拉赐予的，为了感恩，为了赎罪，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类似的还有为人造的神而活，因为这个神是再生父母，现在的荣华富贵也是这个救星赐予的，所以要永远保卫神的荣光。③为物而活。在某些拜金拜物教也可以说是物化或称人格资本化了的人眼里，满足物欲就是人生的目的，除了财富，就没有其他的追求，物重人轻，人为财死。④为人而活。这个“人”不是仅指别人而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是人本主义的人，人道主义的人，人性的人，与物相对而言的人。一切理想主义者大概应列为此类，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这类为人而活的人们不断创造、革新、改进的结果。

人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是有思想又有躯体的客观存在，他们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性生活和艺术生活。各种生活无不带上不同民族文化的印记，形成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世界多元文化。网络文化出现以后，还有与现实世界衍生并行的虚拟世界，人们想象空间更因网上的交流、撞击、汇合、融合而迅速扩大，达到世界规模与前所未有的广度。为人而活的前景越来越广阔，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形式越来越丰富。这个不断发展、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现实

世界在思维中的反映，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在天上，不在来世，而是在我们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并为之奋斗者的心中。

中国古代哲人把人形容为形与神的结合体，提出“不以心为形役”，就是说人的精神不要作物质的奴隶。过分的物质的追求会迷失心志。理性要求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品位，才不致流于庸俗与下流，而纵欲主义正是走着这样的道路。共生论者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提出“形神共生”，这是解决人自身的形与神矛盾的方法，让形与神充分协调的存在与发展，也不能随便地“跟着形——各种感官的感觉走”，将自己引入歧途。

生活的目的在于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人类共生的历史，使之向人类真、善、美、乐境界前进。作为一个人，要能为人类共生文明添上一砖一瓦，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要铺在走向共生的道路上，这是共生论者对克服精神危机的观点。

作为本章结束，人间的灾难和危机完全是人类不能共生的一面，甚至人自己的形神都不能共生。有朋友提出这一章写得太阴森可怕，都写成不共生的历史了，然而正因为如此，才能促成人们的深刻反思，才能做到“以史为鉴”。鲁迅先生有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8]，否则人类怎能走上共生之路呢？人性弱点之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笔者不愿死难者的血白流，不愿一些忘了痛的人继续往那不共生的道路下滑，又来重复一次灾难。对于灾难与危机，只能说不忘过去，慎对将来！

注 释：

[1] 姚有志、过毅主编：《百年战争评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8 页。

[2] 李雨亭编著：《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97-298 页。

[3] 百度网：林慕汉文，据中国军事博物馆提供的数字。

[4] 本节列举数据来源，多为百度网相关词条，通过筛选比较，取其有据可查者。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 年中文版，第 9 卷，第 101 页。

[6] 郑异凡著：《农民权益不容侵犯》、《探索与争鸣》，2004 年，第 1 期。

[7][10][11][12][13] [苏]罗 亚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中文版（赵询、林英译）第 169 页，第 171 页、第 381、338、337 页。

[8] [苏]阿 阿夫托尔汉诺夫著：《党治制的由来》，晨曦等译，中文书名《苏共野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版，内容提要。

[9] 百度网：古拉格词条为 1929-1953 年总共有 1800 万人进入劳改营。

[14][15][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71 页，第 1214 页。第五卷第 393 页。

[17]五柳村：《臭老九的一生》。

[18] 该书第 363 页。

[19] 夏日新，易学金主编：《中国重大文史公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04-608 页。

[20] 柬埔寨相关引语及数字，均见百度网。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辞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2]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 年，第 341 页。

[23]《解放军报》2001 年 1 月 31 日

[24][26][27]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64 页。第 363 页，第 195-196 页。

[25] 任亚秋《非洲轻武器泛滥让人愁》，《中国国际报》2003 年 6 月 10 日。

[28] 郝永平、冯鹏志：《地球告急——挑战人类面临的 25 种危机》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10 月版，第 89-90 页。

[29] 百度网：引自加拿大《环球邮报》。

[30] 同[28]第 343-345 页。

[31][33] 武汉市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编，郭实方、于真撰：《禁毒三字经》，群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1 页；第 19—20 页。

[32] 1987 年 6 月 12 日—26 日，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有 138 个国家 3000 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提出“爱生命，拒毒品”的口号，其后各国有不同提法，有“爱生命，不吸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

[3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5 卷，第 572 页。

[35] [美]阿特 霍布森：《物理学〈基本概念及其与方方面面的联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313 页。

[36]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87 页。

[37] 转引自郝永平、冯鹏志：《地球告急——挑战人类面临的 25 种危机》，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第 360 页、第 223 页。

[38]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卷三，第 197 页。

第四章　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与教义

读者看完第三章所述人类百年来的、全都是带世界性的灾难和面临的危机，心情一定是沉重的。由此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沉思，即从全人类的利害出发去探索人类共生的道路。造成灾难与危机有哪些原因？又如何能消除这些导致灾难的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和现实的民族国家间的利益争夺？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是冲突的双方或多方都有一个主义或教义作为振振有词的旗帜去战斗，要挽救人类免于战争、恐怖、暴力、剥夺，则必须对维护、宣扬、鼓吹、推动这些导致灾祸来临的非人类共生的主义、教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从而理性地明辨是非，有所选择。

原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各种族、民族在相对隔离的条件下，人们站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各个不同地域的时空坐标上，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为了自己的群体利益，提出许多对待异己群体的主张。其中有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广泛的认同与支持的主张就形成主义。所谓主义就是只有它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别的主张则是次要的，甚至是错误的。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主义之说，本身即具有排他性。从逻辑性成份较大的世俗的主义，比起宗教神性教义更有一定道理可说，教义中的非共生因素更具排他性和不可变更性。如“妖魔”概念的普遍存在，“不二法门”的唯一性等。两个或以上具排他性的主义、教义必然产生观念冲突，而排他性正是世俗利益冲突的意识反映。因此，灾难产生原因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主义教义+现实利益，即人们的信仰、信念加上民族国家或阶级现实利益的冲突造成灾难。

人类在上个世纪为了共生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 1.6648 亿多条人命，虽然换来了世界和平发展——人类共生的国际环境，但仍危机四伏。如果我们不对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和教义有个批判性的认识，那死难者的鲜血等于白流，仍将贻祸子孙。本章的任务就在于此。

我们曾在第二章“宗教中的共生因素”一节中尽述了宗教对人类共生的积极作用，本章中也就不能不提及它的负面影响，例如恐怖主义的信仰基础就是出于宗教中的负面教义。在古代农牧社会，民族征服多是以神的名义进行并满足布道宣传、扩大宗教的需要。宗教成为战争的助燃剂，其内核是教权和君权扩张的利益，教会甚至成为战争的主体。到工业时代，民族国家形成，殖民战争成为战争的主线。虽然启蒙运动反对了神权统治，其后人民主权运动反对了专制政治，成功地推翻了教权、君权对平民的剥夺制度。但一些国家在国内实现了民主革命的目标，赢得了和平民主以后。对外仍然是扩张、争斗不已，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以皇权国家主义和以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为形式，以种族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为核心的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如果不批判这些主义，人类能避免战争吗？

世界上的主义、教义之多，之繁，叫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笔者检索了 159 种

主义，72 种自由主义还只算一种，发现真正能成为人类共生的源头和支柱的主义不多，而有违人类共生的主义则不少，有许多当时看来不错发展到后来也是祸害。其中共生论赞成、赞赏的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环境、物种保护主义等等，它们都有个共同基点，即人我共生、异己共生，可以趋向人类共生，天人共生。笔者不把共生理性称为主义，留给异己，异见以空间，提倡说理讨论，平等对待，动口不动手。不以己为主，人为次。这也是留给自己以认错、纠错的空间。至于教义，赞成其有利人类共生方面，而不同意其蔑视异教，视为妖魔，开展为神的“圣战”，为神而伤人的各种教义。它们有悖于宗教立教的初衷，并为教主君主与权势集团所利用，造成人间的不和。

历史进入智能时代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文明的深入发展使得我们有必要把一些原来有积极作用的，或其负面影响不甚彰显的但确实危及将来人类命运的主义与教义加以剖析，让人们从这些主义、教义的思想樊笼中解脱出来，找回“人”自己的存在，发展自己的理性与智慧。

第一节　神——教权主义

教权主义，又称教权论。主旨是教权高于政权，世俗君主或世俗政府得听命于教会与教皇。因为一切权利来自天主，教会或教皇直接秉承天意。5 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宣称世界上存在着两类国家，即“神国”，就是教会，和“俗国”，即世俗国家。神国高于俗国。13 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宣扬教会具有无上权威；他把“支配世界神的理性”称之为“永恒法”，它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基础，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基础。

这样，在历史上由于对神的崇信和服从经过逻辑阐释而形成的教权主义成为教徒，尤其是教权掌握者的不移的信条，对人类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人们误以为相信了教会的各种教义的宣传，执行了教会所规定的教法、教规、典章，制度就是忠于神意，灵魂即可得救。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便是建立在广大信众的这种蒙昧的认识之中。

教权主义的神学基础——天主教核心理论：“教皇永无谬误论”（Papal infallibility）认为，作为至高无上的导师——教皇，在一定条件下就信仰问题和道德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不可能有谬误。这种教义是从教会一贯正确的教义发展而来。其根据是：教会承担耶稣基督教诲众人的任务，教会受基督委托，又得圣灵的帮助，必能忠于基督的教诲。[1]极明白地说明了教权、教会、教皇与神之间的关系。教皇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他是永远正确的。

事实上，神与权无涉，是人才与权有关系。权即权力，是人对人的一种支配、控制关系，多数人为什么会被少数人支配、控制？这是因为有个对神的信仰，神是不可违抗的，神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出于对客观自然力和命运的无法理解，出于对灾害与死亡的恐惧，便认为一定有个超乎人力所能及的外在力量

在支配着一切。这在今天看起来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法则的作用，而在那种原始蒙昧时期便被看作是神力，各个原始部落也都有自己的神。神力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多是那个时代或以前产生的各种神话的影响。东方民族相信祖先神，埃及民族相信万物神。巫师——能够理解神意的人成为人间第一批有权者。在祭祀时可以直接进行人祭，杀害人，去为众人祈祷。在现世生活中，部落是由其首领所带领，有的是和平的，有的是武力的统治，反正是都有同一信仰。所以，权力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有思想信仰上的统治和实际生活的武力统治两个方面。先民们把人类经营共同生活的各种经验逐步通过学习、试错、比较、鉴别、总结出的基本准则，如不杀、不伤、不偷、不抢、不谎，公平交换，甚至是道德准则，要慈善，和睦，要有爱心等等没有看作是人类自身的努力与进步的结果，而归之为神意的安排。原始粗野的人逐步成为神引导下开始文明的人。包括生活秩序、道德，伦理都被神化，人把人类社会和自己的创造物——文明的一切——归之为神所赐予。在思维逻辑上反因为果，完全颠倒了。对于在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方、敌对方则视为神的异己，于是，在蒙昧时代产生的与神对立的“魔鬼”概念此时就更加强化并巩固下来，成为排他性教义的源泉。可见，难以确定的是天上的神与魔，而可以确定的是人间有善与恶。

在部落，部族这种小型共生圈逐步扩大为统一民族时期，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统率或消灭其它异己者时，安拉出现了，阿拉伯民族和帝国形成了。这与其说是安拉在天上的恩赐，不如说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人间的成就。神权的载体是教，教权才是实实在在的支配、控制人之权。提出这个历史现象，丝毫不影响伊斯兰和平顺从教义引导向善崇德等共生因素发挥作用的一面。

为了人类的自觉共生时代的到来，实在不得不对在自发共生时代所产生、今天仍然存在、今后还会起负面影响的一些教义、主义有所触动。因为在自发共生为生存奋斗的时代，毕竟没有全球一体化；而自觉共生时代，才是全人类的整体平等的共生时代，它必然会显示出人类一个划时代的差异。指出这些差异，对人类思想观念的革新与进步，是会有些好处的。可能对坚持一教一族一国之利的，不顾他教、他族、他国的当权者和信仰者有所冒犯，甚至对某些主体认定的神灵也有点亵渎，为了教与教的共生，也只有请求宽恕了。

一、神权的虚幻性

信神的人们认定的神，包括上帝、安拉、佛陀等一切神，都是心中有他们，是人们“祭神如神在”的“如在”心理现象。即使如“性灵学”中所举出的关于神的特异现象，也难以证明神界是可以感知和可以重复出现的客观实体。倒是神界也和人间一样，有权力、等级、命令与服从，有真神、假神和恶魔，有善与恶的殊死较量。这恰好证明神界是人间观念上和实际认知与行为的折射。既然人类历史没有神干预人世活动的记载和对于神的科学观察实证经验，就不能肯定神的客观存在性，神是一个不确定的信息。它只是一个“如在”的集体心理现象。宗教教义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法力无边的，那怎么会有与祂为敌的恶魔存在的可能？又说，上帝是至善至恕的，那为什么又要让人间有从古到今如此多的灾难折磨人类呢？还需要设置因果报应、末日审判来判定人间善恶呢？像中国戏剧《窦娥冤》中那句："不辨贤愚枉作天！"因为"天何言哉！"何况行呢？表明天与神对人间的一切是无能为力的。就像 17—18 世纪的自然神论所认为的那样："把上帝的作用限制在单纯依据可为人类了解的理性法则创造世界的范围之内。世界既已造就，上帝就退而不再干预自然进程和人类行为"。[2]为安拉献身的自杀式袭击者，未见神的褒扬；说"上帝死了"的尼采，也未见其受罚。人间的事从来就是靠人类自己。再说，上帝要人间的权柄干什么，权柄是掌权者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集团利益的，它的表现形态是粗俗、野蛮、暴力与欺骗，上帝能是这样低级的神吗？从世俗角度看是如此。在神学界，17 世纪的神学自由主义（theological liberalism）主张根据某种准则而不按传统权威探讨宗教教义。笛卡尔首倡从神到人的转变，他认为"理性的自然"是基本实体，一切实在的存在都由这个实体演绎而来。他使思想界相信：①应该相信理性；②人居首要地位；③上帝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④人性可以改善，而且正在改善。[3]

因此，神权并不存在，宣扬神权的存在是托神、借神以管人的宗教组织者们所为。神权本身是虚构的、虚幻的。

二、教权的实在性

与虚幻的神权相反，教权却是实实在在的。宗教的四大要素：①所信奉的神；②教义经典；③宣传与推行神旨与经典的宗教组织及其神职人员；④宗教仪式与习俗。除神外都是为信神、敬神、拜神的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基督教的组织是各类各级教会，佛教的组织是各处寺庙。伊斯兰因为是政教合一体制，它的组织就是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只是神职与政职人员的分工有所区别而已。教义解释权归宗教领袖，教义就是宪法与法律，政府掌管世俗事务。清真寺则是日常诵经、祈祷、学习之所。天主教设有教皇、大主教、主教、教士的教阶制度，按地区像行政区划一样管理着各大小教区的事务。这些科层制的设置，在一个统一的拥有通神权力（一般就是拥有教义解释权的最高领袖）通过从上到下的授权任命和信众的拥戴实施其托神的旨意。因为信众们是由这些主教、教长、教士们灌输的信仰，一般会像学生尊敬老师一样听话和服从的，所以教皇和教主们能顺利地完成和巩固其统治。即使教皇、主教是通过选举产生，也只是在高层圈子里的选举，是有权者的"民主"，而与一般信徒无涉。所以它的权力基础不是全体信众的授权，而是来自于虚幻的神权，来自于自称是神意的解释者、监督者。如果这种管理只停留在思想信仰方面，并不伤及人命实施剥夺，那宗教内部还可以在和平共生的情境下得到发展。但由于教权拥有者可以从教徒、信众那里获得名为给神的贡品、贡物，佛教称之为香火钱，实为给教会、寺院的贡奉而且拥有大量教产，使他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生活富裕，就有了教权拥有者的特权利益。因此，对于任何有损于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言行，必然以违反神的旨意而受到教法的惩

处。凡是涉及到权力与权利问题，必然有个现实世俗利益在里面。而当实际世俗利益发生矛盾时，信众穷，教会富，教会盘剥信众，无止无休。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要求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需要这个居中的借上帝之名来盘剥信众的教士阶层。虽然这个阶层曾是领导他们信神，但他们都借神的名义来做伤害信众的事。信众们的思想接受了教士们的长期蒙蔽与欺骗，没有改革思想家对教义新的阐释与宣传也就很难改变。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实行“赎罪券”制度，人们生来有什么罪？要人们交钱来赎这个子虚乌有的罪。这只是教会对内剥夺信众财产的卑劣行径，交不起赎罪的钱就要受罚，甚至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因此，教权主义是执掌教权的集团所坚持的在信仰层次上神的至高无上与世俗制度层面上充满欺骗与暴力的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有人称之为教权至上主义，也许是相对君权而言，强调教权大于君权。但主义成立，君权理论必然是次义，主义本身就含有至高无上之意。教权主义本身就是个不平等的主义。教会组织所奉行的教权主义，做了不少坏事，其过不在上帝与圣母，而是教会的掌权集团和首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教权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一个有目标、有组织、维护掌权者利益的权力系统。

三、教权的垄断性

教权的神学依据是教义，各宗教所崇奉的经典信条中都存在相当多的歧义性。如《圣经》、《古兰经》内容繁多而庞杂，都可以在流传过程中被信徒们作出近似或似是而非甚至相反的解释，这种不同侧重点的解释就成为不同教派的存在的依据。正因为教权是结合世俗利益的，世俗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必然会反映在不同立场和观念上，于是在原教旨与发展出来的各教派教义之间的差异，各拥有其信众。原始教宗由此而变易为多元的、衍生的各宗、各派。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是最接近神的旨意，应为神的正统，各宗教普遍存在这一现象。传统的教义教法必然对新异的教义解释持反对态度，其实质是维护原有的垄断权力，于是教内的分裂和斗争不可避免。甚至如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只因教权的继承合法性之争也能提高到教义之争的高度，造成达千余年的两派之间的生死冲突，直到今天还解不开这个结。

教权的垄断还由于宗教教义中的排他性，排他形成垄断，垄断又推进了排他，二者交互作用，扩大了宗教的非共生因素。几乎各宗教都有排他的严酷记录和压制思想的不光彩历史。天主教在中世纪对科学思想的迫害，基督教在西方伴随经济力量日益增长向世界的扩张，从没有减低改变他人信仰的热情，从和平布道宣教一直到使用暴力手段，为了使不信教或异教的人皈依基督，源出于犹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复仇与惩罚之神此时也表现为现实的好战精神。伊斯兰政教合一制是从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宗教公社”，亦称“穆斯林公社”开始，组成以宗教信仰的约束代替血缘、部族和宗主关系的约束。穆罕默德兼有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的一切世俗权力，这对统一部族为民族具有积极意义。但伊斯兰是以征服阿拉伯半岛上的多神教部族为思

想内涵的，政教始终合一更容不得对教权的侵犯。基督教和伊斯兰两大宗教的相互排他性的冲突，演出长达 195 年十字军东征的悲剧。即使是较少排他性的佛教，在与世俗权力结合以后，也会排他地镇压异己。印度阿育王信奉佛教以后，也镇压异教，不杀生的教义也不能阻止宗教的暴力与征服。同样，产生于罗马帝国残酷统治下犹太民族的基督教，是下层穷苦民众为善积德、向往天国的精神家园。开始时只在下层民众中流传，传入罗马本土后，还是个地下秘密团体。只有在后来贵族们也信，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皈依时，才成为地上合法的宗教。其后上升为国教，教权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据有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教皇制度。西罗马的灭亡，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的宗教文化的传播，相反地教权还在西欧君权之上。国王要是没有教皇的加冕，还算不上真正具有合法性。“君权神授”就是通过神与人的中介——教会获得其仪式上的肯定。教权主义的主张风行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政教分离后，教权得以缩减。但梵蒂冈教庭对遍及世界的天主教会和教徒仍保持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有直属关系的教权组织。

由此回顾，可以看出，当宗教处于思想信仰层次在民间进行活动时，发挥其共生因素比较多，劝善的意义也比较大；一旦与权力相结合，具有垄断性的时候，其非共生因素，即排他性，扩张性就逐步多了起来，酿成人间尤其是宗教间、教派间的冲突。战争的苦难，生灵涂炭，恐怖横生，上帝、安拉若是有情，恐怕也要为教徒间的厮杀落泪。

四、教权对世人的残害

首先，这里指的是教权，而不是宗教和宗教信仰本身。宗教向善，劝善方面的功能，在第二章中述及。这里专指教权，即能支配人、控制人，具有生杀、剥夺人之权，以神的名义干世俗的坏事、有组织的权力。它是一种完全入世的权力，客观上与神无涉的争权夺利的权力，是一种能将排他思想变为实际排他伤人杀人行为的教会权力。

在历史上，教权是专制政治的护身符，它自身就是实行教法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也是专制，最大限度的钳制思想，扼杀视为异端的新思想，仅举其荦荦大端者。

1、天主教会设立的“异端裁判所”，亦译“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何谓异端？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界定，凡否认教会制度的信仰者即为异端。“巫师”是被诬的罪名，即叫人不是按教会所规定的信条言行思考。公元 1220 年，教皇洪诺留三世通谕建立该所。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先后建立。这些裁判所以教皇为最高首领，裁判官由教皇任命并直接控制，不受地方教会机构和世俗政权的监督制约。它残酷迫害“异端分子”或 “异端嫌疑者”以及反对教会专制的人士，包括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刑罚具体有没收财产、监禁、流放和火刑处死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著名的哲学家布鲁诺就是被意大利裁判所处以火刑活活烧死的。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尤为残暴，1483—1820 年间，受迫害者达 30 余万人，其

中火刑处死者 10 多万人。1609 年，法国波尔多境内有 600 个“巫师”被处决，洛林地区，15 年内处决 900 多个。著名的神甫路易还被当作巫师烧死，处决人中，甚至有 7—10 岁的儿童。可谓罪恶累累，磬竹难书。经过民主革命，民权的伸张，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各国宗教裁判所不复存在。1908 年教皇庇护四世把罗马最高异端裁判所改为“圣职部”，由他亲自主持，公布“禁书目录”，对有异见者仍处以开除教籍的“绝罚”，还不放弃对思想的禁锢与扼杀。政教分离后，教会虽然没有了剥夺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还要坚守它最后一块思想阵地。

2、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基督教 1000 多年来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借口仅仅是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是犹太人。难道耶稣不是犹太人吗？这种异民族因为听信教会的无稽宣传反而去迫害基督同民族的人，真不知是个什么逻辑！流落在世界各处的犹太教徒，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信教者。德国法西斯二战中屠杀犹太人 600 万，是遍布欧洲的排斥犹太教的极端表现。

3、十字军东征(严格地说应为东侵，是基督教以神的名义对伊斯兰教发动的远征；这里只是历史书习惯称谓，由此也可见信仰分歧对语言涵义的影响)。历经近 200 年（1096—1291）的西欧基督教向伊斯兰教国家展开的争夺圣地耶路撒冷八次东征是历史上两大宗教间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战争。其间也包括塞尔柱突厥人（逊尼派）与埃及人（什叶派）的伊斯兰教派战争。教皇乌尔班二世（法国人）于 1095 年 11 月 18 日在克莱蒙召开宗教会议，号召信徒进行圣战，参加者可以免原罪。东征者每人都佩戴十字标志，向占领着耶路撒冷的塞尔柱人进行征伐。教皇指挥的队伍，以骑士（世袭的职业兵）为主力，包括大量平民信徒，故十字军又称人民十字军，1096 年第一次东征打到君士坦丁堡时，兵力为骑兵 4000 人，步兵 25000 人。1099 年 7 月 15 日从上年已攻占了圣城的伊斯兰埃及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屠杀了该城所有穆斯林男女老幼和犹太人。由此种下两教的历史上永难磨灭的宗教仇恨。十字军在该地区建立十字军国、两个伯国和一个公国。其后伊斯兰国家又攻击或消灭这些国，西欧教会断续地反复东征七次，还有一次儿童十字军东征。这种长期拉锯式的战争给两教，各国各民族人民所带来的灾难，非笔墨所能尽述。到 1291 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尽灭十字军建立的各国，东征结束。其后欧洲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的战役，已不带征伐性质。十字军剩下最后一块阵地——塞浦路斯岛在 16 世纪为土耳其所灭。

十字军的负面影响，除了酿成千年不解的宗教仇恨外，对巴尔干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当初巴尔干是两教斗争的战区，因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奉的神不一而斗争，又加一个东正教，不同信仰的民族在征服者国家统治下又不能不杂居在一起。伊斯兰由强而弱，基督教由弱而强，东正教斯拉夫族参与期间。巴尔干成了欧洲英法（基督教）、德奥（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和土耳其（伊斯兰教）四方争夺的地区，怎能不成为“火药桶”呢？巴勒斯坦地区和圣城是犹太教（以色列）、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宗教的争夺的焦点，以巴冲突成为以色列建国迄今的难

题，又是恐怖主义萌生之地。这两个地区都可以看出十字军武力征伐的恶劣后果。今天的科索沃的麻烦，也都能找到宗教、民族冲突的源头，其中也有教权对民族世俗事权的影响。

由十字军东征，在耶路撒冷屠城事件中，还可以看见一种教（派）的荒唐逻辑，即敌人的敌人也是敌人，不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杀。世俗的逻辑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乃现实利害关系使然。而十字军却把凡异于己者都杀，是信仰之间的仇杀。这是宗教排他性的极端表现，完全回到动辄屠城灭族的野蛮时代。

五、教权肆虐的教义依据

各宗教的教义中有共生因素，也存在非共生因素，这些有负面影响的教义，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显露出消极面。这些非共生的教义，也并不为某一宗教所独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哪个教或教派，如果继续坚持教权主义，教权大于政权，必然是教权执掌者阻碍信众们去认识和反思这些不合时宜的教义，从而走上既不能发展宗教，又有害于世人的危险道路。人们不相信这些明显有害的教义的过程，也是教权逐步衰落的过程。现用共生理性分教说明。

1、天主教赎罪券制度。它原于“人生而有罪”的教义，称为“原罪”。这个重要的教义，说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上帝创造出来以后，在伊甸园因受蛇的引诱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这一罪过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一直传到亚当的所有后代，也是人类一切罪恶与灾祸的根由。即使是刚出世即死去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过，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神学家奥古斯丁全面论述上帝恩宠的道理与灵魂如何能得救的做法的“恩宠论”，则是它的理论形态。“感恩节”、“赎罪日”即七天做一次礼拜等仪式，则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这条教义固然可以起些有思考、行为能力的人反思自己世俗的罪错行为，进行礼拜忏悔的作用，但教会可以借此盘剥人民，“给我钱就可以赎你的罪。”纯属荒唐。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有组织的权力是如何利用信众的信仰接受有损于自身的条件，因为他们盲从了教权的宣传，以为是上帝的旨意。无须讳言，教义给了教权以可利用之处。等到有观念严重与教义冲突时，如“日心说”与教会、信众“地心说”相冲突，教权出它另一手——强权镇压，就得使人们不仅因受骗而交钱，还得为真理而交命，蒙受不白之冤。人的一生，始终笼罩在“原罪”的心理压力之下，还能有思想解放的可能吗？因此，共生论认为“人生而无罪”，这是与自然天、观念神一样成为人类共生的基本观念，以此排除共生障碍，也是宗教得以和平平等共生的基本前提。

2、伊斯兰的教权即政权或教权大于世俗政权是有教义依据的。从《古兰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始判断与认定。

就在《古兰经》第三章里这样写道：“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不信真主的迹象的人，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罚。真主是万能的，是惩恶的。……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

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4]在至仁至恕、至赦至容、至聪至睿、全知全能的真主——安拉那里，世俗的国权是真主的赏赐。谁来实施呢？只有掌握神意的教才能达到，教权必高于国权，或者合二而一。这就是政教合一的教义依据，并且，真主不仅掌握世间的最重要的权力——国家政权的授予权，而且拥有一切福利资源，掌管着全部财富分配之权，让谁尊卑贵贱，全凭真主的好恶。这恰恰反映着人间专制制度掌权者的需要。不是真有这样一个神，而是人间的统治秩序需要这样一个神、一个唯一的全知全能“为所欲为”、“最善于用计谋”的真主。[5]来支持权力拥有者使尽计谋为所欲为。政教合一之所以不合时代潮流，是因为世界人民向往一个和平共生的互爱互助，互利共赢的秩序，而世俗事务涉及各族各教的平等权利，如果让定于一尊的教来管世俗多元利益主体（包种宗教），世俗的或他教他族必然在唯一性、排他性权力统制下受损。因而会产生多教、多教派的冲突，社会不得安宁，人命也得不到保障。一手执经、一手执剑的办法，在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已不可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与其教义是有关系的。

3、佛教教义虽以和平，不杀生，平等众生，自我修行，从心求佛为主，但存在过分超生死的现象，它虽对共生无碍，但“心如古井不生波”对人类整体却是具有危害性的。为什么？

（1）它强调看空一切，达到无欲、无我境界，完全抛弃人生的一切人伦关系与情感，包括起码的责任感，对世事消极躲避、抱不闻不问的出世态度。它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却是要求人放弃生命。它“普度众生”度到那里去，度到的不是人间的爱与欢乐、共生同乐的世界，而是一个心境安宁，直到涅槃而圆寂的世界。理性的说，就是个空亡的佛国——“永生”的极乐的世界。也许这样的“成佛”在笃信者心中在圆寂前心情是最为平静的，精神上是永生的，但客观上却是如同俗人一样的死亡。极乐世界是什么样？轮回报应之有无？至少是个不确定性的信息。这样的主体认定其有，用之于个人安顿自己的人生则无不可，用之于全人类社会则不可。因为不能让人类放弃向确定性的真善美乐的共生世界的努力而去追求一个不确定性的西天佛国。不等人类自然寿命的结束，就先叫大家去涅槃而后继无人。更有甚者，印度佛教还有集体自杀的传统。

（2）为了一己修行，对人间的灾难与不平无拯救的客观行动。世间杀了一个人，只说两句“罪过”或“造孽”，就不闻不问了。佛教的出世，是以剥夺为标志的世俗统治者的极好的利用工具。它不管邪恶的嚣张，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让受苦受难者相信“轮回业报”而永远屈从，宿命论大行其道，自己骗自己。佛教是弱者的无奈容易接受的教。教义不主张扶弱抑强，这客观上是不利于建立共生社会的，相反，倒起到保护不共生社会的作用。

（3）佛教教义不务生产，靠乞讨，布施生活，似有失人的尊严。历史上儒佛斗争

集中在无父无君和不务世事，浪费钱财两个方面。至于利用信仰，发香火财，养尊处优，背离教义，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在教义范畴。佛教也是有个进步与改革问题，变出世为入世的“人间佛教”，倒是值得研究的佛教领域，以裨益于世。

4、日本神道教教义以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为天皇制的建立与巩固效劳。在原始众多神（80 万—15000 万）中，特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自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并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祭政就是它的教权，精神权威。排除儒佛，实行“神佛分离”，但吸收中国理学的“尊皇忠君”成份。在二战中更有“生长之家”教派，认为“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的股肱，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世界。就是这些教义把日本民族拖进战争灾难，亚洲被侵略民族无数生命被这种教义夺走。

5、以崇信“死神”的不是杀人就是自杀的邪教——前者以日本奥姆真理教为代表，后者以法美等国的人民圣殿教为典范。前者施恐怖杀人，后者多次集体自杀，都是否定生命的邪教。逻辑上，中国的法轮功难属于此类。

所有能吸引群众的教义，因其具有“不二法门”的唯一性即排他性，不论是多神或一神，当他们组织化以后，或以政党形式，或以其他名称，都会形成教权，一呼百应。世界新兴宗教在二战后多见，是个世界性现象，也反映人们在人类灾难与危机面前的恐惧与人际系关系冷漠、疏离的烦恼在寻求心灵解脱。人间愁苦产生宗教，但教权形成却是世俗中的政治，给世俗纷争增添一个维度。世界宗教大会是谋求各教各教派共生的，但愿他们的努力能消除对立，达到宗教和平共处，互不为敌，促进和平发展的局面。

共生论主张宗教文化的多元发展，发挥宗教中的共生因素的作用，逐步改革其非共生因素，教权权威服务于和平大局，而不去以信仰扩大民族、世俗的矛盾。把阻碍共生的教权主义的“主义”丢掉，多做些善事。才能最后达到信仰自由，维护精神家园的宁静。

六、教与非教的共生问题

19 世纪唯物主义在哲学理性的发展中异军突起，与在历史上占优势的唯心主义针锋相对，首当其冲的是有神论，也就是宗教。无神论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是“骗子”、“帮凶”。宗教方面也以“恶魔”来回应。占世界人口 84%的有神论宗教信徒以神的名义来回击异端无神论的攻击，展开了世界范围在思想观念上的最深层次的冲突。以往 17—18 世纪启蒙思想家还只是在有神的前提下反对教权和在世俗政治层次上反对君权，还未跳出对上帝的信仰。现在面对却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武器——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它要推翻旧世界，以打菩萨、禁宗教的实际行动来否定一切神。这是有史以来未有的大变故。尽管争论在思想、哲

学、神学界进行，但影响所及，却震憾着精神家园里的普通群众。人们可以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和苏联改制和中国改革后宗教迅速发展看到宗教信仰的力量，因为有神论者和广大信徒要有这样的精神生活——实际是有道德、良心的生活比没神的生活要愉快一些。而毁弃宗教后的世俗却是权力统治一切，思想不得自由，只知赤裸裸地为物质利益而处于普遍剥夺（包括他们的思想信仰）和斗争的世界。

从感性认知层面上，加上历史形成的巨大惯性、生活习性，宗教获绝对优势，而在理性层面上，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才懂得唯物主义的要义和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因此，经过 150 年的斗争。宗教仍然是未可动摇。即使在智能时代，科学如此昌明，顶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都信神。信神并无碍于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成功，倒是一样地取得了科学成果。唯心、唯物之争，有神、无神之争只要不因此而被利用为政治之争，权力之争，和平共处，就无伤文明的进步。人的思想发展和人本身，就是个心与物的统一体的运动，割裂它的两部分，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思维运动不可能只有纯粹的一方。

共生论如何认识和改变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唯物的信仰之争的局面而达到共生呢？化解教与非教的矛盾呢？在前面提出对信仰的界定，这里进一步提出一个“观念神”的概念，即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神，则是客观事实，与有无神灵无关。上帝归于上帝，人脑归于人脑。思维运动产生的观念神，这个神叫“如在”。这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点大概唯物论者也不会反对。信仰必须得到尊重，这是世界 84.8%宗教信徒的精神利益所在，不能剥夺。它是多数人的现实认知，你不可能把 84.8%的人都放在大学里听哲学课，专讲哲学史。一种激进派人士往往获得了一点真知，就想从思想意识上改造教徒们的世界观。物质形态上可以打掉菩萨，能打掉信菩萨的思想吗？这本身就如宗教排他性一样，这不是理性，更不是共生理性。

信仰目标的信息往往是不确定的，但主体确是这样认定的。有神论努力去证实神的存在，无神论努力去证伪。双方在“观念神”的现实起点上多作出努力，经历漫长的过程后，也许会对人类认识神的水平起到提高的作用，这是教与非教能够共生的认识前提。至于各宗教谁信的神是真神、主神、无上神，也可以在实证与证伪方面作出努力，效果也是一样的。在“观念神”的层次上，是显不出高低尊卑对错的，因为它是个虚拟世界。

教与非教，各教派或新兴宗教，都以他们的理由争取信众，都想开辟信仰的新天地，希望都能促进共生，而不是相反。笔者并无更多神学与哲学的知识，仅凭平等共生理念，谋求各信众之间的和平共处共生，勿再杀戮相残和自杀，观察人间宗教活动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实践，考之以历史上教权之危害和会给人类共生带来阻碍作用，提出上述观点供读者参考，并向宗教界、哲学界贤达讨教。

第二节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在历史上起着很负面的作用，是文明社会一直谴责的对象，而要弄清什

么是种族主义，首先得弄清种族、民族、部族三个不同的概念。从源头上考察世界上关于族的冲突。

英语 Race，兼有人种、种族、民族、家族、世系等含义，它着重血统、血缘性，但范围比较宽泛，容易造成混淆。如部族灭绝，民族灭绝，也被称为种族灭绝。但三者是有区别的，须加以辨明。

一、种族、民族、部族的区分

1、种族。我们人在生物学上属于一个种，即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智人种，即全人类。智人种根据共同遗传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智人种亚种。

（1）蒙古利亚人种，又称亚美人种，即黄种人。起源于东亚、中亚，包括居住在北亚、太平洋、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美洲的印地安人种。它是三大人种中人数最多的一种，现分布于中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南半岛、南北美洲。人种特征是黄色皮肤，黑色头发，扁平面部，低鼻，高颧骨，方头型，狭细眼。

（2）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赤道人种。起源于非洲，包括西非森林尼格罗、中非班图、南非布须曼、澳大利亚诸人种。现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西印度群岛、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特征是黑棕色皮肤，细短、卷曲的头发，少体毛，棕色眼睛，长头型，，低而大鼻，厚嘴唇。

（3）欧罗巴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高加索人种。它起源于欧亚非相连地区，包括北欧、波罗的海、北海——波罗的海、南欧的印度——地中海、西亚的巴尔干——高加索、中欧诸人种。这些人种现分布于欧洲全部，西伯利亚、西南亚、北非、印度、澳大利亚、北美洲。体征是白皮肤、高鼻子、薄嘴唇，蓝或灰眼睛。

白种人内部差异很大，主要分北欧人种和地中海人种。北欧人种又分为波罗的海亚人种和巴尔干亚人种。前者包括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后者包括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拉丁人。地中海人种分为典型地中海亚人种和高加索亚人种。前者包括法兰西人、拉丁人、希腊——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人、闪米特含米特人、南亚雅利安人；后者包括高加索人和西雅利安人。

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同种的智人，起源与生物进化历程都相同。由于在不同地区长期定居，受不同外部条件（气候、地理、食物）等影响形成亚人种。亚人种又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这就形成文化人类学意义上不同的民族。中世纪在欧洲所出现的反对闪米特人的浪潮，就包括人种与宗教文化上的双重差异的种族迫害。

故此，本书认为种族是具有共同体质特征，如上述肤色、眼色、毛发等的人群，它与初期民族含义有重叠，但与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概念是不同的。

2、民族。它是指在同一地域中有着远古的血缘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同种、同语、同文、同教、同经济与生活模式，具有相同归属感的人群。这些人群对自己民族的人称呼为“同胞”、“兄弟”。对异民族的人则称为××人。他们

显著的差异是历史文化特质的差异，如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 56 个民族就属于自然形成的民族，汉语中民族原义也指此。

民族社会的生存与秩序需要有一个组织，这就是先由小范围的族长、酋长领导的部族逐步扩大其共生圈而形成的有统治秩序的国家，人类进入专制国家时代，国家与民族概念迥然不同。后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市场竞争的国际环境下，要求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建立同一市场，同一货币，同一政令，同一法律的民族国家（nation）。民族才由原来一个或多个民族变为冠以国家之名的民族。如英国的英吉利民族就包括原住民克尔特人和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裘特人、日耳曼人。法兰西民族也是一样，由原来的高卢人和后来的诺曼人、萨拉逊人（阿拉伯民族的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族的一支）所形成。在 14—15 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所培育锻炼起来的民族意识成为斗争的精神支柱。从此国内各民族统一于利益一致性的更大的民族概念之中，如果就其与国家关系而言，可称之为“国族”还比较准确。

中华民族也是个民族国家的民族概念，以国名命名，包括了 56 个自然民族，在一个半世纪的抗击侵略赢得独立的过程中，也形成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

3、部族。指民族形成以前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地域等因素的较初级的共生圈，多以酋长、族长或教主为首领，它代替了更原始的按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和部落。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这种对国家而言具有独立、半独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如非洲的部族、巴基斯坦的部族。国家对他们不是直接管辖关系，而仅是某种契约关系和历史遗留的默认关系了。

明确以上这三个概念，其中民族有自然民族和“国家民族”，以利于本章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剖析。

二、种族主义的由来

所谓种族主义，是指本族的人种优于它族的人种，天生的有优劣之分；优种该统治、压迫劣种；杀戮、迫害、歧视是理所当然的一套理论。

考之古代，并无种族主义社会，奴隶社会也有同种人当奴隶，印度的种姓制度接近种族主义，但过去和现在它也不是种族决定地位的社会，而是出身和等级决定社会地位的社会。当时，印度社会的种姓分为婆罗门（教）、刹帝利（君，贵族）、吠舍（商）、首陀罗（农、工）四个等级和等外的广大奴隶。四个等级互不通婚，保持种姓的血统纯正。婆罗门说：“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冥黑。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6]这就是种族主义的思想。但这只是宗教教义掩盖下的种族主义初始形态。古罗马的奴隶制是由于经济与宗法的原因，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根据文化差异，也不是根据种族不同划分的。

真正种族主义思潮出现在 19 世纪的欧洲，它是近代历史殖民帝国时期的产物。欧洲的白人为了统治、压迫殖民地人民的需要，引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观点，指证有色人种系劣等种族，为贩卖、虐待、屠杀

黑人奴隶，歧视、压迫有色人种的现实服务。支持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的斯宾塞和 W·白哲特，美国的萨姆纳——认为影响人口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将导致最强竞争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断改进。也就是说社会是强者的世界，强者改进人类。他们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或雅利安人（德）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这就是种族主义的理论形态。到 20 世纪，生物学、人类学知识的进步，揭穿了种族主义的“科学”外衣，驳斥了生理差异性是导致贫富、强弱的论调，但在人们心理上造成弱肉强食的观点却至今也未能得到清除，我们可以从种族主义的种种表现和罪行中看到种族主义反共生的本质。

三、种族主义的表现

一部黑色人种的血泪生存史，也就是种族主义的罪恶史。在纯粹意义上的种族压迫表现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黑人受害最重。叠加着民族文化宗教因素的犹太族的悲惨的境遇，也是种族主义在同色人种之间造成的罪恶。种族主义把文化宗教的差异性视为人种的生物差异性，为屠杀、灭绝异族制造借口。种族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有如下形式：

1、黑奴贸易。奴隶制度是人类最非共生残酷的制度，奴隶似牲口般任人买卖，作为会说话的牛马使用。历史上早就存在奴隶贸易，其中不乏对异族战俘或抢掠来的奴隶具有种族意义的买卖。但从来没有像 16—19 世纪 400 年间欧美的白人贩卖非洲黑人奴隶这般残忍。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辣，无与伦比。而有些历史学家，规避这段不光彩的种族主义的罪恶历史，仅止于记载贩奴过程中的某些不人道的行为。事实上，从 15 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捕捉黑人，贩卖为奴开始，到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次第展开大规模捕奴、猎奴，通过酋长们诱奴、卖奴以及武装掠奴等手段，把黑奴控制在非洲西海岸各处商站、要塞地下室里，用烙铁烧红，给黑奴手臂和胸前烙上卖奴公司的印记，然后手捆脚链地一船一船地装运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黑奴市场，卖给那里的甘蔗园、种植园主充当农业劳动力。一个黑奴 70 美元，运到美洲卖 2000 美元。黑人身强力壮，吃苦耐劳，顺从能干，买一个黑奴，干一年即可收回买价。葡西两国开始时是王室颁发许可证让私人贩卖，后从荷兰开始以股份公司出现。英法更打着非洲公司旗号，组织黑奴贸易。如此购销两旺的黑奴贸易在 18 世纪达到顶峰。贩卖黑奴人数：16 世纪——90 万，17 世纪——270 万，18 世纪——700 万，19 世纪——400 万。英皇家非洲公司 40 年贩卖了 10 万人，利物浦成为最大的贩奴港。法国 1713—1793 年 80 年间，贩奴 150 万，死者 50 万。在贩奴过程中，死亡率如此之高，原因是黑人贩子们贪图利润，尽量多装，一只 90 吨的船，竟装 490 名黑人，站着时像书架上的书——没有空隙，睡下时比棺木里的空间还小。为防止反抗暴动，两个人左手连右手，左脚连右脚锁在一起，装卸时用绳串连一队，如此虐待，在大西洋上热死、渴死、饿死、病死、传染病致死，不计其数。从非洲到美洲的运输线是一条条死亡线，人间惨酷，莫此为甚！有人还指出 1 个黑奴到美洲，就有 4 个人

在猎捕、地牢、航行、转运、贩卖，到主家的过程中死亡。这是黑种人种的灾难。总计贩卖黑奴数是多少，各家说法不尽一致，最高位数是 3000 万，最低位数是 800 万；非洲运出数约 1800 万—2400 万，运入美洲数约为 1500—2000 万，差额即死亡数为 300—400 万人。美国专门研究贩奴问题专家柯廷统计，成为劳动力数字为 956 万 6100 人，有 15%损失率，贩奴总数为 1100 万，使非洲大陆人口损失惨重。1650 年，欧、亚、非人口为 4.6 亿，非洲占 1/5。20 世纪初，非洲人口只占 1/12，欧洲增长 3 倍，非洲几乎停滞。实则为资本主义扩张加上种族主义强加给黑色人种的灾难。

此外，在东非、北非，阿拉伯人在 15 世纪以前也有捕卖黑奴的记录。而黑人运往欧洲为奴，其数字也不在少数。

笔者把黑奴贸易归之为种族主义的表现之首，是因为必须揭露在贸易的形式掩盖下的种族不共生、不平等的实质。为了人类共生，首先就要实现种族之间的平等共生，这也是世界各民族平等共生的观念基础。

文明国家、全世界都来帮助黑人祖先的后裔吧！那里还处于饥饿、灾荒、穷困之中，这不是恩赐，也称不上慈善，而是给死难的黑人祖先们应有的祭礼！是给各王朝政府和贩奴商们造成的罪恶的赎金，偿还拖欠了几百年的良心债。

2、种族灭绝

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是在 1948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第 260 号决议“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行的决议”中的第二条，“以完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国家的、种族的、人种的或宗教的人群所犯下的罪行”，这里包括了宗教，即民族国家的和宗教的人群。我们这里指的是种族的、人种的全部或部分的种族消绝，以便确指种族主义的本义（教权主义已在上节述及）。

美洲原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在遗传上是完全独立状态，特征是棕黄色皮肤，黑色粗直的头发，铲形门牙，突出的颧骨和鼻梁，体毛稀少，明显地不同于亚洲地理人口的血型。但据考证说他们是 15000 年以前从冰封的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的。从阿拉斯加一直到南美最南端广袤的大地上，他们分散于原始半原始部族之中。在 1492 年新大陆被发现后，白人殖民者开始征服、消灭他们，侵占他们的土地。整个美洲开发、富庶、文明的过程，就是原居住种族被剥夺生存空间和生命的过程。因为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者进行过顽强的抵抗，曾驱逐西班牙出墨西哥湾沿岸，达 12 年之久，在北美也曾有效地驱逐过法国、英国殖民军。嗣后由欧洲带过来的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毒，印第安人缺乏对外来病毒免疫力发生大规模疾病，人口锐减。他们在战争中既无现代武器装备又无整体统一指挥，伤亡总比进攻者损失多一倍到数倍，经过 5 个世纪的种族斗争，印第安人由原有 5000 万人，打得只剩 1/10，北美剩的约 200 万人。1890 年美国把印第安人列入人口调查，实际数为 24.8253 万人，大部被赶入保留地，巴西还有 40 万，秘鲁 50 万，余则分散各处条件恶劣环境之中。

虽然英国新教徒在北美 13 州首举全世界反殖民主义的义旗，按照民主主义的精神

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信奉的是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在南北战争中赢得反种族主义解放黑奴光荣的历史。但对待印第安人却有着相反的种族主义的记录，历史并不能以功掩过，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反对种族主义，正是解放黑人的内战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就扬言：“有必要灭绝全体印第安人部落”，拨款一亿，先灭杀印第安人主要食物——北美野牛，将 1300 万头灭到不足 1000 头，迫使印第安人就范。美国建国直至 1924 年宣布所有印第安人获得公民权止，战斗了 1097 次。其中在英、法殖民当局镇压美国独立力量和内战时，土著首领多数站在英法和南方一边，加深了美国对土著的敌对，致使美国对南方和土著的战争既具有反剥夺，解放种族，又实施种族压迫的相互矛盾的意义。

在 19 世纪，美国有个口号：“The only good Indian is a dead Indian”（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这种你一族活就得别族死的口号就是种族主义的典型语言。杰弗逊就说过：“在战争中，他们（指印第安）会杀死我们某些人，但我们会杀死他们全部”，“追杀灭绝印第安人或者将他们驱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7]这些言论，明显地是种族主义的。

1824 年，美国政府增设印第安事务局于战争部之下，就是实施不是灭绝就是驱赶、迁徙的军事+法律的两手政策。1827 年，印第安人成立切诺基共和国，反对迁徙。1830 年，美国议会通过“印第安人迁徙法案”，把印第安人圈定在保留地内，实行种族隔离。在美国人西扩过程中，从 1777—1887 年，订约 370 个，挤占全部可耕土地，实现“将他们驱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

究竟历史在进步，民主精神与种族主义不相容。自 1924 年，印第安人的境遇随着公民权的获得，也能与黑人一样在美国平等的生活。1988 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赌博条规法》以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到 2001 年，美国 28 个州 290 家印第安人赌场年收入 127 亿，盈利超过 50 亿美元，美国 180 万印第安人加入了这个行业。民主与人道精神将逐步抚平种族主义苦痛的伤痕，这里主要是一方面无情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前进的脚步是走向人种和平共生的，而不能停留在历史的种族仇恨上。

3、种族隔离

在一个国家内，对其统治下的不同种族人群实行隔离政策，既要他们做苦力，又不给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分割成两种以上的制度化待遇为种族隔离，即强制执行制度化的种族分离体制。远在 1555 年，欧洲大陆对分散在各国居住的犹太人就实行职业限制，只允许从事一些仆役性、服务性行业，叫种族“区别对待”，发展到把犹太居住区用隔离物（如铁丝网、栅栏、砖墙）圈起来，只两扇门与外界交通，叫做隔离区。晚上或基督教节日都上锁，由基督教徒把守，伊斯兰执行得更为严格。

典型的种族主义、全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是有 300 年白人压迫黑人历史的

南非社会，于 1910 年成立的南非联邦。1961 年改称南非共和国，居民中 70%是黑人，13%是以印度人为主的有色人种，17%是白人。白人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将种族压迫法制化、制度化，建立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法令有：①《种族隔离法》（1951 年），把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非洲人三等级，分别隔离，黑人被赶到贫瘠的“保留地”内，白人占有 87%的土地。②《通行证法》（1952 年）规定非白种人在白人区行动必须带 60 余种证件，否则罚款或监禁。③《班图自治法》（1952 年）把非洲人按语言文化区分为 8 个部落自治单位，名为“班图斯坦”。在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中，南非的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受到南非黑人的强烈抵抗，并发生 1960 年的沙佩维尔屠杀黑人的大惨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谴责与制裁。1989 年南非德克勒克总统上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1990 年，就解除长达 30 余年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 30 多个黑人组织的禁令，释放在狱中坚持 27 年斗争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和黑人政治犯，取消长达 4 年的紧急状态法。自他执政后，累计废除了 692 项种族隔离法律，修改了 120 项法律，取消了 15000 个行政法规，完成了建立种族平等新南非国家的法律基础。由此，也可见原政府对黑人压迫禁锢之甚。更有意思的是为了制宪，德克勒克在 1992 年举行一次只有白人参加的公民投票以检验对他的支持程度。这次白人公决以空前的高投票率（85.5）和压倒多数的赞成票（68.7%）支持德克勒克。说明在南非平民中间，相互并不分什么黑人白人，全在乎执政者的有无政治家的眼光，胆识和气度，去清除种族主义。1994 年南非各种族选民第一次平等地参加大选，曼德拉以 62.65%的选票当选为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新南非的诞生彻底铲除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国家级的种族主义堡垒。但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层次上种族主义病毒还远没有清除掉。

一个坚持反种族主义的曼德拉，一个放弃白色人种的特权的德克勒克，双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为对立双方的和解共生铸造了一座种族共生纪念碑。

4、种族歧视与种族偏见

种族歧视指种族之间的鄙视，种族偏见和存在于思想观念上对某种族的不公正的成见。虽然世界上再没有种族主义国家，种族岐见与偏见却仍然存在。一些种族主义的组织仍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一篇 2007 年 9 月 21 日《中国新闻周刊》以“种族主义犯罪歧视重返欧洲”的报导。种族主义犯罪在增加，种族歧视正在蔓延，种族主义组织已进入社团政党等组织层次，新纳粹势力又有抬头。这些组织有波兰的最大反犹太政党——“家庭联盟”，已进入执政联盟。匈牙利以排挤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为目标的“匈牙利改良运动”，在布达佩斯穿黑色制服，佩带原匈牙利纳粹党的箭十字袖章，公开集会，在一些乡镇取得了代表席位。东德的新纳粹党搞“民族解放区”，即“排外区”；国家民主党在一个州的民意支持率为 9%，超过该州执政党 1%。

其次，排犹排外（伊斯兰和亚洲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发生 50 人聚群欧

打 8 个印度人的情况。欧盟基本权利监督局 2007 年度发布的《欧盟成员国种族主义和仇外现象年度报告》指出，东欧、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马耳他等国种族主义势头上升。大多数国家种族主义犯罪率增长，波兰、斯洛伐克增幅为 50%，德国案件总数为 15000 件，是全欧第一。即使移民政策最宽容的英国，也经常有人到清真寺游行，喊着“要么爱英国，要么回家去。”

2003 年统计，欧洲极端排外性种族主义组织有 41 个，大致人数 7.5 万人，是不可小觑的。至于存在于思想中的种族偏见，就更为广泛。同时，也不是只有白色人种有偏见，黄色、黑色人种就没有偏见。种族偏见是种族历史，宗教教义，利害冲突，习俗差异等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只有共生理性，才能认识它的不正确性。

以上四种种族主义表现形态各异，严重程度不一，其内核都是不平等对待异种族，需要指出的是种族主义肆虐往往是与其他因素结合造成的结果，如 1-3 是与殖民主义结合，4 是殖民国家内部与纳粹主义结合的表现。

四、种族主义集大成者——希特勒

无论是种族主义理论观点方面，还是种族灭绝的实践，人类的灾星希特勒都是首屈一指的。研究希特勒可以得出对种族主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1、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

希特勒说，纳粹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废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念，而代之以扎根于土壤之中的、用共同血液凝结在一起的种族社会的观念。”

“民族社会主义将依照自己的种族观念进行革命，重塑世界。”

“两个世界相对而立，上帝的人和撒旦的人！犹太人是反人类的，是另一个神的造物，他们一定源于人类种族的另一个根，我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互相争斗”。

由此可见纳粹主义是为建立种族社会服务的。这个种族就是日耳曼人，古代雅利安纯种的后代，具有优等种族的特质：金发、白肤、碧眼、创造力、勇敢和忠诚。日耳曼人有资格去征服并驯服其他民族，德国必须通过以劣等种族斯拉夫人为代价得到“生存空间”。她将征服俄罗斯，根除犹太人发明的共产主义，使落后于人类发展的斯拉夫人变成`奴隶，成为“一群感到需要一个主人的天生的奴隶”；如果一个民族让其血统通过与较低等种族融合而受到污染，那么，这个民族就会退化和灭亡。因此，要保持雅利安人种的纯正性，让神族子孙永远统治世界，希特勒还制订了“生命之源”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计划。希特勒强调，种族间的争斗是有益的，因为它使优秀种族锻炼得更坚强，这种斗争使他们变得更残忍，在达尔文世界里是个必要的素质。他还认为，良心是犹太人的一项发明，历史就是种族间的无情斗争，只有最强壮、最残忍者才理当幸存下来。（看来，希特勒的种族斗争史观与共生史观尖锐对立——笔者）。

希特勒把他所鄙视的一切——自由主义、唯理智论、和平主义、议会制度、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现代艺术和个人主义都归罪于犹太人。[8]

可以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形态是很完备而明白无误的，建立种族国家的蓝图也是明晰的，他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的罪恶实践也是必然的。

2、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奴役的实践

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本质决定它要从地球上灭绝犹太，把所有的劣等种族统统做他的奴隶，斯拉夫首当其冲。1926 年以后，希特勒的灭犹降俄，奴役斯拉夫观念始终未变，直至死亡。

希特勒种族主义实践在他建党时就以反犹为口号进行宣传，上台执政后，从反犹太法开始，一系列的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行政机构犹太人被开除，禁止犹太人从事医生、律师、音乐、教授等职业；禁止日耳曼人与犹太人通婚和性关系；大学、餐馆、药房、医院、剧院、博物馆和运动场逐步对犹太人关闭。1938 年 11 月，利用一位外交官被犹太青年暗杀为借口，组织了一场大屠杀，死了几十名犹太人，焚烧并洗劫了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和全国的犹太教会堂，2 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给犹太人社团 1 亿马克的罚金，这只是灭犹的一个序曲[9]。

大规模恐怖的灭绝欧洲犹太人是 1941—1942 年纳粹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时期发生的。希特勒发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指令，执行任务的是希特勒种族理论的狂热信徒希姆莱和他领导下的党卫队。它是一支训练有素、乐于卖命、残忍成性的精锐部队。它的特别行动队是专为集体屠杀而训练的，跟在德军的后面，走进被占领的城市和村庄，包围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小，一律驱赶到屠场，用机枪和步枪把他们杀死。这样的方法就屠杀了 150 万犹太人。

希特勒为了加速灭绝犹太人的步伐，将原来的集中营改成屠杀中心，把各处犹太人装进装牲口的车厢里，连续几昼夜中途不供应食物和水。当拉到集中营时，那里道路布满尸体，铁丝网柱子悬挂着尸首，到处传来射击声，党卫队的医生来检查“这些货物”，决定哪些人该去附近奴隶工厂的集中营，哪些该送到“死亡工厂”，包括老弱妇孺全部。死刑室——毒气室杀死一批人只需要 3—15 分钟，一个半小时后搬运尸体，然后取下死者的金牙、头发、眼镜、衣物等；赤裸裸的尸体堆积到屋里的天花板，等待送去焚尸场——这就是奥斯威辛杀人工厂的杀戮过程。种族主义刽子手头目霍斯——负责该处杀人的指挥官供认，至少有 250 万死者是用毒气或火化的方法，另外 50 万是饥病而死的，总数 300 万。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党卫队员经常以虐待犹太妇女和孕妇为乐。一位幸存者目睹过当时场景，他叙述这些不幸的妇女们，被党卫队用“棍子打，皮鞭抽，狗撕咬，抓住头发拖着走，用沉重的德国皮靴踢肚子，最后当她们折磨得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被活活地抛进火葬炉。”

人类最后一点的良心、良知被希特勒种族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疯狂的吃人的兽性，在奥斯威辛——人间地狱表露无遗。说明某种非共生理论一旦为群众所

接受为信仰，会导致何等残酷的灾难。

纳粹决心一个不留地处死落入他们手中的犹太人，开动它的国家机器，用新技术杀死了约 600 万犹太人（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上的数字是 570 万），占全欧犹太人 2/3，约 150 万死者是儿童，成千上万个家庭被消灭，无一幸免，没有后裔。[10]这就是希特勒种族灭绝的罪恶实践。

3、希特勒种族替换的罪恶计划

希特勒在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制订了更加险恶的“生命之源”的计划。从 1936 年起在德国建立 9 座“育婴农场”，向雅利安妇女提供向外保密生私生子的优越环境，让党卫军精英为元首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人种”。12 年间，有 1 万名这样的纯种婴儿出生。二战中，纳粹在占领国内设立“育婴农场”，迫使金发碧眼女郎与德国官兵发生性关系，这种形式，至少有 8000 名纯种婴儿出生。但是，这种零散的、要十月怀胎才生一个似乎达不到要求的进度。纳粹就在占领国内收捕、绑架雅利安血统的金发儿童，运回德国家庭抚养，这样的儿童有 25 万人。命运最惨的是挪威妇女和她们生的雅利安与北欧血统混合的“希特勒婴儿”。在二战后成为抬不起头的“纳粹崽子”，屈辱一生。

战后揭密，希特勒并不以奴役斯拉夫人为满足，他还有灭绝英国种族的计划。把 200 万有北欧女人外貌的英国女人关进 12 个“生育农场”中，充当性奴隶。每个纳粹男性“种马”拥有数十个英国女人，批量生产雅利安后代。英国 17—45 岁男人驱逐到欧洲大陆当劳工，老弱病残将处死，留在英国的男性劳工都进行绝育手术。几十年以后，英国种族将为那些德国种族所替代。虽然，英国抗战使纳粹没能实施这个计划，但由此可知种族主义的狠毒。如果让纳粹得逞，世界各种族、民族都将是这样的下场，不会有例外。历史究竟是摒弃不共生的。60 年之后，当年“雅利安婴儿”终于露面，2005 年正式成立“生命痕迹”组织，2006 年 11 月 4 日，在德国东部城镇韦尼格罗德有 40 名这样的老人举行集会。这些一生都有负罪感的老人，同样是种族主义灾难的牺牲品。[11]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种族主义的控诉，我们为屈死的犹太悲痛，也为“冤生”的雅利安难过。我们人类就是被那些极少数的狂徒制造出一些“神话”、“理论”、“主义”等等坑害的。

一手灭绝，一手催生，灭绝异族，催生同种，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看到的纳粹实施种族主义的双轴图。德国纳粹用千万人的血给人类书写了一个完整的种族主义的诠释，看种族主义思想将把人类引到什么样的深渊！

五、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

并不是只是白色人种因其处于强势地位就有种族主义，有色人种一样有种族主义。历史上、近现代史中都有它的记载。只不过没有如白人压迫黑人，欧洲人残害犹太人那样典型。列举一些史例，以便深入反思各自种族主义的历史，构建种族共生的共识。

1、汉民族的种族歧视与屠杀

在汉语中，用“犬”字旁指谓周边民族本身就带歧视、敌视、蔑视含义。如“狄”、“獠”、“狨”、“狁”等都是，时间非常早，殷周时代就有。

历代王朝开疆拓土，也没有少杀异族，也是要驱赶到“我们不愿去的地方”——山林瘴疠之地，大漠荒凉之所。《前汉书》记载，汉将陈汤，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远在万里之外殄灭郅支部族，死其单于，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 1518 人，生掳 145 人，降千余人，斩杀数与掳降数相当，逃到内城的百姓也放火烧死。这算是个种族屠杀的案例。陈汤有言：“明犯疆（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族主义语言算得典型。古籍中，凡有“灭其国，夷其族，徙其民”的语句，都是一场残酷的种族迫害或屠杀，也是史不绝书。

2、蒙古部族的杀戮与种族分等

蒙古部族以 12.9 万铁骑，统一蒙古各部，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蒙元帝国，征服领土达 3000 万平方公里。在欧洲、中亚各民族中都有大量屠杀的记录。在中原，仅成都一城，该县志记载，“城中骸骨 140 万，城外者不计。”元人《三卯录》更道其详：“蜀民就死，率 50 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残杀程度，可谓至极。

蒙古为了统治，种族尊卑分等级，一等蒙古，二等色目，三等金人，四等南人（南方汉族）。一等降一等，好保持少数统治多数。对民间统制，更其严酷，十户一把菜刀，由蒙古人管。这种军事统治，是无法长久的。在推翻元朝时，全国杀蒙古人 7 万。

3、满清种族统治与满汉融合

满族在入关征服汉民族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历史上著名屠城事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与摧毁种族意识的政策，也有血流成河的惨状。但它能坐 260 年江山，与蒙元不同，是实行部分的有限的种族平等，特别是用科举、晋升笼络汉族文人为大清服务这点上比较成功。社会等级也是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汉人，内外还是有别。只是到了列强入侵，民族利害一致，大敌当前，不分满汉，辛亥革命，五族共和，对满清王室没有实行极端政策，汉满关系比较好。日本在东北成立满州国，就是企图撕裂已经融合的汉满关系，侵略者利用种族、民族矛盾制造分裂，可见一斑。

4、大和民族的种族征服

日本民族古来就信神道教，认定自己是太阳的子孙，负有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使命。自视为高人一等的优秀民族，把朝鲜族、汉族看作下等，称中国人为“支那猪”，该他来杀戮，欺凌。不仅像南京大屠杀那样从肉体上消灭，还要进行奴化、日化教育，在思想上消除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让中国人世代做他们的奴隶。

通过以上的例证，种族主义的存在与危害，古已有之，而在近现代，由于德日两国在二战中强力推行种族主义，当今种族主义又有所抬头，构成人类新的威胁。不能不总结种族主义的教训为：谁相信，谁吃亏；谁实行，谁倒霉。多半是以损人开始，

以害己告终。开始时，天之骄子，傲慢无双，以人为豕，戮掠平常。及其终了，国破族亡，成阶下囚，祸国殃民，举族蒙羞。

共生论认为，每个种族或以种族为核心组成的民族一律平等是种族共生的基本条件，各国政府和各族领导人应对境内种族残杀、隔离、歧视等等制度和行为负责，还应对世界各种族负起和平共处的道义责任。

世界反种族主义，是为了和平，为了各种族的平等共生，它具有从野蛮到文明的意义。为了世界免于因种族差别再燃仇恨之火，视异族如己族，一些种族间的不和都能在全球化时代化解，只要有共生思想与意愿，是能做到的。

六、种族主义的今日版——高贵血统论

本来在世界范围，种族主义快要送进历史博物馆，笔者却惊讶的发现，“网易论坛”（http://bbs.163.com）竟有人以“高贵血统论”为题，宣传种族主义孪生兄弟——血统论，并有全套的论证。该文主要论点如下：

（1）“劣质人口大量增加而优质种子近乎绝迹——这就是中华民族二千年来真实的历史。为了再生，为了种族之复兴，我们种族之精英们不能听任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了——提高国民（种族）之整体和重建一个贵族阶层（高尚血统组成之精英领导团队）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因此，立法阻止劣势人口之无限出生和鼓励优秀血统之生殖应成为我国之战略国策……。”

（2）“今天之少数精英，就是未来种族复兴之种子。……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优良组织的社会，均是高贵优秀血统为统治集团之贵族政体，只是贵族之意义现代与古代不同罢了。”

（3）“优秀血统提炼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种族血统纯化之过程，杂种无长期遗传优势，这是天演之公理，种族之纯化过程就成为了我们之目标。”

（4）世界之种族有优劣之分，具有创造力之种族是最高等之种族，具有模仿力者次之，缺乏创造力再次，而没有开化或进化不完全即无创造力的种族最次。因此，可以分类世界种族：日耳曼人和大中华人是最优秀之种族；拉丁、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犹太人等是第二等种族；黑人属于第三等种族，只要我们华夏种族能完全重生，我们就能再现千年帝国之光荣……

该文主要论据如下：

（1）“上帝造人是偏心的：少数之高贵和多数之低贱是宇宙之法则，请看天上之太阳就可知此道理（一个太阳，众多星星，几大行星）。”

（2）凡人类文明之初始时代英雄之血统均可追溯到某个神或黄帝（中国）。

（3）低劣之血统，在平等的条件下，即使经过百倍的努力，也不及优秀血统之一倍努力。

（4）法西斯之优越种族理论实质上和民主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分彼此。……在民主体制下，公众徒然以自由平等而自慰，殊不知却由于缺乏思想而成为了受舆论

摆布之“高级畜群”。[12]

尽管该文作者并没有给出如何鉴别“高贵血统”与“高级畜群”的客观标准和血统的纯正化操作方法系统，无法进行希特勒式的试验，而是由一个“上帝在掷骰子时”就注定了个人的命运的统治秩序。这个秩序是由“三大类精英血统”产生的英雄和精英来掌握（三大类精英似应理解为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的精英）。由他们不仅掌握着现在的政权，还要培养他们的“高贵血统”的子孙，实行精英统治，进到“民主帝国时期”继续对“劣质人口”进行统治，实现华夏种族的完全重生。

该文作者，显然是自划为“高贵血统”这一类的，他可以对世界种族评判其等次，仍然把黑人列为最低层。这三等种族论，算不算我中华优秀创造性成果呢？全世界现在都在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却在创造种族优劣论，而且是以现时统治精英为“高贵血统”，纯化、神化精英血统，它落后于时代与文明，难以时空计。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知识精英的悲哀与内心深深的痛。

笔者属于哪一类？扪心自问，应属“劣质人口”，因为：（1）不属经济精英，没有发财；（2）不属文化精英，没有成名：（3）更不属政治精英，因为除我以外，不代表任何人，也曾为伟大事业奋斗过，但效果不佳。我应属于稀释“高贵血统”的“平民血统”的“劣质人口”。看了这篇“高贵血统论”，还准备进一步进行稀释，因为不稀释，血统论的毒还在那里毒害世界各族人民。

且不谈该文作者把一切归于上帝的神天史观和精英崇拜的英雄史观，以及论证的直观性与臆测性。主要只在说明两点：

（1）英雄、精英、创造不在血统，而在生存竞争中的社会实践。项羽说：“彼（秦始皇）可取而代之”。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说明这个道理。创造性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和勤奋的精神，同一家庭，兄弟相距霄壤者众，也不是血统原因。可能该文作者倾慕某些贵族气质、品格，温文尔雅，文明礼貌。对以往劣质人口的野蛮暴力倾向产生的逆反心理，作些愤激之论，但这也不能证明，精英是血统的原因，倒是反果为因，精英是奋斗的结果，不是血统高贵决定的。

（2）正当全国朝着民主化方向努力之时，作者作出了民主必然导向专制的论断。提出“民主帝国”的概念，而帝国恰恰是不民主的表现。不能因为有民主国家对外侵略就连它国内的民主也否定，也不能因为其国内民主就不谴责、反对其对国外的侵略。“民主帝国”是个对共生非常有害的概念，它混淆两个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概念，使人对民主丧失信心，宣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高贵血统的精英统治。只要是有了权，有了钱，即所谓精英，不论其采取何种手段，掠取到权钱，就是三大类精英，连血统也高贵起来。试问，那些坐在台上喊清廉的贪官，他们的血统是高贵，还是劣质呢？我想，该文作者，应该是文化精英，何谓文化；价值观才是观念文化的核心。该文作者以什么为最高价值，不是显得太露骨了么？问问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还需不需要一个高贵血统的贵族阶层来统治，回到愚昧无知、靠神灵、帝王、贵族来决定我们

的命运的时代。

曾经喧嚣一时的“血统论”、“成分论”——阶级血统论，在文革肆虐期间残害了多少人生家性命。在口语层次上流传“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话，反映阶级歧视与阶级偏见。一股优势人群的狂妄与傲慢之气，正是种族主义血统论惯常的霸权态度。想不到过了 30 年之后，仍然有以种族复兴的理由，用新的语言，表达人类已经反了 500 年以上的陈旧思想，不能不使本节拉长了篇幅，以辨是非。同时，事实也提醒世人，种族主义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种族主义并不因南非最后结束白人统治而结束。相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族主义血统论还会把旧的人类枷锁换个装璜重新套在人民的脖子上。

第三节　民族——国家主义

在人类共生圈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十分突出，它一方面是国内各利益单元的整合，其中就有诸民族因素在内；另一方面，它又是国际间的行为主体，它国不得侵犯。所有民族国家都遵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活动，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商务的、文化的，都是在谋求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从利益最大化到成本最小化考虑问题。国家利己是“天经地义”的，很少能先考虑共同利益。国家的外交就是折冲西半樽俎、讨价还价。民族国家产生于民族国家斗争、战争之中，天然就有对其它国家的敌对因素。人际关系还有些人情可言，国家关系则全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反映在“国家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这一句话，即唯利是图。人际关系还讲点道德，国家间难得讲道德。在丛林法则的强权政治中，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无道德可言。国家是以暴力为基础，以剥夺与攻防为特点的权力机器，它就是要用自己人的命，去夺别国人的命的战争机器。人类共生圈最后形成将是各共生圈即民族国家对内的暴力性的逐步消失和对外侵略利己性的逐步减弱而达成的，而不是各国人民都高举爱国主义、大民族主义旗帜去无止境地厮杀可以达成的。

民族——国家因其紧密结合实际经济利益而不容易改变。国与国、族与族的纷争、斗争在历史上呈现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可以说，人类各种各类矛盾，种、族、教、阶级之间的纠纷都会从民族国家间的斗争表现出来。以往民族间冲突与危机也是通过国家间的战争来解决。只要是坚持民族国家主义，本民族国家利益为第一，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为了人类免于灾难，认识民族国家主义是阻碍共生的因素之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现实中，承认、维护、捍卫民族国家的正当的利益也是必要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既要维护它的现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在建构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又要避免它趋向战争。换言之，共生论反对民族国家成为民族国家主义而不反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存在及其和平发展。

民族国家是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在它没有完成全世界的联合之前，仍将长期存在。它将为人类共生构建物质与精神条件，如果不明确民族国家的最后平等联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弱化民族——国家的唯一性、无尚性、神圣性，相关国家就永远也摆脱不了战

争、暴力、恐怖的厄运。

这个道理还得从最基本概念民族（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谈起。在英语中，nation 兼有国家与民族的含义。中文里的国家与民族则有所不同。民族主义英语表述为 nationalism，同词也就是国家主义，反映着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国家的民族。民族主义有它辉煌的历史，《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民族主义的词条的解释为，民族主义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它是近代史的一项运动，在整个历史中，人们都为他们的故土、祖辈的传统以及他们所在地区的权威所向往，不过直到 18 世纪末叶，民族主义才开始普遍被认为是塑造人们公共的以至个人的生活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19 世纪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20 世纪则是亚非民族运动蓬勃兴起的世纪。17 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突出的一次表现……《独立宣言》和美国的诞生则是 18 世纪民族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最早的体现，这些思想给法国革命以深刻的影响……[13]

英国清教徒革命原本是为清除天主教影响而实行教规、教仪的改革，演变为以议会、地方教区、议会派的军队为一方对以查理国王和保皇派为一方的革命。克伦威尔便是典型的清教徒，他率新军推翻英王并处死查理（1649 年），直到 1688 年，经过多方力量反复的斗争与联合，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而使英国走向民主。清教徒要求放宽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光荣革命后一年，议会通过《宽容法》而得以解决。清教徒以自律、自觉来遵从圣经的教诲，争当上帝的选民；为了抵制罪恶，把家庭和教会都办成修身学校，培养重视私德和对社会负责的个人。这些个人，彼此是平等的，首先是各种信仰互相迁就，其次是互相宽容，最后则是宗教信仰自由。清教主义促进了民主主义，它的主要精神就是宽容与妥协。后来在美洲 13 个殖民地，80%的教会都具有清教主义倾向，圣徒们的民主逐步变成了社会的民主。清教徒担心人人会犯罪，从而认为世上一切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体现在后来美国宪法中关于制约和平衡的条款。如果说孟德斯鸠对政权的设计是理性的思考，那英美清教徒则在宗教改革发展进程中从宗教生活里达到感性的认知，都是对民主精神的贡献。最后在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出来，这成为民族主义的共同基石。可见，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原来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法国的革命都是民族民主运动，是对旧秩序天主教教权、帝国君权的挑战。20 世纪一战后，奥匈帝国战败，中欧、东欧建立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民族国家，同时，在亚洲出现了土耳其的凯末尔、埃及的扎格卢勒、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印度的甘地、中国的孙中山等一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先，有了民族的独立，才能实现本民族的民权。本来在西方民族民主运动同存，但实现了民主的国家，19 世纪加入对外侵略的行列，其民族主义已扩张为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堕落和变质。另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为强调独立（民族解放），民主不民主成为次要问题，帝制、寡头、军阀统治都可以接受。二战后，民族国家纷

纷成立，至本世纪，已经没有殖民地国家了。留下未曾彻底解决的民主主义的大课题成为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的症结。而在概念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也发展为两个不同的东西，通过战争争得独立后的民族国家权力自然掌握在反殖民的军事集团手中。他们所强调的民族国家的唯一性和垄断性，成为压制民主主义发展的因素。

那些并没有成立国家的自然民族和人民若是在掌权民族那里获得平等的民族地位和公民权利，当然就平安无事。否则，在民族差异性和不公平对待条件下，加上一些语言、宗教、历史旧账等因素，必然产生对国家而言的离心倾向，谋求民族自治或民族自决或完全独立，这就是分裂主义的由来。这种分裂主义，还是恐怖主义的温床。

自然民族根据各方面特点强调可分性，但民族国家则是要维护它的统一性的。从总体上说，不与和平民主结合的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民族主义，而不与各民族一律平等观念结合的国家主义也是阻碍民族共生的主义。

一般地说，强势国家为了扩张，它要征服其他民族，它表现在国家主义上比较突出，如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以国家概念为主的形态出现；弱势国家因为要保卫自己的民族生存，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就有民族至上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单一民族国家，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问题不大，而多民族国家或一族多国则是历史上民族间或征服，或联合，或分裂，或受他国势力影响所形成的。民族纠纷主要出现在这后一种情况。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只能是对各个具体民族国家和其自然民族的关系作深入的考察，判断才能公允。也只有用民族平等共生的尺度才能衡量其是非曲直，带有色眼镜或隔毛玻璃观察都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是非的分辨也只是为了民族和解，而不是火上加油，民族斗争之所以难以消弭，还因为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它是感性层面的，蕴含着极大的仇恨和非理性的能量。谁要挑动一下民族的神经，它就可能如火山爆发一样地喷发出来。因此掌握着民族国家的命运的人，各种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尤其要以高度理性的态度对待民族纠纷与冲突，不要把民族推入血与火的灾难之中。

一、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

1、民族意识的形成

民族意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原始氏族、部族、民族、近现代的国家民族，中心离不开这个“族”字，就是我族和他族的区别。民族无论是古代帝国、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它都有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外壳保卫着它，使之不受他族的侵犯，让本国民族得以过着和平生活。一旦国家间发生矛盾，王室与王室，政府与政府发生冲突，它们不会说是我王室和他王室（很多都是有姻亲关系的）、掌权者之间的冲突，而是以民族利益受损为口实，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战争。只要相互厮杀一开始，民族仇恨就愈积愈深，战争规模愈益扩大，原来在自然民族中形成的共同归属感，此时便急剧上升为生死与共的民族意识，那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感情，愿为民族而死。这种反抗侵略、反对掠夺的民族自卫意识是必须的，合理的。相反，不以平等对待异族，民族自大，民族压迫的意识则是阻碍民族共生的。

（1）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缘起于英法百年战争

发生在1337—1453年英法两国王室之间的百年战争，缘起只是英吉利国王爱德华三世——法国查理四世的外甥——在查理死后无嗣，认为法国贵族会议推举的新国王仅是一个伯爵腓力（后称腓力六世），就亲疏关系上缺乏继承王位的合法性。1337年10月，他宣布法国理应归他所有。简单地说，就是外甥要舅舅国家的全部领土，全不顾领土上的臣民的性命，发动战争，打败法国海军，登上大陆，占领大片土地，荼毒法国生灵。法国人民奋起反抗，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00年，英国经历了六代国王，法国七代才把战争打胜。英国退出全部法国大陆上的领土。两个民族打得死去活来，为的只是王室间的争夺领土，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家务事。然而，当时普遍都认为这是神圣的国家大事。

法国转败为胜的波尔多战役，得力于声名远播的女英雄贞德，她率军打败了英军，拯救了法国，虽然她后来被俘焚死，却成就了她的民族英雄的盛誉。各民族都以她为榜样，教育后代，民族意识+英雄主义也就成为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

（2）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意识

在历史上，自从秦灭六国，废封建，建立统一的汉民族的大帝国以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政令形成了以炎黄子孙为种族内核，融合周边少数民族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两千年间，除蒙元、满清不属汉族全国政权外，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体。汉民族意识在抗匈奴、抗突厥、抗金、抗蒙、抗清的斗争中形成。因为华夏文化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无论是北朝还是五代十国，北方游牧民族都融化于汉文化。专制末期，满清入关后的260年的统治，满汉两族逐步融合，汉满已难分了。

从1840年开始，列强入侵中国，受损的不只是满清政权，更多的是汉族民众，民族危难和斗争增强了我国各民族的整体意识。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宣布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中华民族就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56个自然民族的集合概念提出来的。日本侵华战争极大提高了中华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对全国一致抗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祖国和平复兴的建设中，全球华人的民族意识仍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由民族意识衍生的关于民族英雄评判的争论，近来网上也成为热点。这正好与自然民族和国家民族范围不同、角度不同有关系，即以汉民族还是以中华民族范围和立场去看待诸如岳飞是否为英雄，洪承畴是否为汉奸一类的问题。英雄是有阶段性，范围性的。在战争情况下，一国、一族、一阶级的英雄，一定是另一国、一族、一阶级的刽子手。对于家天下的历史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于反抗外族侵略、荼毒和平人民来说，又是有意义的，应该承认其伟大和过人之处。像法国贞德那样，挽救民族于危亡，是一种可贵的抗暴精神，无论是反抗侵略或和平建设都是有利的。但是，民族意识究竟是为本民族的，缺乏对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关照，只是一种扩大了的利己的意识，它并不能促进民族之间的和解与和平，比起全球意识则有实质性的区别。

2、全球意识

共生论提倡树立全球意识，这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和平共生的意识，它是超民族的全人类一体的意识。以往的民族意识产生于民族战争和斗争的年代，今天的全球意识将在一个面对全人类灾难与危机的由战争走向世界和平年代中产生。也就是世界公民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共生理性层面上求得共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如应对环境危机、地球变暖，每个人都意识到，人们就产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它就是不分民族国家的全球意识。又如维和意识，世人不愿看到地区冲突，人人希望和平，赞赏维和行动。但当事民族就不一定这样看，这就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差别。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之间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才能相融，在个人层面上要求把民族——这个被人强调为“大我”，提升到一个完整的“大我”——人类共同利益的全体。培养世界公民的全球意识，是更有利于世界各族人民的。

如果不提升民族意识，让它只停留在“一切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个水平上，那它便像一个高压气罐一样，平时一直在积聚能量，只等有一天出现民族危机，有人便会引爆，造成新的民族间的灾难。

3、全球意识的理论形态——全球主义

与民族意识相匹配的理论形态是国家主义，与全球意识相匹配的理论形态是全球主义，又称世界主义，它并不是近世产生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在第二章叙述到哲学中的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世界大同主义时，便说到，这派主张永远不会变成狭隘的沙文主义者，胸怀全球的人道主义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扩大了范围，扩大到世界整体。国家就应当是个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世界公民。一个人要履行他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同样他有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义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斯多葛学派在 2300 年前就把世界与国家、整体与局部、个人对世界与国家统一的义务观阐述得如此清楚，不能不令人叹服。也就是现代人说的，放眼全球，心怀天下，着手现实，建好国家。但世界主义贬低单个国家的作用，必然受到后来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所抵制，只能成为世界主义的理论渊源而存在。它绝对没有象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受到各国掌权者的欢迎。但在思想史长河中仍不绝如缕，古罗马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肯定；中世纪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认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乃近代全球主义的直接启蒙，卢梭的“邦联论”也是希冀建立高于国家权力的法律、道德秩序来避免国家间的冲突，使人民免于战祸。20 世纪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全球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标志是威尔逊主义，即“14 点原则”，建立国际联盟这样新的政治秩序的原则和模式。威氏主张必须制定高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建立确保国际对话和合作的国际组织。国联成立，究竟敌不过国家主义的强权政治与相互倾轧的阴谋，使二次世界大战旋踵而至，各国才在又一次血的教训之后成立联合国。战后 50 多年全球经济的发展，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主义作出凸现人类整体的作用，开始突破传统主权国家的观念。

罗马俱乐部一些学者们更尖锐的观点，反映了全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全

球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挑战。意大利奥雷利奥·佩西不止一次谈及人类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他迳直说："在人类地球帝国时代，通向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主权原则。它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基础，根深蒂固，已成为文化发展停滞和因此陷入困境的典型病症。"[14]英国汤因比认为："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主要宗教（指信仰）。"今天"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15] 尽管这种剥夺是不可能实现和非共生的，但他们指出了一种未来世界不会因各民族国家的争斗而使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下来的事实。倒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他 1973 年出版的《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中阐述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冲突将被合作与共同体意识所取代，从而传统的国界已不复存在的思想[16]。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浓提出了民族国家已成为"时代的错误，跨国公司的挑战使国家主义的作用日渐式微"的观点[17]。1992 年，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加利撰文也表示"使用几个世纪的绝对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18]

全球主义的学理、逻辑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是历史传统的继承，全球主义理想挑战着所有民族国家的意识，而这些意识是如此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开始，国家对个人而言的无尚权威是无可怀疑的。中经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国家观，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已不仅是中心，而且是个人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到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了领土完整、国家独立、主权平等，从国际关系层面上奠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几百年来只有发展，没有动摇。二者的消长只能是全球利益与各民族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合作则双赢，争斗则两伤"的事实教训中不断向明智一点的方向前进。但从人类共生历史的经验来看，显然不是那么悲观的。

共生论者在这个争论中，肯定全球主义的前瞻性，历史必然性，也肯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和基础性。下面数段将列举一些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若干形式，指出其在历史上已经付出的代价，造成些混乱，认识一下唯一性、排他性为主旨的民族国家主义，从而为谋求发展各民族国家的和谐共生关系作些参考。

二、民族沙文（大国沙文）主义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沙文，N·chauvin，是拿破仑的一名士兵，因为获得军功奖章和一小笔津贴，狂热崇拜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主张用暴力建立大法兰西帝国。以他名字命名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就是指过分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达到不顾他族、他国死活的程度，等同于极具侵略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强调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鄙视和排斥其他民族，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

沙文主义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称民族沙文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称大国沙文

主义。二者一个本质，从不同角度观察有两个名称。拿破仑征服欧洲和二战中德、意、日三国都是执行的沙文主义。

沙文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叫金戈主义（jingoism），也是鼓吹殖民掠夺，煽动民族感情，夸耀英国民族优越等。嗣后，沙文主义被广泛运用，如女权运动中反对“男人沙文主义”，英语含义中又兼有种族与性别歧视等，含义进一步扩大，它甚至还指盲目热爱自己的团体、组织，经常对其他团体、组织怀有恶意与仇恨。

在一战中出现“社会沙文主义”一词，是共产意识形态对机会主义的指称。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沙文主义，参与侵略异民族的战争，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异曲同工。

三、民族投降（虚无）主义

与民族沙文主义侵略成性相反，弱小民族缺乏自立的信心所产生的悲观、失败情绪，表现为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和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也是不利于遏制邪恶和侵略势力的。一个民族，哪部分人在外敌入侵时最容易投降呢？多半是统治集团中的“宁与（给）外人，不与家奴”的当权派和借外力以打击当权派的反对派。在君权专制时代，国家是皇室的统治工具，土地和人民只是国王的财产，战争也只不过是一场赌博。而对于平民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屋宇田园，每寸土地靠血肉之躯来保卫。一个民族统治集团和平民大众是两样的心，而且王室之间，许多是有姻亲甚至是有继承关系的，两国平民杀得个死去活来只是为王室争夺财产而已。特别是在人民将要觉醒，要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也就是以前受尽了剥夺之苦的奴隶们要翻身作主人的时候，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恐惧远逊于对昔日奴隶组织起来的恐惧。统治者在准备出卖民族，而平民们却在为国为君浴血奋战，这是民族——国家主义造成的最令人心痛的悲哀。

在中国“家天下”的历史中，宋朝是个积弱的朝代，文臣治国就是皇帝怕武官拥兵自重，一贯地割地赔款求和，对金、元屈膝投降。特别是南宋的朝廷，奸君赵构，置父兄在金为奴国耻家仇于不顾，贪图帝位不愿抗金，冤杀岳飞，中原不复，可为民族投降主义恶例之一。岳飞秦桧，一忠一奸，但奸莫过于赵构（宋高宗），忠臣也是家奴。在皇权文化中，君总是无罪的，奸在秦桧。本书首次用奸形容君，如果让第一责任人逍遥于史书忠奸之外，是非不分，那只是御用史。

抗日战争，汪精卫成为头号汉奸，这些人以前讲的什么爱国、民族大义等等，只要与其权欲冲突，立刻可以抛弃，可以认贼作父，完成其攫取统治权的野心，哪怕儿皇帝也行，这就是民族投降主义，实际是个人投降，民族蒙羞。

与政治上投降主义相匹配的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一个民族的政权形式是国家，但它的实质内涵是文化，文化比政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如果政权暂时落入敌手，还有机会与可能颠覆它，但如果文化被侵略者所消灭，像改变了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民族意识，那就是灭族，民族不复存在，比肉体消灭更狠。当民族处于劣势时，

一些人对自己民族文化丧失信心，什么不如人，连民族传统中好的成分，和平、自强的思想观点、道德风尚、自我修养等等都成了“落后”，看到本族文化一无是处，一片空白，用它族文化之优，比己民族文化之劣。这就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一旦国势强盛，又走到另一端，民族文化优秀论，要让异民族顶礼膜拜自己的文化，是国粹都是好的。这都是缺乏理性分析的态度，从自卑的一端跑到过于自傲的一端，也都有民族意识在作怪。

民族投降主义之所以阻碍人类共生是因为民族沙文主义，亦即民族侵略主义，是剥夺的一方，是作恶的一方，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作恶无止境，受害的将更多。对恶不加制止，必不能保卫善，此消彼长，道理昭然。

共生论不认可暴力，在智能时代可以不通过暴力解决纠纷，但对历史上已经施加的暴力，只能评判是非，而不能拉回历史。评是非是为了以史为鉴，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也是不能真正达到评判是非的目的。

共生论对民族文化持积极态度，肯定其合于人类和谐共生部分，保留对他族不利的文化偏见与歧视的批评态度。尊重各民族文化，正是尊重自己文化的前提，未有不平等对待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有多少裨益人类的先进观念文化。先进文化应该是最能影响全球文明进步的文化，而不能是只要是本国的都是好的文化自傲心理。民族意识让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成就充满自豪感，而对他民族的文化成就很难发生“他豪感”。人们很少有这种他豪感体验，难道他族的成就就不值得我们骄傲吗？多一点他豪，少一点自负；多一点学习，少一点妒忌，世界民族争端是不是会少一点？

四、帝国主义（imperialism）

古代大帝国与近代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元帝国和中华帝国，都是有皇帝的大帝国，多是以武力征服其它民族所形成的帝国。但帝国主义却是 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工业革命后的原料与市场的新需要而扩大侵略产生的概念。它的特点是“一国在本国领域之外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对其实行控制的政策”[19]。违反当地人民意愿而实行控制就只能是侵略和欺骗，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其形式则有四种帝国主义：

1、殖民帝国主义：这是肆虐全球达 300 年之久典型的帝国主义，即为夺取殖民地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二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垄断资本逐步转化为社会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增多[20]，以军事侵略为主要标志的帝国主义已经失去其经济政治先决条件，即私人或国家垄断资本的依据和独裁或军阀体制具有发动战争的能力，殖民帝国主义已经因不合非殖民化时代潮流而退出历史舞台。以往人们把外国投资办厂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这是按剥削有罪的主义定义的。如按此逻辑，各国交互投资都成了帝国主义，实不足取。

2、社会帝国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侵略国家，如前苏联对东欧的控制，镇压

民族民主运动，侵略阿富汗等，危险的是用“兄弟”、“友好邻邦”、“国际大家庭”之类的骗人语言。这种帝国主义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垄断的意义，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也淡出历史。

3、民族帝国主义：以民族利益为由，对它国进行侵略战争，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此类帝国主义仍难以消除，民族始终是利益冲突的基本单位，只要其国家执掌者沉溺于民族意识，缺乏理智的控制，各种借口都可以让它走上这条道路。尤其是想在地区称霸要做老大的后起之秀，也免不了发点自大狂而冒险。

4、军事帝国主义，即军国主义。奉行这个主义的国家，是把国家作为一个进行战争的机器来部署、安排人民生活的。全国像是个大兵营，军事高于一切，人民生活放在极次要的地位，大炮胜过黄油，导弹强于粮食。二战中的日本和战后某些国家，全民皆兵，不宣传和平，宣传战争威胁，实际经常威胁和平与安宁。

以上四种帝国主义都是从一个基点出发的，即国家主义，本国利益至上，把本国利益置于各国共同利益——和平与发展——之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和国际大环境矛盾冲突，导致孤立与冒险。

五、新版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理论和国家一样长久，19 世纪，马克思揭露了国家的实质只是阶级压迫、镇压的暴力机器，不是个什么神奇的圣物。共产国际向国家主义冲击了 100 年，冲击过后，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国家主义还变本加厉，成为保卫政治统治权的理论形态，出现了许多新版国家主义。对国家主义典型解释：“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依归是国家。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容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21]显然，这是国家主义的最新理论概括，它是一种政治哲学，它的神圣性就是国家，它要求普遍放弃私我，服从国家至上的信念，因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容置疑。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它可以是帝国，可以是法西斯，可以是暴力专政，而它的国民则可以是“神风队员”，可以是纳粹盖世太保，可以是红卫兵，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当权者的国家为依归的。在国家等于正义的政治哲学里，人类近 500 年的文明成果不见了，看不见人民主权的影子，看不见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有国本，不见人本，只看到像 500 年前一样帝国的主权与强大，看不到全球已经联成一体，而且还有个联合国。这样的国家主义，国内看不到民主与宪政，国际看不到合作与发展，只看见一个专制或专政的国家。

正是国家主义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在一百年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述及的那样惨烈，共生论才将它列入阻碍人类共生的主义之一。如果我们只认识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危害，而不深入到民族国家主义层次，则是不彻底的共

生论，各民族国家的本位利益的冲突永远是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绊脚石。

第四节　专制主义

作为政治学中的概念，专制主义（absolution）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它是一种政治体制，其统治权不受其它任何机构的监督，包括司法、立法、宗教、经济或公民选举机构，更不用说个人或团体对其统治者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作为社会历史，专制政治时期特长，从公元前 3500 年埃及法老王朝开始，世界各民族除少数城邦民主社会存活一定时期，竟无例外地先后经过了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阶段，达几百到数千年之久。唯一的没有皇帝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在未独立前大部分人也都是英国皇家的臣民。人类接受专制统治下的生活和专制文化影响太久太久，而现代民族生活在相反的非专制社会时间又仅只两三百年，只不过给其它民族一个新的参照系而已。就人类整个历史惯性来说，民主对专制并不占很大的优势；而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向文明进步来说，民主又是必然和必需替代专制的潮流。这也是现实。民主体制替代专制是势所必然。但各民族的专制主义是有其各不相同的特色，忽视这种特色的存在，很难开展专制向民主的转变。共生理性应充当转变的中介和推进的角色，主张民主的启蒙应建立在充分认识自身专制的基础上。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专门针对专制政治作全面研究的著作，不是说没有主张君主专制如《君主论》、《商君书》这样的名著，而是说对专制政治在实行过程中经验性的归纳和科学总结。它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正面的历史推进作用和负面的阻碍人类共生的作用都一样不应忽略。正是因为它曾起过扩大、巩固共生圈的作用，才在文化中留下集体的记忆，甚至成为民族的骄傲。大国崛起的帝王们，臣民歌颂他们的功绩的同时，也在赞美着成就他们的那个专制制度。它与人民生活的关联性和在各族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只有作这样深入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专制主义及其可转变的方向和途径。这方面，显然不是本书所能企及的，而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 2006 年出版的他 40 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论文“The Reign of Confucionism in China—With Emphasis upon vested Interest as Resistance to Social Change”中译本《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和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 2007 年出版的《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这两本书给我们企盼的“专制史研究”作了开拓性的榜样。前者从中国皇权统治和儒学文化的联姻角度来揭露 2000 年的专制思想发展史实，使读者得出中国专制统治的儒学文化根基非常深厚的明确印象。后者则揭出专制政治内部矛盾、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从而了解专制政治运行机制的底蕴。二者的启蒙思想光辉和史学家的睿智都深深地启发本节的论述。

共生论从谋求矛盾诸方能够达成共识目的出发，尽可能找到其公约数、平衡点为各方所接受，对专制主义以取得批判性认识为期待，以提高共生理性的水平而扬弃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不分历史现实，一律采取否定扼杀的态度。一提专制主义，就要拿起批判的武器，甚至作武器的批判。把因认识不清有一定专制倾向的人当作专制制

度本身加以批判，不仅于事互补，过激的语言和缺乏事实的说理，反而容易造成不可解的对立。所谓对事不对人，就是要把人的创造物——人所设计的制度，人们生活的游戏规则和遵从这些制度规则办事生活的人区分开来。它是死法和活人的关系。人是可以改变的，有理性的，人总不能固守在历史固有程序上，以不变应万变。要把专制主义的危害，包括对社会各方面都不会是什么好事的道理弄清楚，才可能达到批判性的认识，比口号批判、武器批判实在而有力得多。

作为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最本质特征，两个字——剥夺。皇权专制就是皇上一人具有剥夺所有人的所有权利的权力。寡头专制就是几个人集体可以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依靠两个手段——镇压与欺骗，对异己——镇压，对治下民众——欺骗。共生论认为人类灾难——战争、恐怖、暴力的根源就是有人有剥夺他人的权利的权力，其它人对之无奈，无处申冤。这比人剥削人的剩余劳动价值严重千万倍，不可同日而语。剥削，劳动者还有个苟延性命的底线。剥夺，则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彻底吞食的准则。剥削的对象是物化劳动，而剥夺的对象则是劳动者即人的本身及其求生的各种可能选择的机会，剥夺人的生命、财产、做人的尊严，即做人的一切权利。而人只要有平等谋生的权利，通过勤劳可以变富，通过竞争可以变强，而没有了平等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作为思想观念，专制主义并不因推翻了皇帝、国王而消失，它是一切不民主制度，王朝复辟、寡头政治、法西斯专政、个人独裁等等的总根。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人类的政治文明是从反奴役、反剥夺、反暴力开始的，而专制主义就是这三者的集中体现。因为专制主义是违背人性的，所以思想史上常常成为批判的对象，直至民主革命，才在实践中取得英美法三国的胜利。英国君主立宪是通过宽容与妥协的民主精神完成君主与人民共享权力的渐进过程达到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一开始就是一个联邦制的合众国，它没有专制主义的历史包袱。它是新教文明与启蒙、民权运动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当初，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一些将军们也曾尝试着让华盛顿当皇帝，但被斥责为那是一条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道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各处受压迫，无生路的流浪者，避难者的国家；她只有靠约法而治，才能生存。她反对的是英国殖民主义、专制主义，结果是一个新型的坚信自由、实现平等联合，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国家出现在新大陆。法国革命因为欧洲大陆反民主共和的专制传统势力强大，须经过 80 年的反复争夺，中经两次王朝复辟，才达到共和。这三个先行改制的国家，就是我们目前称之为西方的国家。德国、日本由二战战败国，经 50 年的改变也列入其中。她们没有一个国家是反对剥削而富强起来的，也没有一个是无视、剥夺人民的权利的；相反，倒是不断扩大、强调人民享有公民和社会福利的权利。政治文明的进步，关键点就是看其尊重人民权利的程度。一句话，政治文明可以用人民获得的平等权利，更具体的还可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来衡量。

中国是有着 2000 年皇权专制历史的国家，也是背着最为沉重的专制文化的历史包

袱的民族，中国知识界有责任解读这份痛苦的也是珍贵的遗产。这是别的国龄短的国家所没有的；解读清楚了，中国主要的国情、国粹也就明白了。

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解读与批判工作从 1919 年“五四”算起，也快 90 年了。批到现在反倒有些回潮。激进的武器的批判究竟代替不了理性的说理的批判，粗浅地认为消灭了地主经济就等于消灭了专制主义，实际是两回事。使专制主义改换一身披挂重上阵来，还有许多观众正为之喝采。他们认识穿龙袍的专制主义，不认识穿中山装的专制主义；他们认识古代专制主义，不认识现代专制主义；他们认识残暴的专制主义，不认识开明的专制主义。总之是没有看透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穷凶极恶地不是暴力就是欺骗去剥夺属于人民的各种权利，让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权力资本集团的超经济和政治特权拖延保持下去。

批判专制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因为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和盲点，而且也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至少是三方三层次：执行方、赞成方、反对方三方，利益、观念、行为三层次。有的已是几十年的成见，许多概念被“一言堂”盖上了钦定印章就不得更改。科学不能支持民主，不民主更见不得科学，以致许多最基本的概念混淆不清，妨碍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不能不加以辨明。下面分述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各具特色的专制主义。

一、西欧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

法国的封建庄园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典型形式。它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庄园的领主，大可以是国王、大贵族，小可以是一个骑士。庄园主人——领主和依附于他的农奴和少数自由民的地位都是不可改变的世袭制的身份。庄园是一个将政治、宗教、军事、经济等多种功能综合在一起的社会。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军队和行政管理机构，就是王室也无权过问。庄园的领主对庄园内的农民享有司法权、征税权和统治权。与这种庄园制相适应，封建国家的国王把大片土地分封给公爵、伯爵、边地侯、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这些大封建主又把土地分封给中等封建主——子爵、男爵。中等封建主又分封许多小封建主——骑士。上一级封建主是下一级封建主的领主，下一级封建主是上一级封建主的附庸。领主和附庸之间，有个臣服礼和例行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隔层封建主之间没有臣属关系。即使国王路易十四宣布“朕即国家”，指出国家归属于他个人，也没法从贵族、教会那里获得完全的统治权。这种政制，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废封建，置郡县，实行全疆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以前的社会有些类似，而实行秦制以后，则与西欧封建社会并无共同之处。中国从那时就不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而我们一直把 2000 年的专制与封建混为一谈，并把秦统一中国以前定为奴隶社会，混乱得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三不清。

西欧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具体情境又是怎样呢？农奴及依附农民是法国封建庄园的直接生产者，农奴有自己的份地、家庭和独立经济。这点与奴隶不同，但他人身又

是依附于领主的不得随意离开土地的人，领主可以将他连同土地一起转让，赠送和出卖，这点又不同于自由民。农奴须向领主交纳人头税，农奴结婚，新娘子在新婚时须先陪领主过夜，即领主有“初夜权”。农奴如同其它庄园农民结婚，须向领主交纳“结婚税”，农奴死后儿子继承份地时要交“继承税”。在法律上，农奴不得控告领主，不能向国家法庭上诉，农民诉讼案件由领主法庭审理。农奴不得当兵，也不得担任宗教职务。农奴的许多权利被剥夺，依附农民则在交税方面承受着更多的盘剥。基层的社会政治生活，大都在庄园城堡中进行，因为领主有这种权力，以致属于国王的军事上筑城堡以自卫的权力，有时都放弃，如秃头查理国王曾颁布诏令要求贵族分散建筑城堡作为社会义务，各自保土卫国。

西欧这种封建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专制政治，本身根基不稳，加上还有教权与之争民、争权，城市市民阶层的独立性和日益壮大，封建分权制让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有一定的空间，封建的对立物——资本主义，专制的对立物——民主就在 9 世纪至 18 世纪这 900 年间出现，孕育，壮大，并最后代替了封建专制制度。

西欧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例如，1519 年卡斯提腊国会向兼德国皇帝的西班牙查理国王提出：“陛下你要知道，国王只是领取俸禄的国家公仆”；1520 年春，并要求不能离开首都。[22]这种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与我们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相距岂可以道里计？

形成这种对民众并不能完全集权统治而分散在领主那里的权力格局是有着它的历史背景的，首先是教权同时在进行精神统治，甚至深入到世俗领域，权力本身就具有二元性。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既有庄园制的农村，又有行会制盛行的工商业城市。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专制文化，帮助巩固和加强集权于一人的专制。在这点上，中国与西欧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二、中国皇权政治的专制主义

从秦始皇灭六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到辛亥革命清朝覆灭的 2132 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专制主义，日益为众多学者所论证与认同。所谓皇权政治就是社会统治权只为皇帝一人所独有，所有的臣民都处于无权地位；它是一种彻底的中央集权，没有任何限制与监督的极权政治制度。它来自于武力夺取政权，并用武力保卫它。除非用暴力摧毁或内部阴谋篡夺，决无和平让渡的可能。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那种掺和着宗教教义的、利益关系比较确定的、政权相对脆弱的专制主义相比，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所达到的完备性、精微性、超稳定性的水平确实令人叹服。这种产生、发展于农耕时代、宗法社会、专制文化（主要是法、儒两家）背景下专制政体，如果不是工业文明从外部来敲开庞大、专制社会的硬壳，靠它自己实现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几乎是缘木求鱼。“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政治就是皇权政治，特色就是既得权力者死抱不放。广大民众并无权利意识，倒是被教化、驯服为皇权的奴仆，社会只能是长期的停滞在专制主义之中。

当世界普遍盛行着君主专制的时候，中国的专制王朝堪称典范和先进。西欧不仅钦羡着东方的器物文化：瓷器、丝绸；科学技术：罗盘、火药、造纸、活字印刷等；对国家政治制度，同样的佩服这个大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23]这是18世纪法国革命前期著作家的心态。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盛也专制，衰也专制。中华帝国，汉唐明清的辉煌是专制，到近代它的衰落也因专制，整个秦后的2000年文明就是专制文明。人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论专制，毕竟专制帝国有过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当历史已进到工业时代、智能时代，我们却还不能彻底认识专制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和国际社会；还对专制主义抱着幻想，寄希望于圣君贤相清官良吏的开明专制、民本主义、人治德治一套，那才是该要深刻反思的事。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从它产生的背景、时代要求、历史趋势到理论准备、体制设计、运行机制以及它的修复更新，自组织再生能力方面，都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从秦帝国开始，作为一部庞大的统治机器，它一直是有效的。一旦王朝发生统治危机，也就会发生剧烈的农民起义，但这种改朝换代只是恢复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行；对专制政体却是逐步充实和完善，而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甚至到皇权专制社会末期，仍然表现了它的生命力，如人们乐道的康乾盛世，同治中兴。而且即使在专制王朝被推翻以后，政治生活的主导面，骨子里的专制主义，不戴皇冠的帝王仍然存在，只不过多了些花哨主义伪装而已。

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替代封建社会的分封政体是社会的进步，它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休止的战争。经济上废井田（劳役地租）、开阡陌（私田疆界）土地可以私相买卖，也是适应铁制工具使用后，个体生产的需要，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政令上奖耕战，有功可以晋爵，改变身份，废除世袭贵族特权，保证发财升官的机会平等，在耕战上展开竞争。这就是秦从一个西戎小邦迅速崛起成为统一华夏的大帝国的秘密。秦始皇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代替封建的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一切权力归于皇帝的专制政体——郡县制。从此中国进入一个皇权专制时代。如果我们不去分朝按代考察，而是把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我们可以总结出它有以下十个方面的特色。

1、专制理论准备得很充分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流入民间。孔子杏坛设教，私学兴起。齐桓公还办稷下学宫，如同现在的讲坛、论坛一样。学者著书立说，百家争鸣。他们的关注重点是究天人之际（哲学）、研治国之术（政治）。其中法家就是首创君主专制理论的一家，最初的法家理论应是一些在实际政务中卿大夫的主张和成功经验，如郑国子产、齐国管仲、魏国李悝（著“法经”六卷——已失传）等，始终紧扣当时的现实。其后申不害为君王“明法正义”立言，慎到为君王集权发论：“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他为集权独裁——不疑、不两、不杂提出依据。他又说：“官不私亲，法

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24] 就是主张有一个绝对独裁的君主，统一法度以驭臣下。商鞅根据荀子的“性恶论”，慎子提出的“自利心”、“自为心”，设计的治民之法就是“严刑竣法”，轻罪重罚，“以刑去刑”，反对原来封建贵族的“礼治”，即儒家推崇的“人治、德治”一类的礼教治国。反对依照古制，法先王；主张改制，法后王。即服从当今实行厚今薄古，把君主的现实权力赋予学理上的合理性。并且强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25]把权、势、术，数均操之于一人，设官奉法，专制统治秩序就这样建立起来。法家为秦王朝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绝对皇权的帝国作好了充分理论准备。到秦始皇和李斯君臣就付诸实施，完成了秦帝国八个方面——国土、军队、法律、税收、货币、度量衡、道路和马车轨的宽度、书写文字的统一，开创中华帝国的宏大，完整的政治局面。

2、权力集中最彻底

专制主义是皇权政治的精髓。皇权政治就是一切权力归皇上一人，是一切独裁、集权、极权的最高形式。它不允许任何机构、势力和个人分权和侵权，也不允许任何规章、制度、办法妨碍对其权力的行使。因此，在行政管理上，全国郡县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司法刑狱方面，皇帝有最后裁定权，生杀予夺，不受约束与限制。中央办事机构九卿、六部之类全是皇帝的办事人员和职能部门。只有分管行政的丞相（宰相）、分管军事的太尉和分管监察的御史三公有点授权意义上的权限。“天下之事无小大，均决于上”。这不仅是专制独裁，大权不能旁落的需要，也是避免任何事开了先例，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秦始皇每日批阅竹简公文得用车载。

权力中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军权，它需要由皇帝绝对控制，这是专制主义的命脉。没有武装力量就实行不了专制。秦王朝统一天下后，收缴各国及民间兵器，集中销毁于咸阳，铸金（铜）人十二，每个 24 万斤，表明除了嬴政掌握的军队，谁也不能拥有武器。王朝兴亡主要是武力的较量，“成王败寇”是专制社会的常态。正因为一败就没有权力，成了王的为所欲为，是非可以颠倒，历史可以改写；败为寇贼的就杀头、灭族，遗臭万年。

3、控制官民最严密

自秦商鞅立“什伍连坐及夷三族之法”，正式确立了株连制度。以后“汉武帝立‘见知故纵’法，纠劾连坐僚属：一人罪而朋党，生徒同狱，乃至乡里为墟代代有，至明清尤甚。”[26]一人犯罪，不只一人当，而是要一家、一族、三族、九族同当。这样，在法律面前，就使得人人战栗，不敢犯王法。既可防于未然，揭发检举，自我扼制；又可斩草除根，不生后患。因为中国法家的法，是只对臣民的刑律，而非人人平等的现代法律。它对百姓的态度，绝对是宁可错杀，不可漏杀，最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连个记载都不必要。历代都有家人缘（连）坐，如《唐律·贼盗》曰：“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异同”。[27]中国专制主

义的赏罚特色：一人得官，家属亲朋，一串升天；一人犯法，男女老少，九族株连。

对于皇权统治的工具——官僚集团，监视也十分严密，有直属皇帝的监督系统，还不时放出“钦差”四出巡视，“钦差出朝，地动山摇”。到皇权末期，大明王朝，还要加上特务系统：东厂西厂，锦衣卫四处横行。清朝则督抚并行，都是设置相互监视，告密纠举制度，使官僚机器，不生故障。官员们经常处于天威莫测的战栗状态。

4、儒化教育最深入

法家理论，兵家学说帮助秦人建立了大帝国，但不出 14 年，却被揭竿而起的戍卒、山东各地群雄并起所推翻。主张分封的贵族路线的项羽败在汉刘邦手下，开始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专制帝国。初期统治者引入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才喘过气来。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汉武帝与董仲舒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他们明白，单靠军事征服可以开国，高压政策焚书坑儒也只能镇压反对派于一时，使天下人敢怒不敢言，究竟不能长治久安。光有硬的一手不能治天下，还得软的一手——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即两手都要到位。儒学就在这种权力需要的背景下登上帝国政治舞台，扮演专制政治吹鼓手、主流意识宣传家、顺民思想教育家的角色，拥皇、保皇与皇上同命运、共始终。

本来，刘邦在当上皇帝后，并没有感受到做皇帝的威严和乐趣，是儒生叔孙通设计全套礼仪，让臣下匍伏于金阶之下，刘邦高高在上接受原来打江山的哥儿们和百官的朝贺。儒家的礼治开始为专制帝王所接受。叔孙通说儒学：“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说明它不能造反，可以保权，可以统治。

儒家的政治理论是复古的，即维护封建等级世袭制的，是倾向保守与僵化的。当王朝建立，皇帝的政权在手，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驯服百姓”，使之对专制政权不生反心，服服贴贴的生存下去。儒学就变成极为实用性的理论。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叙儒家中和哲学思想、仁孝伦理在感情层面上极易为民众所认可。于是，已经不是原始儒学的汉儒董仲舒创其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糅合了道家、阴阳家的成份的儒家新理论提供给汉武帝，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垄断，使儒学成为助纣为虐的专制文化体系的核心。专制政治与专制文化相互作用、加强，使中国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专制的烙印。这就是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和对民众的奴化教育，直接影响到国民性的形成。但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儒术便行了王道仁政，没有严刑竣法一套。在儒家仁爱的温情脉脉的抚慰之下，在恩威并重的威胁性话语中，专制主义始终不会丢掉它硬的一手，长期奉行的外儒内法——外松内紧——欺骗与暴力相结合的专制的两面政策。

儒家的纲常伦理是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五伦（常）实际行为规范，在皇室鼓励并通过知识阶层（官僚、候补官僚和士绅）的推动下，在广大小农经济农村地区占到优势，成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牢固根基。儒学从一派学说一经朝廷罢黜百家成为皇家提倡的主流意识后，它就成为专制主义巩固思想阵地，垄断各类资源的工具；引

导社会只能沿着儒学规定的、皇权所要求的规范前行。这就是2000年来的专制礼教。而且这种礼教也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形势需要不断更新、加强。如汉儒的任务是发掘秦人焚毁的经书，完成儒学的学术思想体系，使它的理论性、实用性、操作性都能得以对专制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复盖。通过儒学解释专制政治，专制政治又支持、推广儒学，让精通儒学的人做官，开办太学，培养儒学接班人，而禁止其它学术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在确立了儒学统治以后，唐代儒家开始排斥佛、道，儒家以其类宗教或准宗教的排他行为打击佛、道。佛学教义中的众生平等和道家主张个人的超脱，都是不容于儒家的世俗伦理和忠君思想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物质需要凸显。宋明理学循着专制统治需要的方向，进一步引诱士人知识界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生活，大讲心性之学，最后止于“存天理，去人欲”的儒家新教义，闭眼不看统治者人欲横流、为所欲为的状况，让知识界和老百姓去那仅有一点的“人欲”接受做顺民、羔羊的“天理”，明清儒学已经随着皇权政治走向衰落，但还在为专制政治作最后的挣扎。

5、最残酷地镇压异己

专制主义是容不得异己的存在，因为任何没有按统治者意志行动的异人、异事、异见，都可能对它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立了许多王法即刑律，以保障统治秩序，集中表现为残忍的刑罚。从商周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到隋唐以后的笞、杖、徒、流、死，延用到清。为了镇压异己、吓唬平民，往往设立酷刑，如凌迟（生割）、剖心、剥皮、车裂（五马分尸）、腰斩、炮烙、烹、醢……等，极尽野蛮、残忍、折磨之能事，骇人听闻。还有酷吏发明各种刑具、办法，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禽兽都未有此类残忍。

其次是扩大镇压屠杀范围，如诛九族：一种是父系九代血亲，一种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共九族。隋代杨玄感、明代方孝儒都是诛连九族，是法定的扩大化。专制主义就是要斩草除根，才能保其安全与稳定的统治。

最为狠毒的是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专制主义对百姓、对异己、对士人是不让他们有思想的，全面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申诉自由、讲理自由的权利。推行一言堂，一个声音，八个统一，天下才能大治。一部专制政治史，就是扼杀言论、思想自由的历史，否则它就不是专制。从秦始皇法家焚书坑儒开始，在儒家夺回了专制意识形态统治权后，帝王们一直是若干年就要来一次文字狱。越是统治见不得人的时候，统治者忌讳越多；罪恶愈明显时，文字狱也就越多。唐宋较松一点，明清专制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以言获罪。从朱元璋和尚出身，作过贼，忌讳他人写“生”（僧）、“则”（贼偕音）、“殊”（歹朱）等字都要格杀勿论的吹毛求疵起，到乾隆时期文化专制，在位40年中文字狱案件达到150起，不是儒生的平民也不放过，登峰造极。更恶毒的，为全面统制文化，诏令编纂《四库全书》，尽缴天下书籍，达到销毁一切异己著作目的。凡反清、非圣、非儒（朱熹学说）尽行销毁；这在中国是继

秦焚书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第二次大革文化的命。乾隆倾全国之力，设立《四库全书》馆，任用 359 名儒生进行书刊检查，提供禁书目录供乾隆裁决。最后《四库全书》收书 3457 种（另有存目书籍 6766 种），焚毁或部分焚毁书籍达 2665 种之多。[28]存毁比例达 100：77。而存的多是宋明理学，专制文化主流意识，给王朝圣君歌功颂德，颠倒黑白的历史；而毁的则是观点与之相反的书籍，肯定里面有许多反专制文化的精华。我们民族文化经过这次全面书刊审查，剩下的应该说是我们进入现代化之前的历史遗产，即在民主潮流来到东方之前，大清乾隆已经给后人打了一剂反异端的疫苗，保持专制文化长生不老。

6、最高明的欺骗手段

以往我们认识专制主义，多从暴力镇压中看它的残酷性、非人性方面着眼，对它的欺骗性、伪装性较少深究。其实，中国的专制主义是通过长期儒化教育，把皇权政治加以神圣化、家族化、伦理化。通过这三化的不断灌输，它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已经被植入社会的肌体，溶化在血液里，凝固在头脑中。儒学神化专制是沿用原有上帝就是君的祖先神、帝（天子）就是天帝的儿子，神人一家的道理使皇权与神权混同，达到平民敬之如神灵、仰之若佛仙，痴心崇信。儒学发展其宗教性，就其传播教义的广度、深度和效果而言，不啻是个宗教，说孔教也并非言过其实。儒家的天命、伦理双向地与皇权政治结合在一起，如此自然，天衣无缝。中国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使整个民族处于一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各安于其等级地位；实行伦理政治：“小人服从大人（即劳力的小人，服从劳心的君子），女人服从男人（家庭秩序），民间服从官方（社会秩序），全国服从皇帝（集权于一人）”的四服从组织原则。于是，全国似乎是一个祥和、亲密的四海一家。四服从的依据就是《论语》说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篇）。君是天子，命该当皇帝，君父一体，把皇帝当老子，只怕巴结不上。入则事父，出则事君，是做子民的本分，做儿子做惯了，一切听命于君父，养成屈从、顺从的本性。

儒学主张首先在正名，正名便是确定人的社会角色、等级地位，确定以后，便不得僭越，各在自己的职份上尽责。这种上下尊卑关系与家族中的宗法关系相对应，人们在国的权力网络中的地位与在家族亲情亲疏远近的网络中地位又相对应。人们很自然地看到国与家的一致性，家长制是皇权专制的伦理基础，于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顺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应人）；这些既是观念形态，又是现实的生活。人们如此顺理成章地接受“一言堂”、“一长制”。而“家国同源”、“家国同构”、“家国同体”让人们把帝王的家——民人的国视同自己的命脉，就是一种移花接木之计的效用。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区、各部门是兄弟关系；父亲是每个家庭的君主，叫“家君”。总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国一体。[29]君统、道统、血统也三位一体，理性、感性、习性搅和一起，尽管民人都是些毫无权利的像小草一样的可以任意践踏的“草民”和可以随意处决的蝼蚁（蚁民），但对这个国家确

是尽忠尽孝。这便是专制统治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民众只知尽子民、蚁民的义务，为家、为国，为一个不平等的剥夺了自己一切权利的集权制度而竭力直至献身；不知自己权利的丧失正是君父从那里得以扩大统治权力的地方，子民们得到的却是被杀死还要谢主隆恩接受“赐”死和“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恩德”。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欺骗性可以让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笔者在阅读揭露我们国民性，民族性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类书籍时，心中总不免有酸涩之感。这不是长期受着奴化教育而不自知、上当受骗而未觉察的后果么？我们揭开了伤疤，我们对病原病毒对症下药了吗？

让一个没有权利意识的民族，跟着帝王的后面奉献他们的一切，去形成更多更大的权势，又去剥夺更多的人的更多权利，还要为它顶礼膜拜，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高明的骗术么？

7、专制主义的治民之法花样最多

专制统治为了达到其永远统治的战略目标，它的战术策略的花样层出不穷。最能迷惑人们就是下面这些治国御下之道，是用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货色。这个不灵就换那个，轮番使用，互补互促，以达到制服、驯服、愚化、奴化人民的目标。

①礼治。“以礼治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秦以前）的治国方略，孔子“克己复礼”，就是复周公之礼。它是一整套行为规范，每个人的定位和他的言行举止都被规定得详尽可操作。礼仪虽然是一种形式，但它紧密地联系着它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具体地说，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达到思想上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以辨华夷，强调民族意识以利征战，定亲疏就固私心、搞宗派，序长幼就畏长上，明贵贱就忠权势。 为什么要对帝王三跪九叩，要你比他矮一截，他伟大，你渺小，实质是奴性培养，经过十代八代，在权势面前膝盖骨就发软呢！这就是礼教、礼治的效用。日积月累，不断重复、强化，这是用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养成性教育，是培育服从性的良方。所以，专制主义各处都广泛使用形式主义举措。

②法治。中国专制主义的法治，是与现代意义的以宪政为基础的全民立法、约法以之治国，治人也治己的法治完全不同的光治子民，不治君父的以律治民；而且主要是以刑律治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说明儒家的刑的等级性和虚伪性。而秦王朝的法那更是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教，赤裸裸的严刑竣法，可它还要宣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把“以律治国”的鱼目来混“依法治国”的珍珠，欺世盗名。

③德治。把政治伦理化为德，即将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为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为一种爱（慈爱），以德治国，作出榜样，爱民、亲民、恤民，也就是伦理政治化，把治国方略寄托在变国家为“爱的乐园”，大行仁道、王道，“王道乐土”，实行温情脉脉的“爷爷政治”、“爱民如子”。实际上，专制政治从来就没多大诚意实行王道，正如汉宣帝刘洵告诫他的儿子刘奭（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个德教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讲德教、德治、王道等，不过是遮掩骨子里的霸道而已。

④人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人治。在第二章我们引用了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界定：“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中国专制政治中的人治往往被掩盖在礼治、法治、德治交替使用中。常说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仁政、暴政，存乎一心”，“徒法不足以自行”等等格言，教人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素质与修养上，而不设计、坚持一个有普适性、长久性的体制上，故意给予统治者以巨大的空间去为所欲为，这就是统治者偏爱人治的原因所在。人治对统治者说来是最为顺手的，他可以培养亲信，排斥异己；言出法随，朝令夕改；文过饰非，不负责任；不受制约，不受问责等等。

以上四者，礼治形式主义，法治治民不治官，德治本身就缺德，人治更是致乱之源。专制政治的许多花样，也都可作为拖延、反对、抵抗现代法治的烟雾。

8、专制政治内斗最激烈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英雄为夺江山折腰，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以坐江山，做皇帝。这是历朝、历代杀人盈城、盈野的勾当，也是宫廷内骨肉相残，兄弟仇杀的常规。原因只有一个，最高权力只能为一人所独有。除了阴谋就是暴力，嗜权者只能走这一条路。对于乾纲独断、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生杀予夺的帝王来说，人命、人性、人心算什么？历史上专制体制内残杀之事不胜枚举。如：14 世纪 20 年代，元文宗（图帖睦尔）为与阿剌吉八争皇位，将支持阿剌吉八的宗王大臣悉数处死。明成祖（朱棣）为从他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不惜兴师篡夺，穷追不舍，使建文不知所终。就是我们曾提到有共生思想的英主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夺权斗争中更是首先亲自射杀自己的亲兄李建成，逼其父高祖退休为“太上皇”。这些有悖百姓伦常的事，在专制政治的权力斗争中，竟是平常！是帝王家——专制权力运作的逻辑。百姓家的孩子与王子生下来并无本质上即人性生物性的差异，是专制政体预设着他必定走上反人性道路的种种条件。他们在那样的皇权政治条件下生活，就必然要遵从皇权独享的原则，竞争的规则就是决斗，二者必死其一，即你死我活，这是专制主义给统治者带来的逃脱不了的噩运。

为了帝位，在皇家内部，除了战场上公开厮杀之外，朝堂上、后宫内、国戚间、权臣间、宦官、宠臣等等真可谓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累地开展拉帮结派，储蓄力量。没有一个皇家儿子媳妇们不是你争我夺，乌烟瘴气的。世间最歹毒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在皇家里找到典型。隋炀帝杨广大概是暴虐荒淫之首。录一段《隋书》以说明：

“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杨广是老二）。每矫情饰行（作秀讨好），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继承权未到手前拍文献皇后的马屁）。即位后，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穷极侈靡……诸藩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课天下富室益市武

马匹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摧毁商业）。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征高丽），百役繁兴，行者不归（抓壮丁），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东西游幸，靡有定居！（隋炀帝是出名的佚游皇帝）每以供费不足，逆收数年之赋（提前收税），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躭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烽起（四处农民起义），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出征），败亡相继。战士尽力必不加赏，百姓无辜，咸受屠戮，黎庶愤怒，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未之寤也。”[30]

隋朝初立，国势强盛，只杨广一人，即导致败亡。专制政体，兴亡由帝王，而百姓无辜，治乱全无保障。像杨广这样的暴君，产生的基础就是专制政治，铲除了专制主义，就是铲除产生杨广这类害人虫的毒根。可惜的是《隋史》作者惋惜杨广“就擒不寤”，并没有让后来的专制帝王在就死前醒悟过。明崇桢在上煤山前斫杀其公主喊道：“尔为何生在帝王家？”是否算醒悟了呢？共生论者只能说，非人之罪也，帝制之罪也，它残害糟蹋了多少人，包括帝王、后妃、公主们自己。

歹毒的女人要算刘邦妻子吕雉，这位以诛杀韩信闻名的蛇蝎心肠的女人，在嫉妒报复、残忍折磨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制造惨绝人寰的“人彘”案件中显示毫无人性。《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吕后为人刚毅（即杀人不眨眼），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在她设计要杀戚夫人子赵王如意时，她儿子孝惠帝多方保护他的异母弟。但有一天“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燻（灼烙）耳，饮瘖（哑）药，使居（丢在）厕中，命曰人彘（就是一个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话，能动的猪似的粪团）。居数日，迺（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即让儿子去看无比悲惨污秽的牺牲品）。孝惠见问，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31]吕雉所作所为，连她自己的儿子都无法看下去，指责“非人所为”，并悲吓成病。这帝王家干的是什么事？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作者在这里指出炀帝、吕后一男一女，实为人间歹毒到顶的人物，专制主义以这两个典型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也让专制主义的崇信者有所反思：在专制体制下的统治者，人性能堕落到何等地步！真叫狗彘不如。

表现在专制政体下的激烈内斗的另一方面，是君臣互杀，但多数是开国之君杀功臣，亡国之君杀忠臣；反过来奸臣杀主，权臣逼宫，总之围绕一个权字。建国前，推衣食，称兄弟，优礼有加；得国后，刘邦假手吕后，“未央宫里王孙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成为一种不移的规律。当人只是作为他人权力的走狗、工具时，其命运是何等可悲！

亡国之君杀忠臣，明崇祯杀袁崇焕可为实例。至于太平天国，诸王相互残杀，更

是创历史纪录。司马氏逼杀曹魏后裔，和曹氏逼杀刘汉后代，如出一辙。这都是专制政体，统治者内斗的残忍故事。

举出这些证明统治集团内部惨烈斗争的实例，说明在皇权政治的权力顶端的这些君臣、父子、兄弟、妻妾们，他们是仇恨的制造者，不仅是血腥的刽子手，也是随时准备做引颈被杀的囚徒；就在平时他们也是身处无数仇视的眼睛和咬牙切齿声中，时时担心被别人暗算，包括自己的儿女，多么险恶的权力场——它永远与杀人场相伴。他们能快乐吗？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坐在专制主义权力的牢笼里，作你死我活的困兽斗。

9、中国专制主义最缺乏人本精神

毫无疑问，皇权政治就是以君为本，民为末。可它又保留儒家的另一条，有一句可以与君为本相抗衡的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不说它是处于封建社会转型时代，多少还有点平等对话各抒己见的氛围，敢于说这种话以教育学生。直到明末黄宗羲批判君主制，说君主为满足一人的野心与淫乐，“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还自誇“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和唐甄指出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屠杀（天下之人）2000 余年，不可究止。”在这些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观点出现前，整个皇权政治都是以君为本。中国的君是上祖宗牌位的，受到仅次于天地而在亲、师之上的尊崇地位。但又要假借为民，亲民的幌子，儒家发掘出一个“民本”的概念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用来掩盖“君本”的本质。

正是民本思想与王道理论的结合，中国确实有过政治比较开明的阶段，一般是开国初期，有为之君，中兴之主如盛唐的贞观、开元之治，但即使如唐太宗这样的英主，他也只能在接受隋末农民起义诸豪并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之上提高点认识君民关系的水平，并没有丝毫削弱君为本的立场。这个“民本”提法恰恰是儒家替专制主义施放的烟幕。与近代“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近代民主是以人民主权的民权直接反对君权为基石的，二者决不能混为一淡。

幅员辽阔的帝国，分散的小农经济，闭塞不通的信息，君虽贵但天高皇帝远，民为贵只是谈谈而已。倒是官为贵，官本位所体现的专制文化现象复盖面广，经久不衰，决定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君权也好，君本也好，君主也好，君对社会所施加的权力，完全要靠权力的代理人官僚阶层的实际作为。“钦差出朝，地动山摇”说明权力来自于京城皇帝的敕命，“代天巡狩”握有生杀大权，先斩后奏。而地方官僚，平时搜刮民脂民膏，此时当然要多所孝敬，以保持其“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地位，哪朝哪代“千里为官只为财”是一个通例。官场实际只是权力交易市场，你进贡多少，得到奖赐多少，各朝都有比例。下级向上级交多少租，上级就给多大个地方你管，明码实价，心照不宣。至于百姓，“官有十条理，九条民不知”。被牧，被宰的羔羊，还敢找父母官、牧羊犬们要知情权吗？知不知情，无碍官僚统治，越不知情越便于暗箱操作、阴谋诡计和敲诈勒索的实施。所以君为贵是原则，但就实际状况而言，是官为

贵。官与民的矛盾体现于专制主义诸多方面，历史上只讲官逼民反，不讲君逼民反，腐败是通过官僚阶层来实施的。因之，中国官僚文化是中国专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官本位，惟权是尊、眼朝上、家长制、一言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人身依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婚丧嫁娶，大敛其财，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直到这些官僚把王朝彻底搞垮，葬送。然后，在改朝换代后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这与过去我们分析专制社会的土地由开国较均衡，然后通过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过程是相对应的。但把官逼民反的账记在地主剥削账上，实际忽略了官僚机器支持兼并，剥夺农民权利，叫农民上告无门的这一重要环节。而新一朝统治者开国时总是标榜民为贵，给人以替天行道，解救万民的形象，以利新王朝的长治久安。

有论者将中国专制社会的民本主义作为中国民主主义的源头来对待，以证明中国文化中也有民主共和的萌芽。他们意在把开明专制主义（一般地就是讲亲民、爱民、为民、民为本）作为现代民主的阶梯与国际民主政治接轨，实现政治民主化。这也是政治精英们的期盼，因为它可以规避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民权问题。

倒是人本主义较民本主义前进一步，它可以作为一个中介观念通向人权，让全民重视人的生命、财产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但它还只是民主启蒙的第一步，从民本到民主是质的转换。人本反映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关注点，着眼点虽不同，统治者提人本是因为它口号响亮，不象民本容易露马脚；而被统治者着眼的所有民生问题，都牵涉到以人为本的问题。双方还未意识到这就是人权的门槛。但采取的态度、措施和取得的效果有些接近，即把人命和民生放在首要的位置，予以关切，就会取得很大的效果。如“汶川大地震”。执政者以人命为重、身先士卒，救人抢险，体现人本、人道、人性的光辉，哀悼三日、万众一心、抗灾重建，为开国后所仅有，这是价值观的一次改变与升华的信号。此后如果广大民众认识人本与人权的关联，增强公民意识，积极参与维权和政治民主化活动，即可推进人本到民主的进程。若是孤立地看人本，好像人本是东方的，人权是西方的，隔绝互通、过渡的可能，那人本之说还要退到民本，老百姓仍然是无权的草民。什么主义害怕民主与人权？只有专制主义才会如此。因为专制文化根基的深厚和现实官本位的盛行，中国民主化在观念上的进程可能要经过以下的环节，任重而道远。

君本——官本——民本——人本——维权——人权——民主。才能把缺乏人本主义精神的专制主义改变为有人权的民主主义。

10、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最难廓清

从以上九个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专制主义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民主革命在英美法三国的成功，主要是他们的国民有权利观念，制度上有明晰的产权，较少人身依附，谁也不能剥夺谁。商业社会交易关系的平等性比较容易转化为人与人的平等性，他们较少专制文化的包袱。而有人却并不认为专制文化是负面遗产，也没有看到它是人身和思想得不到解放的根源性因素。反而在振兴民族的形势下，准备再一次

丢弃“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反专制的核心内容，只提爱国、避讳民主，而不民主的爱国运动，必然将已争取到的一点民权再次奉送给当政者，像20世纪上半叶我们所做的一样。“五四”精神经过近90年才生发出一个“科学发展观”，从概念上回归到“五四”，而民主——这个政治科学的时代概念却是如此艰难地不被人接受。任凭民众和知识界如何千呼万唤，却在这第一道门槛——我可以反对你的意见，但你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考验前过不去。政治精英，能全力保证这点实现能有几人？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对民主的抵制。它在上世纪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继续下去吗？

文化专制主义流行的后果是公民意识薄弱，对公共领域事务漠不关心，对各种侵权行为熟视无睹，老老实实做纯良的百姓。平时只盼着一个贤能政府领导，不贤能也只能无奈，而掌权者正好实行开明专制，民本主义，把它当成民主，为民作主充当人民作主。

300年人民民主运动的目标在很大部分国家仍未实现，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军事政权。它的历史、阶级、政治倾向性多是军事管制、独裁，在很多方面是这些国家残存着专制主义的广泛影响仍未肃清。

中国是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中国2000年的专制主义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并加以改变，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极大的贡献。

三、中东欧封建社会的开明专制主义

开明专制主义（enlightened despotism）是18世纪下半叶，中东欧一些封建国家专制君主鉴于英国已经立宪，法国酝酿革命，西欧民主潮流高涨，全欧封建秩序在动摇，本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等内外因素，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接过了法国启蒙学者要求自由民主的旗帜，宣称要领导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利用伏尔泰希望有个开明君主，在哲学家的辅助下，改革社会生活的主张，把自己装扮成“开明”的君主，执行一些有利生产、民富国强的政策，形成一段德（普鲁士）、俄、奥的开明专制时期。首先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登基时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愿为人民造福。接着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皇帝推行“开明专制”政策，进行如改革教会，政教分离，兴办教育事业，编纂法典等项改革。1781年，奥皇约瑟夫二世甚至颁布废除农奴制的诏书，成了这个时代的代表。这种从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了中东欧的发展，君主掌握了发展国力的主导权，对德、俄两大国的崛起，尤其对于德国成为帝国及其后成为战争策源地都产生过不小影响。

由此可见，开明专制对国家实力增长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由于它的本质是剥夺的，掠夺的，必然的结果不是对内的镇压，就是引导全国向外侵略。这同样地需要揭露其“开明”的虚伪性和危险性。

在对待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历史的问题上，也有人把“文景”、“贞观”、“开元”、“康

乾”等盛世称为“开明专制”。这与东中欧的“开明专制”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是中国极少数有为君主执行“民本主义”政策偶然性的表现，无碍于其子孙继续其不开明专制，制度永远不提供开明的连续性和保障。而后者是封建主义衰落必将为资本主义代替的表现，它形成几个大国的共同现象，带有改制性的意义。和民本主义一样，他们的开明专制也具有欺骗性和局限性，专制本质不因东西方而改变。

只要是欣赏“开明专制”而愿步其后尘者，思想感情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就站在帝王统治者一边。政治进程中的黎民百姓祈求政治精英们的“开明”、“恩赐”吧。这也就是“民本思想”的要害所在——反民主的专制实质不变。

四、近现代专制主义

与有帝王存在并掌权的古代专制主义不同的还有多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它们是19—20世纪民主运动在英美取得成功后，专制与民主继续较量，出现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更加极权化、民族化、种族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法国民选执政复辟君权的专制主义，以党派形式出现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的专制主义和德意志种族主义纳粹党的专制主义以及某些国家尚存的军阀专制主义。这样归类，是把这些反民主的，都以剥夺种族、民族、人民的权利为本质特征的形形色色的不同形式专制主义归为近现代专制主义。其意义在于示知，专制特权政治依然存在，人类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远未完成，专制主义仍在阻碍着人类共生的发展，专制思想仍然没有廓清，分述之如后。

1、法国民选执政复辟君权的专制主义

在法国大革命中，1799年，拿破仑以有功的军事首领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在法国强制执行军事独裁。他有权任命部长、将军、文官、地方行政官和国家参政院委员。他在加强执政府制度的权力的基础上，成为永久执政官。1804年，改为世袭帝制，拿破仑称帝，并请教皇为他举行祝圣礼。次年，又在米兰接收教皇的意大利国王加冕礼。俨然是法国查理大帝的继承人，于是征服欧洲的计划步步实现，直到侵俄失败，第一帝国垮台。

拿破仑侄子路易·波拿巴（1808—1873），他出版两本书：《空想政治》和《拿破仑思想》，宣传只有皇帝才能为法国带来光荣和自由。1848年革命胜利后高票当选为总统，因宪法不能连任就发动解散立法会议的政变，自己当上皇帝，史称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独子已故去）。他在位时兴办公共事业，加快铁路建设，促进工业的发展，对外扩大势力到印度支那、西非和拉丁美洲。后因争夺势力范围与普鲁士冲突，在普法战争中被俘而退位。

拿破仑叔侄当上皇帝的共同点是在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的大革命中，竟然如此容易成功复辟帝制而且能稳定其统治。不是因为战争，这两个皇帝也不会下台的。关键就是：①“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掌握军队，任何形式的专制政体都可以出现，复辟帝制，军人独裁或一党专政，而且都以民族和人民的名义，还披着自由民主的外衣。把权力集中、再集中，集中在独裁者的手里，为所欲为。②法国大革命乃是民主的试

验，也可以说是试错，谁都难以承担指导与裁判的重任，也只能由历史事件本身去演进。这样，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群众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掌握它的精神并实践，成为核心问题。而帝制的历史习惯倒是实实在在的力量，人们相信反对复辟阴谋最好办法是有民主共和思想的人当皇帝，以消除革命时期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结果以民众为皈依的理想反而成为创造皇帝复辟的条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傅勒所言："这个逻辑的尽头是波拿巴这位大革命的国王，……古老的权力形象与新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结果是"民主王权"（une royaulé de la démocralie）的建立。[32]人们竟然不觉得他们是复辟帝制，而是在创建一个新时代。

这种现象对 19—20 世纪各民族国家，尤其是 20 世纪在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国家产生承先启后的影响，承先：继承传统皇权专制——经过各种民主的形式——启后：建立各种军阀专制政治。200 年只是丢掉了一顶皇冠而已，专制以其新形态在继续着对绝大多数国家的统治。

2、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的专制主义

法西斯，意大利文 fascio，源于拉丁文 faces，是用红布带子捆绑一束棍棒中插一把战斧，它是古代罗马帝国表示长官权力的标志。皇帝与独裁官为 24 束，执政官 12 束，大法官 6 束。1919 年意大利墨索里尼首次使用这个词，后以它命名自己的党，用它作为党徽。法西斯党所实行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主张以民族（种族）国家作为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中心；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一切决定于领袖；民众必须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并立即执行；它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反对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的平等，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针锋相对。

法西斯思想先驱是法国激进的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索列尔。在他所著的《暴力论》中主张的"工人阶级运动需要非理性的神话来实现其历史作用"，"由负有历史使命的运动来行使暴力是"崇高的"。这些信条在墨索里尼政治活动的初期就进入了他的思想。法西斯主义其实是用极权主义办法来促进经济落后的社会加速现代化的尝试。墨索里尼把索列尔、尼采（德国超人哲学家）、马克思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法西斯主义。后来广为传播，日本、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均受到它的影响，成为 20 世纪人类战争灾难的思想源头。直到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年后的今天，亚、非、拉军人独裁政府仍然不少。据统计，80 年代，亚洲 4 个，非洲 40 个，南美 8 个，欧洲 2 个。而军事专制能走向民选文官政府，实行宪政的民主化国家到上世纪 80—90 年代才开始，数量也只 20 个左右，世界民主化——反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任务还重得很呢。

法西斯独裁专制是政党政治中的一股逆流，不同政党的存在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是群言堂的组织保证和实行代议制的第一步。通过讨论、争论，使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公民所组成的政党取得共识，通过投票选择，才可能达成一致或服从多数，以利政务的开展。而法西斯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剥夺其它公民组成政党的权利，封他党他人之口，一党独裁，决无求同存异之意，必然走上侵略——自我毁灭的道路。

法西斯专制是在殖民帝国争夺战中一种集全国之力，不惜牺牲全民族的生命去作孤注一掷的赌博的办法，以便称霸群雄，征服世界。这就决定它要与本国和世界人民为敌，最后必然失败的结局。法西斯猖獗一时，还因为它与民族国家主义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它能煽起民族狂热、大国沙文主义的恶劣情绪，达到疯狂的程度。

3、德国纳粹党的专制主义

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奉行法西斯主义，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元首至上。但德国仍有其特色，即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党的名称，纳粹主义 Nazismus 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zialisus 的缩写，纳粹党全称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以社会主义招牌起家，实行一些社会政策，一度赢得德国工人、妇女、民众的支持，当上魏玛共和国的总理。但他执政后，即公开反对民主，把其它政党宣布为非法；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元首的以党治国的方针，并推行消灭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为了实现其日耳曼民族征服世界的野心，把全国 10 岁以上的少年编入希特勒少年队，到 13 岁编入希特勒青年团，18 岁加入纳粹党，灌输种族优越论、复仇主义（复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之仇）、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军国主义等纳粹主义毒素；把漂亮、聪明的雅利安儿童培养成四出杀人的凶手，毁灭人类的工具。尤其是纳粹党对全国平民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人都有身份档案，实行全面监控。党卫军、纳粹党徒遍于全国，对内是盖世太保，对外是第五纵队。第三帝国确是犹太人的地狱，但也不见得是雅利安纯种人的天堂。它驱使着他们的人去当炮灰，其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德国纳粹政权随二战结束而飞灰烟灭。但是纳粹主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新的形势下，纳粹分子还在世界范围里时有所现，并逐步入流右翼恐怖主义，继续祸害人类。

4、军阀专制主义

不能像法西斯、纳粹专政掀得起大浪的一些独立国家的军事首领们，有的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有的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有的举反美的旗帜，有的举反苏的旗帜，在获得独立的过程中，成为一国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或者是有君主政治的背景，或者是党派政治的后台，或者是某个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军事势力，或者是属于某些单一部族或联合的力量，各有其特色地实行着军人统治。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政变频发，政党上下如走马灯，宪法、政体形式上是属民主类型，但运行却困难重重。贫穷、缺粮、缺教（育）、疾病，灾难甚至内战是下层人民摆不脱的困扰。国家虽小，影响颇大。据统计，1960 年以后，世界各国先后有 61 次政变，大部分是军人所为；56 次得逞，杀掉首脑 8 次，将原首脑当傀儡 7 次，废黜的 11 次。这种政权更选的非和平方式，证明民主化程度之低。一些军事政治人物，仍然奉《君主论》、《暴力论》为圭臬，专制主义仍然缠绕着这些国家。不仅平民百姓受苦受难，就连执政者项上的人头也是不安全的。多一点共生理性，少一点专制独裁，不是要好得多吗？

共生论认为人类社会的人为灾难之源是剥夺，即人能剥夺他人的权利。人类社会

诸多矛盾最后都会综合到掌权的统治者和无权只得听令的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皇权专制社会里就是君与民的矛盾，没有君的社会就是执政者与人民的矛盾，而专制主义就是代表君或执政者可以剥夺人民权利的一种自古皆然而今变种繁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朕即国家”的皇帝自不待说，就是民主革命后的执政者们也更多的是“把国家变成人民的相对物而假身其中，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谋取私利。”[33]这种私利并不限于个人小利，而是执政者所维护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利。而所有以权谋私之成为可能，就是有剥夺权利现象的存在。换言之，即民主监督权已被剥夺才会如此。这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根很难拔除的原因。

各种不同特色的专制主义终将以各种不同途径结束它自己的历史。它的代价是不同的，关键是执政者能否认识剥夺行为于情于理于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合时代精神的，也是反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强大兴盛、持久繁荣建立在剥夺人民权利的专制主义基础之上。君与民、官与民之间，是走和则两利、双赢的路，还是走斗则两伤，并无赢家的路，共生理性可供有识者参考。

值得庆幸的是，竟然有位国王，致力于国民的幸福，教他的人民如何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不丹的国王旺楚克结束专制的途径。不丹从一个政教合一的秘宗佛教国家，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做到 97%的国民认为生活得幸福和谐，给世界执政者提供了一个令人启迪的榜样。在波涛汹涌载舟覆舟的巨浪中，让我们看到一片和平的白帆向我们驶来！

第五节　专政主义

专政，汉语《辞源》解释为独揽政权，见于《左传》、《汉书》。前者指晋国范氏专政，后者指王莽专政[34]。英语 dictatorship，兼有专政与独裁之义，dictator 就是独裁者，具有独揽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意义。列宁说：“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35]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也指出专政就是独裁——“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又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36]列宁是从世界历史范围界定专政，毛泽东是就一国范围说的。二者都表明“专政”这一概念对世界革命和国家政权的核心意义，离开专政就无法说清当代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

遍读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有自诩的语言，也只在 1852 年 3 月《致约·魏德迈》的书信中说道：“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37]可见其对专政的自信与偏好。由此，列宁强调：“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38]因此，用专政这个概念

来阐述 150 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比用专制这个从古老君主时期就有的概念更能贴近意识形态实际。

所谓专政主义，一般是指强调政治统治关系，即某一政治或军事集团独揽大权，借以消灭异己，达到其永久性、绝对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赋予阶级的内涵，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以往文献中较少见以专政主义为范畴对社会历史进行论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赞成和实行的一方，认为专政是过渡，是手段，是工具，顶多是个原则，而以社会主义涵盖它的内容，更为神圣而无恶名，究竟独裁并不好听。说及马列主义，阶级专政乃题中之义，何须单叙。反对它的一方，就直接称之为专制独裁，极权主义。前者隐藏了重点，后者未辨其异。二者都没使用“专政主义”。而一个概念、范畴，既是该类事物的概括与抽象，又是一种认识、分析事理的工具，选用适当，就便于准确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事物的本质。本节选用“专政主义”作为概念工具。

专政主义与专制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以剥夺人的生命、财产与尊严为主要特征。但它们的范围、对象、强度、依据、危害、影响等并不完全相同。

作为政治领域的专政行为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阶级的具体人，但这个人的阶级划分是属于经济范畴，是以人的经济地位来区分的。列宁给它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9]质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占有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这个能够占有劳动的剥削关系消灭掉。所以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这种以政治范畴——权力来剥夺他人的权利的专政，同样存在一个以有无权力资源的阶级关系。即有权的统治者阶级和无权的被统治者阶级的矛盾问题。从政治关系来看，专政主义者是压迫者，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垄断，而是更严重的政治压迫，是可以剥夺别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的阶级。用政治镇压手段去全面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中劳资关系、生产关系本身就是个不切实际的既不公平又无效益的政策。何况这种消灭不了的剥削关系仍然盛行于世，名曰就业；而政治剥夺却带来 100 多年来的灾难。因为没有认识到专政的经济标准与政治标准的背离性，放弃了对专政的前提“阶级民主”、“苏维埃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建设，致使苏式政体于建立 74 年之后，轰然倒塌。专政主义成败过程中的教训极为深刻。下面就专政主义各个有关方面进行叙述。

一、两种专政的比较

在过去 100 年中，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前者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为主；后者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包括集体所有制）。政治上前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后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从表面上看，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但仔细一看，有个根本性差异，就是资产阶级有部全民遵守的宪法，有一个民选的政府和讨论法律和大政方针的议会，有一

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制度和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信息公开而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资产阶级政府初期未实行成年男女不分种族，职业、党派、财产一人一票普选制之前，工人们在选举上受到财产方面的限制而失去投票权，可以称为资产阶级专政。但 100 多年来的发展，它的民主部分，人民的权利愈益充分，专政职能愈益缩小；而我们还沿用着 160 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90 年前（苏联成立时），6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阶级专政的概念。

毛泽东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40]可惜的是，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学到了“专政”，却没有学到专政的另一面——对本阶级的民主。倒是资产阶级把民主扩展到工人阶级直至全民，还建立了一个世界性主权国家的民主联合组织——联合国，不能不使人感到，学生学的成绩不佳。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无产阶级不向往民主与自由，只向往革命和专政？民主只是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无产阶级，尤其是它的力主专政的理论家（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者例外）。下面展开各方面的比较。

1、专政范围：资产阶级专政范围是局部的，无产阶级专政范围是全社会性的。

列宁说：“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41]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要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范围必然是全社会的，甚至改造者本人、本集团也得改造；所以造成全面性、持久性、阶级性的压力。两个决裂的理论又造成传统上、习惯上、心理上，甚至直逼人性上的断裂。整个社会处于心灵撕裂的状态。要么双重人格、心口不一、两面派；要么死路一条。人格、人性的扭曲成了专政的直接后果。

同时，计划经济的实施，使专政深入到日常家庭生活之中，任何小事都可上纲上线与专政联系上，不得安宁。

相反，资产阶级专政是在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秩序的基础上，给予政治形式的完善和法律制度上的保证，是已有秩序和规范的肯定与发扬，社会成员知道自己行为的预期后果而各安其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存在社会压力。只有违反法律的刑事罪犯与造反者才感到专政的暴力。它的范围是有限的。

2、专政对象。资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把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全体成员作为对象。道理很简单：把劳动者消灭了，资本就不能增殖，发不成财了，他们能这样干吗？恰恰是法律保障其剥削那部分，才是“专政”的内容，而其它部分，正是保证劳动阶级能得到其相应报酬的部分。它没有制定直接的暴力剥夺的法律，劳资双方有通过各种组织，展开谈判的渠道，而不是刀兵相向。其专政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叛者。

无产阶级专政则不然，随着革命的深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进展，不断有新的阶级、阶层被划入专政的范围，而在“人民”的名单里除名。以为无产阶级只对资产阶级专政，不对其它阶级阶层专政是大错了，甚至本阶级本集团的人都难逃厄运。

首先说农民，该是夺取政权的盟友吧。他们生产着粮食，活命的物质吧，功劳不小。可列宁说，“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个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到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42]这种腐化活动在另一处得到解释：“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43]就这“自发势力”的概念，坑害了多少中国农民及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右倾干部”。

其次说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的自由职业者和各种第三产业的知识分子，解放时有 500 万人左右。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比体力劳动者更具独立性和个性，倾向自由，向往民主；其中一部分不满旧社会政权的腐败，国民党一党独裁，投奔了革命，和大部分科技知识分子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智力资源。他们继承的“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与当时普遍蒙昧与政治上的蛮横，确有观念上的分歧，但爱国是一致的。在 1957 年，毛用“双百方针”引蛇出洞的“阳谋”手段，使 300 万知识分子被划入“敌人”的行列。从此，国中难见耿介之士，万马齐喑，道路以目，对现代知识分子实行长达 20 多年的专政。毛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极尽蔑视奚落之能事，他说，“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44]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他说：“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45]他的仇知心理溢于言表。就在 1957 年 10 月 13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 13 次会议上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46]这里不仅看出罗对无产阶级专政毫无认识，却也见毛如同对他老师梁漱溟一样地对他们知识的嫉恨。文革中大批“学术权威”，整得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从毛的言词中读到其心理活动。连胡乔木后来都证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心理。”（《杜光文存》16 辑，P34）

一些经过了反右“考验”并改造了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中的当权派们，在文革前夕，毛对他们又作了一次评价：“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47]这里面就包括了党内的高中级干部。一些反右、反右倾没有被打倒的有头面、有成就的著名人士在文革中一起被收拾掉。不堪批斗折磨和人身侮辱就只能选择自杀一途，仅在龙九洲《被迫害自杀的著名人士名录》[48]中即有 44 人之多，其中除学术文艺界人士见于第三章第二节外，还有党的下台领袖李立三、王稼祥，有毛的新老秘书田家英、周小舟，有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还有邓小平的胞弟民主人士邓蜀平等等，都成为专政对象。这种迫害异己、

株连亲友、无情无义、丧尽天良的专政，只有过去专制昏君才会有这种事发生。但这一切是在一个振振有词，反修防修的理由下撒手让群众及小将们去“革命”造成的恶果，不从专政主义这个根上去认识这些现象是无法理解的。

再次，说革老革命的命、专专政者的政。

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不达到最后消灭阶级是不会罢休的。不管你一生如何忠于革命忠于党，多么早参加革命，担任何等重要职务，或者正在专革命对象的政，只要在眼下对领袖、导师不亦步亦趋，或不理解，或执行不力，立刻就会翻转身份，由执铸者变成囚徒，接受批斗。刘少奇不理解文革，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遇到要揪斗的新问题，才想起用宪法来保护自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本来党治制的国家的宪法从来无人当真，要命的时候倒想起“民主”的宪法来。一辈子自己修养也教人修养，提高党性忠于党；在七大提出全党尊崇“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把政治局最后决定权送给毛泽东，反过来死于毛之手。这里就有个专政主义的体制问题，可不象皇权专制时派去抓人的是钦差大臣，这回派出的是“革命小将”。这充分说明，一个没有法律秩序的专政，再老的革命，也救不了自己。

革命者成了专政对象的逻辑就是文革《五·一六》通知中的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49]专政主义就是用这种不断创造出来的“帽子”给你戴上，然后以帽子之罪，将这一类人整死，这是专制主义与独裁主义所不可企及的。搞阶级专政的人死于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是这种专政的恐怖所在。

举此三类，足以证明，专政主义不仅是对敌人专政，而且可以把自己人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直到思想认识和敌人扯在一起，然后加以镇压，可以使自己人不寒而栗，致使专政对象越来越多，人民越来越少。不似资产阶级专政，由警察侦缉、检察官或受害人向法院起诉，再行专政，且法律规定不施以酷刑，有理可以申辩、上诉。

3、专政强度

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度对比分两个方面，历史上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后的恐怖时期。强度以死人数和思想宽容度为指标。

这里以法国大革命和中国人民革命为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价最大，历时 82 年（1789—1871），死人 200 万，除 100 万为拿破仑征服欧洲战争而死，余为革命与卫国牺牲的。其中革命镇压皇室、贵族、教士 6131 人，连带第三等级 36573 人，这还是雅各宾专政——即激进共和派恐怖时期造成的。巴黎公社已属无产阶级性质，起义牺牲 1 万，白色恐怖死 2 万。即阶级斗争共死亡接近 10 万。对这段历史，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们如托克维尔等，不是赞扬雅各宾专政，杀得对，杀得好，而认为是革命中的不幸，有民主而无法治，甚至反思到卢梭的理论失误。

再看中国革命即中国内战代价至少是 300 万，而专政死亡数则完全是中共执政后的事。仅文革十年，1978 年 12 月 13 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 2000 万人，整了 1 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50]如从建国算起专政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2853.5689 万人。从法中两国两个阶级的专政的历史经验看，无论是雅各宾专政扩大化，还是毛发明的群众专政，都是灾难之源，强度远比遵照法律的专政猛烈得多。坚持专政论者们，对此不知应作何解释？真如有某些历史学家以政治家的口吻说，公社的失败是因为专政得不够，没有追到梯也尔的老巢斩尽杀绝。苏、中、柬共总算专政得彻底吧，结果又如何？

专政强度另一指标可以用是否宽容异见来观察。在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照样出版发行，只要你不动手，只动口，只写书是不被追究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使有点异见，文遭封杀，人受监禁。马克思可以在大英博物馆完成其反资本主义的资本论，我们的张志新、顾准们能在图书馆里完成他们著作心愿吗？

4、专政的危害不同

无论是哪个阶级专政，共生论者都反对，因为专政是人类共生历史的变态，相反，阶级斗争论者认为专政是历史的常态。他们的理论是，只有让他们领导到实现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才会没有专政。

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内的民主，可以部分化解阶级矛盾，达成民族团结。但民主不向国外延伸，所以危害性多表现为对外侵略。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阶级斗争，专政主要是内斗。前者是全民国家，后者是阶级国家。阶级国家说全民国家是假的，但全民国家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阶级国家只一部分人有政治权力统治社会各阶级。因为其理论认为除工人阶级外，都是要被历史消灭的阶级。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消灭阶级，所以它对国内的危害性要大些。我们理应指责民主国家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指的正是资产阶级政府对外扩张的一面，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内民主的一面。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一国之内的和平发展的局面是靠民主原则来维持的，而不可能靠专政的原则来维持。

其实，专政主义不仅能分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分裂世界和人类。共生史观提人类的共生圈这个概念，就是为了不让部族、民族、国家这样一些生活共同体凝固化、僵化；让它既处于对历史说来是个整体，对未来世界来说它又是个部分，是准备趋向一体的变化中的一个圈子。像我们所说的思想不开阔、眼光不远大的小圈子、小山头一样。共生圈不断扩大为一个世界政府管理共同事务，是人类的美好前途与永远福祉所系。但是专政主义它是从每个共生圈内先按阶级加以分裂、斗争，然后才是国际苏维埃的实现。这条路已经证明是如何地不切实际，世界能以不断剥夺别人、别族、别国的权利来走向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么？

国际苏维埃的设想，它有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就是认为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处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生圈（国家）的工人利益能一致吗？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利益都不一致，因为它不是像马克思所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1]而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按经济关系划分的阶级，其中就有按政治关系分为掌权群体与无权群体；按财产分为高中低收入群体；按知识程度分高中低文盲等群体；按宗教信仰分教与非教、各个宗教的群体；按用工制度分有正式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利益差别，它能一致起来吗？只有赤贫状态的无产无业的流民利益才是一致的，但他们品格上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知产阶级登上社会生产历史和世界舞台后，倒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不剥夺别人，观念上的自由与平等比较一致些，经济利益也不可能一致。

那些单向思维排斥多元，容不得异己的存在，其理由就在“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上，它延展开去，就是一个党，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阶级。阶级专政的理论起点无非就是三条：剥削有罪，剥夺有理和这个阶级利益的无差别的一致性。

5、专政的依据有异

资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维护私有制的，讲自由平等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试验的、推行公有制的，讲平均反剥削甚至是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

资产阶级专政诞生在反封建经济秩序、反教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特权统治的环境中，它是人民主权运动、民主革命的成果，是以建立反剥夺人们权利的宪政法治社会为目标。只是在维护剥削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被指称为专政，实际民主意义要胜于专政意义。它的目标是全体国民的福祉。它的存在与发展并不要以消灭某一部分人为代价。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创始人列宁看来，归官僚国家机器因为保存了私有制和剥削，它的成员都不是穷人，是工农敌人的政权。议会只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政客们的清谈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不但否定了议会制度，而且直接用武力镇压了彼得格勒市民为纪念立宪会议而举行的和平游行。当考茨基批评列宁这样做是“消灭民主”时，列宁立刻给考茨基戴上“叛徒”的帽子，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列宁就是这样不需要全社会各阶级阶层共同制宪，而用工农苏维埃（代表会）代替代议制议会。他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这百万倍竟然是按照物质条件来量化形容的：“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就使群众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52]正是从专政剥夺所建立的“苏维埃民主制”，一个巴黎公社的放大模式立法司法行政合三为一、无从监督、无法问责的苏维埃在俄国出现。最后专政的对象转向农民、知识分子。不是民主，而

是死的人数才真正达到百万倍。（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正是人类近 700 年反专制的奋斗，才找到一个最不坏的体制，保证国家领导人由选民选举，受选民监督的政府，不让专制政体复辟。但这一体制却在一个反剥削的社会主义旗帜下，通过直接暴力手段再度重现，且有过之无不及，这也就是两种专政有着两种不同民主的含义。资产阶级民主反剥夺，无产阶级民主反剥削。究竟后者的依据是理想的，经过 100 年的试验并没获得成功的共产主义蓝图。而前者确实是世界不断发展的现实，而且还是个不算悲观的事实。普世性民主的发展，是前者不是后者。苏联东欧的改制并没有带来工农民众的灾难，起码没有斯大林式的灾难；而中国的改革也只得朝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民主方向改动。而如果继续无产阶级专政，那今天的共产党精英怎样经受得住？那些权力资本大款们就只能永远寓居国外了。一些理论家们，缄口不谈剥削，叫工农阶级为弱势群体，以阶级起家竟然连“阶级”两个字讲的胆子都没有，中国的阶级就被开放放飞了吗？

专政主义在 100 年意识形态中占有中心地位，它从理论上是一切论争的焦点。只有承认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此检验党性。党则是专政的载体和工具，这样才能把专政作用发挥到极致。专政是国体问题，属于国体的大事——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建立起的专政，是不可须臾离也的法宝。它又是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点。一个消灭阶级，两个彻底决裂都得靠专政去执行。所以文革的理论是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论认为建国十七年，专政还不彻底。大概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共模式才算彻底，无情剥夺国人的一切才算彻底。舍此，我们怎样能合理地解释苏中柬三国意识形态造成 6600 多万人丧生的灾难，又怎能告慰这些含恨终天的亡灵呢？只有批判专政主义才能担当此任。

6、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因为这两个专政的较量，使得人类在 20 世纪经受痛苦与灾难，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掠夺与火并发生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又变成了内战、冷战。世界范围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阶级斗争，直到苏联解体也并未停息，并延续到 21 世纪，成为国际的不稳定的因素。新世纪国际整体上虽无大战，但局部战争、冲突、恐怖仍然不断，其中贫富差距拉大的国家，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发展到暴乱到专政的危险。也就是说仍然存在以剥夺对剥削的可能，而不管是哪个阶级专政，只要是有剥夺权利的现象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

现在专政政治有两种趋向，一是原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私有制，已从共产主义退到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上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但政治上对民主化深怀疑虑，实际上是专政主义思想体系未曾触动，仍然是苏式体制。专政主义躲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盾牌后面，走之字路，打模糊牌，打着红灯住右走，在两种专政之间摆动。以保护权力资本的利益为目标，两种专政手段都可以被用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不堪全球化的压力，仍然有人会走越穷越革命的道路。所以毛派共产党仍

然有执掌政权的可能，尼伯尔形势和拉美向左转说明这一点。是否执行专政主义政策，是各向左的国家的前车之鉴，生死攸关！这就需要充分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而知有所选择，才能真正造福于民。

由于冷战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亲美、亲苏、亲中势力在发展中国家尚存许多影响。希望过去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被民族国家主义，教权主义掺和而放大，再次危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二、极权化是专政主义的发展逻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在人们往往对专政主义的残酷性、非人性的过程与后果的严重性很难理解，提出种种疑问的时候，有的说，人的因素第一，是历史人物错误造成的；有的说是总的主义出了偏差；有的说，总的主义没有错，是执行者理解错了；有的说，国情特殊，中国道路只该如此，等等。综合这些见解，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是权力的极端化，政权被掌握在一党一人之手，其它的党与个人都无权置喙的话，其造成的灾难，必大为减轻。这里面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极权化是专政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逻辑，只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极权化是必然的事理，试就其事、索其理以述之。

1、“极权”概念的内容及由来

在 20 世纪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美国诗人伊斯曼 M • Eastman（1883—1969）总结了极权国家的 20 项特征，胡适在 1941 年一次讲演：《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简明地表述为：

（1）狭隘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的政党，来执掌的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之下。

（5）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和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

（12）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13）政府计划的罪恶。

（14）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53]

至于极权的概念则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创造的，他描述（定义）为“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二战初“极权主义成了一党制政府的同义词”。广义上说，“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与专制或独裁的区别常常表现在以新的政治机构代替一切旧的政治机构，打破一切法律、社会和政治的传统。……在极权主义者统治下，传统的社会机构和组织被阻止和压制，社会组织的机能因此遭到削弱，人民更驯服地被纳入唯一的统一运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主义者统治之下是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目标的实现而变得合理。……他们的行动无法预料，而唯其统治者的意念是从。”[54]

从极权主义上述 20 项特征来分析，有 5 项是关系国家与政府的，即国家至上，政府无错；有 5 项是关系党和领袖的，即党统制一切，领袖神圣；有 6 项是剥夺人民权利、挑动互斗、消灭异己的；有 4 项是废弃学术，反理智与科学的。总之是在一个党、一个领袖统治下，凡于目标有利的就去实现，凡于目标不利的就去摧毁。于是有两大目标：国家主义，侵略与掠夺；阶级专政主义，剥夺与恐怖。这就是有计划的实施罪恶，极权制度，大都如此。

2、极权化是专政的本质要求，唯一性是极权化的合理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专政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由马克思奠立的，是他的理论成果的焦点。在苏俄还没有真正实践专政理论之前，马克思就为这个理论的唯一正确性倾注了毕生的心血。马克思的哲学，对立面的斗争奠定了他的斗争不可调和性的极端；政治经济学论证剥削有罪，并上升为剥夺，论证了暴力造反有理的绝对性；革命也只有他一家是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要有个扭转乾坤的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和领导这个专政的党，要洞察与驳斥所有异己之见的机会主义论点。在第一国际和其后大部分时间，他以最激进的观点批评所有的“同路人”。其实，在理论探索上，某种逼近真理的认识路线，并不是某个天才所能全部完成的，而是众多同道朝着一个目标，认识它的各个侧面，大多是围绕着未知的正确的路线，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不断发现相似或相近的东西，也许就有真理的颗粒。但马克思对此总是毫不妥协的批判，直接追到其阶级背景。即使是同盟者，也始终不忘同盟者的劣根性和它的阶级企图。这可以看看《共产党宣言》的第三、四章。所以，从一开始，这一个主义所宣称的绝对正确性、科学性就让人感到是一种唯一的正确理论。如果你不能领悟，必定是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上有问题。

马克思也找到了实现他的理想的伟大“物质武器”，即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对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剥削剩余价值理论和反剥削的历史使命茫然无知，要把他们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自觉革旧社会的命的阶级。这就需要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去宣传、普及他的这套理论并组织起来，推翻旧世界。他告知工人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5]从主义的唯一性到阶级的唯一性，这在列宁之前即完成了这种准备。

列宁是专政主义的实践者，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极富经典性。他因为创造性地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最有发言权。他的解释无可争辩，这就在主义的解释上完成了唯一性，成为继马克思之后唯一理论权威并拥有专政国家领导权。因此，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奠定了政党唯一性、领袖唯一性的基础。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至少在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6]这就宣示了一个阶级是由一个政党来领导，一个党是由一个领袖集团来主持的道理。那时，列宁还讲点领袖集团，还有点集体领导的味。到了斯大林时期，就用民主集中制和他实际的四年中剪除政治局的反对派的操作中完成其领袖的唯一性。这一连串的唯一性，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斯大林的极权化的过程。它反映的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唯一性，只要有不同的第二种诉诸理性的声音，这个专政一见阳光是难以蒙哄大多数人的。赫鲁晓夫的苏共 20 大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它只有诉诸暴力与镇压，克格勃和钳制言论、封锁消息才能维持。因之，它比其它的专改更彻底地要求铲除异己，而且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社会主义为什么只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阶级为什么只能由一个政党领导？一个政党为什么只能由一个领袖来独断？这些非常浅显而要害的问题，始终被禁止讨论。一言以蔽之，即无产阶级专政控制了一切。然而这个专政长达 74 年才结束，也可见政权一旦蜕变为某一党一人的工具，它对人类或一国的共生带来多大的阻碍与灾难。俄罗斯改制后，人民赢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有组建政党的自由、有批评政策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了不是集中安排的民主。克格勃不再侦查人民公敌，而是去反中央情报局，执行缉毒、反贪腐、反恐怖的情报任务，逐步地在去极权化、去特权化。因为原来专政积习太深，有权干部商业化、私有化所造成的影响仍然相当严重。尽管如此，普京当选总统所赢得的 70%以上的选票和信任，而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仍然合法地存在，这已非高压而虚假民主的斯大林时代所可比拟。

毛泽东在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从 1953 年就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就是推进着无产阶级专政，到文革

时达到全面实施，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一切，结果是一场浩劫。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力最大，使世界人口的 1/4 的中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他的制度贡献就是强化并普及了民主集中制，并发明群众专政，使破坏性达到空前的地步。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到五统一：即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最高境界。他发动并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无奈全中国除对外国、外族时利益一致外，内部利益是如此的不一致，他的五统一就连最后一拨人，包括寄以厚望的林彪也统一不起来。

毛泽东的后继人并没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觉悟过来：叶剑英 1978 年所说的整了 1 亿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而且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就是说专了多少人的政，就得平多少人的反。这就是法治社会法外无罪、法外无刑的道理。所以，“六四”对学生的专政行为，对法轮功广大练功人员的不公正待遇，都属于违宪、非法。只要解密，历史将会证明他们无罪，也得平反。这不是预言，而是 100 年来专政主义的经验。

3、政治民主化实质是去极权化，还民以公民权

共生论者不希望世界上有专政现象，即一部分人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是公平、平等、自由的底线，也是共生的底线。剥削不是致乱之源，倒是剥夺才是致乱之源。笔者长期也认为把剥削消灭了，国家独立了，人民解放了，平等实现了，人间幸福了，那忍受些剥夺倒也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也还值得。但是，事情完全不是如我所想，而是相反。剥削未消灭，剥夺竟达到专制、独裁的程度。这不是个人之事，而是事关全民每个人的大事，不能不坦诚而言。

从专制、专政社会要推进到民主社会，有赖上下齐努力。首先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法治的最坚实的一步，是否定文革必然的延伸，否则专政主义还会在某一天卷土重来。去极权化，可以把美国诗人伊斯曼所述的 20 项特征对照，去一项算前进一步。全国公民齐努力，争取公民权利，去极权化的过程就是民主现代化的过程。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与全世界和平发展所要求的容异、存异、共生、和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专政主义是历史上专制主义在新的名义和理论下的继续，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尊地位经历了 80 多年（1848—1934 年，从《共产党宣言》到斯大林独裁），才完成极权化。中国专制文化更深厚，所以只需 45 年（1921 年建党到文革开始）完成极权化。去极权化实际是消除专制政治、专制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项努力将是长期的而且是非常艰巨的，走向公民社会首先得弄清楚它的障碍是什么，而不会被许多肤浅之见或心计之见所迷惑而不知要害所在。

建立和谐社会首要条件之一也是要废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世界是人类的世界，而非哪一部分人不论其以何种名义都不能专哪部分人的政。只许我这类人掌权掌钱，不许别类人有发言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建成“和

谐社会”吗？虽三尺之童，知其不可也。

三、民主集中制是通向极权的桥梁

民主集中制是专政社会的政治体制，它是通向极权政治的桥梁。如果说民主专政决定国家的性质，哪个阶级是主人，哪个阶级是应被专政的敌人。那么，民主集中制就是政体——政治体制，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由列宁建党时强调的集中制，经过斯大林命名、完善，毛泽东普及应用于中国所有的政治组织，人民团体，包括广大城乡基层组织、青年团、少先队、班级会、一体实行的规则、做法。民主集中制是覆盖全中国的政治体制。党章中更是明文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万花筒，变化多端，捉摸不定，但最根本的一条，集中最高权力于一党一人的本质不变。它还是通向党主政治的桥梁，也是专制主义过渡到专政主义的必经之路。有了它，也就保证了它的效率与独裁，但所有会殃及人民的独断与腐败也不断地从这个制度中产生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

1、它是只保证集中，不保证民主的制度。从它产生的背景来说，最初是列宁在秘密状态下建立一支由职业革命家领导的行动的党，并要求组织武装力量夺取和保卫政权的时候，强调集中制，他说：“无产阶级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57]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当时提的是集中制，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民主集中派，接过民主之名，行集中之实，才定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毛泽东更加以辩证化，理由更充分。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认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58]这些道理是实行于人民内部，至于对其划定的敌人，则是专政的范畴，而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民主了。

这段话五个要点：①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②民主只对集中而言，自由只对纪律而言；③自由是要有领导的，民主是要有指导的；④何时有民主，能自由是统一于集中意志和纪律之下的；⑤制度并无确切的实施程序，不确定性极大。

实践中的民主集中制又是如何？长期以来，民主只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集中指导的目的而行事的手段。它要求是最大最强有力的集中，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反对专制维护人民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常说：“扩大民主”、“吸收参加”、“集中指导”……等等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它有四条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除少数服从多数这条算民主外，全然是个部队的组织原则。军队以服从为天职，这是职业功能、组织结构决定的。政治组织执行这个原则，

就是政治组织军事化，形成“一个军队般严格的政党”，只有铁的纪律，而无思想与行动上的个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是一支战斗部队，战斗任务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服从集中，集中服从专政，专政服从统帅。

“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有权的少数往往可以导演出多数，甚至是超多数（包括会场外的群众）。没有程序民主，讨论、表决，永远无法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社会组织化生活平时绝对是多数服从少数，统治者、管理者总是少数。一个组织如果常年不开会，或在充分准备好了以后再开，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全部涵义是按集中指导下的人选当代表或参与者，在集中确定的日期、地点召开，按集中指导的内容议程讨论在集中指导下的问题，作出集中指导的决议，顶多有细节上文字上的改动。然后散会各干各的事，参与者或代表们既无继续监督集体决定实施之权限，又无平时反映民意之义务。他们完全处于召之必来，除当选本级的班子成员外，挥之必去的状态。这样的民主只能是强化集中而不能制约集中不是很显然的么？它的作用是给集中以合法的地位，民主的桂冠，封堵异见者之口。这样的代表会不可能讨论大事的对与错，只能在已经被集中了的前提下通过决议和人选。有个别与集中意见相左的，还要集中地去做工作，打通思想以合乎集中指导者的意图。所以这种体制的代表会的主要任务是一致通过，学习精神，传达贯彻，模范执行等。代表会与 X 级干部会议的差别仅在于能授权给集中指导的机构以合法性。

这种制度，在中国不仅实行于党政系统，而是普及到各行各业，各个基层，社区，就是学会、行会都实行它。实践结果是老班子不容易下，新班子不容易上，僵化无创新，保守不进取，上面不推不动，上松下散，缺乏主动性等等。因为这个制度缺乏人品、学识、能力上的竞争和选择，就保证了选上去的人既得权位，当然也就包括了利益。另一方面，中央可以开个生活会，逼退一个全党的总书记。更可以随时几个人一商量，或者不商量，不通知谁来或让谁出，直至枪毙（如贝利亚）都是民主集中。明显地没有法律保障的申诉权，每个人不是安全的，有权者更甚，这样内部就不能不大搞阴谋诡计。

2、民主集中，作为制度，学理上讲不通，事实上是实现独裁的工具。凡社会组织，只要有分工合作，协同配合的集体行动，不是个人赶庙会都有集中。政治决策上的集中，最为重要。专制社会，御前会议，大臣们各抒己见，皇帝最后拍板，是不是典型的民主集中？但这是什么民主？——专制下的民主，仅止发表看眼色行事的的意见而已。庐山会议不是这样开的吗？

再讲学理：集中是相对分散而言的，民主是相对专制、独裁而言的。分散是没有集中，与民主何干？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八百诸侯”和“土皇帝”是民主造成的吗？倒是专制文化的馀绪。专制是没有民主，与集中何干？因为民主集中制已是现实生活，是事实大前提，才能推出集中是相对于民主而言，举国无人指其非。如果按语义学反义词来说，恰恰证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于专制与独裁，是民主专政

的内部版。因为自始至终这个指导民主的集中是缺乏民主的合法性的，而只合乎专政要求，即一种既定的主张和假定。——最主要的是阶级专政的主张。

有了这个民主集中制，它可以把任何暗箱操作的结论作为指导民主的集中，然后又以民主的形式取得合法性。

有认为文革中的“九大”或官员腐败乃是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笔者认为，这是从表面上来看问题的说法。没有往深处想一点：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那点没实行民主集中制？从会期，时间地点，议题，选中委，哪点不按毛林的意志办？倒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正反映这种民主集中制轻而易举的剥夺八大中央委员们的政治权利，不开会就打倒了“八大”选出的 123 名中央委员。民主集中制的大会只是一场斗争的总结，承认其胜利。如果掌权人认为开会不利于自己，十年八年不开代表会也没有关系。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九大的召开，反正执行机构照常运转，权力机构永远为执行机构所决定，民主不就荡然无存了吗？

“九大”是暗箱操作与群众大民主相结合，大民主不也是为暗箱操作服务吗？这所有的戏不就是在“民主集中制”这套假民主的外衣下进行的吗？它是排除异己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至于个人独裁是违反集体领导的这一条。恰恰是集体领导只能实行民主制，一人投平等权利的一票才能起作用。大多数是经过内斗，权力总会以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再集中于一人。集体领导的成员乃是上一代成员的替身（接班人），他们不能公开与第一把手的分歧，而是私下商量或不商量解决，这些就是集体领导的暗箱了。

民主仅止于能减少点暗箱吗？民主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根本精神，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生活、思维方式，人们把它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看待。它尊重他人的平等权利，坦诚相见、和平协商，而不耻于专政主义打击报复、迫害歧见、双重人格、口是心非等恶德。

3、民主集中制是无法实现权力监督的制度。从巴黎公社实行直接选举、监督、撤换的议行合一的委员制以来，中经苏维埃制度的发扬光大，到我国民主集中制的畅行全国。考察它们的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是它最薄弱、最无奈的环节。列宁还想过不少办法，写过《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文章[59]，无奈什么方法也监督不了斯大林和其后苏联的腐败分子。原因在哪里？苏中两国监察制度有个共同点，就是监督只是上对下，最多是地位、权力相当的监督；实际是一种纪律检查，大官监督小官，上级检查下级的形式，只能被动、坐等群众检举、揭发于事后，而不是千百万人民及其代表和相对下级的干部自下而上的监督。由于民主集中制的信息和权力网络的唯一性，谁也无法绕过第一把手的掌心，而只能通过掌权者按集中制的处理方法，即使是事后监督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形成制度性的官官相护，把检举信交给有权的被检举人手中，能致举报人于死地；比专制时代凭私人关系互相包庇要严重得多。这就是上访多，信访忙不赢而无权处理，又不能曝光于社会，求公道于人民，闷在那里，久拖不决，能

谈得上有效监督吗？这种状况在苏中两国两党表现为一个经常性的，甚至是永久性的握着高度集中实际权力的执行机构和执行者与权力机构众多的普遍分散不讨论研究大事且无实际权责徒有其名的代表之间的矛盾，即执行权的高度集中与监督权的普遍分散的矛盾。爱因斯坦曾指出过，苏维埃集中制还没有找到它的平衡力量。它终于在这种议行合一、大权独揽、无法监督的弊端中坍塌。

一个掌权者群体即执行官员们占 60—75%席位的只吸收倾向于或忠实于他们的代表的会议会作出多少有利于会议外的广大被领导的群众的决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成员结构上的致命之处。

所有这一切，在专政主义中都可得到解释，因为这个政权是为了专政，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政，而权力制衡和监督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4、民主集中制是专制主义与专政主义联手反民主的产物。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极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仇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后，恰好找到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的专政主义；原来专制主义到民主主义进程是由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再来个否定之否定，反民主主义。就成为专制主义与专政主义联手夹击民主主义的情势。说暗渡陈仓也好，说借尸还魂也罢，反正中国的专制文化是通过反资本主义的一切进入社会而大行其道的。以致大清末年开放报禁、党禁到百年之后，人们还在为什么第 X 次思想解放，为开放言论和新闻立法而呼吁。

自由是相对禁锢而言的，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就多一点自由。自由是什么，是人的本性。一个动物，它就是要动，关起它来叫不自由，它要反抗。一个人，他就是有思想，因为人是有思维活动的动物，不让他想、他讲，他就不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许多灾难都发生在剥夺人民的自由上：知识分子没有发言的自由，就可以不讲常识、科学和理性；农民没有耕作的自由，就只有饥饿；没有市场交换的自由，就只有匮乏；没有支配私有财产的自由，就只有干部决定一切；没有迁徙的自由，就只有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私营经济的自由，就只有官营的垄断；没有参与讨论的自由，就没有学术的真理性；……一直可以写 1000 条！岂止是相对纪律而言的自由所能涵盖？把人类所有对自由的追求，都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加以专政，这是人们丧失自由的主要原因。

我们从“以俄为师”到“一边倒”，全盘接受苏式政治体制至如今，还没有从几十年教训走出苏化的阴影。谋划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英们，你们要改什么，提供这点参考。

四、利益代表论是专政主义的依据

在人类历史上，把世界未来蓝图描绘得最为令人鼓舞的大概要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了。因为他已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必然是按照他指出的社会发展方向前进。但是，现实社会又是一个丑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又是必须彻底推翻和改造的社会。无论马克思是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还是从对真理的伟大发现出发，他创造出了一个以专政来解放世人的理论。谁来担当这个扭转乾坤的重任呢？马克思找到了专政的阶级——无产者工人阶级，并赋予这个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

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60]工人阶级是社会的普遍代表，是个什么涵义呢？（1）他们在目前是真正的社会理性；（2）是社会的中心；（3）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新人。因此，工人阶级代表着整个人类。后来出现一句话，“按工人的面貌改造自己”，是它的历史注脚。

从这个地方就代表起，一百六十多年来，人类各个不同的民族、阶级、群体的利益和品格，都在这一专政救世理论里的工人阶级代表了去，成为专政主义手中扫荡障碍的王牌。

1、阶级论的利益观

利益是什么？自古至今，利益概念有许多表述：英国洛克说是人们通过劳动从自然取出来后把它拨归私有并在政府保护下的财产；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是可以感受到的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前者把利益直接指为财产，后者则着重在利益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实际感受。一般地说利益是能够满足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条件，它是通过社会生产，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一方面利益包含了客观实在的内容，一方面利益主体对它有着深切的感受与感知。因此，个体或团体的利益是不容易被他人代表的。在法治社会除非利益主体授权委托，才可以代表，否则，就像你的信被他人拆看一样，不说偷窃行为，至少也是侵权。因为这不是物质利益现象，是权利的表现。与这些提法不同的是阶级论的利益观，马克思的利益范畴的内涵是指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关系。在《神圣家族》文中，马克思使用的利益概念，是与思想、精神、道德相对立的物质利益，他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说：“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 ‘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61]他又说，“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 [62]利益的实际表现为一定经济关系中对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63]因此，马克思利益概念被融入他的阶级经济关系、剥削与占有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就只见整体阶级利益关系，不见现实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关系，那些从改善工人阶级现实眼前的利益关系出发的主张，就会被斥之为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等。他要把工人阶级全部力量集中在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的努力上，因此，阶级论的利益观是极为宏观的、历史的、长远的。人类最高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共产主义，要把人类从“奴隶分工”、“剥削制度”、“资产阶级法权形式”下解放出来，就是无产阶级终极利益的实现。这就带来一系列的利益问题上的不协调，阶级内的利益关系得不到重视与研究，造成利益关系上的极大混乱。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4]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紧扣着无产阶级最根本的、最大的利益——得到全世界。其他利益应服从于这个最高利益。这是所有利益代表论的前提。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各国、各族、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之大不相同，才会有如此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战争发生。马克思将之归为两个阶级的利益和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两大阶级利益的斗争。无产阶级

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被尊为至高无上，当然它可以压倒（从上面）、舍弃（对下面）一切枝叶的、局部或个别的、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利益可以代表一切，顺理成章、无可非议。对于敌对阶级的利益则加以无情摧毁，可以享受的物质利益，当然加以剥夺。所以思想不能离开利益，尤其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至于精神利益，道德、宗教、心理、民风、民俗等等在物质利益面前，算得了什么！从这里也可窥知在专政理论中为何把物质剥削看得重，而对剥夺人们的抽象的权利又看得那么轻的原故。理论之属于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而不属于知识分子——知产阶级的底蕴于斯可见。

阶级论的利益观，决定了下面一系列的表现。

2、利益代表论的表现

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包括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谁来代表，首先有个合理的资格问题。是那个群体，它的成员应为首选；虽非成员，平时言行有利于这个群体，为本群体成员所认同或授权，能够作为群体利益表达者，这才能代表。若赋予选举形式，就叫民选代表。代表要代表该群体的疾苦、难处，心声。各种不同群体代表开会才可以知民意，展民情。按照政治是社会各群体相互讨论协调其利益，达到高度整合，以利和平发展，而不是阶级对阶级斗争的政治，自然能使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但专政主义反是，试看它的“代表”逻辑：

（1）一个阶级可以代表许多阶级

根据唯物史观，工人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即人类最终就只有这个阶级，也就是阶级消亡后的世界成为清一色的工人的世界。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都将被消灭或淘汰。因此，这些中间阶级的长远利益就是改造为工人，所以现实的工人可以代表未来的农民。那么，谁代表现实的农民的利益？举例说，农民因干旱而无粮食吃，工人因有配给没有饿的感觉，工人能代表农民吗？代表了，就会饱人不知饿人饥。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在岗工人也是不能代表下岗工人的，因为利益不一致。这个利益就是现实的、局部的、眼前的对阶级而言是微不足道，而对当事人及群体都是温饱和活命攸关的利益。前已分析过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肯定不是一致的。所以群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公开的表达渠道是重要的，而不是到处强调利益的一致性进而代表之。简单的例子尚且如此，把整个阶级的利益全被专政的机构代表了去，必定带来了权利的丧失，阶级的不幸。

最为不幸的是中国农民阶级，为革命牺牲人数最多的是他们，为建设积累 6000 亿启动资金的是他们，生产全国人吃的粮食是他们，但没有粮食吃因而从 1959—1961 年饿死最多的也是他们。四年中非正常死亡 3754.8 万人的绝大部分是农民。理论上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实践上又谁来管了他们的死活？这是笔者久郁心中的结。公开的答复是没有的，也许有人早就有答案，却不愿说。为了探求究竟，是对是错，提出浅见以就教于读者：理论上农民利益被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利益代表论”代表了

去，实践上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管了他们的死活。可怜他们长眠在“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利益的泥土中，至今无人对此作出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总结与概括。从这种已经成了历史的沉痛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就是要面对现实，解决一个个具体的老百姓活命和改善民生的事，不能空谈什么不着边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而是要以人为本，落实到每个人。务实政治家提出“百姓的事无小事”，令人鼓舞。但如何知道百姓心中有什么事，则要建立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各群体利益由他们自己来表达吧！

2、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

既然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可以代表其他阶级，那么，国家是由这些阶级所构成，且为“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理所当然无产阶级代表国家。不仅可以代表国家，还可以代表民族。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这是我们抗大及后来学校的校歌头尾两句。我们当兵时，就有这种优越感、自豪感、代表感。这种心理体验，自认为我这一群人就是无产阶级，是一个民族的精英和未来，是民族最优秀的部分。民族总不能让其他落后的部分去代表吧。故此，部分代表了整体，优秀分子代表了全部炎黄子孙。

还有个理论支撑，即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只要阶级解放了，民族矛盾也就解决了。所以，无产阶级又可以代表其他民族，并代表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这种逻辑还可以延伸到世界，“国际苏维埃一定要实现”，还有什么不可代表的呢？

3、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人阶级是个庞大的一类人的集合，它和国家、民族一样的具有抽象性，它的利益谁来代表呢？必曰其先锋队，即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精英集团，在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中国则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的，舍党其谁？

同理，党是个庞大的组织，而且有个宝塔型的科层制的管理体系，组织利益由谁来代表呢？当然是各级干部代表各级党员，各级领导代表各级干部，全党的代表当然是中央。此时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完全吻合。层层集中了权力，层层也就代表了权利。

4、领袖可以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根据以上一连串推论下来，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代表几亿人的利益。接受几亿人的“委托”的重担，领袖自己也会产生神圣感。此时客观情势与主观感受相重合，完成了利益代表的整合功能，成为定制，成为专政的合理性的依据。于是有无直接选举无关重要，这一套就是最合乎马列和国情的办法了。有人就开始反诘，你把我的利益代表了去，是什么时候打过招呼？是党员的好说，入党宣誓时，就是自觉为党奉献一切，应无二议。民主党派也好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时，也算有约。只有平头百姓，无党无派的，谁来领导都可以的良民才是冤大头。所谓公民权利意识，就是不想当冤大头。

综上代表链条为：领袖<党（先锋队）<无产阶级<各个阶级、国家、民族。（<为利益代表符号，亦即权力集中符号）

分析一下它们的虚实关系；领袖和党是实的，阶级和国家是虚的。决定环节是在虚实之间，党如何代表阶级？又怎么能代表阶级？2008 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发表一篇金雁先生写的《一月巨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给笔者的震撼是空前的；同时也就对这两个大问题给予了回答。文章讲的是，震撼世界的 1918 年 1 月 5 日，即十月革命后两个月，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组织当时众望所归无人反对的“立宪会议”选举，在 707 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只得到 175 个席位，占 24.7%，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 40 席，也只占 30%议席。胜出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仅主流派就占 370 席，超过半数。列宁不是接受这个全俄各族各阶级人民在反沙皇专制的 2 月革命后的积极成果——召开立宪会议并选出了代表，和平民主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是凭赤卫队武力镇压他党当选的代表。在 11 月 28 日就对立宪民主党抗议示威开始了镇压，并调集忠于布党的军队进入首都，实行戒严，驱散开会的议员。1 月 5 日，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左派（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数万人参加游行。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杀手们从埋伏的暗处开枪射杀，并从工人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践踏它们……。当时左派名作家高尔基，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了《1 月 9 日与 1 月 5 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党的暴行。他把当天惨案比之为 1905 年 1 月 9 日沙皇屠杀和平请愿的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即民主宪政）。正是这次反宪政民主的大屠杀，直接导致苏俄的内战。[65]

布尔什维克党怎样代表工人阶级？用来复枪发言来代表！说明：阶级是抽象的，任何党、派、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旗帜去分裂工人队伍。阶级是不可能由一个党来代表的。只有血腥的、极权的武装党才自称是能代表。枪杆子里政权都能出，还不能出利益代表吗？

利益代表论不过是苏维埃政权和学习苏维埃的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已，说白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反宪政民主的斗争。它不仅不能代表阶级，国家、民族更代表不了。要完成一套民主授权程序，才可以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代表起来。愿真正的民选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早日出现，结束“利益代表论”的代表时代。

五、党主政治是专政主义的历史沉淀

在过去 100 年的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中，出现一种政治现象，即有一些国家是由一个党作主的政治制度。它脱胎于君主制，却又不是民主制，带有新旧政体在一个社会中斗争的特征。它们不是由政党自由竞选用选票得来的政权，而是一个武装起来的行动党，从敌人（殖民帝国主义或专制主义）手中夺取的即“枪杆子里出的”政权。党

在形成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军事性，有了政权以后所建立的国家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即使在夺取政权时的友党，其后也无足轻重，以至不能形成外部平衡与监督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由一个党作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有称之为“党治制”，八九十年代中国宪法学界称之为“党主制”。这种党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党主权不受法律制约，等于没有立宪前的君王。如同上述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对本阶级群众的镇压所表示的历史意义——政党脱离了阶级，成为少数人以阶级之名行独立主权之实，全国无可制约。它实质是对阶级、对国家、对人民的篡夺。由此，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统治 74 年的专政历史及其败亡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党主政治是专制主义君主制向民主主义的民主制转型的特殊形式。中国国共两党都长期实行党主制，表现在都有国家的宪法，都不曾把宪法的民主精神当回事。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人民来做皇帝，千万万人来做皇帝”。1924 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它的民权指向也是非常清楚的。

国民党的党主制是由1928年宁汉合流蒋介石主政南京后，国家制定了《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此为国民党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正式开始。共产党的党主制则是在宪法中加“领导”二字即告成功。蒋介石在临终前才悔悟：“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实行一党专政！”[66]到他第二代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党禁，部分实行了“宪政”，结束了训政时期的党主制。国民党经过 60 年总算履行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诺言，于 1989 年实行总统大选，还政于民。由党主之政变为民主之政，政党可以在野，亦可执政，全凭选民投神圣一票，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这说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念和从训政到宪政的制度设计并不支持一党专政的恒久性。而马克思主义的专政主义、阶级利益代表性、民主集中制等却从理念、体制和组织体系全面支持一党专政的恒久性。这是一个从理论意识形态到组织构建完全统一了的制度形态。从它主观意愿和实践都证明它对政权要一包到底，大有不达共产主义誓不罢休之势。这是不以人们包括它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庞大而深厚的存在。不管人们高兴不高兴，这个政治就是党主政治。它的政治改革的基础在此。党主制是现实，更是历史的沉淀。只能深入地了解它的各个方面，才有可能促进它审时度势，从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1、民主政党与党主制政党的异同

从 17—19 世纪英、美、法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实行政党政治。国家设有议会，它的中心作用就是为国立法，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政党讨论国是的平台。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各政党各抒政见，通过选举，组成政府。这些党也可叫做议政党，是动口不动手的“文斗党”，它产生的条件有四：

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有力量足以组织政党向专制统治者争统治权，

并实行它的阶级统治；②新教精神、独立主体、自由竞争、权利平等，使各党派彼此间有协商、妥协，达成和而不同的政治局面的可能；③有启蒙思想家提供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社会普遍理解与接受作为它的政治思想环境；④有法治秩序的传统。所以这些政党不担心它被对立党所消灭，而只有在选举上的胜出与失败。它不需要武装来保卫它的发言权。成者并不为王，而是为选民服务；败者也不为寇，也不担心被软禁或保护、监视居住、坐牢、杀头一套专政暴力手段的摧残。这种政党政治是人类 700 年来争取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成果，来之亦不易，也是政治文明逐步脱离野蛮的表现。因之，它合乎共生理性的选择。

政党政治产生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表达的客观要求，是会场而不是战场决定的政治。政党本身就代表异见，也可说政党它产生于异见。政党所具备的民主品质，主要一点就是容得异见，听得进反对的声音，这样才有多党政治的可能。所以，这种政党尊重成员选择的自由，国家领导人和代表选民议政的议员也由选票决定，个人可以改变党属，权在选民而不在党。

党主制政党产生于对敌斗争的革命时期，它是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它的理想社会而建立的党，所以它就具备以下特点而区别于议政党。

①它在组织上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集权党，它一分散，不听指挥就会被消灭或瓦解。

②它在理论上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党，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它在理论上的正确性，理论上的变化与创新，是为此服务的。

③它在性质上是个行动的党，武装的党。党的目的决不能模糊，意志上更不能动摇。每个党员是终身为之奋斗的，并且是矢志不移的。它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犯多大的错误，也要保有政权，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大保证是“党指挥枪”，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属于国家之论，简直是天方夜谭！

④它在“阶级道德”上尊崇党的纯洁性，讲阶级的爱，不相信人类普遍的爱与博爱。特别恨叛徒，人一生只能有一次的政治选择，入了党就终身服膺不二。像今天的党内反思人士、自由派、民主派、异见人士等非主流派是无地位的。

⑤由武装夺取政权的专政党，是不可能与其他党分享政权、轮替政权的。它不可能把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从党的逻辑上说，那样便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因为千百万人头落地才夺得的政权，只有野心家或敌人才觊觎这个政权。

由此从两种不同背景产生出的两种政党，虽然名称上都是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所以同样都是在说民主，而两类党的民主也是不同的。专政主义所要发扬的民主，是有别于民主主义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含义是什么？是有利于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集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个民主是把毛泽东的六项标准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全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那么什么又是社会主义呢？全世界讲社会主义，并以之立国、建国的就有 70 多种，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直至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它们的民主当

然不可能有统一合理的解释，只得先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最具中国特色的解释是邓小平作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他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干也是社会主义。”[67]一语道破天机，社会主义是为共产党的存在服务的。强大的舆论机器在党手里，当然怎么干也都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以保证合法性。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便是党主政治的民主涵义。无论是毛泽东的穷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同时期不同形式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民主都是为党专政服务的。至今，尚未明文解释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大概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能理解为党领导下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才合乎党说什么是什么的逻辑。

另一个很大不同的是法治与人治的不同。

民主政治是在原有法治基础上废弃了封建的或专制的特权所订立的民主宪法和法律，所有政党行为要依法而行，故多党制并行不悖。而专政党的法是以前没有的，靠革命夺取政权后自己来创造。它可以不要法，只要书本上马列思想和当时当政者所发的号令与政策精神。一篇“宣言”，一本“语录”都是可以治天下的。

专政党它不能形成法治规范，难以建成法治社会的道理在于党本身的结构是人治系统。试析其详：党的各代成员是经过上一代党员灌输马列、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而介绍下一代党员入党的。代际间有着师承关系；同一批的有师兄弟关系；上了战场的有生死战友关系；老的要任命新的，授权给后辈。有了职务，提拔之恩，又是恩师与门生关系；有了命令与服从，形成上下级，就具有类似于君臣，主仆关系（首长和勤务员的关系）。如果两辈人之间年龄悬殊，则是子侄关系，甚至是再生父母的关系。这个革命大家庭与中国宗法社会的爷爷统治与专制社会皇帝统治的结构近似，它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分层分级、听命于人的结构。怎么能让它去倡行法治呢？如从第一批发展的党员至今，一年一批就有六七十代。这个庞大规模的党的党员，从几十个人到现在已达 7000 万人，它靠什么维系？战争时期靠阶级觉悟和军事纪律；掌权时期靠利益。当官在中国就是风险和付出最小、收益最大的一行。当官必须入党，以保证是自己人。党政明的是两套组织系统，实际是一套以人的认识、意志、感情为转移的人治系统网。这种党的人治结构成为中国特色国情之一，它大大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建立。党并不太按章法办事，而是按人治系统的党情、党性办事。党比国大，政法委比公检法那家都大，怎能独立依法办事。事无巨细，多是按领导意图和高层领导圈阅、批条、指示办事。

以人治系统求依法治国，其难度之大，出乎想象。有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政令难出中南海”。为政者一定比民间百姓更有体会，不用饶舌。

2、“党主制”概念的由来及其分析意义

自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两国主政以来，党领导一切，党主政治，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不仅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法律、法规

上的规范，更是几十年的政治现实。但用党治制或党主制概念来概括都是两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70 年代，苏联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有《党治制的由来》，历述苏共消灭异党及内部的斗争，实行一党统治的经过。这个名称没有本世纪中国宪法学界提出的“党主立宪”中党主制有主权地位来得确切。一般治法上讲法治、人治、党治；在主权主体上讲君主、民主、党主，而且“党主制”也毫无褒贬之意，不象党独裁、党专制刺耳、不友好。对应历史上的君主制和未来必须走的民主制，党主制作为历史事实、沉淀，是客观存在。主权既不归君，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的时代可算得归君，他不是君王，胜似君王。也不归民，归民尚早，据说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中国选民素质不够”；开放言论自由，“嘴无遮拦”影响稳定团结。开放报禁更是有违马列毛祖制，祖制要求是舆论一律，绝无杂音，噪音。开放党禁，更是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条，民主从未有时间表和路线图。所以，在君主制到民主制之间，有个党主制时期是可理解的。党在领导着国家、政府、军队，也有为民、亲民、爱民的时候和人物的精彩表现，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这是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绩是巨大的，经济腾飞，中华振兴，世人共睹。研究党主政治、党主制是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若干认识前提的。

先说“党主制”概念的由来，1986 年 12 月，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刘大生提出受君主立宪启发而产生的“党主立宪”的概念，并在上海《社会科学》1989 年第 7 期著文：《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明确了这个概念。并界定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权时为直接党主制；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极端党主制”；党组织不直接向国家机关发号施令（意指只领导）称为“间接党主制”，并指出，现在只能是“党主时代。”[68]刘大年通过 20 年的“党主立宪六论”结论是：“党主立宪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妥协和合作的最合适的法律形式”。它的“灵魂即在于‘法定党权’”，他与许多诘难者，讨论的结果是“这个类似政策建议是一种非必由而是可由之路。”[69]

提出这个“党主立宪”，对于认识党群关系和党政关系具有实质性意义。党首先与群是合作和妥协的双方，而不一定是一方。党是掌权的一方，群是广大的利益群体的被统治、被管理的一方。党主制，就是党要群怎样便怎样。也从法学理论证明党≠群，即非民，是民的转化和异化，化为另一个利益主体，它因获得权力而成为官，可见二者利益差别的深刻性，让法学界得设法限制它的权限。历史上去了一个君，又来了一个类君。它为什么就不能意识到它的权力是来自于历史和自己定的法，而不一定是来自人民现实的选择，这权力不是太固化了一点么？整个党是先进的人们所组成，吃是全国纳税人的粮，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三公（公款吃喝、公车、公费旅游）及浪费每年达 9000 亿之多。机构重叠痈肿，别国人只养政府一套机构，中国人要养党政工团（包括民主党派）四套班子。18 人养一个干部，还要发生贪污腐败。所谓立宪，就在于要限权、反对特权，是民主化的一部分，今天的领导党竟然要被领导的群众来要求限权，

不也太可悲了么？

再也反映党政关系，政在党下，党政不分，且不说是阶级组织，阶级而今不是说没有了，不说了吗？它只是一部分国民。政是全国人民的名正言顺的管理机关，政——众人之事，党——阶级之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在政上都是专政主义的历史沉淀，有它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不能承认其永恒合法性。这是“党主立宪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这点限权之议，根据党主制固有规律性也难以实现。

3、党主政治的利弊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几十年来，都一句话，党主沉浮。国家如此，民族如此，个人命运亦如此。所以写这个标题感触很深。党有 90 岁，一波三折，一波是掀起了革命之波，三折是三个 30 年，伟大而苍凉，悲壮而瑰丽，但也扑朔迷离，难窥全豹。第一个 30 年，壮怀激烈，多难兴邦，艰苦卓绝，举世无双，胜日本，建中华，如日东升。第二个 30 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作孽，不可活”。第三个 30 年，改革开放，救了社会主义，也救了自己。第三个 30 年，又经历了三代，代有所进。从对外开放到与国际接轨，改革也从经济进到政治，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已使富人达到世界级水平；次第开展立法、讲法；提科学发展观以结束第二个 30 年之荒唐不科学时代。讲和谐以巩固不讲阶级斗争的成果，讲人本以安天下，讲为民执政以固政权。在四川大地震面前，它已从 30 年前制造灾难的党，变为抗灾救难的党。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有 7000 万党员的大党，是个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可以说它存在的本身就是 90 年来的巨大成果，它包括了炎黄大部分优秀子孙。

另一方面，党史扑朔迷离之处甚多。90 岁的党，生于何年何处，都未弄清楚，党史何堪？试举其实：在全党共识认定 1921 年 7 月 1 日党生日的前一年——1920 年，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国际代表）等 8 人在上海渔阳里 2 号建立了党，维经斯基写给苏联的工作汇报称党已建立，以陈为总书记，领导成员 5 人，他自己算一个，明确了纲领和党章，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次年的一大（13 个代表参加）是渔阳里二号安排的一个活动。[70]就连自己的生辰也是糊涂账，看来党史学家需加努力，才能把真正的党史弄清。问题是有些人总想把历史真相弄得糊涂一点，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保持那点沙滩上建立的荣誉大厦。如果生年定在事实上的 1920 年，岂不是陈独秀占了建党的头功？因此要破除迷雾，深入解密，党史资料如同一个大油田，抽出来都是原油，可能提供人民以极大的能量与智慧，去面对未来。

毋庸讳言，党正因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而面临新的挑战和历史选择：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去专百姓的政而存在，还是作为有思想，有创造力，具有时代精神的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和平发展服务的、对内民主、对外友好的党而存在？显然是 7000 万党员，尤其是党的精英与领袖需要思索的问题。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对帝修反，今后则是如何对待人民和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咱们全是吃“民”粮的干部。

要专政主义，还是要民主主义，这是党主制的可选的两条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

实质是党主制的改革。党不改，光改民，决无前途。通过对党主制的利弊分析，创新思想就是取其利，去其弊，从大的体制上观念上着眼，从百姓具体权利和福利的改进上着手，也许能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道路。

总的说，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物质充沛，精神文明五条为利，反之为弊。利是什么？利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①党主政治使中国从一盘散沙状态，通过全社会抗日救亡，实施全面组织化，建党、建军、建国，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开放前），成为亚洲甚至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开放后）。

②通过战争的锻炼，中国人从自卑到自尊、自豪，是在战场上打出的勇气和尊严，使任何强大的侵略者不敢小视，以中国特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③能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如自制核弹火箭，登月计划，这次汶川大地震，更足以说明全党全军统一部署，步调一致的优越性。

④高度组织纪律性，对贯彻政令、改革、建设是有利无弊的。

害是什么？害是不讲民主与法治。

①目标、决策错误，全盘都错，浪费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体制上无防错，知错，说错，纠错机制，一错就得错到不可收拾。党内没有，党外更没有。原因很简单，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话，毛泽东拾来反其意而用之。“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71]党外不能有党，党内不能有派，近观对党大有利，远看对党大不利。“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不亡也得腐败变质，实际上所谓亡党，本质上是亡权，这个权本来就是属于选民的。

当政治上把目标锁定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经济上实行穷过渡，公有制的全面计划经济，文化上消除多元文化，就造成 30 年的灾难性后果。

②与世界民主政治潮流格格不入，与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距不小，对西方民主视若洪水猛兽，实际反映它不能在百姓面前放弃官本位，党特权。怎能与民平起平坐呢？革命不是白革了？

③上面不说，下面不能说。最上面不动，全国不能动，社会自组织和能力很差，公民社会自律性，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的公平性都不彰显，缺乏主动性与创新性等等。

④党是个封闭系统，家丑决不能外扬，控制舆论以求做到这一点。诸事不能公开透明，特别是对信息的自由传播，尤为脑火。

⑤可以毫不困难地制造假象，以假乱真，结果能做到无是非，无对错，唯权力是从。法律被挤到次要地位，极度地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依存关系，而无法律的保障。

利弊相权，弊大于利，所以现在亟谋兴利除弊，如提高党员素质，加强执政能力，以人本悦民心，以民本保政权，相信可以建设一个大公无私的圣贤党，完成复兴民族，光耀中华的大业。但很少能从专政主义的根本体制来看待这一切。

4、党主制的未来选择

为无产阶级专政主义服务而存在的党主制在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何去何从，中国不像苏东国家连选择的时间都没有就亡了党。苏联亡党的教训不是别的；是苏共坚持一党专政造成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政治法律、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结果。这是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总结。（见《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2009 年 11 月 24 日所发专访久加诺夫的网文）

一个以无产阶级之名垄断国家权力和社会一切资源的专政集团，不客气地说，是个比资产阶级还更为偏私的集团。资本主义的私有是有边界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私有化是无边无际的。危险在于把全国人民的资源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名先变为公，然后在权力催化剂作用下化为私，就是不饱私囊也是拥有使用权的，与无产阶级无关。专政机器不是对官商阶层，倒是成了官商手中的机器。发展成果不与人民适当共享，加上政治权利又无保障，二者相加，党主制便会变成了专无产阶级政的政党。经过这一演变，倒成了保护“大款”的党了。它就背离了立党的原意，必然遭受广大党员的反对，那时就没有选择的时间和机会了。

虽然如此，对于中国党来说，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选择的时间游刃有余，也就是改革主动权在党而不在民。此时，总结 60 年来主政经验，因而能对未来作出理性明智的选择，乃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第一种选择是“改”字当头的选择。以民主宪政为目标，走人类政治文明共同的发展道路，改掉苏式体制，接受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促进各国各族各阶级阶层的人人平等和谐共生。彻底放弃专政主义，平反因专政错误的冤假错案。首先是学宪法、用宪法，普法先普宪。宪法是民主之基，党从国的上面走到人民这个平面上来，首长与公民在宪法面前平等。宪法规定的党领导要用制度保证它不误导，误导决不是领导，所以全国人民都有发言权，是谁不让人发言，脑子里就有专政主义在作怪，只有专政主义在党内得到肃清，社会上的侵权行为才不致发生。有百姓护权，领袖好当，大家不说话的主席是很难当的。

对于过去专政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只须表明切割的立场，解密工作跟上，泰山压不了顶。一届领导负一届的历史责任，不需要背负爷爷、伯爷甩下来的包袱。民主政治是面对现实选民利益与意愿的政治，只有专制专政政治才是祖训如何，庭训如何，意图如何，看爷爷眼色行事的政治。但这一种选择需要非常之人，有大智慧，成非常之功。稍为因循苟且一点，即丧失时机。对于广大党员，他们有着和群众一样的民主诉求，尤其处于弱势而无告者，更觉其冤。因为他们已经尽到了义务，却不知权利在何处。

第二种选择是“和”字当头的选择。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平、和睦、和谐、少事。也算新“三和一少”。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和内定机制是上一代掌权人们的人事关系折冲制约、保持平衡决定的。伯乐不能得罪，“叔”乐也不可能都得罪。那个富得流油、财大气粗的不能得罪（这是政权的后台，原来有权，现在又有权又有钱

的），那些穷哥儿玩命的也不能小看。贪污受贿上面保了不能得罪，双规呆在里面的也不可能都得罪。这种选择，新儒家十分热衷，他们把过去的不幸、失误统统归之为没有尊崇孔子的教训，使民族道德沦丧。治国之方，全可从“论语”、“孟子”中找到。于是乞灵于忠孝之道、君君臣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上下相蒙，决不认错，笑错不笑骗！以维护既定统治秩序，受到强势群体普遍热烈的拥护。这种选择，只苦了多数怕得罪掌权者的百姓，他们眼巴巴的望着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分享一点大款挥霍的零头钱，这样为“富人”作主的党，很适合中产以上升官发财心理，太平盛世，万年长。

第三种选择是“拖”字当头的选择。拖字是不作为，反正一届 5 年，顶多十年。比下届可能不足，比上届则政绩多多。为党为官之道，谨遵祖训，听话就行，士农工商，百行之首，旱涝保收。如果这种态度比慈禧还不作为，即最后还是得立宪，允许民间办报、结社，恐怕是把矛盾愈积愈多，则其后继人越艰难，而且党内改革派人士也不会让它长期拖下去。

第四种选择是“保”字当头的选择。保是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有提改革者，则以保守态度待之。保党主制，保它的一规一矩，一字一句，一草一木。这种保很容易与爱党、爱国、爱民族、爱集体的感情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排斥改革的保守情绪，厌恶理性的声音。怕动、怕变、怕改。这样的人一多，改革就到此为止了。本来，中国的政改除废除了领导终身制改为任期制这些见实效外，至今无大作为，就是有一批明改实保的人。改革只改到先富起来的人富了，完成了权力向财富的转型，反转过来，巨富支持权力，权力支持巨富特权——不申报财产，变公产为私财，变内资为外资，再投资于内，享受优惠。公盗逍遥海外，掠夺耀于国中。国何堪！民何堪！

第五种是“抗”字当头的选择。抗是抵抗世界人权民主潮流，仍然坚持专政主义的一党专政思想与作风。对爱国爱党出于长久之计，建议言事者，不仅不予倾听，还要敌眼相看，视为异己敌对份子，继续挥动 30 年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棒，封杀其言论，诬陷其个人，让文革死灰复燃，以保卫专政体制。堕党于不义、不信，最后毁掉党的，就会是这些人。

这五种选择，是从党主政治这点出发的，有这五种可能和思想。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这本属在党同志研究领域，未可多言。但共生论主张是党群共生、官民共生，故亦有涉。专政难以共生，民主才能共生，并不因党内党外而有所不同，这也是历史。

在结束本节之时，如释重负，灵魂或可得救。本节立意与行文，是对第三章第二节“意识形态灾难”的探源性回答，以此作一柱心香，郑重吊祭世上由专政主义所残害的 7481 万 1689 个亡灵。为了今天与明天人类的共生，不能忘记昨天的惨与痛。我们这一代曾是从血泊中淌过来的。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为我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我向历史作出以上不太准确但于心无愧的坦陈，祈请为人类和谐共生奋斗的人

们多所指正。

第六节　报复主义

在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中，有一种极为普遍，众人并不认为是错，可能把每个人都卷进去的、出于人的自卫本能和集体复仇，酿成争斗各方难解难分的属于恶性互动行为键的心结和信念所形成的主义，这就是本节所要叙述的报复主义。与强势进攻型的主义，如教权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专政主义不同，而与民族国家主义类似，既有现实存在意义的一面，又有阻碍共生的一面。有时，它成为共生圈的存在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它的正反面作用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报复行为源于报复心理，报复心理源于有杀戮、伤害、侵占、污辱、剥夺、欺诈、欺骗等等对人不利的行为发生。人人都能体会到报复是对一定侵害行为的强烈反应而作出的行为，但名为主义则是法学中的专门名词（revengism）。它是一种刑法理念，指起源于人性复仇本能；以命抵命，以伤抵伤的同态复仇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所以报复主义刑法是有刑法史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刑法。无论是古代镇压主义的刑法（直接复仇）、近代工具主义刑法（注重社会惩罚）、还是当代的“敌人刑法”（把罪犯当敌人整）都是法理上报复主义的表现。法律是人的社会行为的底线，它决定着人们对行为的选择。报复主义可以成为刑法学的主流观念，那么社会上的报复行为就是在底线以上，合法而不理亏的事了。而且个人复仇本能常为国家利用，国家的权威本能（统治者的利益驱使行为的本能）更易增加新的复仇性。报复主义在解决犯罪问题（包括暴力、恐怖）时又酝酿着新的犯罪，反恐战争就存在着这种类型的报复。这是共生论观察报复主义的视角。本节就不完全拘泥于法学概念，进而将报复理解为涵义更宽泛的各类各层次的报复现象，而将支持这些现象的理念观点归之为报复主义，它包括一切助长复仇、报应、惩罚等等理论与实践。

报复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有人类之初，当原始人在群体内外互动时，有合作的欢乐的正面互动，当然也就有排斥、争夺、伤害的不愉快的负面互动。只要一方受损，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应激反应，促成报复心理。古代人很容易把存在于人类的现象反映到神界观念中，复仇女神就是最早神话中的报复主义典型。传说她是被杀害者的幽灵，也是诅咒的化身。她代表的是人间的不平与怨恨。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指出女神是 3 个人，后世称她们为阿拉克托（愤怒不止者）、提西福涅（谋杀的报复者）和麦格拉（嫉妒者）。这三种行为表现和心理，正好说明报复主义者的三个特征。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是要把复仇对象加以消灭，虽然有的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怀有强烈的嫉妒心也可以形成报复。人们向仇家报复，向胜于己者报复，向秩序报复，向社会报复，世界就在无止无休的报复中循环地动乱不已。

报复主义最普遍的形式是同态复仇。它是最早期古文明国巴比伦法律所遵循并发展的一项原则，即犯罪人应当受到和他施加给受害人完全相同的伤害或损失来作为惩罚。早期社会都原原本本地应用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古代巴勒斯坦，

伤害、致残和盗窃都被认为是私刑，不由国家来惩治，由双方自己去解决。巴勒斯坦圣者曾制订一项法律：即受害人不能向使他失去一只眼睛的加害人讨还一只眼睛，但可以索取和他眼睛相等的价值。这样，远古以来的同态复仇就可以用赔偿同等价值来补偿，在解决报复主义问题上走出了第一步。以此类推，自己已被废了一只手，还要废他人一只手何益，徒致更多的残废。由此野蛮方法改进为文明方法。无论如何，受伤害的一方总是有要求补偿的权利，这是报复行为能转化的一面。但一提高到报复主义，也就是报复第一，一切为了报复，那就是添乱了。

初期报复属于个体对个体，私仇私了阶段，就像动物相互撕咬一样，到了有组织权力的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复仇不是由当事人而是由他人掌握，部落首领、宗教长老、巫师等人用神权、神意、巫术等执行复仇的职能。最后，对犯罪复仇成为国家一项专属权。法律机构发达后，生杀之权被国家要走，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了。复仇权被统一于国家名下，原来对个体的侵犯，现在提高到对公众、国家的侵犯。刑罚因而愈加严酷，如凌迟、车裂、株连，个人惩罚决不及此。另一方面，惩罚犯罪更具有合理性，支持者增多，双方对抗性手段也相应增强。国家接过报复主义的权力，成为国家刑法权威的权力依据。因此，它的第一任务就是确保国家的威严，只有国家的权威性，才能保证国家内部的杀人，伤害，侵犯事件的抑制与减少，而对于外国外族的损害和侵略，国家便成为报复主体，从经贸方面的报复也能发展到国与国的战争，直至世界大战的规模。

报复主义阻碍人类共生，表现出极为明显的特点：

1、报复主义的普遍性。出于人类动物性本能，攻击性与报复性几乎是同时存在，只要有利害冲突，首先是争夺食物和异性的冲突。有出手的就有还手的；有吃亏的就有报复的。不管男女老少，各地域、各国、各族、各宗教、各群体、各行业、各职业、各种身份的人，除了笃信不报复的教义者外，没有几个人能不因侵害而不存报复之心的。人的应激本能在遭受侵害以后转变为一种报复和复仇的欲望，要以更大的力量张扬应激本能，证明自我的存在。甚至在小孩们游戏中被打，能以更大的力量还击时，他就会心满意足；反之，他会不满、自卑、悻悻然潜伏着报复。“从本质上说，生命本身就是要对妨碍和束缚它的东西进行报复——永远的报复，”[72]人际关系是如此。

组织与组织、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矛盾，也有积怨与报复的存在。宗教之间、教派之间、民族之间、政党之间，更是因历史归帐，新仇凭添，报复主义非常普遍。

因为人们并不认为报复主义有什么不对，所以恐怖组织总是明言，这次恐怖袭击是对×军××行动的报复，而一些国家、政府、军方也公开称采取××报复行动。

巴以之间，法塔赫哈马斯之间三方讲得最多的词汇就是报复，小孩们扔石头与火箭弹攻击，都是在报复。报复主义弥漫的地方是永远也得不到和平的。

现今的世界，一边是“我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倡导着人类的爱，让世界充满爱；一边是报复、再报复；复仇、再复仇。多么的不协调！大至恐怖，小至斗殴，

报复主义情绪充盈人间。报复主义作品更充斥在戏剧、小说、影视中，旧式演义、新派武侠小说都不遗余力的宣扬报仇雪恨，不断将暴力、残害、狡诈升级，以获得报复快感，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2、报复主义的纠缠性。我们前面几节，善恶对错比较明显，只有报复主义是有理中的无理，无理中的有理，相互纠缠，难解难分。为什么？冲突开始时，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伤害，总是一种伤害。事情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能够诉诸法庭审判，分清是否故意，明辨是非与赔偿；而是伤害与反伤害的自卫，报复与反报复的酝酿，最后发生严重的报复行为，难以收拾。其次，受伤害者的迁怒现象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即我报复不了你本人，转而报复到家属亲人及其老弱妇幼。在这里报复不了你，我到另个地方报复你。在报复对象、报复的时空、报复的内容，都是不确定的，形成一种弥漫性。人们心理充斥着报复，就成为人们心灵的弥漫型的溃疡，不到敌我双亡，永不停歇。就单一报复行为，可以发展成为一系列报复链，不断拓展、延伸。一次报复与反报复就是一环，一环套一环，这种连环性交错在一起，也是纠缠性的表现。巴以冲突史可以分析出其中有多种纠缠存在，所以尽快尽早解开其中任何一环，对解决总体纠缠都是有意义的。

解决纠缠，切忌快刀斩乱麻，一刀斩下去，所有线与头都得翻一番，头绪更多，只能是“耐心理乱麻”，不抱报复心理去理，即使是共生理性的耐心，也不一定能理得清。只有冲突两方、影响冲突的多方，都有共生理性，一齐来理，才能理清头绪。

报复主义的纠缠性表现在婚姻家庭领域尤为突出，民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指家务事中的矛盾的纠缠性，“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表明矛盾发展中双方都有恶性互动的过程，当事情搅和成一团乱麻的程度，大家对之束手无策，只能任其发展，酿成悲剧。还有自卫过当与报复主义的纠缠，不过当自卫不了，又当如何？这又给“矫枉必须过正”以空间。实行矫枉过正又造成新的仇恨与报复主义。

3、报复主义的恒久性。报复主义不是搞一阵就罢休了的事，而且贯穿在人类的生活之中。中国民间古训有鼓励报复主义的“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说。历史上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灭吴国，更是经典的复仇故事。岳飞“满江红”鼓舞了多少民族志士，与外族，强敌抗争。但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说明民族恨之深，复仇心之切，代代相传。并无人对其返祖性凶残性有所质疑。仇恨超过了一切，历史上的百年战争有波希、英法、奥土，战争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报复的惨剧。基督教的十字军东侵，穆斯林仍然牢记于心，种下的仇恨种子，一千多年，仍未消释。

4、报复主义的严重性。面对全球化趋势，21 世纪人类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要求人类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应对贫穷、环境、资源、冲突等一系列危机。此时最需要全球各国、各民族、各宗教联合起来，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而报复主义却在各个层次，不同时空中摧毁着人类合作的基础，为人类理性共生与感情博爱时时处处设

置障碍。哪里有报复主义，哪里就难以有和平与发展，共生与和谐。

几乎可以在现实世界轻而易举地找到报复主义对地区冲突、国际、国内的纷争后面的支持例证。当国家元首级的人物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要对某国、某组织实行报复时，国际局势能不紧张吗？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如果也渗入报复主义因素时，那它的决议，制裁等等强制性措施也是会受到质疑的。

归根到底，报复主义的严重性在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开支持它的合理性。他们毫不讳言，要报复，准备报复。恐怖主义如此，反恐怖方面也如此；反政府武装如此，政府同样如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象都是天经地义的。按报复主义的原则办事，是历史，但是应该说，是可以改变的历史。尽管困难重重，世界仍然是利益冲突多样化、思想观念复杂化的世界，在研究人们互动关系中，真正的妨碍交流、合作、妥协、和平的报复主义应列为重点，而消减报复主义是建立共生理性的极为艰难的一面。

报复主义植根于人的本能与国家权力本性，本来它是对恶的惩罚，因为“以恶制恶”原则的实施，以道德正义的名义对侵害行为施以惩罚，但在制止恶的手段上是“以暴易暴”，发展了暴力，自己在升级的过程中破坏了“给予——回报”相互对等的原则，它就成了报复的对象。这就是冤冤相报，无止无休的最初启动，经过放大与扩散，人们已经很难摆脱报复主义的恶性循环。

对于其他妨碍人类共生的主义，人们或者经历过血的代价，或者已经提高了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如种族主义，专制主义，专政主义，但是报复主义并没有论者展开批判，因为它与每个人都是关联着的，有损其利益者都要报复。宗教家虽然不主张报复，但身体力行者也是少数。就连孔子也只能说“以直报怨”。佛陀能否以德报怨也是问题，世人又能如何呢？

共生论也企图缓解这一难题。它大可至国际冲突和战争，小可到一家一户，朋友、邻里。首先是倡导不行报复主义。本节举出以上报复主义的特点，明其利害，供世人参考，要以人类未来儿孙为重，以前辈和自己这代恩怨情仇为轻，捐弃前嫌积怨，为普世的博爱扫除思想与心理障碍。人类以往的历史上那些非共生的主义已经给人类划下了无数的伤痕和痛苦的记忆，叙说批判它是为了从制度上、观念上使人们醒悟过来，并不是为了报复。人是历史的产几，包括那些伟大人物也是非共生制度（各种游戏规则）的囚徒，即“无处不在枷锁中”，（卢梭语）才像从前那样地你死我活的斗。共生理性也许能为减弱一点报复主义这个自古皆然、而今尤甚的势头，认而开启大家敞开心扉地对待彼此，不使仇恨升级，促进人间互谅、互爱。

当下报复主义还在盛行于世界。直至刑事立法者头脑里还残留着报复主义而不觉察，法理上从卢梭的刑法是“惩罚与不服从的关系”到把刑法视为国家性公法，严格把构成要件机械化、客观化，强调刑法报应性的依据性地位，把罪犯当敌人，“不知法亦不赦”。“以恶对恶”完成否定之否定的“报复正义”。不问为什么，只看是什么——

犯罪是一种纯粹的“恶”。它的逻辑是，“因为有恶发生，所以施恶对应”。在目前认识还处在“刑罪均衡”的“报应论”阶段。大部分国家因为要维护国家权威，还没有摆脱这种报复主义的法制观的条件下，也只能是社会、宗教、学界[73] 理性地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求得到一种理性与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课题，并加以探讨，寻求解开循环报复的症结。

在这个领域里，经过了 300 年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在启蒙思想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刑法学中清除报复主义残余，推进人道主义法律观，以彻底保障人权的地位。如果不在法律底线上否定报复主义，那国家秉持这种“报应论”对罪犯实施报复，走向人类社会废止死刑就更遥遥无期了。

死刑可废，将对消减报复主义有重大促进作用。一方面它对罪犯更多的是问：“为什么”？它不致因客观原因促成的犯罪的帐全记在犯罪人的主观故意上，过多地强调主体“恶”的完全自由意志。实际上死刑问题也是个社会制度、客观情势与个人行为的纠缠问题。其所以叫人死与同态复仇，与报应论都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本节要把报复主义与其他影响特大的主义并列为妨碍人类共生的主义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助燃剂、扩展点、起爆器。从利益冲突角度看它是助燃剂，让火气更大；从交互仇恨的链条上看是扩展点；从复仇心理到复仇行为的临界点看，它是起爆器。

通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共生之路上，报复主义始终是障碍物，深沟与高墙，它阻隔家、国、族、教、阶级等群体之间的心灵沟通、感情交流、互助合作、和谐共生。

共生论理解报复心理，因为当事人受了伤害，但不赞成报复主义和报复行为，因为它会成为更多伤害的起点。冤冤相报何时了，雪恨复仇哪是尽头？如同对暴力和恐怖一样，共生论的态度是“抗暴而不施暴”缩小矛盾，“自卫而不过当”，利于和解。报复的反面是宽恕，它是人类的美德。如果说，拥有物质资源的人能做一个慈善家，广济众人；那无物质资源的人也能做慈善家，那就是多积宽恕的美德，是精神层面上的慈善家。人类太需要宽恕，因为人类的积仇积怨实在是太多太深了。少一点报复，多一点宽恕，这便是结论。

当本书写到第四章将结束时，迎来 29 届世界奥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举世同欢的节日，也是人类健康与智慧的光芒四射的日子。各大国元首聚集京华，新世纪和平发展的伟大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可以提高到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去认识，也不为过。而笔者写的却是妨碍人类共生不健康、不智慧的百年陈货，甚至是人类的千年陋习，反祖式的野蛮。何其的不协调！但是人间有两种火：一是光明之火，燃遍了全球、全国奥运的和平、友谊、希望的圣火；一为阴火，过去和现在世界尚存的战火与仇恨之火。笔者希望自己的心血像一缕涓涓细流能湮灭后一种阴火的火苗与火种，让地上的圣火更加光辉灿烂，作为我的敬意与献礼。

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的智慧，首先它是和平的，按法治精神，友好的竞争。君子之争是求诸己之争，以技取胜，以智取胜，以德取胜，也有服输精神，不耍无赖。胜者有卫冕之志，败者有再厉之心。提高自己，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这是个同向性的竞争。它越竞争越团结，越高尚，越精彩。所以，世界奥运会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为人类通过运动增进健康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不仅如此，它还为人类作出了竞而无仇、争而不斗，内求诸己，外重友谊的榜样，也显示出和谐共生到快乐共生的美好前景。共生论视之为“圣洁竞争”，它的意义远远超越出奥林匹克运动场，而是以奥运村中和平友谊的气氛广及于地球村，让这种圣洁竞争的光芒照耀着全世界。

注 释：

[1][2][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 卷，第 348 页；第 9 卷，第 570 页；第 7 卷，第 155 页。

[4][5]《古兰经》，马永真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7-39 页；第 31 页，第 42 页。

[6] 白乐天、李凤飞：《世界全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一卷， 第 77 页。

[7] 见百度网相关条目。

[8][9][10][美] 马文·佩里主编，胡万里等译：《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429—431 页，第 445 页，第 502—507 页。

[11]《武汉晚报》2006 年 11 月 14 日第 25 版。

[12] 网易论坛：龙的传人 Cauzer。

[13] [1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第 6 页；第 2 卷，第 602 页。

[14] [意]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83-184 页。

[15] [意] 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 21 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 213-217 页。

[16] [美] 莱斯特·布朗《没有国界的世界》，纽约，1973 年版，转引自田志力《全球开放论》，东方出版社，1990 年版，第 77 页。

[17] 参见苏长河《非国家行为体与当代国际政治》，《欧洲》，1998 年第 1 期。

[18] 布特罗·加利：《加强联合国》，美国《外交》季刊，1992 年第 11 期。

以上[14]-[18]均转引自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百度网，范文库，fwgy16.com。

[20] 董崇山：《社会资本主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94-295 页。

[21] 百度网，相关词条。

[22] 转引自《顾准文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贵州人民出

版社，1994 年，第 1 版，第 319—340 页。

[23]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98 页。

[24][25]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49—150 页，第 159 页。

[26][27] 郭翔、鲁士恭主编：《犯罪学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29 页。

[28] 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英文原著，叶巍，王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42—144 页。

[29]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7—129 页。

[30]《隋书·炀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第 5 卷，第 14 页。

[31]《史记·吕后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第 1 卷，第 43、44 页。

[32][33]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117 页；黄万盛：中文本序。

[34]《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二册，第 873 页，“专政”辞条。

[35] 列宁：《政治家的短评》<1920 年 2 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30 卷，第 322 页。

[3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1412、1413 页。

[37]《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 63 页。

[38]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 月—9 月），《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3 卷，第 190—191 页。

[39]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4 卷，第 10 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1415 页。

[41] 列宁：《论对马克思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 年 8—10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64 页。

[42][43]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雅病》（1920 年 4 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212 页；第 192 页。

[44][4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452 页；第 484 页。

[45][47]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 3 月），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内刊语录本）第 255 页；第 139 面。

[48][50] 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香港新苗出版社，2007 年，第 405 页；第 361 页。

[4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原载 1967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1 卷，第 251 页。

[52] 转引自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百度网。

[53] 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香港新苗出版社，第 216-217 页。

[5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第四卷，第 205 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85-286 页。

[56]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 4—5 月）《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3 页。

[57]《列宁选集》，第四卷，1965 年，第 192 页。

[5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第 368 页。

[59]《列宁文选》，人民出版社，第 1018—1019 页。

[6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 1 卷，第 12 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 37 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07 页。

[63] 本节引自谭培文：《马克思利益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0—51 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3 页。

[65]《炎黄春秋》，2008 年第 7 期，第 75—77 页。

[66][[70][71] 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香港新苗出版社，第 157 页，第 143 页，第 151 页。

[67] 胡绩伟：《馀丝记》，载于《争鸣》2008 年第 3 期，第 52 页。

[68][69]《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25 页；第 37 页。

[72] [73] 高艳东：《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载《现代法学》2006 年第二期。